

# 闽学研究

## 编辑委员会

顾问：陈 来

编委会主任：陈庆元

编委会副主任：方宝川 谢必震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照南 王岗峰 王晓德 方彦寿 叶松荣  
朱人求 朱杰人 朱高正 汤漳平 李豫闽  
连 榕 陈 颖 陈支平 陈永森 张品端  
张善文 林庆彰 郜积意 黎 昕

主 编：陈庆元

副主编：方宝川 谢必震

编辑部主任：陈 颖

# 闽学研究

(季刊)

2015年第4期(总第4期)

---

---

## 目 录

### · 朱子学 ·

朱子教育思想与实践发微 ..... 王志阳/1

《朱子家训》的现代价值 ..... 张 蕾/13

### · 闽学源流 ·

李珥对朱子学的继承和阐发 ..... 张品端/20

### · 闽学名家 ·

严复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评判与改造 ..... 孙汉生/30

白玉蟾与《白真人集》····· 徐 杰/40

林弼名字考证····· 张婧雅/49

叶向高年表····· 赵莹莹/52

· 闽学与诗学 ·

龚用卿诗歌中的“馆阁气”····· 林晓玲，官伟伟/77

《九歌》异代有嗣响

——黄道周《九诉》析论····· 郑晨寅，王照年/81

横槊论兵亦壮哉，海天形胜谈笑来

——张际亮与金门奇人林树梅的倡酬述论····· 陈 茗/88

浯江林豪首渡台湾诗文及行止探究····· 宁国平/92

曹学佺石仓诗话（上）····· 陈庆元/116

# Journal of Fujian Studies, No. 4, 2015

---

## Major Contents

- A Probe into Zhu Xi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 WANG Zhiyang/1
- The Modern Values of *Master Zhu's Homilies for Families*  
..... ZHANG Lei/13
- Li Er's Inheritance and Expansion of Zhu Xi Studies  
..... ZHANG Pinduan/20
- Yan Fu's Critic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ntality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 SUN Hansheng/30
- Bai Yuchan and *Anthology of Daoist Master Bai* 白真人集  
..... XU Jie/40
- The Name and Courtesy Name of Lin Bi: A Historical Account  
..... ZHANG Jingya/49
- A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Ye Xianggao  
..... ZHAO Yingying/52
- An Analysis of the Solemnity and Elegance of Gong Yongqin's Poems  
..... LIN Xiaoling, GONG Weiwei/77
- A Twin Poem of *Jiu Ge* (*Nine Odes*) in a Different Age  
——An Analysis of Huang Daozhou's *Jiu Su* (*Nine Appeals*)  
..... ZHENG Chenyin, WANG Zhaonian/81
- On th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and Friendship between Zhang Jiliang and Lin Shumei,  
the Singular Poet in Jinmen, by Analyzing Their Poetic Co-works  
..... CHEN Ming/88
- A Study of Lin Hao of Wujiang Academy in Jinmen and His Poetic Writings and Activities during  
His First Trip to Taiwan Island  
..... NING Guoping/92
- Cao Xuequan and His Poems: Part I  
..... CHEN Qingyuan/116



# 朱子教育思想与实践发微

王志阳<sup>1,2</sup>

(1.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福建 福州 350007;  
2.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朱子一生以传道授业作为最重要的职业。在漫长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朱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 获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有教无类是朱子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精髓, 因材施教则是朱子教育思想的关键环节, 两者通过读书法得到完善和发展, 成为中国教育史的一座丰碑。

**关键词:**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读书法

《宋史》朱子本传载:“熹登第五十年, 仕於外者仅九考, 立朝才四十日。”<sup>①</sup>其余时间虽有丐祠的虚衔, 但均是在家从事教育活动, 即使朱子在外担任地方官时也时刻注意教育事业。如同安主簿时期, 朱子从1153年开始主管县学, 有因县学之事和泉州学教授闹矛盾, 于是整顿县学, 颁布文件, 试补弟子员等事宜; 在南康军时期, 整顿郡学, “四五日到学中, 为诸生诵说”<sup>②</sup>; 在漳州知州任期内, “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学, 视诸生, 讲小学为正其义, 六日下县学亦如之。又创受成斋, 教养武生, 新射圃, 时督之射”<sup>③</sup>; 在潭州知州时期, 更是下令修复岳麓书院, 发布《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 且亲自前往教授学生; 在朝四十日的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的任务便是给宋宁宗讲书。由此可知, 朱子在任实职之时, 亦未远离教育教学事业。因此, 朱子一生最为重要的职业当是教师, 被称为教育家, 实至名归。

本文从朱子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精髓、教育教学方法、典籍研究法三大方面来观照朱子的教育教学思想与教育实践。

## 一、有教无类: 朱子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精髓

“有教无类”语出《论语·卫灵公》, 朱子注曰:“人性皆善, 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 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 则人皆可以复於善, 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sup>④</sup>由此朱子对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成为朱子本身教育理念的核心精髓。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常规重点课题“福建朱子学派教育实践研究”(FJJKCGZ15-012)。

**作者简介:** 王志阳, 男, 文学博士,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 主要从事朱熹及考亭学派研究。

① 脱脱:《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年, 第12767页。

②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1482页。

③ 《光绪漳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 第485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210页。

有教无类的具体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我看朱子有教无类的思想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朱子门人数量多，朱子是南宋乃至中国传统教育中学生人数量最多的学者。陈荣捷《朱门之特色及其意义》对朱子弟子的统计最为详尽，他梳理了《宋元学案》《宋史》《朱子语类》《朱子实纪》《经义考》《考亭渊源录》《宋元学案补遗》等典籍的优缺点之后，先从门人的定义入手，统计各种文献后，获得结果如下：

本书叙述六百二十九人。其中依上述标准得足称门人（连家学）者四百六十七人，又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共弟子四百八十八人。诸书易纬弟子而实只是讲友者六十九人，诸书作为弟子而实既非弟子亦非讲友者七十二人，诸书重误者十四人。换言之，诸书以为弟子而今证实其只是讲友或直与朱子学术无关者一百四十二人。从《语类》考究，确证其曾请教故是弟子而为诸书所未载而今乃增入者三十九人。<sup>①</sup>

这是陈荣捷统计之后的具体人数，因其依据的文献较《宋元学案》《宋史》来得普通，其结果必然存在疏漏的情形，不能全面反映朱子门人的情况。陈荣捷十分清楚其统计结果，故说明如下：

此四百百之数，乃指知名者而言。其不知名而未考者，即不倍此数，亦必相若。长沙一夕已有七十余人请教。今湖南知名者仅十五人，只五分之一耳。苟以此比例，则朱子弟子总数，可达数千。陆游谓：“朱文公之徒数千百人”，不为过也。然只以知名之四百八十余人而论，数目之大，孔子而后实所罕见。孔子门人三千，盖言其多。知名者共一百一十二名。年代久远，人数当必数倍于此。孔子学徒之众，比当时及以后几百年任何一人之多，显是事实，孟子谓杨墨之徒盈天下。墨氏号称显学，然《墨子·公输》说：“弟子三百人”而知名者不过二十四耳，……朱子绍熙五年（一一九四）以上疏得罪权柄韩侂胄（一一五一—一二〇二）解侍讲职东归，经江西玉山县，讲学于县庠。听众若干人。程珙座中两问，偶尔发言，实非特自求教，故非弟子。《宗派》与《学案》以为门人非是。<sup>②</sup>

陈荣捷的解释合情合理，辨析过程理据完整可信，即朱子门人为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教育第一人，学生数量亦属第一人。为了说明其观点，还把朱子门人和二程门人、王阳明门人的数据相比较，得出：“故谓汉后朱门人数居首，并非过言。”<sup>③</sup>

从上论述可知，朱子的门人弟子当不只几百人之数，朱子长期在福建各地书院讲学，弟子遍天下属事实。

第二，朱子的学生遍布南宋各地，使得朱子学，乃至理学的传播得到了南宋各地学者的遵从，由此确立了理学的正统地位，最终取代了南宋初期的王安石新学地位。

据何佑森统计，朱子学生在当时的地理分布遍及南方各省，甚至影响到北方，如《两宋闽学之地理分布》图1、图2所示。

何佑森在其文中着重说明了其统计的依据：“这篇论文的写法是换了一种方式，根据《宋元学案》和《宋史》上的学者文人，配合两宋行政区域的划分，画出三类的图表：一是以时代先后和地区为中心，一是以地域和学派为中心，一是以学派和学者为中心。凸后附有统计表。”<sup>④</sup>显然统计以《宋元学案》和《宋史》所载录的学者作为统计对象并未全面反映朱子学的具体传播范围，因为《宋元学案》属于清人作品，而《宋史》属国家正史。前者因历史较为久远，资料不全或者散落的情形较多；而《宋史》则是国家正史，凡是在学术上或者政治上未有足够大的政治影响力的学者均不会被收录，必然导致了两者收录的朱子弟子情况存有不全的情形，而以其为统计结果亦必然导致不全的

①②③ 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8、9页。

④ 何佑森：《儒学思想：何佑森先生学术论文集·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第185页。

情形，如王梓材、冯云涛编撰《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补遗》增补朱子门人，故何佑森的统计有一定的疏漏。但其所依据的两者文献均属于权威资料，其所载录的学者均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影响，当可比照孔子时代的三千学生中的七十二贤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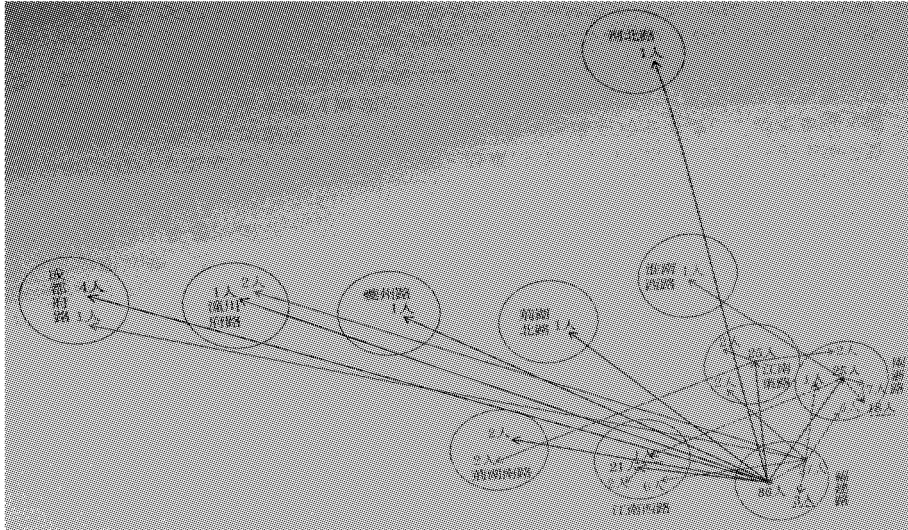


图1<sup>①</sup>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福建路	两浙西路	两浙东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36	25	25	21	4	3	2	1	1	1	1	1	一 总人数
27	25	4	3	1	2	2	1	1	1	1	1	二 再传人数
3	19	1	1	1	1	1	1	1	1	1	1	三 三传人数
10	10	2	2	2	2	2	2	2	2	2	2	四 四传人数
126	79	29	32	5	1	4	3	1	1	1	1	合计

图2<sup>②</sup>

上引第二图的显示结果则正如何佑森所作说明：“闽学以一传最盛（见统计表），再传三传的学者都集中在福建和两浙两路。”亦可看从旁佐证朱子本人的教育教学范围远较其弟子来得广。

第三，朱子弟子的职业遍布了当时的各行各业。

①② 何佑森：《儒学思想：何佑森先生学术论文集·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第196、197页。

朱子选拔弟子未对学生身份或者家世作任何限定。中国传统职业不外乎士、农、工、商四途，朱子门人所从事的职业亦属四者之列。

在朱子众多弟子中，当高官者有之，如詹元善担任广西安抚使，黄榦亦是高官，但是浙西人的发迹远在从学于朱子之后，甚至是在朱子过世之后。对于此事，陈荣捷亦有详细考辨，他说：

从事实考察，则朱子门人四百六十七人之中，有官职者只一百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私淑二十一人之中有官职者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二。合共四百八十八人，有官职者一百四十二人，占拜恩之二十九，显属少数。即其讲友七十二人，亦只三十三人有职，占拜恩之四十六而已。若谓弟子之中，有许多名里不详，其中应以一半有爵禄计者。予应之曰，其名里之缺，正因其无职无衔，无爵无禄之故。是以墓志不闻，方志不载。全世界任何文化，任何社会，其知识阶级，恐未有如是之平民化者。<sup>①</sup>

上述统计说明了朱子一门与当时官僚之间无密切联系，朱子一门弟子确实显贵者不多。宋代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凡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通过科举都可以获得官员职位，朱子弟子中有从事“士”一途的人，显然是有的，只是人数极少。朱子门人属普通士人居多。

在封建社会中，处于地位最低的是商人；而许多的朱子门人属此列。在宋代，商业活动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引来了大量仕途不得意者参与经济活动。朱子一生仕途不顺，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其具体情形可见前文），转而投身商业。印刷业活动是朱子一项重要活动，相应的具体操作则由其学生帮助完成。朱子从事商业活动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即朱子帮人撰写文章和刻书售书两项内容。

帮人撰写文章和刻书售书两项活动，属文化产业和出版行业活动，这两项活动在朱子主要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如高令印引朝鲜李退溪《答李仲久问目》所说：

文字钱未详其事，然详下文所云，似是刊行书册所贸之钱，则之所主而官省所领者也。先生与诸人尝设书肆刊印书册。……书肆所引书册所贸之钱，虽在择之处，亦朋友间可以随便通用之物，故如是处之耳。<sup>②</sup>

这是李退溪解释朱子在《与林泽之》第七书中所说的“文字钱”<sup>③</sup>时所说的内容，当中涉及林泽之帮助协理文字钱的事情。至于出版图书典籍，则需要有校刻、撰写、管理等各个角色来完成，朱子门人中当有众多的学者参与，使得整个图书印刷能够顺利推进。朱子门人中还有从事印刷雕刻手工艺的工作，即南宋的活字印刷，涉及文字的版的雕刻内容，以及图章篆刻等。

可以说，朱子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带头人。朱子的弟子遍及各行各业，概因他选择学生能够摒弃各种传统偏见，做到有教无类，使得儒家理学知识再次向基层社会沉淀，进一步普及文化，使得儒学世俗化进程更加快速推进。

## 二、因材施教：朱子教育实践的关键环节

因材施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优秀传统，自从《论语》开始，因材施教便成为有成就的教育家的共同特点。《论语·先进》载：

<sup>①</sup> 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

<sup>②</sup> 《增补退溪全书》第一册，朝鲜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一九八四年影本本，第三一三页。见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sup>③</sup>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六，《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45页。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白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白也兼人，故退之。”<sup>①</sup>

冉有与子路之间因性格差异，导致了孔子对其提出了不同的行为规范，其目的当是都是为了达到没有“过犹不及”的中庸境界，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引用张栻的观点如下：

张敬夫曰：“闻义固当勇为，然有父兄在，则有不可得而专者。若不禀命而行，则反伤於义矣。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则於所当为不患其不能为矣，特患未之之意或过，而於所当禀命者有阙耳。若冉求之资禀失之弱，不患其不禀命也，患其於所当为者逡巡畏缩，而为之不勇耳。圣人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於义理之中，而使之无不不及之患也。”<sup>②</sup>

朱子引用张栻的观点以证自身对此文献的内涵的理解，这便可以看到南宋三大学者的朱子、张栻均是赞同因材施教的观点，这是南宋学者对教育的一致看法。朱子高度赞同孔子的作法，并且从哲学原理上进行论证。他说：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sup>③</sup>

人性本善，是朱子一贯加持的观点，但是他对人性的具体表现则以气的构成差异来加以解释。此处所言木、金、水、火实是使用了周敦颐《周子太极图》的金木水火土构成时间万物的形态。至于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则语出《孟子》，为人的本性内容。朱子以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来解说人的各种具体表现，而归因于五行构成的比例差异。这是一个使用传统哲学语言来解释人的性格差异的方法。其实质内容为人的本性均是善良的，但是其个性都是因为其内在气质的差异，在西方心理学上就是血质的差异，由此形成了人性格与思维的差异。

正是人性格气质的差异，决定了人对事物的接受过程充满着变数。朱子说：

气禀所拘，只通得一路，极多样：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尽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或工於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蚁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於亲而薄於他人。……<sup>④</sup>

此处所言是以极端情形来进行说明，如“能尽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或工於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的情形，所举例子是以唐明皇对待各位弟弟非常友爱，但却杀害臣子、儿子、妻子等，这是前文所引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个方面的差异。由此可知，识义理、读书等亦当有此情形，只是气质之性要改变亦是非常困难。《朱子语类》载：

问：“气质弱者如何涵养到刚勇？”曰：“只是一个勉强，然变化气质最难。”<sup>⑤</sup>

此处所谓变化气质，是指改变其自身内在的五行成分构成所造成的各方面影响，从而使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者的构成产生差异，也使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变化，即使其不仅通利害且识义理，工百艺且读书。但是这样的改变需要扭转其自身的各项特质，用“勉强”方法，但是勉强终究是强扭的瓜不甜，故朱子认为改造一个人的气质最难。朱子在教授弟子之时主要从顺势而为入手，着重于学者自身的学习，并通过学习逐步改造，至于其结果能否达到圣人之徒，则是看学生自己的造化了。朱子在教育廖德明时说：

①② 《四书章句集注》，第162、163页。

③ 黎靖德：《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④⑤⑥ 《朱子语类》，第205、3588、3588页。

今学者皆是就册子上钻，却不就本原处理会，只成讲论文字，与自家身心都无干涉，须是将身心做根抵。<sup>①</sup>

读书本身不是目的，需要读书人时刻以改造自身作为根本任务。这就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模式了。中国人以圣人的德行作为自己的修行的标准，以圣人作为自身的修行目标，而圣人的模式便是“内圣”“外王”之事，而朱子时代的理学是在王安石改革失败之后，其结果正如余英时所说：“只有‘内圣’之学大明以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sup>②</sup>正是如此，故朱子强调以自己身心作为根本。但实质隐含了以内圣作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实现外王之事。朱子又说：

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於期间，然后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敛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间说时事，逐人说几件，若只管说，有甚是处？便截断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应物皆然。<sup>③</sup>

正是以自身作为学习培养的首要目标，其他内容则属于外在之事，而秉持内心，时刻修行，其结果便是为了实现外在遇事应物的得宜。朱子以修礼书为例：

须培拥根本，令丰壮。以此去理会学，三代以下书，古今世变治乱存亡，皆当理会。今只看此数书，又半上落下。且如编《礼书》不能成就，亦是此心不壮，须是培养令丰硕。吕子约“读三代以下书”之说，亦有谓。大故有书要读，有事要做。<sup>④</sup>

每个人要以自身为根本，培养丰壮之后，才能够真正理会载录天下兴亡之法的典籍，也才能够真正实现“外王”之事。结合自身身心读书，才能把事做好。

朱子在长期讲学中，所教授学生甚多，但是其学生成长为学术大师的人却不多，而是呈现出了各自的工作重心。对于朱子门人的学术成就问题，有的人说朱子门人已经没有任何创新了，如蒙培元《理学的演变》：“朱熹学派，人数甚多，弟子满天下。其及门弟子著名者有蔡元定、黄榦、辅广、陈埴、蔡沈、李燾、陈淳等人，大都摭拾遗说，对朱熹思想没有多大发展。王夫之说：‘朱子没而嗣其学者无一人，是可为长太息者也！’（《宋论》卷十四）这是很正确的。”<sup>⑤</sup>有的则认为朱子门人在学术方面难以超越，是由于朱子学术体大思周的缘故，如陈荣捷《朱子门人》说：“朱门之所以逊色之原因不一，其显然者则朱子之理学统系完成，难有发展之余地。二程理学尚在初期。理学之思想未完成。仁之观念尚在发展中。理学在二程为一新世界。于是上蔡龟山个能以觉或以天地一体言仁，别辟新境。在朱门则盛极难继，只得守成。”<sup>⑥</sup>事实上，持上述言论者的最为重要依据的确是朱子之后实未有能够超越朱子之学的弟子。

朱子在学术思想方面达到了二程以来各方面的集大成者，而朱子弟子们都没有从朱子的整体思想出发，更多的是从朱子的某方面来发展其学术思想，使得朱子门人难以超越朱子本身。比如，在礼学方面有黄榦、杨复；在易象数学方面有蔡元定；在理学的普及方面有陈淳；在《尚书》学方面有蔡沈；在治国理政方面有黄榦、詹元善，等等。这既是朱子教授弟子不拘一格的重要原因，也是朱子贵在依照学生自身气质因材施教的结果。

我们以朱子门人的两大宗师，即朱门正宗黄榦和紫阳别宗陈淳两人做比较，便可获悉朱子因材施教的实践及其成果了。

在人生经历与求学方面，黄榦更得朱子的真传。《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淳熙三年条载：“春，

①③④ 《朱子语类》，第3588、3590、3590页。

②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10-411页。

⑤ 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页。

⑥ 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始见朱文公于五夫。文公馆先生於屏山潭溪之侧。先生业精思苦久而益笃，文公深知其有得於道。於是传授付畀之意。”<sup>①</sup>此时黄榦刚好25岁，而淳熙九年条载“文公以仲女归于先生，馆于紫阳书堂”<sup>②</sup>，此后直至朱子过世，黄榦是追随朱子最长时间的弟子，而且黄榦亦因朱子的缘故获补将仕郎，即绍熙五年“七月，宁宗即位。文公以捧表恩奏补先生将仕郎”<sup>③</sup>，这实际表明朱子对黄榦所寄予的厚望，实非其他弟子可比。事实上，朱子也明确说：“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贤者不轻。”<sup>④</sup>与朱子长期相传的结果，便是黄榦在学术方面，主要着力于礼学及其他经学方面，著有《经解》。在政治事功方面，据《宋史》本转载，黄榦则在知临川令、知新淦县、通判安丰军、鞫和州狱、知汉阳军、知安庆府等处任捕蝗虫、断案、赈灾、边防及社会治理等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政绩卓著，堪称能吏。<sup>⑤</sup>

与黄榦长期跟随朱子不同，陈淳最后以“紫阳别宗”或者朱门第一人的身份奠定自己地位，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学术思想成就。陈淳与朱子直接接触时间甚短，仅有朱子知漳州时的绍熙元年（1190）十一月到绍熙二年（1191）四月，以及朱子去世年前的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中旬到庆元六年（1200）正月五日，两者时间之和仅有八个月左右。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通过书信讨论学术问题，故陈淳以学术见长。《宋史》本转载：

及朱熹来守其乡，淳请受教，熹曰：“凡闻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於慈，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类推也。”淳闻而为学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答者，则称淳善问。后十年，淳复往见熹，陈其所得，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切要语，凡三月而熹卒。<sup>⑥</sup>

可见朱子对陈淳所教授的内容实与黄榦有异。“根源”是朱子针对陈淳学术思想问题做了指导，还给陈淳指出了其后续学习的要点是下学之功，这两者是陈淳学习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本传写到：“淳追思师训，痛自裁抑，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sup>⑦</sup>这概括了陈淳主要的治学方向，但仍过于抽象，事实上，陈淳是在“根源”二字上着手研究朱子学术思想，并且通过自身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践其“根源”二字，才完成最为重要的成果《北溪字义》，使之成为理学名著，不仅上接朱子之学，还贯穿二程以来的理学思想；而更为重要的影响是陈淳使理学思想由朱子时代的《四书章句集注》形态转变为启蒙时代的《北溪字义》，使得理学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理学的影响力亦更为深远，大力推进了理学的社会普及程度。

作为朱子学术正宗的黄榦和紫阳别宗的陈淳，两者与朱子之间的学术交往和交集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均从朱子的身上学到了适合自身的治学方法和处事方法，成就各有千秋。前者，朱子把黄榦带到南康军、漳州、潭州等地观摩学习治国之策，并且教授各方面经学内容，故其事功达到了当时朱子门人的顶点；而后者，一生未正式入仕，以教书为业，并研习儒学学术思想，走出了以字为本原的治学路径。两人虽有差异，都在朱子指导之下获得了巨大成就。可见朱子对学生因材施教之方法的科学性。

### 三、读书法：朱子教育思想的贯彻路径

朱子长期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不论有教无类，还是因材施教，都是从先儒的教育教学活动发展来的，其读书法亦有其根源。朱子是孔子之后长期从事教育教学活动，能够学贯六经的学者。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观中最具创新性的思想。

①②③ 郑元肃、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集》，元刻延佑二年重修本。

④⑤⑥⑦ 《宋史》，第12777、12778-12782、12788、12788页。

读书之法，凡是存有文字就有读书法，其起源实无法确考，但是有文字确切记载，又影响深远的则是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之法。《论语》载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便是最早的读书之法。但是孔子的读书之法并未被系统阐述，零散存留于《论语》《礼记》等先秦两汉典籍中。与之不同，朱子的读书法是在长期教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完善，最后由朱子学生整理而成，即辅广所载录：“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sup>①</sup>这便是辅广从自己所听到的朱子日常教学的内容，或者其他文献中获得的读书方法。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上述内容进行提炼，并在元代经由国子监的文件而颁行于当时的各级学校，而程端礼在此书的卷首有言：“日程节目主朱子教人读书法六条修，其分年主朱子宽著期限，紧著课程之说，修。”<sup>②</sup>这使得朱子读书之法成为了当时全国各级学校的教学大纲，朱子的教育思想亦由此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学习中国传统典籍最为重要的方法。

### （一）远大理想与遵循规律：居敬持志与循序渐进

读书本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想克服学习过程中的重重障碍，必须有远大的理想，这便是朱子所说的居敬持志。程端礼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说：

所谓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於应事，读书时敬於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需要养得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说如此。<sup>③</sup>

这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大体概括了朱子对居敬之说的看法。但是程端礼引用此处的观点，显然并未涉及持志部分，仅是引述朱子的观点，未对观点进行剖析，以便学习者能够获得更为简明的理解。事实上，朱子主要讲述的内容很简单，即把心固定于所从事的事情，集中精神解决问题，其内在的心理学依据，是清空心中各种杂念，便于充分调动学习者的潜力，在读书方面，则能够帮助记忆；在解决问题方面，则能够发挥知识储备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程端礼仅抽取这条具体语录来解释朱子的居敬持志，把居敬持志作为朱子读书法的最后一条加以排列，对居敬持志的观念价值的理解，显然过于狭隘，因为居敬持志涉及学习者内在志向的问题。而辅广则把居敬持志放置于朱子读书法的第一条。事实上，朱子的读书法并非简单的以读书为读书，而是以读书为手段，始终以内圣外王作为读书的目标。《朱子语类》载：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sup>④</sup>

《大学》是个大坯模。<sup>⑤</sup>

今且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如此看得一两书，便自占得分数多，后却易为力。圣贤之言难精。难者既精，则后面粗者却易晓。<sup>⑥</sup>

由上述三条可知，朱子把《大学》定为首读之书，其原因在于《大学》能够确定学习者读书的规模，而其他内容仅是作为实现学习者规模的材料而已。事实上，朱子对《大学》的推崇的根源在于《大学》提出了一个实现圣人事业的具体途径，即《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便是以修身为起点，以平天下为终点。因此，所谓居敬持志，并非仅仅是指读书而言，而是在读书之前要立下规模才能够真正把握得住读书的终极目标，虽然朱子认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

①②③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附纲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1、121-122页。

④⑤⑥ 《朱子语类》，第419、420、420页。



本始所先，末终所后。”但是朱子在此仅是以其重要性及先后顺序为着力点，而其终极目标还是外王之事。《朱子语类》载：

说《大学》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节看。”<sup>①</sup>

朱子的思想虽然承接自古代儒学，但是把《大学》提升到四书之首，其社会背景正如前引余英时所言的内在逻辑，故所谓修身为本，外王为末，实则是只有穷理之后，体会此理，才具有推此理的本领。事实上，能够明德于天下的人都是圣人了。故朱子希望学习者以圣人作为修身的目标，而非以单纯读书为目标，读书仅是属于致知格物的一种途径而已；以圣人作为目标，外在之志无疑是平天下之事。

因此，收敛身心，专一做事，始终以内圣外王作为自身的能力目标，始终以恭敬之心对待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方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但是内圣外王毕竟是过于遥远，并非人人能够达到，亦不是人人能够实现，故朱子便在《大学》的注解中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循序渐进当有两方面考量，一指读书方面，另一是指修身方面。读书与修身为朱子教育思想的两面，关系到朱子教育思想的多方面原则的多维度关照。

读书方面，程端礼解读的内容，甚为到位。《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说：

其所谓循序渐进者，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字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着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其循序渐进之说如此。<sup>②</sup>

程端礼对朱子在读书方面的循序渐进之道理解读大体两方面：一是从字、句、篇、一书、两书直至儒家经典内容，要逐步解决，才能真正完成读书的过程。二是道学不明的根源在于读书未能循序渐进。

当然程端礼仅以此条语录来看待朱子的循序渐进之法，显然过于简单，《大学》之道是从明理、体验理到推行理的过程来实现的，这是从读书向处理事情的原则转换。《朱子语类》载：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说得详。<sup>③</sup>

要想成为圣人，必须先就小事、日常事做起，这需要学习者从圣人所教处着手去做。这便是朱子提倡从小学开始做起，以大学作为提升阶段的重要原因。《朱子语类》载：

“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冗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sup>④</sup>

此处大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古人有小学制度作为保障，而使学习者能够以小学工夫逐步学习，不给你在做事中，日积月累达到圣贤坯模。二是小学制度消失之后，已经无法复原小学工夫来实现圣人坯模，则学者仅能通过以敬为修心之法，实现圣人坯模，而其以为主之法，则又是回到了前述“居敬”之方了。

<sup>①③④</sup> 《朱子语类》，496、276、269页。

<sup>②</sup>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附纲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0页。

## (二) 全方位接收文献内容, 完成自我改造过程: 熟读精思, 虚心涵泳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历来为儒家学者所推崇, 而传统社会亦以此法推进教育的发展。朱子以熟读精思作为学习的主要方法。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说:

所谓熟读精思者, 朱子曰:“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 必须成诵。真学道第一义。遍数已足, 而未成诵, 必欲成诵。遍数未足, 虽已成诵, 必满遍数。但百遍时, 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 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 说不去, 心下若存若忘, 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 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 读得正文, 记得注解, 成诵精熟, 注重训释文意, 事物各件发明相穿纽处, 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 只是虚设议论, 非为已之学也。”其熟读精思之说如此。<sup>①</sup>

程端礼此处所引用朱子的观点, 包含了熟读与精思两部分了:

一是熟读。读书的遍数达到什么程度才是真正的熟读? 这便是朱子最先注意的内容, 他引用的观点是战国末期的大儒荀子的观点, 要通过读书而达到背诵的程度, 读书需要以遍数作为保障, 这比单纯背诵来得重要, 故有“学道第一义”的感叹。虽然朱子未提及其所熟读为何书, 但从前文所言居敬持志的内容可知, 其所读内容当是四书五经的内容, 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古典文献的学习形态, 而其目标是为了达到全方位熟悉文本。

另一方面是精思。“学而不思则罔”是朱子极力避免的。在熟读之后, 提出了思考“事物各件发明相穿纽处”, 对文献内容的各个关键环节都进行多维度思考, 弄清楚其内在的发展变化情形, 由此真正掌握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 其思想和文献融为一体, “如自己做出来”这便是人与文献合一的形态, 在此基础上, “向上有通透处”提出了要由文献本身上升到提炼内在之理的标准, 即前文所言的内圣外王之道的高度。由此可知, 思考文献的内在之理、目标仍在于“向上有通透处”, 而非就文献而读文献。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 熟读文献, 达到自然成诵, 并以此为基础, 掌握文献内容, 思考文献内在之理, 提炼出向上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方法。

虽然文献的内容能够通过熟读精思而达到全方位解读, 但是熟读文献毕竟仅是文献内容而已, 学习者要能够通过熟读精思而完全转化为自己内在的思想。为此, 要避免读书成了为人之学, 必然提出了为己之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 虚心涵泳。

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说:

所谓虚心涵泳者, 朱子曰:“《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 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 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 自家只平者心去秤停他, 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 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 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 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底意思, 其有不合, 便穿凿之使合。”其虚心涵泳之说如此。<sup>②</sup>

此处朱子专就“虚心”的内容进行了系统解说, 其内容大体有二: 一方面, 学者需要从内心方面放弃自身的观点, 先从圣贤所说的内容入手, 如理解文献内容, 从而达到真正理解前贤与诸家的观点, 为庄子所说:“心斋”“坐忘”的空白状态, 而以文献内容为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 学者需要破除自身成见, 不能带着自身固有的观点来阅读圣贤的观点, 因为这样会穿凿或者割裂文献观点, 容易造成对文献的误读。

事实上, 朱子是赞同以六经注我, 而反对我注六经。但是朱子的治学方法未完全以六经注我, 而

<sup>①</sup>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常附纲领》, 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第120-121页。

<sup>②</sup>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第121页。

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同时进行，最终达到传统与创新的同时。这便是虚心涵泳，即在虚心基础之上，再对诸家文献资料进行综合提炼方能完成对原有内容的提升过程。《朱子语类》载：

傅至叔言：“伊洛诸公文字说得不恁分晓，至先生而后大明。”先生曰：“他一时间都是英才，故拨着便转，便只须恁地说。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圣说话，虽后面便生一个圣人，有未必尽晓他说者。盖他那前圣是一时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sup>①</sup>

此处本是论述朱子解经的经验，完全是针对注解经书的内容而谈，但是朱子在此论述过程中涉及了两方面：一是如何处理经文，二是如何处理诸贤的注文。两个问题是交杂在一起的，难以分开，故朱子对两者合起来讲述。朱子对经学文献，注重在其经文的字句的本身内涵，是因为经学文本属于作者因事立言立论的，后人的注解始终难以在全面知晓作者本意上再注解，故朱子仅能从本分注解；而对后来者的注解内容则需要加以比较辨别，才能真正获得其内容。由朱子的注经实践可知，朱子是以经学文本为主，参考阅读其他注解文献，并比较诸多文献之间的内容差异，才能够获得最佳注解内涵。这便是朱子自身所说：“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sup>②</sup>由此便有了朱子注经的一个典型模式：朱子注解原文的文字，并引用其他学者之说以备一说。这个目的正如钱穆《朱子学提纲》所总结的内容：

故朱子之四书学，一面极富传统精神，另一面则又极富创造精神。凡属理学新义之有当于创造性者，朱子亦已尽量纳入其《四书集注》与《章句》中。凡朱子认为于孔孟大传统有走失而无当于创造性者，虽程张所言，亦不阑入。或则仅收于圈外，不列入注之正文。使读者辨别其虽有发明，而非本义。故其《集注》与《章句》，实乃朱子自出手眼，确然成一家之言，纵谓解释朱子之自出己意，亦无不可。惟朱子自认其一家言，于孔孟大传统有创新，无走失，如是而已。<sup>③</sup>

钱穆虽于《四书章句集注》立论，但可以把上述内容扩大到朱子对诸经的注解。

因此，朱子对文献内容的解读，是虚心涵泳基础之上的比较分析，最终获得自己的真知灼见，即现代学者所言的拿来主义，亦或古为今用，以复古为创新途径。

### （三）知行合一：切己体察、着紧用力

以内圣外王为儒者最高目标的理学家，其教育思想亦是以培养学生具备内圣外王作为目标，故读书便需要知行合一，而其方法便是切己体察和着紧用力。

关于切己体察的内涵，程端礼说：

所谓切己体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於心，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覆。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渐渐如此，方有益。”其切己体察之说如此。<sup>④</sup>

朱子对切己体察的内涵包括了两个阶段：一是学习者需与道理合二为一，才能真正掌握道理的真谛。二是学习者需要从自己身上着手，把自己所思所想和圣贤言语所含内容之间进行比较，不断反省检查，从而不断提升自己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的能力。

关于着紧用力，程端礼说：

①② 《朱子语类》，第3445-3446、3446页。

③ 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87-188页。

④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附纲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1页。

所谓著紧用力者，朱子曰：“宽著期限，紧著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是甚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其著紧用力之说如此。<sup>①</sup>

程端礼此处引用的是朱子专门针对读书而言的内容，非常好地注解了“着紧”（即著紧）的内涵，即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事实上，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陈》正是以此为标准而修订课程。但是程端礼已经把朱子的读书法简单理解为读经典典籍了，这是一个比较肤浅的解读，也是朱子学的精髓在元代开始消退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朱子教育学生虽有以读书内容为讨论对象，如四书五经等内容，但是这些讨论均是在居敬持志的原则下来进行的，这便要求学生仅是以读书为途径，目标仍旧是内圣外王。故“用力”的内涵有在读书方面发力，但也包括了更为重要的内容，即在行动上用力去做。《朱子语类》载：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sup>②</sup>

读书是修身的一部分，而不能代替修身的内容。“用力”当包括读书，但是并不仅限于读书，当包括力行的内容，才能够真正完成修身的过程，而致知格物也正是《大学》所强调的修身内容的两条。在朱子的日常教育中，甚至把力行的重要性提高到致知之上，故有“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sup>③</sup>，这亦是因为典籍所言的道理毕竟不可能完整，故朱子强调以实践来深化典籍的内涵。他说：

书册中说义理，只说得一面。今人之所谓践履者，只做得个皮草。如居室中，只在门户边立地，不曾深入到后面一截。<sup>④</sup>

典籍的内容毕竟是讲究抽象的义理，仍旧需要依据自我的力行来补充义理的具体内涵与行为方式。故用力在于依据圣人典籍来指导自己行为，并着力于赋予典籍的具体行为方式和内涵，解决实际的问题。这便是要下功夫解决各方面问题，否则仅是典籍中的知识而已。朱子说：

学者实下功夫，须是日日为之，就事亲、从兄、接物、处事理会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则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将去。<sup>⑤</sup>

这便是以具体行为中坚持按照典籍的基本原则来做，而这显然不是仅仅读典籍能够获得的效果。正是下工夫于读书治学，更需要在日常行为中“勉行”，方能完成读书之效。

因此，着紧用力需要从典籍的阅读与修习中宽着期限，加紧学习，更需要在日常行为中以典籍思想为原则，指导自己的日常实践，以此实现内圣外王的目标。

#### 四、结 语

朱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秉持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使朱子学派的弟子遍布天下，而且分散于各行各业，实现了理学思想大众化、教育普及化的效果。朱子又通过因材施教，使朱子学派的弟子在外在事功和学术理论的修习过程中，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程。朱子最具创新性的精神便是创造了独特的读书法，使得后世学者不管是赞同朱子学，还是反对朱子学，都只能通过朱子读书法来获得成才的途径，使朱子学派成为一座后人挖掘不尽的富矿。

（责任编辑：丁 翔）

①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常附纲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1页。

②③④⑤ 《朱子语类》，第299、298、388、398页。

# 《朱子家训》的现代价值

张 蕾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 古代家训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朱子对传统家训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 使其推广普及有了可能。朱子家训内涵为: 倡导君臣有义、家庭亲睦、人际和谐、重德修身。它的教育价值在于要求每个人要正确对待自己与对待他人; 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把“仁”推广到生物甚至非生命的领域, 萌生出沟通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顺应思维, 争取实现“天人合一”的生存环境。

**关键词:** 朱子; 家训; 历史渊源; 思想内涵; 现代价值

《朱子家训》(以下简称《家训》)是关于治家、修身、处事的家教经典。《家训》以朴实精辟的语言, 提出了每一个人在家庭、社会中所充当的角色和应尽的伦理道德义务, 其内容所包含的理性光芒, 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明和深厚文化底蕴, 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价值。

## 一、“家训”的历史渊源

古代家训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亦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家训”一词而言, 最早见于《后汉书》里的《边让传》, 边让说:“髻髻凤孤, 不尽家训”, “人无父曰孤”, 没有父亲了就叫孤儿, 说我年幼时就成了孤儿, 没有受到父亲的训诫, 也就是没有听到家训。这是关于“家训”一词的最早说法。

关于家训的起源, 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把家训的起源推前到《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儒家经典, 甚至旁及《国语》《战国策》。<sup>①</sup>有学者认为:“中国家训的起源时间当在上古尧舜之时, 且归根到底是源于上古之时人们父子相传、口耳相授的生产生活实践。如果从时间上来断定, 则当是伴随着以血缘相系的家庭关系的形成而产生的”, 并认为尧舜是中国家训的创始人。<sup>②</sup>有的学者则不同意产生了家庭就出现了家训的观点, 认为只有家庭从“血缘家庭”过渡到宗族组织的出现和宗法制度的确立, 家训的起源, 始于此。理由是, 《尚书》中的《无逸》《君奭》《康诰》保留了周公训示子侄的许多真贵资料, 开了帝王家训的先河, 所以“周公则成为我国家训的创始人”。<sup>③</sup>

纵观诸多讨论中国家训起源的文章,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都想把家训的起源往前推, 越前越好、越

---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朱熹《小学》及其童蒙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影响”(项目编号: FJ2015B165 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蕾, 女,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英语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和朱子学。

① 刘剑康:《论中国家训的起源——兼论儒学与传统家训的关系》,《求索》2000年第2期。

② 林庆:《家训的起源和功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曾凡贞:《论中国传统家训的起源、特征及其现代意义》,《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古越好。这些观点虽然不失为一种研究的途径,但从文献、文体学的角度思考,那只是一些训诫子孙的言论,远不足以构成一种文献学上、文体学上的“家训”之体。也许,这些训诫之词可以成为形成“家训”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启迪家训形成的开蒙之作,但那毕竟不是“家训”。一般认为,“家训”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黄门侍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他是中国家训之祖。

从《颜氏家训》起,“家训”之体趋于成熟,“家训”之名得以成立,并一直影响到近现代。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家训著作最繁盛的时期。《中国教育史研究》考证,仅魏晋南北朝“据文献可考的至少有八十余篇(部)”<sup>①</sup>。颜之推《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朝初年,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家训之作。明人袁表曰:“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作《颜氏家训》,谆谆欲子孙崇正教,尊学问。”<sup>②</sup>历代评论,以颜氏之书为“家训”之祖。对此多有不同意见,但如果客观地分析,“家训之祖”之说,其实是名符其实的。因为《颜氏家训》开创了一种家训的著述之体。这种文体影响了其他的各种家训之著,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颜氏家训》共七卷,卷一: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卷二:风操、慕贤;卷三:勉学;卷四:文章、名实、涉务;卷五:省事、止足、诫兵、养身、归心;卷六:书证;卷七:音辞、杂艺、终制。从目录中可以看到,这几乎就是一本家庭教育的百科全书。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古人眼里,“家训”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不仅包含着人文之理、治家之要、为人处世之道、养心修身之神、品节风度之韵、治学问道之经,还包括为官出仕之箴、为文制艺之技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可见,家训就应该是一种对子孙的全方位教育,它应该包括处事立身的所有要素。

宋代,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都热衷于著“家训”,影响较大的有范仲淹《义庄规矩》、包拯《家训》、司马光《家范》、苏颂《魏公谭训》、叶梦得《石林家训》、吕本中《童蒙训》、陆游《放翁家训》、吕祖谦《家范》、袁采《袁氏世范》、真德秀《教子斋规》等。宋代的家训已呈现出非常规范和成熟的面貌,表现为内容的面面俱到、思想的深刻厚重与形式的相对稳定。如吕祖谦的《吕氏家范》,可以看到因袭《颜氏家训》的另一路发展。《吕氏家范》共六卷:卷一宗法,卷二昏礼,卷三葬仪,卷四祭礼,卷五学规,卷六官箴。显然也是面面俱到,但其关注的重点是“礼”。

元明清时代的家训,继续保持着繁荣的局面,尤其是那些世家大族为维系宗族可持续发展的忧患意识所驱使,对“家训”的制定、增删、沿袭及传承,形成了一种风气,促使了家训的发展和对外家训的研究。这期间出现了一篇影响极为广泛的“家训”,即朱伯庐《治家格言》。该篇《治家格言》共506字,用骈文写成,言简意赅,篇幅很精干,不作长篇大论。它从修身养性、治家之道到处世为官之要都有论及。由于它文字优美、音韵和谐、节奏明快,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被接受。从内容看,《治家格言》是《朱子家训》的阐发和延伸,把《朱子家训》哲理形象化了。如果把《朱子家训》比作纲,那么《治家格言》就是目。

中国的家训著作,从几百字的短文,到数十万字的巨著,但真正在历史上被公认的、具有较大社会与历史影响的,大约也就十几种。其中以《颜氏家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朱子家训》和朱伯庐的《治家格言》为最负盛名。

## 二、朱子对传统“家训”的改编

朱子对以往的各种“家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改革“家训”体的过程中,比较利弊得失,

① 陈学恂、金忠明:《中国教育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9页。

② 明·袁表:《庭帷杂录》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选择了一种相对比较科学而利于大众接受的方法。

首先，朱子把传统家训中的“论理”与“说事”相分离，以避免繁琐。如，他把司马光《家范》中的古今事例部分抽出来，另写了一本书，名为《小学》（十一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卷一“立教”，辑录古代圣贤关于率性、修道的言论；外篇：卷六“嘉言”五上“广立教”，与之对应，以前贤（主要是理学创始者）的嘉言及古代有关立教的故事羽翼之。类此，内篇之“明伦”，则有外篇之“广明伦”对应；内篇之“敬身”则以外篇之“广敬身”对应，如此等等。

其次，朱子把传统家训中具体的行为规范部分抽出来，另编了一本《童蒙须知》（又名《训学斋规》）。此书凡五卷，分别为：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他又把传统家训中有关“礼”的部分抽出来，编成《朱子家礼》一书。《朱子家礼》凡五卷，分别为：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

第三，朱子对传统家训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改造是把传统家训中最根本、最精髓的思想予以形而上的哲理化，把它们提升到哲学与“道”的高度，并以精炼的语音表达出来。这就使“家训”摆脱了芜杂而言不及义的弊端，使“训”之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显然，朱子认为，所谓“家训”，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人之所以为人及处事立身之大法，它具有优先性和纲领性。而一般的道德教条、具体的行为规范及礼仪制度则是对“大法”的辅翼与完善。如果不首先确立大法，则做人的根本与底线就会淹没在繁琐的文字、故事与制度之中，不免本末倒置了。

朱子对传统家训的改造非常成功。它沿袭了自己对传统儒学体系改造的一贯思想和方法：一是以简御繁。如对儒家经典的改造而成“四书”。二是“述而不作”。所谓“述而不作”并不是没有创造和出新，而是善于运用已有的材料来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我们看《朱子家训》大量引用了前人的话语甚至民间的俗语，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三是理学思想一以贯之。《朱子家训》很好地体现了朱子自己的理学思想，语言通俗却“理”性十足。

朱子的《朱子家训》与传统的“家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传统的家训，洋洋洒洒，少则万言，多则几十万言。《朱子家训》只有317字。这一改变使家训大大地便于记诵，从而使它的传播更加便捷。也是这一改变，使其推广普及有了形式上的可能。

### 三、朱子《家训》的思想内涵

#### （一）朱子《家训》倡导君臣有义

《朱子家训》提出：“君之所贵者，仁也。”古代的“君”，就是国君、国王、皇帝，是执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之所以为“贵”，是因为他们能顺应历史潮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施“仁”于民。“仁”即爱人，比较爱人民（即使为巩固其统治而被动地爱人民），体贴民情，爱惜人力，不过度地压迫和剥削人民，让人民较安定地生产和生活。这样的“仁”君，外国之有，中国也有。

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夺得天下，做了皇帝，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施行“仁”政——实行修养生息政策：让逃亡的士兵、农民回乡生产，恢复田宅；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十五税一。这就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汉高祖以后几代皇帝继续推行“修养生息”政策，到了文帝、景帝统治的时候，便出现了“文景之治”繁荣盛世，人口也增加了，全国有5950万人。

东汉初中，光武帝刘秀调整了统治政策：释放奴婢；废除了王莽时的苛捐杂税，使人民安定生

产；整顿吏治，惩处贪官酷吏。在他统治十多年后，全国出现了较为安定的繁荣的“光武中兴”局面。正如家训曰：“君之所贵者，仁也。”

《朱子家训》又提出：“臣之所贵者，忠也。”“忠臣”有两种。一种是忠于“暴君”之臣，一种是忠于“仁”君之臣，后者为平民百姓所爱，因为他们执行国君的“仁”政，利国利民。这种大臣是为国为民的功臣。我国历史不乏这种有功之臣。如上述所说，因为有忠于汉高祖的陆贾辅佐，以及其他“忠臣”的勤政，才有后来出现的“文景之治”繁荣景象。唐朝前期之所以出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繁荣富强、威震世界的国度，除了有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仁”君的功劳外，与当时坚决拥护推行“仁”政的忠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姚宗、宋景等是分不开的。这些忠臣执行“仁政”，身体力行，促使社会稳定，使人民群众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共同奋斗，开创盛世局面，这种忠臣，贵也。

上述所举是古代对历史发展作过重要贡献有功的“仁君”和有名望的“忠臣”。

### （二）朱子《家训》倡导家庭亲睦

朱熹《家训》提出：“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这几句话是论家庭主要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睦相处的准则和行为规范。首先，朱熹《家训》要求父母对子女要“慈”、“教”。他认为“父之所贵者，慈也”。所谓“慈”，即父母要疼爱子女。但父母对子女千万不可溺爱，不可放纵，朱熹指出：“子孙不可不教也。”

其次，朱熹《家训》要求子女对父母要“孝”。“子之所贵者，孝也。”所谓“孝”，是指子女要善待父母，父母在世，子女要奉养、尊重，父母死后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朱熹强调的“孝”是真心实意的孝，是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真诚情愿的付出。作为子女，应当主动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使其安度晚年，不仅在物质上关心父母，而且要在精神上关心父母；在父母面前要保持和气、愉色与婉容。

第三，朱熹《家训》要求夫妻关系要和睦。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与基石。他指出：“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夫和妇柔是夫妻相爱的关键。所谓“和”，即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时，不走极端，保持心平气和的理智。所谓“柔”，即柔顺温和。夫和妇柔就会相亲相爱。

第四，朱熹《家训》强调兄弟之间要友爱。兄弟之间不能因为一些小事而反目成仇，大动干戈。“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所谓“友”就是要去爱，互相帮助，患难与共。“恭”则是指尊敬、谦恭。“友”“恭”是兄弟姐妹之间团结的根基，如果连自己的同胞手足都不友爱、不团结，谈何友爱和团结其他人呢。

朱熹把仁、忠、慈、孝、友、恭、和、柔，分别作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个体主体道德，尽管在道德标准划分上不完全符合实际，并且有封建等级观念，但强调社会各层次的人要“各守其德”。这是符合社会道德总体要求的。

### （三）朱子《家训》倡导人际和谐

朱熹《家训》特别强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从我做起，即要努力做到“慎勿谈人际之短，切勿矜己之长”。在与人交往中，不要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伤害别人的感情，也不要因为自己有所长或工作有了成绩，就自我显耀而瞧不起别人，为人应当保持谦逊的本色，切不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当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方法则是“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仇恨自己的人要用情谊来化解他，怨恨自己的人要用诚心去回报他，用平静的心态、平和的方法去化解矛盾，切不可仇报仇、以怨还怨。在与人交往上要做到“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要学会理解和宽容，别人有小的过错，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之，别人有大的错误，也要做



好思想工作，以理服人，用道理使他明白错误的地方，促其改之。

朱熹在《家训》中还强调指出，“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做到“处事无私仇”，“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

#### （四）朱子《家训》倡导重德修身

朱熹《家训》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在朱熹看来，重视道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他还就如何重德修身提出了许多深含哲理的见解。他认为：“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这句话是对别人善恶行为所持的态度，对行恶的人要抑制，对行善的人要宣传表扬他。他还进一步指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意思是指善事多么小也要积极而为，恶事多么小也不能为之。注意小节，细心修养，才能达到高风亮节。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他认为，读“圣书”才可以修德，识礼义才可以养气。人因读书而美丽，人因识礼而高雅。读书是文化教育，识礼是素质教育，读书识礼，二者不可偏废。处于今天这样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就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读书，不掌握各种知识，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只是空话。通过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吸取人类知识的精华，加强道德修养，把自己变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朱熹在《家训》中还指出：“勿损人而利己”，“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阐述了做人的行为准则。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民为本，取利时决不能为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钱财是重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钱就过不了生活。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做到“见不义之财勿取”。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义之财与不义之财的界限，在于是否劳动所得和合法所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劳多得，少劳得少，无劳不得。合法经营，劳动所得，劳动致富，是有义之财。不义之财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牟取暴利之财，见到这种财勿取。我们必须大力宣扬“见不义之财勿取”的道德，使之深入人心，以期在整个社会形成对非义之事大家都反对、遇合理之事则大家都顺从的局面。

朱熹不仅在家庭亲睦、人际和谐、重修养等方面为我们作了理论上的精辟论述，而且在行动上也为后人提供了精神指向。如朱熹对父母的孝感人至深。他少年失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四十岁时母亲不幸病故，为守孝道，他筑寒泉精舍于墓旁，在此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直到守墓追孝三年期满，等等。

## 四、朱子《家训》的现代价值

《家训》通篇富有哲理。其中心思想是教导人们应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如何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今天，《家训》仍具有现实价值。

### （一）正确对待自己与对待他人

《家训》提出：“慎勿谈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大过，以理而谕之。”这是对待自己与对待他人的正确思想，富有处事做人的哲理。受世界观、方法论、科学知识以及实践经验的影响和制约，每个人要正确认识客观、认识别人不容易，正确认识自己就更难。做人切勿矜（自夸）己之长，不要妄自尊大，不要恃自己之长而自吹自擂。要正确看待自己，就算自己富有智能和才华，但同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知识与才华相比，充其量不过是海水中的一滴；就算个人的功劳很大，但同党和人民的功劳，特别是千千万万革命

先烈用他们的头颅和鲜血换来我们美好今天的伟业丰功相比，个人功劳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们党员干部的知识、才华功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有什么值得矜己之长，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如果矜己之长，就会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就会脱离党、脱离集体、脱离群众；就会把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当耳边风，就会拒绝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结果必然掉入难以自拔的深渊。现实生活中，这种事例不少。如有的经理、厂长自认为：“有我才有这个公司。”“有我才有这个工厂。”骄傲得很，不听职工的意见，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把公有财产变成任由自己支配的私有财产，贪污、挪用、胡作非为，搞垮了企业，坑害了员工。人贵有自知之明，要经常解剖自己，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比较难，尤其是认识自己的弱点、缺点就更难。所以，朱子要求在道德修养方面要谨慎，“勿矜己之长。”

朱子要求“慎勿谈人之短”。在思想上的互相帮助，感情上的互相交流是必要的。人人都需要别人多方面包括思想上的帮助，但是不能随便地自由地谈人之短。这是由于：其一，人非圣人、完人，人人都有短处、缺点。道德修养的方法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多谈人之长处、优点，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才能虚心进取。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就会滋长骄傲情绪。其二，随便谈人之短，不但对克服短处不起帮助作用，而且会影响内部的团结。因此，对他人的过失，人有小过要容忍，人大过要以理说服教育，使之改过。

## （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家训》要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为善，就是要办善事、好事和实事，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为恶，就是做恶事、坏事和假事，做有害于人民的事。善与恶是每个人为人处世首先必须分清的根本问题。只有划清了善与恶的界限，才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善如流，疾恶如仇，多为人民群众办好事。

然而大善是由小善积聚而成的，无小就无大，积小才成大，积少才成多，“涓涓细流汇成巨川”，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和规律。英雄人物是从小善做起的，受人民敬仰。如，雷锋事迹、孔繁森事迹，他们的大善都是由很多很多的小善组成的。伟人的伟业也是从小善开始的。以善小而不为，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成，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诚然，不能否定理想、远景规划的重要作用，但是，有了崇高理想和远景规划而不始于足下、脚踏实地、从小事、实事、好事做起，又有何用呢？每个人，必须做到善大积极而为，善小也要积极而为之。人人从小善做起，积小善为大善，整个社会、国家和民族就会形成真善美。

恶虽小但也不能不应恶小而为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洞不补大洞无法补，小恶积多必成大恶。防恶、反恶的第一道防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第一道防线一旦被攻破，发展下去，就会毁灭终身。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事实可以说明，如有些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几十年，临离退之前，受某些人以权谋私发横财现象的刺激，心动、眼红、手痒了，赶快乘有权之机捞一把，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个别有权的人由以权谋私发展到卖官封爵，等等。这都是开始于第一道防线的突破。他们以为恶小微不足道，而为之，没有认识到小恶会发展为大恶。朱文公“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誓言，的确是对世人思想道德修养的忠告。

善与恶也是对立的统一。专做善事就不会做恶事，多做恶事就不可能做善事。善恶兼容，只是暂时存在现象；不是善向恶转化就是恶向善转化。因此，善事多么小也要积极而为，恶事多么小也不应为之。

（二）把“仁”推广到生物甚至非生命的领域，萌生出沟通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顺应思维，争取实现“天人合一”的生存环境

朱子主张“格天下之物”，“穷天地鬼神阴阳草木鸟兽之理”。他吸取道家“人法地，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穷物之理乃所穷人之理”，指出物之理和人之理是相通的，才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所以，在《家训》中，他告诫子孙后人“勿非礼而害物命”。言简意赅的“物命”两字启迪着人们要扩大精神文明视野。这里的“礼者”乃自然规律，要人们以人学为主，也要讲究揭示自然规律。我们以往谈社会发展，大多是从经济、政治、文化来考虑，只对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治安混乱等社会病加以讨论，却忽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恶化加以应有的关注。例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锐减、土地沙漠化、水质的混浊、垃圾泛滥等已使人类不堪负担。由于人们大肆砍伐森林，捕猎稀有野生动物，掠夺性地开采地下资源，工厂排放浓烟污水，已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频繁不断的各种自然灾害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人类要善待自然，保持与大自然的动态平衡，自然界也有生存的权利、发展的权利。同时，人类也要为自己后代保留足够的资源，不损害后代子孙繁衍的需要和权利。

我国在世界上有最多的人口，却只有最少的平均资源，若13亿同胞希望达到美国现有的生活水平，据说需要的资源是现在的几十倍。因此，这就赋予我们的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要注入新的伦理道德的内涵，要重视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顺应和谐、生命伦理与环境伦理的和谐，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并要优化人类的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借鉴《家训》中的教诫，“勿以非礼害物命”，正确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不奢侈、不浪费、不挥霍、不铺张、不贪图安逸、不追求享乐，即使今后经济上非常富裕，也仍然以俭朴为荣。这样就可能避免非道德的砍伐森林、狩猎珍奇禽兽动物。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我们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有着重要启发。

朱子在700多年前，站在人文智慧的高度，便在《家训》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天也”、“天必相之”。这便是要用更多的同情心与责任感去爱护自然，保护生存的有序，管理好人与自然共同生息的“地球村”，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顺应，避免人定胜天的狂妄，奴役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责任编辑：丁 翔)

# 李珥对朱子学的继承和阐发

张品端

(1.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 江西省 2011 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 上饶 334001)

**摘要:** 朱熹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 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学说于南宋末传入高丽, 并与后来朝鲜社会实际和需要相结合, 发展创新为具有朝鲜特色的朱子学。李珥(栗谷)是朝鲜李朝著名的哲学家, 他一生致力于朱子学研究, 且善以己意表述之, 多所创获。具体而言, 在理气论上, 栗谷以朱子理气不离不杂、气能动而理不能动, 气有为而理无为的思想为依据, 并吸取朝鲜初期性理学者的理气论思想, 提出了“理气既非二物又非一物”说、“理通气局”说和“气发理乘一途”说; 在心性论上, 栗谷依朱熹的理气论、心性三分和“心统性情”的思想, 提出了“心合性气”说, “四端七情气发理乘”说和“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 在格致论上, 栗谷以朱熹格物致知论为基础, 提出了以居敬存养本心与即物穷理相辅相行的方法论, 进一步丰富了朱熹的格致论思想; 在工夫论上, 栗谷一方面继承《中庸》中的诚思想, 一方面继承朱熹居敬存理、静养动察、变化气质的思想, 提出了居敬、存诚和养气三者统一的修养工夫论。栗谷以主气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 在朝鲜朱子学界别树一帜, 为朝鲜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 朱熹; 李珥; 朱子学; 继承; 阐发

李珥(1536—1584年), 号栗谷, 是16世纪朝鲜著名的哲学家、栗谷学派的开创者。他一生最着力处, 便是对朱子学的研究, 且善以己意表述之, 多所创获。本文从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和工夫论四个方面对朱熹与李珥的性理学思想作一比较, 以窥见其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 一、理气论

关于理气问题, 栗谷一方面继承朱熹理气论思想, 另一方面吸取朝鲜初期性理学者的理气论思想, 立说较为新颖, 其说有三: (一) 理气“既非二物又非一物”说; (二) “理通气局”说; (三) “气发理乘一途”说。

在理气关系上, 朱子的理气观是建立在理气不离不杂之思想的基础上。栗谷依本朱子的这一思想而又有所创新。他认为, 理气为“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栗谷说: “夫理者, 气之主宰也; 气者, 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 非气则理无所依着。既非二物, 又非一物。非一物, 故一而二; 非二物, 故二而一也。非一物者, 何谓也? 理气虽相离不得, 而妙合之中, 理自理、气自气, 不相夹杂, 故非一物也; 非二物者, 何谓也? 虽曰自理、气自气, 而浑沦无间, 无先后、无离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项目编号: 10BZ042) 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品端, 男,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江西省 2011 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朱子学。

合，不见其为二物，故非二物也。”<sup>①</sup>“一而二”是指理气的特性和功能性，“二而一”是指理气的圆融性和内在性。理气的这种既“一而二”又“二而一”的关系，栗谷概括为“理气妙合”。栗谷讲“理气妙合”，妙就妙在理气非一非二，不离不杂，动静无端，显微无间。在判定理气究竟是一物还是二物的问题时，栗谷亦严格地以朱子的理气不离不杂的观点立论。因为“理气浑融，元不相离”，故非二物；又因为理气“浑然之中，实不相杂”，故非一物。理之与气，“即气而理在其中”，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样，栗谷既排除了理气二歧之见，又避免了认气为理之病。理气这种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思维模式，正反映了东方哲人的思维特点。

栗谷认为，理气“不相离、不相杂”。讲理气“不离”，旨在突出理的实在性，指出离开气而讲理，则理便成为一悬空孤立的抽象物，如何成为万物之本体？从理不离气而言，理为实理。讲理气“不杂”，旨在强调理对气的本质优先性。栗谷认为，离开理而讲气，则气便成为混沌一团，世界岂不成为一杂乱无章的存在，又如何确证人道的理性秩序。故栗谷说：“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气不离理，理不离气，夫如是则理气一也。”<sup>②</sup>“理气妙合”“理气一也”，既突出了世界的物质（气）实在性，又强调了实在世界具有理性的秩序。在栗谷看来，天地万物的实体是“气”，天地万物的本体是“理”。实体之气的本然状态是湛一清虚的，但在变化流行中本然之气会发生形态上的变异，分化为不同的存在形式，由此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本体之理也因气的变化万端而表现为“分殊”之理。此分殊之理就是某物为之某物的本质之性。故栗谷说：“理虽一，而既禀于气，则其分万殊，故在天地而为天地之理，在万物而为万物之理，在吾人而为吾人之理。然则参差不齐者，气之所为也，虽曰气之所为，而必有理为之主宰，则其所以参差不齐者，亦是理当如此。”<sup>③</sup>“理当如此”，气才能如此。理之于气，犹如人之于马。人乘马而行，不是任马而行；而是人按照自己的目的驭马而行。这就显示出理对气的本质优先性，是理主宰气，而不是气主宰理。

“理通气局”说是为回答理气之异的问题而提出的。此语出自华严十玄门中的“通局无碍门”<sup>④</sup>，但栗谷此说亦本于朱子的“理气不离不杂”之义和“理一分殊”之说。它是从理气不相离之妙的关系中包含的理无形、气有形的特性中提出的。栗谷在《圣学辑要》中明确指出：“理通者，天地万物同一理也；气局者，天地万物各一气也。所谓理一分殊者，理本一矣，而由气之不齐，故随所寓而各为一理，此所以分殊也，非理本不一也。”<sup>⑤</sup>在朱子的理气论中，“理”是形式原则，它赋予万物之存在以形式。作为形式原则的“理”本身是超时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这便是栗谷所说的“理通”。但“理”本身不活动，故它是抽象的“存有”，而非具体的“存在”。具体的“存在”需要“气”。“气”是实现原则，因为它使万物在时空中得以成为具体的存在。然而当理落在气中时，便受到气之限制，而形成万物之性，并呈现万物在时空中的特殊性，故“气”又是特殊性原则。这便是栗谷所说的“气局”。栗谷的“理通气局”说是对朱子学形而上体系“理一分殊”的阐释。

栗谷在与成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开展理气之辨时，进一步阐述了“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的见解。他说：“理通者，何谓也？理者，无本末也，无先后也。无本末，无先后。故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是故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而其本然之妙无乎不在。气之偏则理亦偏，而所偏非理也，气也；气之全则理亦全，而所全非理也，气也。至于清浊粹驳、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中，理无所不在，各为其性，而其本然之妙则不害其自若也。此之谓理之通也。气局者，何谓也？

① 李珥：《栗谷全书》（一）卷9，《答成浩原》，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7页。

②③ 《栗谷全书》（一）卷10，《答成浩原》，第210页。

④ 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韩国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第169页。

⑤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第457页。

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气之本则湛一清虚而已，曷尝有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气哉？惟其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故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于是气之流行也，有不失其本然者，有失其本然者。既失其本然，则气之本然者已无所在。偏者，偏气也，非全气也；清者，清气也，非浊气也；糟粕煨烬，糟粕煨烬之气也，非湛一清虚之气。非若理之于万物，本然之妙无乎不在也。此所谓气之局也。”<sup>①</sup> 简言之，所谓理通，是指理无形迹，故无本末，先后，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而本然之妙无处不在；所谓气局，是指气有形迹，故有本末，先后，气之流行有失其湛一清虚之本者，非若理之寓于万物而本然之妙无处不在。以“理通气局”四字表述理气之异，确是栗谷的特识。

“气发理乘一途”说是针对“理气互发”说而提出的，它涉及理气动静问题。栗谷一本朱熹关于气有动静而理无动静的思想。他说：“大抵有形有为，而有动有静者，气也；无形无为，而在动在静者，理也。”“天理者，无为也，必乘气机而乃动，气不动而理动者，万无其理。”<sup>②</sup> 在栗谷看来，气可以动，而理不能动；气有为，而理无为，所以只能是“气发理乘”。理气不能互动，自亦不能互发。栗谷认为除了人的情感是“气发理乘”之外，天地间不论是天道的运行还是人道的流行，也都是“气发理乘”这一条途径，没有其他的途径。这样，栗谷就否定了退溪的理气互发说。栗谷在与成浩原展开理气之辩的过程中，又进一步阐发了“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的观点。他说：“气发而理乘者，何谓也？阴静阳动，机自尔也，非有使之者也。阳之动则理乘于动，非理动也；阴之静则理乘于静，非理静也。故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阴静阳动，其机自尔，而其所以阴静阳动者，理也。故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夫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者，原其未然而言也；动静所乘之机者，见其已然而言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理气之流行皆已然而已。安有未然之时乎？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所谓气发理乘者，非气先于理也，气有为而理无为，则其言不得不尔也。”<sup>③</sup>

栗谷为了进一步说明“气发理乘”之含义，还作了一个比喻：“器动而水动者，气发而理乘也。器水俱动，无有器动水动之异者，无理气互发之殊也。器动则水必动，水未尝自动者，理无为而气有为也。”<sup>④</sup>以器动则水动比喻气动则理动，既说明了气发理乘的理由，又否认了所谓理气互发说。

与“气发理乘”之说相关联的是理气先后的问题。栗谷对此也有独到的看法。他说：“天地之化，无非气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阴阳动静而太极乘之，此则非有先后之可言也”<sup>⑤</sup>，“气发理乘者，非气先于理也”<sup>⑥</sup>。在栗谷看来，阴阳无始，动静无端，这是从极本穷源上讲气之本然无始无终。此种本然之气与形上之理原是妙合无间的，换句话说，理之本体与气之本然状态是无先后之可言的。故气发理乘并不意味着理气有先后。

上述理气三说，是栗谷理气论的基本思想。他曾在《圣学辑要》中总论理气问题说：“有问于臣者曰：理气是一物是二物？臣答曰：考诸前训，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气浑然无间，无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虽不相离，而浑然之中实不相杂，不可指为一物，故朱子曰‘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合二说而玩索，则理气之妙，庶乎见之矣。论其大概，则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此是穷理气之大端也。”<sup>⑦</sup> 可见，理气非一非二，理通气局，气发理乘，三者互相联系，共同组成了栗谷理气论。

①③④⑤⑥⑦ 《栗谷全书》（一）卷10，《答成浩原》，第209、209、210、210、211页。

② 《栗谷全书》（一）卷12，《答安应休》，第248页。

⑧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第455页。

## 二、性情论

朱熹关于“性情”问题，从“动静”、“体用”、“未发已发”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但很少从“理气”角度对性情进行探讨，这就为后来学者留下从细微处发展的空间。栗谷的心性论，大体继承了朱熹的心性情三分和“心统性情”的思想，但在具体论述上又有其独特的创发。其心性论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心合性气”说、“四端七情气发理乘”说和“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

在理气论上，栗谷认为气是“盛理之器”<sup>①</sup>，在心性论上，栗谷则认为心是“盛贮性之器”<sup>②</sup>。他强调“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sup>③</sup>“理在于心，而其名为性。”<sup>④</sup>所以，他说，“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谓之心。”<sup>⑤</sup>在这里，栗谷说心为性气之合，而不说心为理气之合，与退溪有所不同。退溪认为理是能活动的，理与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即承认心之知觉不只是气的作用，而是理与气的共同作用。退溪的这一思想，突出了理对于心之“灵”的作用，侧重于解决心的知觉作用问题。栗谷固守朱熹的立场，以理为“只存有而不活动，能活动者唯气。所以栗谷认为理自身并不能动，只能乘气而动”。他说：“性，理也；心，气也。”<sup>⑥</sup>“心是气也。”<sup>⑦</sup>正因为如此，栗谷强调“合性与气而为心”，其意似乎不在说明心的知觉作用问题，而是为了解释道德意识的善恶问题。这一点，是与他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说相联的。栗谷“心合性气”的思想，尽管朱子也有“心者，气之精爽”的思想，但把心直接理解为是气，这应该说是栗谷对朱子心论的进一步发挥。

在心与身的关心上，栗谷也强调心的优位性，比朱熹更加明确地指出心的主宰性。他说：“心为身主，身为心器，主正则器当正。”<sup>⑧</sup>故心是栗谷心性论的主要讨论对象。在心的作用上，栗谷特别强调心的实体功能和心当具众理的一面。他说：“人之一心，万理全具”<sup>⑨</sup>，又说：“气变乎本然之理者，固是原于理而已非气之本然，则不可谓听命于理也，故所重在气，而以气主言。”<sup>⑩</sup>这是栗谷心性论的基本立场，体现了他“主气”的特色。

栗谷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说，是反对退溪“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而提出来的。朱熹在对《孟子》中四端的解释时，曾说过“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sup>⑪</sup>这两句话在中国并没有引起注意，但却引发了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的论辩。退溪依此提出“理气互发”说，而栗谷不同意退溪理气互发论，而只讲气发理乘一途说。他说：“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sup>⑫</sup>栗谷批评退溪未能理解朱熹之真谛，并认为依朱子分解的思想来看，则发者是情，而情属于气，在“理”上则不说发。所谓“四端是理之发”，其真实之意，当是说：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却不能说情是从理上发出来的。理只是气发时所当遵依的标准，亦即发之所以然，而实际上的“发者”乃是气。对此，

① 《栗谷全书》（一）卷14，《人心道心图说》，第283页。

②③⑦ 《栗谷全书》（一）卷9，《答成浩原》，第193页。

③⑥ 《栗谷全书》（一）卷12，《答安应休》，第246、249页。

④ 《栗谷全书》（一）卷14，《人心道心图》，第285页。

⑧ 《栗谷全书》（一）卷21，《圣学辑要》三。

⑨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第456页。

⑩ 《栗谷全书》（一）卷10，《答成浩原》书二，第211页。

⑪ 《朱子语类》卷53，《朱子全书》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6页。

⑫ 《栗谷全书》（一）卷10，《答成浩原》，第198页。

栗谷举例说：“见孺子入井中，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化而理乘之也。”<sup>①</sup> 四端与七情均是气发理乘。所以，栗谷说：“凡情之发也，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sup>②</sup> 这就是所谓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

栗谷沿着四端七情均是气发理乘的思路，进一步解释了情何以有善恶的问题。他认为，凡情都是气发理乘，所以，四端不在七情之外，即“七情包四端”。这与朱熹主张四端与七情的同质性的观点是一致的。栗谷认为，七情之发有善有恶，而四端特指七情已发时的善而已。栗谷依朱子性即理，理不活动，活动的是心，心是气，故心所发动的情，不一定合理的思想。他说：“性具于心，而发为情。性既本善，则情亦宜无不善，而情或有不善者，何耶？理本善而气有清浊。气者，盛理之器也。当其未发，气未用事，故中体纯善，及其发也，善恶始分。善者，清气之发也；恶者，浊气之发也。其本则只天理而已。情之养者，乘清明之气，循天理而直出，不失其中，可见其为仁义礼智之端，故目之以四端；情之不善者，虽亦本乎理，而既为污浊之气所掩，失其本体，而横生或过或不及，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礼，本于智而反害智，故不可谓之四端耳。”<sup>③</sup> 就是说，情的善恶是在性发为情的过程中，由气之清浊造成的，以清气之发为善，而浊气之发为恶。

栗谷还把四端七情的善恶问题与人心道心问题联系起来讨论。“道心”、“人心”这两个概念出自《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后来，理学家言心性论都牵涉到这一问题。朱熹对此理解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sup>④</sup> 他认为，人心发于形气之私，故危殆而不安；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故微妙而难见。朱熹未尝以人心道心为二心。但其或生或原之说易使人产生“二心”之疑。退溪从“理气互发”说出发，认为道心为“理发”，人心为“气发”。栗谷认为，这是因为对理气关系认识未透而产生的对朱熹人心道心说的误解。他指出：“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sup>⑤</sup> 在栗谷看来，人心道心俱是气发，但因气有本然之气与所变之气之异，故乘本然之气而为道心、为四端（善情），乘所变之气而为人心，为七情（兼善恶）。基于上述观点，栗谷极力反对退溪的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而始终坚持其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

“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是栗谷心性论的又一创见。在心与性、情、意的关系上，栗谷进一步发挥朱熹的“心统性情”的思想。他主张心为性情之主，反对“分心性为有二用，分情意有二歧”，认为这是对朱熹“心统性情”说的曲解。在栗谷看来，心性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他说：“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矣。岂不大差乎？须知心性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然后可谓不差矣。”<sup>⑥</sup> 所谓一路，是指心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发而后絀绎思量计虑者为意。性、情、意均统摄于心，故言心、性、情、意为一路。所谓各有境界，则是指心寂然不动时是性境界，心感而遂通，发用流行时是情境界，因所感生情而缘情计较时是意之境界。然而，虽各有境界，但总归是一心之未发已发而已。所以，栗谷又说：“性发为情，非无心也；心发为意，非无性也。只是心能尽性而性不能检心，意能

①⑤ 《栗谷全书》（一）卷9，《答成浩原》，第192、193页。

② 《栗谷全书》（二）卷34，《年谱》上。

③ 《栗谷全书》（一）卷14，《人心道心图说》，第283页。

④ 朱熹《中庸章句序》，见《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1页。

⑥ 《栗谷全书》（一）卷14，《论心性情》，第296页。



适情而情不能运意，故主情而言，则属于性；主意而言，则属于心。其实则性是心之未发者也；情意是心之已发者也。”<sup>①</sup> 栗谷提出此说，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认为心虽有人心、道心之分，其实只是一心，并非有二心；性虽有本然之性、气质之性之异，其实乃一性，决非有二性；同样，情虽有四端七情之别，其实为一情，绝非有二情。他强调说：“夫以心性为二用，四端七情为二情者，皆于理气有所未透故也。”<sup>②</sup> 这里所谓“于理气有所未透”，就是不懂得气发理乘一途的道理。由此亦可看出，在栗谷的心性论与理气论之间具有一以贯之的一致性。

### 三、格致论

格物致知说，是朱子学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问题。它既是方法论、认识论，又是朱子理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对《大学》的解释，特别注重格物致知说。他对此作了明确的训释：“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sup>③</sup> 朱熹以推扩训致，以至极训格，以知为识，以物为事，解释简明清晰。他认为，所谓致知，是致吾心之知，就是把自己的知识推广至极；所谓格物，是即物而穷其理，就是彻底穷究事物之理。格物与致知的关系，朱熹常常概括为“格物所以致知”，这是指，一方面格物以致知为目的，另一方面致知是在格物过程中自然实现的。朱熹的“格物”说，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向外求知的方法，即他所说的“即物穷理”之学。格物的过程，这个过程即“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这是说，格物的最终境界不是一天一事就可以达到的，要通过用力之久的功夫，就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经过积久的努力，才能达到“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这个豁然贯通的境界不是没有内容的神秘体验，而是标志着达到了“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sup>④</sup>的格物知至的阶段。

栗谷的格致论是以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为基础，并进一步作了阐发。在格物的对象上，栗谷同朱熹一样，也肯定格物对象的广泛性。他说：“天下之有名可名者，皆可谓之物，岂必物之物乃为物耶？”<sup>⑤</sup> 他把物的对象规定为应接的事物之全体，但又不可能穷究所有的天下之物，故栗谷又引用程颐之言对穷究之“物”的对象进行了说明。他说：“程子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穷理工夫大要如此。”<sup>⑥</sup> 即把格物分为读书、评论古今人物是非、接触事物等。这与朱熹的格物之途径大体相同。就读书而言，栗谷比朱熹更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认为，读书是穷理之首要工夫。他说：“入道莫先穷理，穷理莫先于读书。以圣贤用心之迹，及善恶之可戒者，皆在于书故也。”<sup>⑦</sup> 读书明理贵在于得天地之心，体圣贤之意，“为有用之具”，而不是入耳出口，徒记诵圣贤语而已。但读书并不是格物之全部，格物的最终目的在于躬行实践。栗谷指出：“彼读书者格致中一事耳。读书而无实践者，何异于鹦鹉之能言耶？”<sup>⑧</sup>

栗谷与朱熹皆主张穷究具体事物之理，“即物穷理”，同时，又提倡“居敬”、“存心”的工夫与穷理工夫相辅相行。但栗谷比朱熹更为重视明道的体认方法。朱熹把居敬工夫视为穷理的必要工夫。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

①②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第458、455页。

③④ 朱熹《大学章句》，见《四书集注》，第6、11页。

⑤ 《栗谷全书》（一）卷9，《与奇明彦》书一。

⑥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穷理章。

⑦ 《栗谷全书》（二）卷27，《击蒙要诀》读书章。

⑧ 《栗谷全书》（一）卷15，《东湖问答》论君臣相得之难。

益密。”<sup>①</sup> 栗谷对朱熹这一思想作了阐发。他认为以居敬工夫涵养本体之心法，是穷究事物之理的预备性方法，但这却是必须的。栗谷说：“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sup>②</sup> 居敬工夫是存养心知本体，以维持致知状态的方法。若能常存心知之本然状态，即可因内心之灵明在格物时顿悟到穷究事物之理，从而达到“豁然贯通”之境界。

栗谷认为，在穷究事物之理时，要达到完全致知的地步。他说：“如或思而未得，则专心致志，抵死血战，至忘寝食，方有所悟。”<sup>③</sup> 这种方法与朱熹“格者，至极之谓”，“言穷之而至其极也”<sup>④</sup>的思想相同。穷而至其极，就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朱熹认为，“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sup>⑤</sup> 这说明朱熹、栗谷已经认识到，人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现象，而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栗谷还认为，“苦思之久终未融释”的话，亦可穷究其他事物之理。他说：“或苦思之久，终未融释，心虑窒塞纷乱，则须是一切扫去，使胸中空无一物。然后却举起精思，犹未透得则且置此事，别穷他事，穷来穷去，渐致心明，则前日之未透者，忽有自悟之时矣。”<sup>⑥</sup> 在这点上，栗谷与朱熹的看法是相同的。朱熹说：“于此处既理会不得，若专一守在这里，却转昏了。须着别穷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sup>⑦</sup> 可见，朱熹和栗谷都主张两种方法相互使用。

在致知上，栗谷不同意把致知的“知”分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而主张“知”只有“真知”与“不真知”之分。这是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朱熹为了克服北宋理学家张载、二程在“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问题上的一些矛盾，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他把“知”分为“真知”与“不真知”。朱熹说：“问‘知有闻见之知否？’曰：‘知，只是一样知，但有真不真，争这些子，不是后来又别有一项知。所知亦只是这个事。’”<sup>⑧</sup> 但因“知”之真与不真是由认识机能的差异所确定的，所以栗谷更强调“致知”之过程的分析。他把“致知”的认识过程分为上、中、下三个阶段。他说：“最下一层，闻人言而从之者也。中一层，望见者也。上一层，履其地而亲见者也。”<sup>⑨</sup> 这就是说，第一阶段（即最下层）是通过读书等格物的工夫穷得事物之理致的阶段；第二阶段是通过穷究事物而逐渐理会事物之理致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实践其已知之知的阶段。这样才能达到“真知”，达到“真知”之过程也就是格物知至的过程。

栗谷在对朱熹格致说的解释上，对“格物”和“物格”分别做了分疏。他对“格物”的解释是：“人穷物之理，而使之至于尽处也。”<sup>⑩</sup> 对“物格”的解释是：“物之理已至于尽处，更无可穷之余地也。”<sup>⑪</sup> 栗谷的这种解释，不仅与朱子在《大学章句》中解释的“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和“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意思相通。而且其解释也更为明晰。栗谷还指出，“物格者，物理尽明而无有余，是物理至于极处也，是主物而言也。知至者，物之理尽明而无余，然后吾之知，亦随而至于极处也，是主知而言也。”<sup>⑫</sup> 亦是对朱熹《大学或问》的“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

① 《性理大全》卷48，《四库全书》第7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②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收敛章。

③⑥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穷理章。

④ 朱熹《大学或问》上，见《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⑤ 《朱子语类》卷15，见《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9页。

⑦ 《朱子语类》卷8，《朱子全书》第14册，第275页。

⑧ 《朱子语类》卷34，《朱子全书》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55页。

⑨ 《栗谷全书》（一）卷10，《答成浩原》书二。

⑩⑪⑫ 《栗谷全书》（二）卷32，《语录》下。

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谓而无不尽也”<sup>①</sup>的进一步发挥。所以，栗谷基于对朱子格物说的理解，不同意退溪的“理到说”。他说：“理本在极处，非待格物始到极处也。理非自解到极处，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也。”<sup>②</sup>理本在极处，若格到十分处自然就到极处，但只格到三分出，就不能说到了极处。知至就是指对吾心之物之理的全部的知晓与否。使心真实地依理而行，应是明理之后的境界，惟先明理而真知善之所在，然后可以诚意。他说：“所谓真诚意者，格物致知，理明心开而诚其意之谓。未能真知，恐难得到真诚意也。”<sup>③</sup>惟有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而明理、明善，然后可以使意诚，而真实地为善去恶。就此义而言，诚意是格物致知后的结果。此即所谓《大学》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及《中庸》的“不明乎善，不诚乎身”之意，即诚身须在明善之后。栗谷的格物致知说作为其诚意之先行工夫，不仅符合朱熹依循《大学》的“格致诚正”之序，重视格物致知的工夫之用意，而且是对朱子之说的修正和发展。

栗谷从知行二者分言止于至善问题，是很好的工夫理论。他说：“珥所谓知之至善云者，不必深排。夫至善云者，只是事物当然之则也。其则非他，只是十分恰好处耳。统而言之，则知行俱到，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方可谓之止于至善。分而言之，则于知，亦有个至善；于行，亦有个至善。知到十分恰好处，更无移易，则谓之知之止于至善；行到十分恰好处，更无迁动，则谓之行之止于至善。何害哉？”<sup>④</sup>这是栗谷答复奇明彦信中的一段话。栗谷是分知和行两方面做工夫，知要知得十分恰好处，此是知的止于至善，而行亦要行得十分恰好，则为行的止于至善。奇明彦则反对从知行两方面说止于至善之论，认为止于至善是行的事。其实栗谷此说，是合于朱熹所说的知行之工夫的。在朱熹理论中，言知至便可意诚，即若知至，行亦会恰当，但知至未必就能诚意，即行亦未必恰当。因为诚意须有独立之工夫，不是知理知得切便能达至。这也是后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知先行后”说，而倡知行合一，并认为《大学》之教首重诚意的主要原因之一。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并强调“行”的重要性。意即要先能明理，然后才可以“行”得恰当。既然知行可分先后，则当然可以言知行各有止于至善。故必须从这两方面做工夫，才能使知行俱止于至善。栗谷此说，便包含从两方面做工夫之意，既不是只知得彻底便可，尚须行得笃实。这是对朱熹知行说的进一步阐发。

#### 四、工夫论

栗谷十分重视工夫论。他一方面继承《中庸》中的诚思想，一方面继承朱子居敬存理，静养动察，变化气质的思想。其工夫论的要旨在于居敬、存诚和养气三者的统一。

关于居敬。栗谷非常强调“敬”字工夫，认为“敬言圣学之始终”<sup>⑤</sup>，“敬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间断”<sup>⑥</sup>。他年青时曾与退溪讨论过“敬”的问题。退溪问栗谷：“敬者，主一无适，如或事物气头来，则如何应接？”栗谷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回答说：“主一无适，敬之要法；酬酢万变，敬之或法。若于事物上一一穷理，而各知其当然之则，则临时应接，如镜照物，不动其中，东应西答，而心体自如，因其平者断置事理分明故也。不先穷理，而每事临时商量，则商量一事时，他事已蹉过，安得齐头应接？……盖静中主一无适，敬之体也。动中酬酢万变，而不失其主宰者，敬之用也。”<sup>⑦</sup>栗谷此意是说，敬是一种心有存主、专心一意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贯彻于动静两个方

① 《大学或问》上，见《四书或问》，第8页。

②③ 《栗谷全书》（二）卷32，《语录》下。

④ 《栗谷全书》（一）卷9，《答成浩原》书一。

⑤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三，收敛章。

⑥ 《栗谷全书》（一）卷21，《圣学辑要》三，正心章。

⑦ 《栗谷全书》（一）卷9，《上退溪先生别纸》书一。

面：静中主一无适和动中酬酢万变。二者是本体与作用的关系。他把敬分体用之说，是本于朱熹所说的敬骇动静之意。而以静中无适为敬之体，动中应事为敬之用，则是栗谷对朱熹之意的发挥。栗谷在谈到抑制色念时说：“此也无别工夫，只是心有存主，读书则专心穷理，应事则专心践履，无事则静中涵养。”<sup>①</sup>在谈到“敬以直内”时，他说：“有事则以理应事，读书则以诚穷理，除二者外，静座收敛此心，使寂寂无纷起之念，惺惺无昏昧之失可也。”<sup>②</sup>这此都是讲敬的工夫包括动与静两方面，即：应事践履、读书穷理是动中工夫，静中涵养或静坐澄心是静中工夫。二者都是心的涵养工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栗谷论“敬以直内”与“义以方外”的关系说：“敬体义用，虽分内外，其实敬该夫义。直内之敬，敬以存心也；方外之义，敬以应事也。”<sup>③</sup>

栗谷提出的“敬之活法”之说，亦是顺朱熹格物致知论而说的。如朱熹说：“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sup>④</sup>但栗谷将格物穷理的效果配合持敬工夫来讲。敬之活法，是有其个人的心得。此说以平时若能穷究事物之理，而知处事接物的当然之则，则于事物交至时，便可不动其中而应万变，如明镜之照物，同时兼照而不随色变。这也能道出朱熹的格物穷理工夫之优点。

栗谷认为，人的心性道德修养是无止境的，主敬只是权宜之计。他说：“学者须是恒主于敬，顷刻不忘，遇事主一，各止于当止。无事静坐时，若有念头之发，则必即省察所念何事，若是恶念，则即勇猛断绝，不留毫末。”<sup>⑤</sup>通过敬之功夫不断克去恶念和私欲，恢复本心之诚，乃是栗谷修养工夫论的最终目的。他说：“敬，主一之谓，从事于敬，则可以寡欲至于诚矣。”<sup>⑥</sup>寡欲并不是无欲，而是对私欲的合理节制。因此，栗谷提出了与朱熹、退溪以“主敬”为特征不同的，而以主诚为特征的“存诚养心”修养工夫理论。

关于存诚。“存诚”作为一种治心之重要工夫，是栗谷修养工夫论的主要内容。栗谷认为，诚是天之实理、人之实心。他说：“天有实理，故气化流行而不息；人有实心，故工夫辑熙而无间。人无实心，则悖乎天理矣。……一心不实，万事皆假，何往而可行？一心当苟实，万事皆真，何为而不惑？故周子曰：‘诚者，圣人之本’。”<sup>⑦</sup>“存诚”的工夫要从诚意入手，栗谷说：“诚意为修己治人之根本。……志无诚则不立，理无诚则不格，气质无诚则不能变化。”<sup>⑧</sup>所以，“诚意”为真践力行，修己治人之根本。因栗谷主张“气发理乘一途”说，认为理不活动，而气能活动，所以理之能否完全呈现，须看气是否为湛一清虚之本然之气。可见，如何使气保持或恢复其为本然之气的状态，便成为了最重要的工夫。栗谷变化气质的工夫论本于张载和朱熹之说。张载尝言：“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sup>⑨</sup>朱熹解释说：天地之性，专指理而言，气质之性，则以理杂气而言，只是此性在气质之中，故随气自为一性。栗谷在《圣学辑要》中将中国宋明诸儒的为学宗旨及工夫论加以分类辑要，并附加按语点评其义，系统阐述了他自己的“矫气质之偏，复性之本然”的工夫论。

诚和敬是相互关联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工夫论而言，“诚之”之意与“敬之”之意并无多大的差别，人们常常以“诚敬”合而言之。栗谷引程子的话说：“程子曰：‘诚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学之序，先致知而后诚意，其等有不可躐

① 《栗谷全书》（二）卷32，《语录》下。

② 《栗谷全书》（二）卷27，《击蒙要诀》。

③⑤ 《栗谷全书》（一）卷21，《圣学辑要》三。

④ 《朱子语类》卷12，见《朱子全书》第14册，第378页。

⑥ 《栗谷全书》（二）卷31，《语录》上。

⑦⑧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诚实章。

⑨ 张载《正蒙·太和篇》，见《张载集》，上海：中华书局，1978年，第9页。

者。”<sup>①</sup>敬之与诚之即是工夫之表现，此一“诚敬”工夫之所向则是天理、天道。但从诚自体上看即是指此天理，故此时二者之间又是诚体敬用的关系。栗谷说：“诚者，敬之原也；敬者，反乎诚之功也。理则仁之在乎天者也，仁则理之赋于人者也。敬以复礼以全天理，则此非至诚之道乎？”<sup>②</sup>不过，栗谷承认敬与诚相互关联的同时，还主张由敬入诚。他说：“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人不能复其本心者，由有私邪为之蔽也。以敬为主，尽去私邪，则本体乃全。敬是用功之要，诚是收功之地。由敬而至于诚矣。”<sup>③</sup>在这里，栗谷把“诚”看做天理和心的本体，即心中之天理。敬就是去私欲、邪念，以恢复本心的天理。由敬而至于诚乃心性修养工夫之极至。

关于养气。栗谷强调“保养正气”的养心工夫，是对朱熹后天渐教工夫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养气包括“养志气”与“养血气”两个方面。前者为“养仁义之心”，即良心；后者是“养真元之气”即“真气”，二者缺一不可。志气不高则人无以立，生气亏虚则人无以生。栗谷说：“仁义之心，人所同受，而资禀有开蔽；真元之气，人所同有，而血气有虚实。善养仁义之心，则蔽可开而全其天矣；善养真元之气，则虚可实而保其命矣。”<sup>④</sup>本来，天地气化，生生不穷，毫不停息，人之气与天地相通，良心、真气亦与之俱长。惟其戕害多端，所长不能胜其所消，辗转枯亡，故心为禽兽，气至夭折。这需要养气。如何养气呢？栗谷说：“其养之之术，亦非外假他物，只是无所挠损而已。”<sup>⑤</sup>就是说，养气的唯一方法，是使人本来所具有的良心、真气“日长而无所戕害，终至于尽去其蔽，则浩然之气盛大流行，将与天地同其体。”<sup>⑥</sup>可见，栗谷的养气工夫，直由程朱而上溯至孟子。

栗谷认为，人之仁义之心，是由天地之理而来，而人之血气，亦是自天地之气而来。并指出，害良心者和害真元之气者皆为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故栗谷一方面主张养志气，一方面又主张养血气。就养志气而言，栗谷的方法有：一是要寡欲，寡欲则不会失去其本心；二是要保养，保养则足以存其仁义之心，足以供其所伐，养则长，不养则消；三要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配义与道，是天理与真元之气恒不相离，所生之气是理在气上表现。这就是栗谷所说的“理气之妙”之表现。就养血气而言，栗谷则引用孔子的君子有三戒说和《周易·颐卦》中的“慎言语，节饮食”等思想来予以解释。若能少时戒色、壮时戒斗，老时戒得，做到孔子所言三戒，便能以理胜之，不为血气所动。慎言语，是指要养其德。节饮食，则指要养其体。因此养血气的目的在于，使血气不足以乱其本心。栗谷进一步认为，从本源上讲，真元、浩然并非二气。但是以道义养的话，会成为浩然之气，只保养血气的话，则会成为真元之气。故二者也可称为“浩然之气，心上气也；真元之气，身上气也。”<sup>⑦</sup>栗谷主张“存诚养心”，“养心”主要是指涵养“仁义之心”。因涵养“仁义之心”的过程便是集义而生浩然之气之过程，亦即是兼养“真元之气”的过程。故养心之工夫，应以养志气为重心。但养血气作为使血气不足以乱其本心之方法，亦是不可缺少的修养工夫。因此，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要同时并进。

朱熹以“敬”为圣学之成始成终，而提出静养动察，敬贯动静的“主敬涵养”说。栗谷则以诚为立志、格物、变化气质之本，以“诚之”为一切学问尽性成圣之工夫，而提出了“存诚养心”说。栗谷由敬入诚，诚兼体用，恢复气之本然状态，“保养正气”之养心工夫，既是对朱子之说的继承，也是对其理论的阐发。

从上述观之，栗谷在朝鲜朱子学界别树一帜，创立了一个以理气非一非二说、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和心境界等等为主要内容，以主气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为朝鲜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 《栗谷全书》(一)卷20,《圣学辑要》二,穷理章。

② 《栗谷全书》拾遗卷6,《四子立言不同疑二首》。

③ 《栗谷全书》(一)卷21,《圣学辑要》三,正心章。

④⑤⑥⑦ 《栗谷全书》(一)卷21,《圣学辑要》三,养气章。

# 严复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 知识结构的评判与改造

孙汉生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 青年严复在英国留学时发现“西洋胜处, 在事事有条理”, “寻常日用皆寓至理, 深求其故, 而知其用之无穷, 其微妙处不可端倪”。严复的观察、思考, 触及思维方式问题。回国之后国家民族的危机激起严复对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国民素质和科举教育的思考, 其中有大量言论关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问题。带着异文化的参照, 严复对中国文化和生活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特征的认识非常清晰, 其深度前无古人。后来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和批判, 大体肇端于此。

**关键词:** 严复; 中国; 传统思维; 知识结构

青年严复在英国留学时学的是海军, 但他更为用心和着力的是对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观察, 他发现“西洋胜处, 在事事有条理”, “寻常日用皆寓至理, 深求其故, 而知其用之无穷, 其微妙处不可端倪”。<sup>①</sup>严复的观察、思考, 触及思维方式问题。

回国之后十几年, 少见严复有文字问世, 直到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国家民族的危机激起严复对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国民素质和科举教育的思考, 其中有大量言论关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问题。带着异文化的参照, 严复对中国文化和生活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特征的认识非常清晰, 其深度前无古人。基于深刻认知, 他决意“陶铸国民, 使之利行新制”。<sup>②</sup>后来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和批判, 大体肇端于此; “五四”所昌明的科学精神, 共产党人和当代中国实事求是的思维范式, 严复可谓道夫先路。

## 一、严复归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几个特征

(一)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就思维方法而言, 演绎法(外籀)多于归纳法(内籀)。

演绎法与归纳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 皆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但是偏重于外籀而疏于内籀, 重推理, 轻实验, 则流于空疏。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严重缺陷, 阻碍了科学进步。

《名学浅说》论内籀术云: “中国由来论辩常法, 每欲求申一说, 必先引用古书, 诗云子曰, 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 与之校勘离合, 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此术西名为 deductive, 而吾译作外籀。……古人以其阅历, 传为公例, 吾用之以断决事理。此似人人所能, 然往往有不如法, 遂成谬见。

---

**作者简介:** 孙汉生, 男, 福建教育出版社编审、副社长、副总编辑。

<sup>①</sup> 《严复留学英国期间的相关言行》, 见《严复全集》卷五,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年, 第485、484页。“相关言行”摘自《郭嵩焘日记》。

<sup>②</sup> 《宪法大义》, 见《严复全集》卷七,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年, 第287页。

欲其无差，必精外籀之术，庶不至所据者是，而所断者非也。然而外籀术重矣，而内籀之术乃更重……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sup>①</sup>

《教授新法》演说中国教育方法，其中涉及思维方式的训练问题：“自内外籀之分言，则外籀甚多，内籀绝少，而因事前既无观察之术，事后于古人所垂成例，又无印证之勤，故公例多疏，而外籀亦多漏。”<sup>②</sup>

类似以上对中国思维偏重演绎法的判断，严复在演说和译文案语中时常提到，并且多有批评。严复所批评的，并不是演绎法本身，只是说，演绎推理所依据的论据，常常是以前人的阅历为公例（公理、原理），而对这个公例未加省察和验证。严复依据《穆勒名学》的逻辑学原理，认为，演绎法所依据的论据，应该来自归纳法，而不是凭前人成说，或者凭空臆断。严译《穆勒名学》“论科学何以不皆外籀而有试验科学”指出：“天下之至赜，皆可由其例以通之，而例之成，则内籀之术为之也。故格物之学，其始莫不本于分试。分试而内籀，斯其学之公例成焉。特诸科之学，其试验者各有专端，其实测者各从其类。”严复案语指出：“穆勒言成学程途，虽由实测而趋外籀，然不得以既成外籀，遂与内籀无涉。。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非实测之所会通（归纳、概括）故也。”<sup>③</sup>

严复认为，造成中国人思维方式重演绎轻归纳这一特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教育，“专重读书，而不识俯察仰观学于自然之尤重。”<sup>④</sup>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实证精神，其危害是“人才因之以稀，社会由之以陋。……尚有极重之弊焉，使不改良，将吾人无进化之望者。”<sup>⑤</sup>所以，严复呼吁，“固当舍古从今，而人道乃有进化。故曰：生今为学，内籀之术，乃更重业。”<sup>⑥</sup>“所冀教育改良，学者之鉴别力日进，于旧学能存其是而去其非。物理（指自然科学）一科，公例既立之余，随地随时可以实验。”<sup>⑦</sup>

（二）中国旧学，言事说理，充满巧问智词，囿于心成之学，往往“逞臆为谈，不咨其实”；<sup>⑧</sup>设意为因，本因求果，从而导致虚妄。

严复透过《穆勒名学》讨论几何学中“推于界说”的假设方法和心理学中“意相守例”，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外籀之法落于虚妄，因为推理的前提往往是虚妄的巧问智词。

《名学浅说》论巧问智词（fallacy of begging the question）：“先主一定之成见，而后发议证其为然者，其于名学，皆为巧问之智。”<sup>⑨</sup>此即现在逻辑学的概念“假设性谬误”，指在论证或者推理过程中暗中利用了某些不当的假定、预设，只有依赖它们才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种谬误常常出现在前提与结论的逻辑关系上，貌似正确，具有某种心理的说服力，但经仔细分析之后却发现其为无效的推理或论证形式。<sup>⑩</sup>严复译《穆勒名学》加案语指出此类逻辑错误，“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sup>⑪</sup>

于此逻辑错误，严复指出：“中国旧学，无论哲俗诸家，犯者尤众。顾此智不祛，将一切穷理，皆同自欺。虽貌极精微，于真理实用，毫无有当。……常见世人，每以己意，先与物以定名，后乃从

①③⑥⑨⑩ 《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9、162-164、399、499、163页。说明：《名学浅说》虽曰译自英人，实是严复以英人著作为本，编译以为授课教材，完全化为己意，所以本文作为严复观点引用。

② 《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7、238页。

④ 《丙午十二月念三日上海华童学堂教学演说》，见《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91页。

⑤⑦ 《教授新法》，见《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7、238、239页。

⑧ 《严复全集》卷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⑩ 参考陈波著《逻辑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3、344、339页。

名说理，不知当为名时，吾意已有定属。后来说理，仍是吾意之理，与物何涉。……若以名学法例，绳吾国九流之学，则十八九皆丐问智词。而谬学相传，犹自以为微妙。此中国穷理之术，所以无可言也。试问星学占验，则星象昭回，某为句陈，某为帝座，某为王良，某为旄头。此为天之所自名，抑人之所命耶？既以意妄命之矣，乃又以意为之推，谓某星乃主朝廷，某星乃主胡虏，某主马匹，某主兵戎。……又如医药治疗之术，凡用阴阳五行，皆真呖语。乃至谓白色之药，宜于入肺，酸味之品，足以斂肝。……吾非好为警古，顾幸生今之世，大梦差醒，有灼然瞭然，知其说不摧陷廓清，犹将误人于无已者。故垂涕泣而为吾党一及之耳。……此等智词，其常见于世俗者，如于人物事义，先加恶名，而后从而议之。秦桧欲杀岳飞，先谓其谋还兵柄，而不待证据，又谓其事必须有也。”<sup>①</sup>

《穆勒名学》从几何的假设，研究逻辑学中的假设，严复受到启发，认识了心成之学（a priori science，现在通译先验论）的成因。原来，“形数诸学之所言，非真物也。智学家曰：几何之所由推，推于界说（定义）。……几何之所界者，世间必无是物也。世间之点必有度（magnitude，即大小），而几何之点则无度矣。世间之线必有阔陋，而几何之线则无阔陋矣。……将谓此非云其效实（actual，现实的），特言其储能（possible，可能的）者乎？……凡形学之所有事者，皆非自然之所有，而独存于人意之间。故形学设意为因，本因求果，特心成之学耳，与一切外物，固无与也。此其说虽出大方之家，而自不佞观之，则于人心之理，又未合也”。严复加案语，谈几何学点线之虚设和心成之学，举一案例——晚清人士设意为因、本因求果，得出西人非富强的结论：“吾往年闻一学人争西人非富强，而其语皆与联珠暗合。曰：富者不远适异国以求利，今西人远适异国以求利，则非富也。又曰：强者无事人之保护，今西人立约以求保护，则非强也。此其联珠，虽以至精之例勘之，不得谓非合法也。顾其言如此，其谬安所属乎？”西人用于科学假设，国人在现实中设意为因。其思维方式与几何学是同一类，路径相同，“原（前提）”建立在抽象的预设之上。以抽象预设当然，而不必经验证，习惯成自然，当成永恒真理。几何学作为科学，可以抽象预设，因为其研究对象本非真物，而是抽象原理。“物具一德（特征、特性）而亡其余者，特科学之便事，权焉，而非其真实也。……必曰假如”。<sup>②</sup>

严复还从《穆勒名学》研究意相守例（the law of association）受到启发，对中国传统思维之心习之成有所省察。《穆勒名学》指出：“夫吾思之所能，所不能，本于所遭而定者也，依乎心习者也。使心习之既成，而一旦欲反乎其习，于吾心必形至难。此心学之一大例，而能违之者寡矣。今有两物焉，于吾见则联及，于吾思则相依，自有生以还，未尝一见其分处，亦未尝各出而为思，则将见此例之行（此例于心学为意相守例），二意相守，久而弥固，其卒也乃欲孤举其一而不能。此于不学之人，最易见也，故二意必连结而不可解。惟媿心缜性之人，以其见闻之多异，又能好学深思，以穷事物之变，夫而后二意分形，不相胶结，而向者之心习，无由成也。”严复案语解释：“意相守例，发于洛克，其有关于心学甚巨，而为言存养省察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心习之成，其端在此。拘虚束教，囿习笃时，皆此例所成之果。……中国人士，经三千年之文教，其心习之成至多，习矣而未尝一考其理之诚妄。乃今者洞牖开关，而以与群伦相见，所谓变革心习之事理，纷至沓来，于是相与骇愕，而以为不可思议。夫西学之言物理，其所以胜吾学者，亦正以见闻多异，而能尽事物之变者，多于我耳。”<sup>③</sup>

意相守例，今心理学称为联想律，意指人的思维常常联想到过去所经历、所熟知、所习惯的事物，并受其影响和拘束，遂生成心和成见。严复呼吁，为学“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

①②③ 《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46-448、167-169、175-176页。



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sup>①</sup>

(三) 崇圣信古，重前人古训而不重当今现实；重书本知识而轻实践，重知识积累而无心灵与思维开拓；轻信流言，习惯于听话和从众，不善于独立思考；不容求异思维，压制创新思维。

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无独辟之虑”<sup>②</sup> 没有独立独到的思致，无创新思维。其他文章和译著案语有大量文字对其表现和深层原因及危害做了透彻分析。

《教授新法》谈教育方法，实际上所言也是一种认识方法，关乎盲目崇古还是崇尚实证问题：课经学，“其理诚然，愿其理之所以诚然，吾不能使小儿自求证。凡皆枯骨朽肉之定论，主张我辈之信心”；“皇帝所折中，昔贤所论断，则惟有俯首受教，不敢有违，违者或为荒经，或为蔑古，皆大罪”；“古人之成说，即今同呈讹谬，累百盈千，误而犹信，常为大害”。“尚有极重之弊焉，使不改良，将吾人无进化之望者，则莫若所考求而争论者，皆在文字楮素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膺于古人之成训，或同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尝亲为视察调查，使自得也。少日就傅读书，其心习已成牢鞲，及其长而所言办事，亦以如是心习行之。是以社会之中常有一哄之谈，牢不可破，虽所言与事实背驰，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余，群情汹汹，驯至大乱，国之受害，此为厉阶。”<sup>③</sup> 又云：“吾国人言，除六经外无书，即云除六经外无事理也。”<sup>④</sup>

严复总是在中西对比、参照中认识中国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尝谓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其学问（与科学）“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此为科学探索、求异创新方面。在欧洲，“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起卧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曰病狂”。此为社会科学和政治方面。严复认为，在中国“仅用呆狂二子，已足丧天下古今人材之进境矣”。<sup>⑤</sup>

严复还能从世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中看到国人思维方式的隐性问题——麻木、庸常、怠惰、趋同、守旧停滞、死气沉沉：“士林无横议，布帛黍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縟，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悞，无以复逾。”<sup>⑥</sup>

《群学肄言 物蔽第五》：“泰东人士，于无稽诞幻之言，受之如饥人之得食，而饕讹谣诼，虽于己无所利而犹为之。……支那染工赋色不成，谓因布一讹言，不能动众之故…支那所有教案，皆坐士民笃信流言，乃至放火杀人，不复恤耳。”<sup>⑦</sup> 此虽为斯宾塞之言，严复显然是认同的，从其译注“此俗吾闽正尔”可知。

长期强调大一统和独尊，压抑求异思维。《论世变之亟》说，中国专制政治一味追求“《春秋》大一统”的稳定局面，“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防止人们产生竞争意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

① 《政治讲义》，见《严复全集》卷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② 《严复全集》卷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③ 《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9、237页。

④ 《名学浅说》，见《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9页。

⑤⑥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见《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64、364页。

⑦ 《严复全集》卷三，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紘之网以收之”。<sup>①</sup>

严复以一己之力努力改变压抑创新的社会惯性，有一生动例证：做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校长）时，一学生作文《张巡论》一改庸常论调，批判杀妾飨军为野蛮和歧视妇女行为，大喜过望，自掏腰包奖赏此生十元，并给外甥女写信说，“可惜吾女尚小，不然，真可妻也”。<sup>②</sup>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求异创新，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以一己之私为价值尺度。

#### （四）价值思维混乱

价值思维是指在现实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中，思维者依照主体自身的尺度，选择、对待和评价客体，使客体主体化从而产生价值的运思活动。崇圣信古、轻信流言，则主体自身价值判断所持的尺度与现实社会和客观真实必不对应，必然造成价值思维的混乱。如果用严复翻译《群学肄言》的概念，可以称之为“情瞽”。

严复《救亡决论》曰：“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又言：“当其做秀才之日，务必使之习为剽窃诡随之事，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桔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贄通籍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真若一丘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惜民生国计也哉。”<sup>③</sup>以一己之私为价值尺度。《法意》对人类价值观的扭曲有所分析：天下古今，固有甚美之意，至良之法，以其民心德之不逮，而克不施…虽有自由，然使其民奴性既成，必且以其说为至不道。清风霁宇者，诚生类之所欣欣，顾使习处窟穴幽秽之中，则将缩项顰眉，以遇之为不快。<sup>④</sup>

严复对价值思维混乱的认识，理论上应是受到斯宾塞《群学肄言》之《情瞽》等篇的启发。《政治讲义》云，“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sup>⑤</sup>《群学肄言情瞽第七》：“是故当人情之瞽也，往往于小不仁严，于大不仁恕。……无他，以人情之悚权慕势而已。”严复理解、概括“情瞽”的大意如下：民伏于积威权势日久，用此成其心习，难与言一群之是非；此种情瞽古今所同，古所崇信者，专制之君主，今所崇信者，代表之议院，然而皆过。又明其惑，为党人所通病，守旧尊王者，其惑固然，即言维新革命者，亦同此惑。尊上忠主之民，不知重法而重立法之权，不知愼度而愼制度之人，种种情瞽，缘是以生。然使民德未优之日，猝然去其如是之心习，则其群有立散之忧。是故如此之惑，常为治群学者之大梗，而又难祛也。史家所以独详君公而不及民生者，亦缘尊尚权力之情瞽。<sup>⑥</sup>

避免“情瞽”，惟有排除外在干扰，独立思考，所以严复呼吁思想言论自由：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sup>⑦</sup>一切事理“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足以瘖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sup>⑧</sup>正是宣言以独立自由的主体姿态进行价值判断。

《法意》第十九卷第二章案语：“人生于群，是非固亦有定，盖其义必主于养生，而求其是非之所在，则为术不出于因明”；“欲辨其理之是非”，不得以古先和经典“以较其离合也，亦不得以公言私言为断，必将即其理而推其究竟，使其终有益而无害于人群。斯其理必是，是者何？是于此世界之

①③ 《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52、46页。

② 《与甥女何幼兰书》，见《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56页。

④ 《严复全集》卷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0页。

⑤ 《严复全集》卷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⑥ 《严复全集》卷三，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9、104、108页。

⑦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见《严复全集》卷三，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⑧ 《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人道也”；“居是世界，以人言人，不得不以此为程准也。呜呼！不自用其思想，而徒则古称先，而以同于古人者为是非，抑异于古人者为是非，则不幸往往而妄。即有时偶合而不妄，亦不足贵也”。<sup>①</sup>严复在此揭示了价值判断的目标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幸福，其标准是人道主义，是善，而不是古先和经典，其方法是运用理性思维，进行逻辑推理（因明术）。

## 二、以知识重构改铸国人思维方式

严复在1898年1月2日发表《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认为，“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蔽。故有可见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此在细事、在隐蔽处者，正是本文开头所论及，欧洲人寻常日用中不可端倪之微妙——思维方式。“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sup>②</sup>

严复开出的治疗之方，不是革命，而是教育。“是故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者，教育之大责”。<sup>③</sup>严复认为，中国教育是有所偏废、不完整的教育——舍士无学，学古入官，<sup>④</sup>由此造成中国人知识结构的失衡，带来思维方式的缺陷。严复通过译著所建构的，作为教育者所设置的课程，其知识体系和结构是物理科学（自然科学）、群学（社会学）、名学（逻辑学）和外语，当然还有中国传统旧学，尤其是晚年，以旧学为先。但是在早期，戊戌变法前后，特别重视西方科学（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引进，意在以科学改进国人气质，变其心习。《教授新法》演说：“欲变吾人心习，则一事最宜勤治：物理科学是已。”<sup>⑤</sup>

### （一）提倡研究群学，开濬思维智慧

严复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是斯宾塞的思想。他首次介绍斯宾塞，应该是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原强》：“（斯宾塞）《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其勉人治群学者，意则谓天下沿流讨源，执因果果之事，惟群学为最难，非不素讲之者所得与。”斯宾塞群学“精深微妙，繁当奥殫。其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引其端于至真之原，穷其极于不遁之效”。<sup>⑥</sup>所以严复认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sup>⑦</sup>故而提倡中国学人学习群学。

### （二）提倡科学，改变国民心习

在斯宾塞的学说体系里，物理科学是群学的基础，其《劝学篇》云：“智之开也，物理为先，群理为后。未有物理不明而群理了然者，何则？物理简而群理繁也。”<sup>⑧</sup>“天下沿流讨源，执因果果之事”，以群学所含之事理为最繁难，必以以下诸多学科为基础：数学名学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力学质学（物理、化学）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天地二学（天文、地理）见物化之成迹，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化物之蕃变；生学（生物学）明生生之机；心学（心理学）知感应之妙。<sup>⑨</sup>以上皆属自然科学，而群学，即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前提。

严复强调民智对于国家和民族兴亡的重要性，“民智者，富强之原”。提高民智的途径，主要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西洋）言学则先物理（科学）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所以审核物理，辨析是非”；“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

① 《严复全集》卷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0页。

②④⑤⑥⑦⑨ 《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64、235、237、238、24、25、24-25页。

③ 《宪法大义》，见《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7页。

⑧ 《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

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sup>①</sup>

《教授新法》云：“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因为“物理科学，其于开澹心灵，有陶炼特别心能之功”，又利于增广知识，卫生保种，大进事业，“为吾国所最缺乏而宜讲求者”；“一切物理科学，使教之学之得其术，则人人尚实心习成矣”。<sup>②</sup>

斯宾塞有个教育命题影响深远：科学（含社会科学）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sup>③</sup>

晚清时期西方近代科学介绍到中国，并非自严复开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早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十几年就有人介绍了，李鸿章在1889年的春季特课中要求参加课艺的考生解释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但是，当时译介西方近代科学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他们的目的是藉科学以传教，“宗教为体，科学为用”，西方科学译作中充斥着自然神学意味，缺少完整的新科学理念，以致晚清官员和士大夫对科学还是相当无知，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懵懵懂懂。只有严复的译介才真正让科学概念、科学思维、进化论等进入社会的知识视野，在晚清知识界和思想界引起震动。<sup>④</sup>

### （三）重视逻辑学，为科学研究厘清名词

严复认为，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术落后。《与长子严璩》书云：“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sup>⑤</sup>《与五弟观衍》书云：“虽有圣者，无救灭亡也。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sup>⑥</sup>而名学，“义兼夫术与学者也，乃思之学，本于学而得思之术者也”；严复案语引培根之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sup>⑦</sup>

严复认为，名学是关于思维的学问，是学问的学问，科学的科学。“智识有待于思辨。思而精，辨而明，又有待于习名学。……名学者思辨之学也。必通名学，夫而后能决思理之无差，而有以照天下之事实，察夫辨言之妄，而不至日陷于过失与危机也。”<sup>⑧</sup>所以名学引进是当务之急。严复在晚清孜孜矻矻翻译名学著作，并成立名学会，讲习名学，可谓用心良苦，学问救国之心赤诚可感。

严复认为，“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sup>⑨</sup>语言文字跟不上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中西皆然，中国尤甚。

《名学浅说》指出：“近取一身而言，一筋一骨，一官一络，皆有专名，而中文虽尽《灵枢》《素问》与一切医书之所有，不足于译。……乃滥制新名。夫名者器也，以如此不精之器，以求通专精之学，呜呼难已。”<sup>⑩</sup>“上自《五雅》《三仓》《说文》《方言》，直至今之《经籍纂诂》，便知中国文字，中有歧义者，十居七八，特相去远近异耳。……有时所用之名之字，有虽欲求其定义，万万无从者。即如中国老儒先生之言气字……邪气、元气、间气、湿气、厉气、正气、淫气、余气。……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必茫然不知所对。然则凡先生所一无所知者，皆谓之气而已。指物说理如是，与梦呓又何以异乎？出言用字如此，欲使治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庸有当乎？今请与吾党约，嗣后谈理说事，再不得乱用气字，以祛障蔽，庶几物情有可通之一日。他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义字，诸如此等，虽皆古书中极大极重要之立名，而意义歧混百出，廓清指实，皆有待于

①② 《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4、35、240、238页。

③ 《斯宾塞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4、45页。

④ 参考[美]本杰明·艾尔曼著，王红霞等译《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第五章《从教科书到达尔文：现代科学的到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⑤⑥ 《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37、451页。

⑦⑧ 《穆勒名学》，见《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14、333页。

⑨ 《政治讲义》，见《严复全集》卷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⑩ 《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2页。

后贤。”<sup>①</sup>

严复认为，日常生活语境中这些含混的词语，尚且无妨，而用于科学、哲学，则须廓清指实。“语言文字，思辨之器，求思审而辨明，则必自无所苟于其言始。（因概念含糊）至于今日党派滋多，虽人人皆言爱国，而其意中所爱之国各异。是以言论纷淆，虽终日谈辨，实无相合之处也”。<sup>②</sup>

#### （四）以外语教育打开思维的全球视野

严复非常重视西学和外语教育，认为只有学习了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才更能认识自己母语和本土文化，严复称之为“自他之耀，回照故林”。《教授新法》演说：“居今言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谓教授旧法当改良。诸公既治新学之后，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正好为此。”<sup>③</sup>《丙午十二月念三日上海华童学堂散学演说》：“所读者，尤必为本国之书。但读矣而仅囿于此，则往往生害。故必博参之以他国之书，而广证之以真实见闻。”<sup>④</sup>精通群学理论，才能更加理解中国古训（如：言必有信、见利思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所以然。<sup>⑤</sup>前文论及之“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亦同此理。“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sup>⑥</sup>

严复甚至认为，欲真正学好中文，须精通外文。“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能之。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sup>⑦</sup>

以西文弥补中国教育缺陷，非徒语言，乃变心习，这是严复经验之谈。1894年11月8日，与长子严璩书：“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sup>⑧</sup>

严复强调要学习原汁原味的西学，必须精通西文。他瞧不起从日本转来的西学，称为“东学”，是裨贩之学，所以一向瞧不起留日学生。《〈英文汉诂〉卮言》云：“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假道于译，借助于东文（日文），其为辛苦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故今日东西诸国之君若臣，无独知其国语者。”甚至英法各国的将军，都通他国语言。<sup>⑨</sup>

在严复眼里，外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工具，而是思维的全球视野和异质文化参照；与其说严复重视外语，不如说他在倡导全球视野、比较思维。他说西人靠译文无法领会传《易》、作《春秋》的微言大义，《离骚》《史记》的歌曲和吊诡；反之亦然，西学也难以译求。其理同于南民不可与语冰，生譬不可以喻日。<sup>⑩</sup>只有通晓西方语言，才能真正领会西学；只有真正领会西学，才能真正认识中学的价值。

严复对外语的重视，建立在对思维规律的认识之上，是对思维规律的运用：“人心之思，历异始觉。假使世间仅此一物，则其别既泯，其觉遂亡，觉且不能，何往思议？故曰天下无无对独立者也。”<sup>⑪</sup>“凡一种人民，未与他类异种相见之时，往往无自呼之种名。”<sup>⑫</sup>

戊戌变法以后，严复的激进思想有所改变，不再如前之偏激，对中国旧学有了更多的温情和敬意，主张兼容并包：“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凡可以瘠愚者，将竭力

①② 《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0-351、348-349页。

③④⑤⑦ 《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0、293、240、241页。

⑥ 《译天演论自序》，见《严复全集》卷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⑧ 《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37页。

⑨⑩ 《严复全集》卷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6、84、83页。

⑪ 《穆勒名学》案语，见《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⑫ 《政治讲义》，见《严复全集》卷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尽气馘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旧也。”<sup>①</sup>显示了严复在思维上广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不凡的气度。

## 余论：从鲁迅、胡适、李大钊看严复的影响

此处所言影响，仅就国民性、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方面而言。

天演论和进化论思想在晚清后的中国风行一时，成为知识界和社会上层中的主流信仰。<sup>②</sup> 严复的启蒙思想对“五四”一代思想家的影响，学界应有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论证，本文仅以鲁迅、胡适、李大钊在国民性、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方面的有关文字和言论，作为个案，展示一下严复的流风余韵。

(一) 严复的《道学外传》生动地刻画了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塑造，其形象：“面带大圆眼镜，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颌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其知识和思维：“四五十年间，日日均可读书，质虽弩下，无一得之智，无远略之怀，但能徇途守辄”。<sup>③</sup> 此形象也许正是鲁迅的孔乙己形象的前身。孔乙己与“道学先生”如此形神毕肖，应非偶然。鲁迅对国民奴隶性的揭示，与严复一脉相承。严复《辟韩》认为皇权专制让人民成为奴隶，“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sup>④</sup> 与鲁迅一样，哀其不幸。而长期的高压，习惯成自然，变成天性的奴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的盲从和惰性。《法意》案语云：“吾国固无真自由，而约略皆奴隶。……责其所以盲从驯服者尤深，垢污懒贱，习为常故。”严复深深为其叹惋，鲁迅则怒其不争。<sup>⑤</sup> 冷漠、麻木、迟钝、僵化、守旧、奴性、盲从，是严复和鲁迅对中国社会没落时期国民性和思维方式特征的共同认识。

据《鲁迅年谱》，鲁迅于1898年到南京读书求学，1901年沉迷于阅读《天演论》，甚至能够背诵；进化论成为鲁迅早期观察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和路标。“严复每出一书，鲁迅一定设法买来”。《道学外传》刊于1898年6月的《国闻报》；《辟韩》1895年发表于天津《直报》，1897年转载于《时务报》，此报在鲁迅就读的南京路矿学校很流行。严复以上言论，鲁迅或许都读过，并且深深刻印于脑际。<sup>⑥</sup>

(二) 胡适少年时代就深受《天演论》的影响，“胡适”之名就是“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他15岁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国文教员杨千里先生“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作文题。<sup>⑦</sup>

胡适的科学主义精神和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无疑受到严复提倡实验主义的内籀之法和批判心成之学的影响。胡适做《红楼梦考证》，用意就是做一个科学实验的案例，“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sup>⑧</sup> 胡适提倡“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sup>⑨</sup> 胡适认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

① 《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

② 张鸣：《民国的三个面相》，转引自刘建军等著《李大钊思想评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

③④ 《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78、40页。

⑤ 《严复全集》卷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⑥ 参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版）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79页；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⑦ 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的自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4-55页。

⑧ 胡适：《红楼梦考证》，见《胡适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277页。

⑨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文集》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的”<sup>①</sup>；“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sup>②</sup>“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sup>③</sup>最后这段话，不能不让人想起严复的话：“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sup>④</sup>胡适无疑是接着严复的思路讲下去的。

无独有偶，李大钊的真理观亦有类似言论：“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sup>⑤</sup>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谈中国国民性特征：消极的、苟安的、因袭的、保守的、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缺乏同情心，<sup>⑥</sup>与严复《论世变之亟》《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道学外传》等文所言极其类似。

据今人研究，李大钊“早期的进化论思想主要来自严复的重大影响，主要接受的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观念”。<sup>⑦</sup>有文为证——李大钊谈宇宙观的名文《青春》有一段文字：“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邃研物理，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之有高下而后流也。今太阳本热常耗，以慧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罔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斯能耗热耗力。故大宇积热力，每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sup>⑧</sup>一百三十四字，除“邃研物理”四字外，全录自严复《天演论》手稿《自序》，一字不差。<sup>⑨</sup>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见《胡适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120页。原载《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②③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文集》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107、116页。

④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见《严复全集》卷三，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⑤ 李大钊：《真理（二）》，见《青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8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2月2日。

⑥ 李大钊：《青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3、126页。原载《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⑦ 刘建军等：《李大钊思想评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

⑧ 李大钊：《青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3页。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⑨ 参见《〈治功天演论〉（手稿本）自序》和《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序文》，见《严复全集》卷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223页。

# 白玉蟾与《白真人集》

徐杰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福建福州 350117)

**摘要:**白玉蟾是福建道教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是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实际创立者,对于南宗教团组织的创建可谓功魁千秋,被尊为“南宗五祖”。他改变了以往南宗只是单个人以丹诀传密的传统,开始较大规模地吸收门徒,创立了以修炼内丹为主,兼传雷法的教团和靖庵,从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派系,其影响足以与当时已逐渐联合成为正一教的符箓诸派相抗衡。白玉蟾本人博览群书,心通三教,学贯九流,著述不辍。为文制艺,无所不能,宣扬道法,抒发情感,下笔滔滔,奔放不羁,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道宗仙诗大家。《白真人集》是其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种。

**关键词:**关键词:白玉蟾;道教;《白真人集》

白玉蟾,本姓葛,名长庚,字如晦、白叟、以闾众甫,号海琼子、海南翁、琼山道人、琼琯、武夷散人、神霄散吏等,卒后诏封“紫清明道真人”,世称紫清先生。祖籍福建闽清,生于海南琼州(今海南省琼山)。

关于白玉蟾的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学术界争议颇大。其生年一般有南宋绍兴四年(1134)与南宋绍熙五年(1194)两种说法。前者主要依据清代彭翥所撰《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和一些清代方志,后者主要依据白玉蟾弟子彭耜所撰《海琼玉蟾先生事实》。通过当今学者的考证辨析,后说较为可信,即生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至于其卒年,或谓南宋绍定二年(1229)“化解于盱江”,或谓元代尚在人世。但由于各种说法皆拿不出可靠的证据,且自南宋宝庆三年(1227)之后便未再见到白玉蟾的诗文著作与确切事迹记载,故学术界一般根据彭耜所记,认为其卒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sup>①</sup>窃以为,只要不能证明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一文为伪,则基本可以排除“绍兴说”的可能性。首先,彭文明载白玉蟾生于“绍熙甲寅三月之十五日”<sup>②</sup>,又谓其绍定己丑解化符合“待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sup>③</sup>之诗,故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绍熙”是出于“绍兴”的误写或误刻。其次,彭耜作为白玉蟾最亲近和器重的弟子,于嘉定十年(1217)起师从白玉蟾,绝不可能连师父究竟是八九十岁还是二三十岁都无法辨认。何况还有其他间接证据可与彭文的“绍熙说”互相印证。因此,所谓“绍兴说”反而很可能是出于“绍熙”的误写或误刻,后来以讹传讹,流传日广,有意无意满足了人们关于高道白玉蟾长寿的传说、想象和愿望。此外,近年还有一些学者根据白玉蟾的个别诗作,推断其生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或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左右<sup>④</sup>。虽

**作者简介:**徐杰,女,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sup>①</sup> 参见王尊旺、方宝璋:《也谈白玉蟾生卒年代及其有关问题——兼评近年来有关白玉蟾问题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曾召南:《白玉蟾生卒及事迹考略》,《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3期。

<sup>②③</sup> (宋)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一。

<sup>④</sup> 参见冯焕珍:《白玉蟾生卒年新说》,《现代哲学》2011年第5期;刘亮:《白玉蟾生卒年新证》,《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



然观点新颖，但实际上并未提出更多新的证据，在整体解释上似亦欠说服力与其它之佐证，尚难令人信服。首先，诗词本是艺术作品，容有艺术加工与创造，未必是对历史的客观记载，且存在不同的解读、阐释方式；其次，白玉蟾作为修仙之人与教派领袖，年少得道，行踪不定，为了增加其神秘感与权威性，或受“道不言寿”传统的影响，完全存在对生平、年岁等信息故弄玄虚的可能与意图；第三，白玉蟾在道门中声名显赫，如今所见署名白玉蟾的诗作亦有后人附会、委托的可能，故不能单纯依靠诗词中隐晦的片言只句来断定或证明白玉蟾的生卒年月。

相传其母梦食一物如糍涂，觉而分娩，故又名玉糍。因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母亲改嫁白氏，遂改姓白。白玉蟾幼年聪颖绝伦，谙九经，能诗赋，曾举童子科。开禧元年（1205），白玉蟾正式拜金丹派南宗四祖翠虚真人陈楠（陈泥丸）为师，向其学习道教丹法，师事九年，并云游四方，“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书，长生久视之术，紫霄啸命雷霆之文，出有人无飞升隐显之法”<sup>①</sup>。嘉定六年（1213）陈楠去世后，白玉蟾披发佯狂，走诸名山，盘桓于罗浮、霍童、武夷、龙虎、天台、金华、九日诸山，传道授徒，为百姓驱邪治病，足迹遍布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嘉定八年（1215），白玉蟾于武夷山遇陈守默、詹继瑞，十年（1217）收彭耜、留元长为徒，后又收潘常吉、赵汝谿、赵汝渠、洪知常、陈知白、林时中、叶古熙、周希清、胡士简、罗致大、庄致柔等人为弟子，声望日隆。

或谓嘉定中，白玉蟾曾应诏赴阙，对御称旨，命馆太乙宫。嘉定十一年（1218）春，白玉蟾游洪州西山，适逢宋宁宗降御香建醮于西山玉隆宫，命使者邀其“为国升座”，观者如潮。后又邀其至九宫山瑞庆宫主国醮。但云游成性的白玉蟾显然对于这些官方性质的道法活动并不热衷，屡欲“避之”“遁去”。《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又载，嘉定十五年（1222）夏，白玉蟾在京城“伏阙言天下事”，结果“沮不得达，因醉执逮京尹，一宿乃释”。<sup>②</sup>大概是之前官府的礼遇给了他信心，抑或是一时心血来潮，使得身处方外的白玉蟾亦有此伏阙言事的举动，无奈喜好道教修炼的宋宁宗似乎对其所言的天下事并无兴趣。此后，白玉蟾仍继续云游传道，修炼著述，发展教团组织。

宋代是我国道教教义教理与教派组织成熟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整顿、改造与充实，以及唐代思想理论的大发展，道教到宋代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兴旺发达之象。如社会地位提高，获得官方支持，修道人数增加，宫观遍布全国，典籍大量编纂。据统计，宋代仅福建就兴建道观40余座，数量居历代之首。这一时期，在道法承继不同源流的基础上，道门内各教派亦纷纷应运而生，分衍融合，山头林立。除了固有的天师（正一道）、上清（茅山）、灵宝三大派之外，尚有全真、金丹派南宗、清微、神霄、天心正法、东华、净明、武当诸派。而其中一个总的发展趋势便是外丹术的渐衰与内丹学的兴起。

金丹派南宗便属于内丹派的一支。其丹法思想渊源于唐末五代的钟离权、吕洞宾，奉北宋的张伯端为高祖，并以张伯端《悟真篇》作为立宗创派的基本经典。张伯端传道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陈楠。陈楠上求诸师学说，兼习雷法，将内炼金丹与外用符箓合而为一，并扫荡丹书纷繁的术语，力求简明，下传白玉蟾等弟子，为南宗的繁荣兴盛准备了重要条件。而白玉蟾作为福建道教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是金丹派南宗教派的实际创立者，以“文教宗师”著称道史，对于南宗的发展可谓功魁千秋，被尊为“南宗五祖”。其对南宗思想与教派的贡献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在继承张伯端、陈楠等人道法的基础上，对南宗的金丹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主张先修命，后修性，并以体内精、气、神三宝作为丹法修炼的重点。他说：“人身只有三般物，精神与炁常保全。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炁即非呼吸炁，乃知却是太素烟。其身即非思虑神，可

①②（宋）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一。

与元始相比肩。”<sup>①</sup>因此，他提出“夫修金丹者，先探本源，次知蹊径。入门之初，辨水火，识龙虎，然后采太元真精，以为金丹之母”<sup>②</sup>，待修炼到神全气和，阴尽阳纯之时，则金丹可成，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内丹学理论体系，完善了金丹派南宗的教理教义。

(2) 在注重修炼内丹的同时，将内丹与外丹修炼、符箓雷法结合起来，主张内外丹合炼，内功与外法兼用，形成了一套内外兼修、兼容并包、和会诸宗的丹法修炼体系。在他看来，内丹与外丹的功能具有互补性，二者功用不同，皆不可独用。内丹须与外丹相互配合，经由外丹点化，才能达到神形俱妙、超凡入圣的境界。同时，内炼丹功还要与外用符箓雷法相结合，“收炁存神，惜精爱己，内炼成丹，外用成法”<sup>③</sup>，这样既有利于自身修身致仙、与道合真，也可以为民众消灾避祸、治疗疾病、祈雨救旱。

(3) 改变了以往南宗只是单人以丹诀传密的传统，开始较大规模地吸收门徒，建立教团组织与固定的修行场所。相传，南宗四代祖师从张伯端到石泰、薛道光、陈楠都是师徒间一线单传。陈楠虽招收了白玉蟾、鞠九思、沙道昭等若干弟子，但人数仍然很少，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教派。直到白玉蟾时，才开始大量授徒，据称“四方学者，来如牛毛”<sup>④</sup>。其与诸弟子取法早期天师道的“二十四治”制度，在福州等地建立了碧芝靖、鹤林靖、紫光靖等靖作为传教基地与活动场所，并向朝廷奏请靖额，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还以“神霄玉清府”的名义设立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和教阶制度，建立起一支比较完善的宗教组织队伍，从而迅速扩大了金丹派南宗在南方地区的影响力。

(4) 制定了一系列宗教科仪与戒规，建立起一套南宗教派的组织、修行制度与戒律体系。当时，南宗道堂刚刚兴起，教徒快速增长，人员不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仅平日游手好闲，喝酒闹事，建醮上章也往往不依法度，严重败坏了南宗的道风和声誉。为了正己律人，规范徒众行为，确立道堂规矩，其参考传统道教戒律撰写了《道法九要》《道堂戒论文》《堂规榜》等戒律文献来阐述道堂管理问题，订立南宗道徒日常修行所应履行的职责义务和行为规范，以达到除弊兴教的目的。这些文献不仅成为南宗教派组织、修行的基本纲领，而且对后世的道教戒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明代的《道门十规》就明确规定：“凡出处之间，悉遵白祖师、冯尊师诸师匠《堂规》《丛林仪范》而行。凡有过失，悉依责罚。”<sup>⑤</sup>此外，白玉蟾还时常与弟子讨论道教各派的法术科仪，将雷法融入斋醮科仪之中，并通过传授《金液还丹印证图》等方式，论述、规范了修炼步骤，修炼场所的选择，丹室、丹台的建构，以及剑、镜、刻漏等法器的配置等，对后世的道教科仪亦有所影响。

道教内丹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广泛吸收儒家与佛家，特别是理学与禅学的思想内容，倡导三教归一论。如张伯端即主张“教虽分三，道乃归一”。而白玉蟾亦博览道、释、儒三教之书，广泛吸收各家义理思想，显示出浓厚的三教融合色彩。如友人苏森谓其“心通三教，学贯九流，多览佛书，研究禅学”<sup>⑥</sup>，时人诸葛琰称“其于佛老秘典及人间所未见之书靡不该贯”<sup>⑦</sup>，弟子留元长亦谓其于“三教之书，靡所不究，每与客语，觉其典故若泉涌然，当世饱学者未之能也”<sup>⑧</sup>。

① (宋)白玉蟾：《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三十九《毕竟恁地歌》，《道藏》第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二《南康军成蹊庵记》。

③ 《道法会元》卷七十《玄珠歌》注，《道藏》第32册。

④ (宋)白玉蟾：《修真十书·武夷集》卷四十七《法曹陈过谢恩奏事朱章》，《道藏》第4册。

⑤ (明)张宇初：《道门十规》，《道藏》第32册。

⑥ (宋)苏森：《跋修仙辨惑论》，(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八《附载》。

⑦ (宋)诸葛琰：《跋鹤林紫元问道集》，(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八《附载》。

⑧ (宋)留元长：《紫元问道集序》，(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八《附载》。

在白玉蟾看来，“三教异门，源同一也”<sup>①</sup>，“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sup>②</sup>，“道释儒门，三教归一，算来平等肩齐”<sup>③</sup>，即道、释、儒三教在根本宗旨、思想源头与最终归宿上是一致的，不应该以门户之见互相攻击，厚此薄彼。因此，其在诗文著作中多会通三教之言，并将三教的重要思想观念相提并论，相互比拟，既强调其同一性，又突出其互补性，力求站在道教南宗的立场上会通三教思想。譬如他说：

粤自两周之季始，自三教之兴，孔氏则四端五常，释氏则三乘四谛，老氏则三洞四辅。若夫孔氏之教，惟一字之诚而已。释氏之教，惟一字之定而已。老氏则清静而已。所谓是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其在孔氏者，岂不见云：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终日如愚，三月不违仁，善养吾浩然之气，念兹在兹，则其庶乎屡空也必矣。夫为道学者，如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在释氏者，岂不见云：二六时中，常光现前，壁立万仞，如鸡抱卵，常使暖气不绝，绵绵密密，无令间断，则所谓临崖撒手，便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也必矣。夫为禅学者，如何临济入门，便喝有理不在高声；德山入门，使棒打草，只要蛇惊。其在老氏者，岂不见云：洞晓阴阳，深达造化，追二气于黄道，会三性于元宫，攒簇五行，合和四象，龙吟虎啸，夫唱妇随，玉鼎汤煎，金炉火炽，节候既周，脱胎神化，功成名遂，身外有身也必矣。夫为仙学者，如何牵将白虎归家养，产个明珠似月圆。毕竟三教是同是别，不知说个何年事，直至而今笑不休。<sup>④</sup>

又说：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子未明心地，故发此问。参禅则制心一处，始扫至于无扫。禅是佛心，心为万法之宗。修养为抱元守一，初修至于无修。道为养神，神为万物之主。神即心，心即道，道即禅也。盖无为大道者，离名相，无生死，常处虚空，无有纤碍，事来则应，事去则寂，如鉴照相，不留形迹，强名曰道。<sup>⑤</sup>

白玉蟾还特别善于援释、儒入道，借用佛教与儒家的一些概念范畴和思想观念来解释、论证、完善南宗的丹道思想和修行方法。譬如，其论道气、形神、性命关系曰：

至道在心，心即是道，六根内外，一般风光。……是故形以心为君，心者神之舍，心宁则神灵，心荒则神狂。……至道之要，至静以凝其神，精思以彻其惑，斋戒以应其真，慈惠以成其功，卑柔以存其诚。心无杂念，可不外走，心常归一，意自如如。一心恬然，四大清适。……所以道心者气之主，气者形之根，形是气之宅，神者形之真。神即性也，气即命也。<sup>⑥</sup>

命者因形而有，性则寓乎有形之后。五脏之神为命，七情之所系也，莫不有害乎吾之公道。一受于天为性，公道之所系焉。故性与天同道，命与人同欲。<sup>⑦</sup>

其论内炼与养气之法道：

先当习定凝神，惩忿窒欲，则水火既济，水火既济则金木交并，金木交并则真土归位，真土归位则金丹自然大如粟米。日服一粒，神归气复，充塞天地。孟子曰“善养吾浩然之气”者，此也。肝气全则仁，肺气全则义，心气全则礼，肾气全则智，脾气全则信。若受气不足，则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岂人也哉！人能凝虚养浩，心广体胖，气母既成，结丹甚易，可

① (宋)白玉蟾：《道法九要序》，《道法会元》卷一，《道藏》第28册。

② (宋)白玉蟾：《金丹直指》，《道藏》第24册。

③ (元)彭致中：《鸣鹤余音》卷三，《道藏》第24册。

④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九《平江鹤会升堂》。

⑤ (宋)白玉蟾：《金丹直指》，《道藏》第24册。

⑥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三《东楼小参文》。

⑦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三《性命日月论》。

不厚其所养，以保我之无欤？<sup>①</sup>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于是默而识之，闲邪存诚，终日如愚，专气致柔，故能以坎中天理之阳，点破离中人欲之阴，是谓之克己复礼，复还纯阳之天。<sup>②</sup> 这些说法显然是对儒家心性论、修养论以及道德伦理学说的借鉴。

又如，白玉蟾论金丹修炼之法曰：

人若晓得《金刚》《圆觉》二经，则金丹之义自明，何必分别老释之异同哉？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何况人人具足，个个圆成，正所谓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闾透长安。<sup>③</sup>

有一修行法，不用问师传，教君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何必移精运气，也莫行功打坐，但去净心田。终日无思虑，便是活神仙。不憨痴，不狡诈，不风颠。随缘饮啄，算来命也付之天。万事不由计较，造物主张得好，凡百任天然。世味只如此，拼做几千年。<sup>④</sup>

吾今则而象之，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知心无心，知形无形，知物无物。超出万幻，确然一灵。……藏心于心而不见，藏神于神而不出，故能三际圆通，万缘澄寂，六根清净，方寸虚明，不滞于空，不滞于无，空诸所空，无诸所无，至于空无所空，无无所无。<sup>⑤</sup>

顺我之物，则可以无心藏之；逆我之物，可以无心顺之。至如真妄本空，逆顺俱寂，则三际圆通，一灵晃耀，此乃把握调心之要也。盖缘一念起则动则万念起，一窍开则九窍开，此无他，乃是以神驭气之意。<sup>⑥</sup>

这些说法则明显吸收了佛教的修行方法和思想智慧。

在常年云游四方的过程中，白玉蟾与佛教高僧和儒家学者亦多有往来。他曾作《赠明讲师》《次韵东波蒲涧寺》《见浙翁琰禅师》《谒鹤湖大义禅师》《谒雩都灵济大师》《潮阳谒灵山大颠禅师》等诗歌描写、追忆其参访寺院，与僧人交往论学的情景，可见其与僧人的交谊颇深。对于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者的朱熹，白玉蟾虽很可能未曾谋面，但心中亦十分敬仰，曾撰文悼念道：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筒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像赖何人。仰之弥高，赞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说。<sup>⑦</sup>

由此可见其对朱熹逝世的悲痛之情，以及对朱熹人格学术的钦佩与崇敬。

白玉蟾才华横溢，勤于著述，出口成章，文不加点，“平生翰墨半天下”<sup>⑧</sup>。除了丹道著作之外，其于为文制艺，无所不能，在文章、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歌咏山水，记叙故实，宣扬道法，抒发情感，文采恣肆，下笔滔滔，奔放不羁，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道宗仙诗大家。现存诗歌一千多首，词一百多阙，文一百多篇，各体兼备，内容丰富。大致来说，一部分为阐释丹道理论的道教诗文，一部分则是典型的文人作品，皆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共同奠定了白玉蟾在道教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白玉蟾在世时，其诗文、丹道著作就已经开始编辑刊行。宋末元初的道教学者俞琰曾说：“白玉

①⑤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三《玄关显密论》。

②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三《无极图说》。

③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三《修仙辨惑论》。

④ (宋)白玉蟾：《修真十书·上清集》卷四十一《水调歌头·自述》，《道藏》第4册。

⑥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七《鹤林问道篇上》。

⑦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七《化塑朱文公遗像疏》。

⑧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二《送朱都监入闽序》。

蟾有《武夷集》《上清集》《玉隆集》《海琼集》《金关玉钥集》，……皆门弟子所编。《群仙珠玉集》载张紫阳《金丹四百字》、石杏林《还源篇》，其文辞格调与玉蟾所作无异，盖玉蟾托张、石之名为之耳。陈泥丸《翠虚篇》亦是玉蟾所作。其首篇数首诗皆元阳子诗，其后《紫庭经》《罗浮吟》《归一论》与《武夷》等集如出一手。”<sup>①</sup>其传世著作有《武夷集》《玉隆集》《上清集》《金华冲碧丹经秘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德宝章注》《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问道集》《海琼传道集》《白真人集》《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等二十余种，均为治内丹学者不可不读的重要典籍。

《白真人集》十卷（原八卷，新增二卷），清同治七年（1868）重刻本。卷一，序；卷二，序、记；卷三，文、说、论、赋、诗；卷四至卷六，诗；卷七，书、疏、题跋、碑、铭、经、传、偈、法语；卷八，诗余、附载；卷九，丹诀、语录；卷十，杂著。在白玉蟾的诸种诗文中，《白真人集》无疑是较为全面，影响最大的一种。

历代学者对白玉蟾的诗文创作，大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宋人姚鹿卿说：“先生噫笑涕唾皆为文章，下笔辄数千言，不假思索。如元气浑沦，太虚中随物赋春，无一点剪刻痕，而曲尽其妙，则所养者可知矣。”<sup>②</sup>明人潘是仁谓：“其诗真若肺腑有烟霞，喉舌有冰雪，非丹台紫府中人，能构只字耶！”<sup>③</sup>清人彭翥称赞其“古文雄伟排宕，縹緲离奇，纯乎大手笔。诗则有唐音，有宋体。其恺攀和厚，味之无极者，唐音也；其清新颖异，出奇无穷者，宋体也。要皆不失为大著作手，读者当自得之”<sup>④</sup>。晚清著名词学家陈廷焯亦云：“葛长庚词一片热肠，不作闲散语，特见其高。其《贺新郎》诸阕，意极缠绵，语极俊爽，可以步武稼轩，远出竹山之右”<sup>⑤</sup>，又说：“葛长庚词风流凄楚，一片热肠，无方外习气。”<sup>⑥</sup>

詹石窗则从道教修行观的角度指出，白玉蟾的诗词作品主要有“题赠杂咏诗”“修道歌谣”“神仙人物及圣贤赞颂诗”和“丹功道意词”四种类型。其诗词中蕴含着深刻的“良背”思想，突显了“止止”的修行要义，并从“止止”动静中捕捉诗歌意象，架构艺术殿堂，将周围的一切事物都看作行“止止”之道，从而形成了“止于物境，以物洗心”“心物俱忘，道由真显”“景随主化，因景寓玄”和“锻炼意象，火候天成”四种相应的诗歌风格。而这些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意象，又是白玉蟾在修道过程中无意于诗的内心的自然流露，可以从其中体认和领悟一个杰出道人在修道过程中内心的空灵。<sup>⑦</sup>

具体来看，白玉蟾之诗有的奔放浪漫，如《笔架山》：

吾是瑶台翰墨仙，操觚弄笔玉皇前。  
翻云为墨海为砚，一片寒空如雪笺。  
兔豪象管用不得，倒蘸昆仑醉钩画。  
当年染罢八角芒，金阙上章求放逸。  
三峰坐断江南天，临汝城头苍苍然。  
状如笔架翠起伏，与吾阁笔麴麴眠。  
山灵惊呼猿鸟乱，清魂复被风吹散。

①（元）俞琰：《席上腐谈》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②（宋）姚鹿卿：《庐山集序》，（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八《附载》。

③（明）潘是仁：《宋元诗集存·白玉蟾诗集序》。

④（清）彭翥：《重刻紫清白真人诗文集跋》，（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十。

⑤（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⑥（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⑦ 参见詹石窗：《诗成造化寂无声——武夷散人白玉蟾诗歌与良背修行观略论》，《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3期。

起来叫问山前人，几度松枯白石烂。<sup>①</sup>

在诗人的想象中，自己是一位在玉皇大帝面前操觚弄槩、翻云覆海、倒蘸昆仑、放逸纵横的仙人。全诗豁达豪迈，意兴潇洒，比喻夸张，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独具风格。

有的诗清新无尘，如《病起》：

我爱山水清，淘洗诗中俗。  
 榻来山水间，白昼卧茅屋。  
 天公知此癖，复还我以病。  
 病中玩山水，诗句觉愈胜。  
 我欲抱病吟，生怕病忽愈。  
 钵口莫汤药，静对山水语。  
 君看病中句，不特苦且清。  
 长如酒后时，雄吟畏酒醒。  
 行带琼台云，随风下山去。  
 回首山上庵，记在猿啼处。<sup>②</sup>

在诗人看来，正是他所喜爱的清丽山水，淘洗了他诗作中的俗气。庆幸因病得闲游览山水，“诗句觉愈胜”，所以他坚持不饮汤药，“生怕病忽愈”。这是一种何等洒脱闲适的境界，凡人的确难以企及。

又如《武夷有感》十首之七至十：

雨脚初收起暮烟，芒鞋竹杖翠云边。  
 东风解发阳春意，放出落花啼鸟天。

月冷风清三径竹，猿啼鹤唳一窗云。  
 开门放入前山翠，试把星儿柏子焚。

千山猿叫月如昼，万籁风号天正秋。  
 雾湿苍苔烟漠漠，白云飞梦过瀛洲。

岩下烟深人不来，白云寂寂掩苍苔。  
 松花落地鸟声寂，一枕清风送梦回。<sup>③</sup>

诸此，皆展现了诗人浑然天成、不事雕琢、想象驰骋、心骛云天的诗风，也完美地描绘了诗人所追求的修心境界及其体悟的自然之道。用白玉蟾自己的诗来说，便是：“诗人心与物俱化，对景无诗诗自成。诗句自然明造化，诗成造化寂无声。”<sup>④</sup>

在白玉蟾现存诗作中，丹道歌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很多看似普通的诗歌题材，在其笔下都熔铸了内丹修炼的旨趣。比如他的《水调歌头·自述》《咏雪》《茶歌》《九曲杂咏》等，看似寻常题材，却处处因景寓玄，蕴含玄机，无不营造出一个修炼金丹的超然世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水调歌头》四首之四：

堪笑塵中客，都总是迷流。冤家缠缚，算来不是尔风流。不解去寻活路，只是担枷负锁，不

①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四《笔架山》。

②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三《病起》。

③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六《武夷有感》。

④ (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六《武夷有感结束》。

肯放教休。三万六千日，受尽百年忧。

得人身，休嗟过，急须修。鸟飞兔走刹那，又是死临头。只这眼前快乐，难免无常两字，何似出尘囚。炼就金丹去，万劫自逍遥。<sup>①</sup>

除了诗词外，白玉蟾的文章亦是文采清丽，语言优美，韵味悠长，超尘脱俗。以《涌翠亭记》为例，该文是白玉蟾于嘉定十一年（1218）游江西庐山、西山后，欲前往浙东富春江，途经江西武宁时，慕柳山之名，偕友人谭元振、黄日新登山游历，在涌翠亭中欣赏山景，弹琴舞剑，酒酣之余，援笔写下的一篇绝妙散文。其文曰：

骚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风月，皆曰：“江南山水窟，江西风月窟。”嘉定戊寅，琼山白玉蟾，携剑过玉隆，访富川，道经武城。双兔凌烟，一龙挑月，憩武城之西，望大江之东，抚剑而长呼，顾天而长啸。

环武城皆山也，苍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树，古涧生风。峭壁数层，断岸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鹤，婉然如罩烟之龙者，柳山也。白苹红蓼，紫竹苍沙，鱼浮碧波，鸥卧素月，琉璃万顷，舳舻千梭，窈然如霞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谷者，修江也。

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亭曰“涌翠”，盖取东坡“山为翠浪涌”之句。观其风物，披其景象，如章贡之郁孤台，如浔阳之琵琶亭者，涌翠亭也。飞翠际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镜，烟柳云丝，高低如幕。绿窗漏檐，朱檐吸雨，华椽跃凤，鳞瓦铺鸳，四榻无尘，一间如画。玉栏截胜，银海凝清，鸥鹭不惊，龟鱼自乐。适其酒量，任其诗怀者，亭中人也。

若夫风开柳眼，露浥桃腮，黄鹂呼春，青鸟送雨，海棠嫩紫，芍药嫣红，宜其春也。碧荷铸钱，绿柳缲丝，龙孙脱壳，鸠妇唤晴，雨酿黄梅，日蒸绿李，宜其夏也。槐阴未断，雁信初来，秋英无言，晓露欲结，蓐收避席，青女亦装，宜其秋也。桂子风高，芦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苍寒，千崖见梅，一雪欲腊，宜其冬也。复何所宜哉！

朝阳东果，万山青红，夕鸟南飞，群木紫翠，桐花落尽，柏子烧残，闲中日长，静里天大，渔舟唱晚，樵笛惊霞。有时而琴，胸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时而棋，剥啄玉声，纵横星点；有时而书，春蛇入草，暮雁归庐；有时而画，溪山改观，草木生春。以此清兴，以此清幽，收入酒生涯，拥归诗世界，盖有得于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

山光浩荡，江势澎湃，松声如涛，月华如水，萤火万点，俯仰浮光，禽簧一声，前后应和，飞青舞碧，凝紫流苍，于是而曰“涌翠”。芦湾不尽，兔窟无穷，挽回亭前，酌以元酒，招入酒里，咏入新诗。名公钜儒，鳞跼叠副，骚板如栉，峻韵如霜。前者唱，后者和，长篇今，短篇古，亦莫罄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树，夜月浸水，表里冰壶，渔歌断处，碧芷浮天，帆影落时，绿芜涨岸，菰蒲萧瑟，舟楫往来，其乐自无穷也。

作亭者谁？李亚夫也。一日，桐城谭元振，上清黄日新，与余抱琴而憩其上。风吹鹤袂，人讶水仙，磅礴数篇，淋漓百盏，月影在地，马仆侯门，援笔不思，聊述山水风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后可以觞咏乎斯亭。主人曰：“然！”予亦酩酊，明日追思，世事如电沫，人生如云萍，蓬莱在何处，黄鹤杳不来。抱琴攫剑，复起舞于亭之上。<sup>②</sup>

本篇从空间、时间、人物活动等多个角度全景式地描绘了涌翠亭的迷人景色，层层递进，引人入胜，含蓄地表达了作者人生苦短、乐以忘忧、遗世高蹈的感慨和追求。该文将写景、叙事、抒情诸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使诗人的内心情感、精神活动自然地融入到客观景物之中，从而达到了主客统一、神与

①（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八《水调歌头》。

②（宋）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二《涌翠亭记》。

物游的艺术境界。在篇章结构上,《涌翠亭记》很好地汲取了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艺术技巧,既无呆板抄袭之痕,又无拗口生涩之感,显得自然流畅。且其文句多用四言骈句,清丽华美,精雕细琢,控驭自如,浑然天成,实乃不可多得之佳品。

由于白玉蟾诗文集的流传比较繁杂,而清同治重刻本的《白真人集》也历经多次辗转翻刻且疏于校勘,故其中的疏漏错讹在所难免。近年来,学术界已开始对白玉蟾的诗文著作进行比较全面的整理校勘和编辑出版。如海南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朱逸辉主编,朱逸辉、王君伟、陈多余、朱逸勇校注的《白玉蟾全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的《白玉蟾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董沛文主编,周全彬、盛克琦编校的《白玉蟾全集》;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盖建民辑校的《白玉蟾文集新编》《白玉蟾诗集新编》,皆可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责任编辑:林春香)



# 林弼名字考证

张婧雅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 作为明初以诗歌、古文列为闽南文苑之冠而且两使安南、坐镇登州, 深受朱元璋信任的漳州籍文人林弼, 因其文集几经湮没, 事迹多有不传, 其姓名、生平等材料也都记载不详。《闽书》《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史料虽然都曾对其身世、经历进行过考证, 但终究莫衷一是, 不成定论。关于林弼姓名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林弼初名唐臣, 入明后因国禁改名为弼; 二是认为林弼原名为弼, 别名唐臣, 入明后仍改回弼。经过细读文本, 详加考证, 林弼原名应当为弼, 唐臣只是别名, 入明后改回弼, 所以现以林弼相称。

**关键词:** 林弼; 本名; 别名; 改名

林弼, 字元凯, 漳州龙溪(今龙海市)文山人。他于元至正年间领江浙乡荐, 登进士第, “有文词, 著声闽浙间”<sup>①</sup>, 后擢漳州路知事。入明, 两使安南, 不受赈金, 为朱元璋所赏识。为官期间, 虽有小人作奸, 被诬下狱, 但朱元璋亲书“休问”二字, 不仅得免牢狱之灾, 还改判饶州, 这在以酷法治国的洪武一朝可堪奇事, 可见朱元璋对其信任之深。其后, 他官至礼部主事、吏部考功郎中、登州知府, 终卒于任上。根据《四库全书》本《林登州集提要》记载: “弼平生著作有《梅雪斋稿》、《使安南集》, 是集总名《登州》, 盖汇为一编, 总题以所终之官也。凡诗七卷, 文十六卷”<sup>②</sup>, 可谓著述丰厚。而且《四库全书》本《林登州集提要》对其诗文评价颇高, 认为“明初, 闽南以明经学古擅名文苑者, 弼实为之冠也。”<sup>③</sup>光绪版《漳州府志》也以为: “(漳郡风雅)至元凯而盛矣。”<sup>④</sup>林弼还雅好书画, 广交名士, 不仅与乡党张以宁、林泉生交好, 还与宋濂、王祎、刘基、危素等人熟识, 以闽南人的身份进入明初台阁之中。由此可见, 他在明初对闽南学界和文坛的影响。然而, 因林弼文稿几经湮没, 直到崇祯年间才被王志道、张绍科重新整理刊刻(现已流失), 所以有明一代学界对其关注不多, 相关记载也纷乱驳杂, 为后世留下很多疑点。如, 林弼何年中第、林弼是否参修《元史》等都有待考证。此后, 经历明清易代, 更多史籍毁于兵火, 林弼文集幸运地被其裔孙林兴发现, 并于康熙四十五年再次刊刻(现存刻本), 后入编《四库全书》(现存四库本), 我们才有幸得见其作品。正因为如此, 笔者在阅读与林弼相关的文献时发现, 不仅林弼的生平材料难以发掘, 就是其姓名都存在争议, 本着为其扬名的目的, 将对其姓名进行考证。

关于林弼的姓名现存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林弼原名为唐臣, 入明后才改名为弼; 二是认为林弼原

---

**作者简介:** 张婧雅, 女,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专业闽南文献与海疆文化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 师从陈庆元教授。

① 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漳州府·名臣》卷六十八。

②③ 纪昀等:《林登州集提要》, 见林弼:《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林登州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④ 沈定均:光绪版《漳州府志·人物三》卷三十, 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 第630页。

名弼，又名唐臣。这两个观点都承认林弼有两个名字，一为弼，一为唐臣，其抵牾之处在于弼到底是他本名还是入明之后为避讳而改的名。本来这并非一个重要的事情，但因《闽书》《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综》《四库全书》《明诗纪事》等史料都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而且长期没有定论，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梳理一下林弼的名字问题。

首先，现存可见第一个提出林弼曾改名的人是宋濂，宋濂在写给林弼的《使安南序》中言：“元凯，名唐臣，临漳人。今以时制所禁，更为弼。”<sup>①</sup> 宋濂与林弼同时，而且是在给林弼文集作序时提出林弼因时制所禁而改名，可确定林弼确实于洪武年间由唐臣改名为弼。因宋濂有此一说，所以后世大部分材料都支持第一种观点，也就是林弼入明后才更名为弼。如明隆庆己巳（1569年）年间，俞宪在编《盛明百家诗》作《跋林登州集》时言：“林登州初名唐臣，后更名弼，自号梅雪道人，生于闽之龙溪”。<sup>②</sup> 再如闽籍史学家何乔远在《闽书·英烈志》中为林弼作传时也写道：“元广发长子也，故名唐臣。……洪武二年，郡以名儒闻于朝，太祖遣使三征之，更名弼，与宋濂、王祜、曾鲁等修《元史》，书成，赐黄金束帛。”<sup>③</sup> 可见，何乔远不仅认同林弼曾改名的观点，并补充了林弼改名的时间是洪武二年。持此观点的还包括黄稷虞，他在编《千顷堂书目》时言：“林弼，字元凯，初名唐臣，龙溪人。”<sup>④</sup>

入清之后，钱谦益、朱彝尊等人也都支持第一种观点。如钱谦益修《列朝诗集小传》时言：“林弼，字元凯，龙溪人。初名唐臣，以国禁改名。”<sup>⑤</sup> 朱彝尊作《明诗综》言：“弼字元凯，初名唐臣”。<sup>⑥</sup> 再如傅维麟在《明书·林弼传》言：“洪武二年郡以名儒闻，征入，更名弼，与宋濂、王祜、曾鲁等同修《元史》，书成，赐金帛”。<sup>⑦</sup> 《御选明诗·姓名爵里一》也言：“林弼字元凯，初名唐臣，龙溪人。元末乡荐，累官漳州路知事。明初以儒士登春官，修礼乐书，处礼部主事，历登州知府。”<sup>⑧</sup> 此种观点一致持续到晚清甚至现代，如光绪版《漳州府志》言：“林弼初名唐臣，字元凯。”<sup>⑨</sup> 郭柏苍在编选的《全闽明诗录》中不仅引录俞宪的叙述，还明确表示：“林弼，字元凯，初名唐臣，龙溪人。”<sup>⑩</sup> 直至1997年，吴文治所编的《明诗话全编》中，依旧言：“林弼，初名唐臣，字元凯，福建龙溪人。”<sup>⑪</sup> 由此可知，现存大部分史料都认为林弼原名唐臣，入明后才更名为弼。但是，正因为持此观点的人很多，而且不乏名家、大家，所以其正确与否，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得出最终结论前，我们不妨看看支持第二种观点，也就是认为弼乃其本名的材料。洪武十七年王廉为其所作《中顺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志铭》（下简称《墓志铭》）中，王廉专门叙述了林弼名字的来源：“公妣陈梦北斗旁星堕怀中娠而生公，因名弼，又名唐臣，字元凯。时禁国号名字，

① 宋濂：《使安南集序》，见林弼：《林登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俞宪：《跋林登州集》，转引自俞宪：《盛明百家诗》，隆庆刻本。

③ 何乔远：《闽书·英烈志》卷一百一十八，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49页。

④ 黄稷虞：《千顷堂书目》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⑤ 钱谦益：《林登州弼》，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转见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9》，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55页。

⑥ 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3页。

⑦ 傅维麟：《明书·文学》卷一四五，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第2877页。

⑧ 张豫章：《御选明诗·姓名爵里一》，见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八。

⑨ 沈定均：光绪版《漳州府志·人物三》卷三十，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30页。

⑩ 郭柏苍：《全闽明诗传》卷一，见郑杰等辑：《全闽诗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页。

⑪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4页。

仍旧名。”<sup>①</sup> 根据《墓志铭》我们可知，因其母陈氏夫人梦到北斗旁星堕入怀中而娠，所以给林弼起名为弼，而唐臣则是其在元代使用的别名。入明后，因禁用国号为名，所以林弼重用旧名，也就是弼。现存第二个认为弼为其本名的材料是崇祯年间林弼的同乡张燮在作《林登州传》的时候提出：“林公唐臣，初名弼，字元凯。”<sup>②</sup> 第三则材料是《四库全书》本《林登州集提要》，其编者写到：“弼，又名唐臣，以时禁国号名氏，遂仍旧名是。弼本初名，唐臣乃其改名。朱彝尊《明诗综》则云：‘弼初名唐臣。当由宋濂序谓唐臣更名弼致误，然宋序未尝言初名也。至弼改名既旧，而原本之首尚署为林唐臣撰则无所取。今仍署弼名著之录焉。’”<sup>③</sup>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这则记述，我们可有四个分析：一、弼乃其初名，唐臣是其改名。二、入明后，林弼确实因国禁又从其别名唐臣改回初名弼。三、后世之所以说唐臣为其初名，弼为其改名根源在于宋濂的序。四、指出后人根据宋濂序中言其由唐臣更名为弼就认定唐臣为其本名的逻辑错误，因为宋濂虽说林弼入明后从唐臣改名为弼，但并未否定弼乃其初名，是后人望文生义，疏于考证才误以为唐臣是其初名，弼为其改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清末文人陈田在编《明诗纪事》时也明确了林弼的名号。陈田言：“弼改名唐臣，以禁国号名氏，复名弼，字元凯，龙溪人。”<sup>④</sup>

据以上材料可知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为数颇多而且绵延不绝，但细读之后，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可信，原因如下：一、墓志铭多为家人准备材料请与墓主相关的人撰写，如林弼的《墓志铭》就是其亲弟弟请曾与他一起出使安南相交甚深的王廉来写。王廉在《墓志铭》中说他和林弼的交往“以程计俭万里远，以時計凡十阅月”<sup>⑤</sup>，“其仲国子监助教原功氏以余与公为知己，乃自中都价公之状来乞铭”<sup>⑥</sup>，证明王廉所写内容是经过林弼家人认可的，更增加了材料的可信度。二、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分析，宋濂虽说林弼入明后由唐臣改为弼，但并没有否定弼乃其本名。而且通过阅读林弼文集，笔者发现宋濂不仅与林弼同时而且两人交往颇深，他们有共同的好友如王祎、王廉，而且二人还有诗文往来，如宋濂为其文集作序，林弼写诗赠予宋濂儿子，所以宋濂的说法也是可信无疑的。三、林弼作品在明代就已散落，如《梅雪斋稿》《使安南集》《诗经讲义》《宋儒会解》现都不存，所以很多学者都没有关注他，如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中就说：“今无其名，不知何官。”<sup>⑦</sup> 最早关注并企图整理重刊其文集的就是他的同乡漳州人张燮，后虽因张燮突然病故而作罢，但张燮已根据搜集到的材料作有《林登州传》，所以相对同时的其他学者，张燮的材料更为可信。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收录林弼作品时已经加以考证并详细分析错误缘由，明确弼乃为其原名。

至此，我们可以说“林弼初名为弼，别名唐臣，入明后又改名弼”这一观点清楚无疑，无奈诸位史学巨擘如何乔远、钱谦益、朱彝尊皆疏于考证，实属不查。而后世大多编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明确分析的情况下依旧不予以考定，以至延用错误观点至今时至今日更是不该，因此笔者作文一篇，以希为林弼正名，并希望借此小文引起学界对林弼其人、其事、其文的关注。

(责任编辑：林日杖)

<sup>①⑤⑥</sup> 王廉：《中顺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志铭》，见林弼：《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林登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sup>②</sup> 张燮：《林登州传》，见林弼：《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林登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sup>③</sup> 纪昀等：《林登州集提要》，见林弼：《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林登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sup>④</sup> 陈田：《明诗纪事》甲编卷十四，见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1》，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704页。

<sup>⑦</sup>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叶向高年表

赵莹莹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晚年自号福庐老人,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两度入阁为首辅,谥“文忠”。叶向高著述丰富,有《苍霞全集》,又自撰年谱《蘧编》。叶向高一生尊崇儒家思想,坚持平和中庸的为政处世态度,在晚明激烈的党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文学方面坚持实用思想,重振了晚明台阁体。本表对叶向高生平进行的梳理,并对其重要的诗文作品进行系年。

**关键词:**晚明文学;福建文学;叶向高;年表

## 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一岁

七月三十日亥时生。

福清县孝义乡化南里后叶村(今福建省福清县港头镇后叶村)人。父叶朝荣(1515-1586),官至广西养利州知州。母林氏(?-1590),叶朝荣继室。《蘧编》: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七月三十日亥时,余生。太夫人林氏,化北里上并林公寿女。余前有二母:郭夫人,化北里泽朗郭公彦龙女;康夫人,平北里垓密康公俊次女。郭夫人无出,康夫人有一女,迺江林守定,以贞烈旌表。<sup>①</sup>

叶向高出生时福建正遭逢倭乱,以福州、福清等地尤为严重。母亲林氏避倭乱于母家,因族人认为不吉,林氏于返家途中路旁一败厕中生子,故叶向高小名“厕儿”。《蘧编》:

余生时倭乱闽已数载,太夫人将娩,迺避倭寇,居外家。外家族人以俗忌不乐,太夫人喻其意去之。野有败厕颓垣,依焉。遂生余,故乳名曰厕,时旁近无一人。越日,先少师公乃知。自担鸡酒往问。<sup>②</sup>

按:叶向高出生时父叶朝荣已年过四十,祖父叶广彬年将七十;又前郭夫人无后,康夫人只诞育一女。叶向高作为长子,自然备受家人重视。虽值倭乱严重,母亲林夫人舍命保全幼子:

余孩时好哭,每遇贼太夫人祝不哭,辄不哭。一日,贼来迫,相去只数步,度不能免。而贼忽顾见他妇人,遂舍去。又一日,遇贼。避匿丛薄中,贼以枪乱刺丛薄,卒不伤。其危险如此。<sup>③</sup>

《明史·叶向高传》:

向高甫妊,母避倭难,生道旁败厕中。数濒死,辄有神相之。<sup>④</sup>

**作者简介:**赵莹莹,女,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① (明)叶向高、叶益荪:《蘧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99页。以下所引相同之书,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注详细情况,再次出现则不再详注出版社、版本情况。

②③ (明)叶向高、叶益荪:《蘧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499-500、500-501页。

④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31页。

这些富有神异色彩的记载，一方面展现了当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略恶行对百姓造成的侵扰和伤害；另一方面也为人物本身赋予了独特而神秘的色彩。

###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二岁

举家至镇东卫。

由于倭乱严重，举家投靠镇东卫城姑祖徐百户家。后又别居。

按：至镇东卫，依吾祖姑嫁徐百户者以居。百户已没，祖姑亦无子。有庶子徐相，袭其职。妻某氏，贤妇人也。与太夫人相欢如妯娌，有子文昭，差长于余。其后又去徐别居。<sup>①</sup>

###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三岁

居镇东卫城。

###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四岁

居镇东卫城。

是年，戚继光率部抗击龙田倭匪，倭患初平。

###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五岁

自镇东卫归家。

元月，异母弟叶向亮生，庶母林氏所出。

四月，戚继光荡平福清倭寇。举家搬回化南里。

###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六岁

居家。

叶向高启蒙读书。

按：叶向高年幼即才思敏捷，过目成诵，尤其擅长属对，乡人目为“神童”。时祖父叶广彬出联“日长似岁闲方觉”，叶向高对联“夜永如年卧不知”。

是年，胞妹生，林夫人所出。后嫁于龙田何氏。

###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七岁

居家。

###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八岁

居家。

<sup>①</sup>（明）叶向高、叶益荪：《莲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502页。

是年，叶向高入私塾，受业于同里儒生王肖冈先生。

### 明隆庆元年丁卯（1567）九岁

居家。

是年，明穆宗朱载堉即皇帝位，诏选郡国廩生入太学。  
从父亲叶朝荣少师公读书于核窑。试为时义，亦能成章。  
异母弟叶向永生，庶母林氏所出。

### 隆庆二年戊辰（1568）十岁

北上入京。

是年，父叶朝荣应选郡国廩生，北上入太学，随父入京。

### 隆庆三年己巳（1569）十一岁

寓京。

是年，父叶朝荣馆于给谏魏瀛江公家。

异母姊叶默以翁姑逼嫁，自刎死。后蒙旌表“贞烈”。

按：林氏姊，名默。为叶向高先母康夫人所出。先，嫁于上迳林守定家，夫受继母折磨致死；后又欲卖媳叶氏于商人，女不从，自刎。时女年方二十三岁。隆庆四年庚午（1570）十二岁

南归至家。

是年，父叶朝荣试畿闈不利，携叶向高南归。

### 隆庆五年辛未（1571）十三岁

居福州。

是年，父叶朝荣馆于省城工部林琼田公家，从父读书。

### 隆庆六年壬申（1572）十四岁

居家。

是年，叶朝荣馆于平北里城山庵，从父读书。

叶向高首次参加县试，为福清县令许梦熊所重。府试亦名列前茅，督学宋仪望欲拔为第一，县令许梦熊以为年少，抑居第三。

异母弟叶向亨生，庶母林氏所出。

### 明万历元年癸酉（1573）十五岁

居福州。

先，父叶朝荣馆于福州醋巷，从父读书。督学宋仪望为叶向高延誉于士大夫，与大司徒马钟阳之

子马焱歙同读，受业于卓华东先生。

按：叶向高因年少贪玩、荒废学业，为马钟阳所不喜。

是年，新任督学宋豫卿策试诸生，叶向高位列三等，未能参加乡试。

### 万历二年甲戌（1574）十六岁

居家。

是年，父叶朝荣在本里塘北陈家设馆，从父读书。

冬，聘本县永东里里美村俞廷御女为妻。

按：先，许梦熊为叶向高聘其师王公女，为女方所拒。后，许梦熊又择俞廷御之女俞氏，并为其在县衙主婚，成为当地美谈。

### 万历三年乙亥（1575）十七岁

居福州。

是年，叶向高入府学。督学胡二溪策试诸生员，叶向高居二等。

冬，长女叶命出生。

### 万历四年丙子（1576）十八岁

居福州。

督学胡二溪先生试，居一等。

是年，父叶朝荣以恩贡例选，授江西九江通判。

### 万历五年丁丑（1577）十九岁

自家往九江。

是年，叶向高送母亲及家眷至九江，遂留官舍。叶朝荣署理瑞昌。试士，首拔李汝祥，遂与叶向高同读官署。

### 万历六年戊寅（1578）二十岁

寓居九江。

冬十月，长子叶成学生，妻俞氏所出。

### 万历七年己卯（1579）二十一岁

自九江回闽，后北上入京。

回乡参加福建乡试，中举人，位列第二十五名。

冬，父叶朝荣进京述职，叶向高随父北上，李汝祥亦同行，参加次年会试。

## 万历八年庚辰（1580）二十二岁

自京师归九江。

会试落第，随父归九江。作诗《送沈裕州》，赠沈有容。

按：在京期间，叶向高与抗倭名将沈有容成莫逆之交，结为兄弟。后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会试，又与沈有容之兄沈有严同上春宫。《肖林沈公七十一寿序》：

余自为孝廉，即从将军游。徘徊燕市，留连不能割。再与守君同上春宫，计今二十余年。<sup>①</sup>

## 万历九年辛巳（1581）二十三岁

寓居九江。

按：时官署内生灵芝一株，认为是祥瑞的象征，父叶朝荣作《瑞芝堂》。

## 万历十年壬午（1582）二十四岁

北上入京。

秋，北上。

冬，次女生。因生于潘阳湖，故取名“叶湖”。

是年，父叶朝荣转任广西养利州知州。因路途遥远且任所荒僻，母林太夫人携家眷俱归家福清，父叶朝荣独自赴任。

## 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二十五岁

居京。

会试，举南宫第七十八名。廷试，中二甲第十二名；选庶吉士第六名。

八月，开馆。馆师为莆田陈经邦及无锡周敬庵。阁试初序第六，再试第一。

按：“故事，阁试卷皆糊名，以官坊先阅，然后呈阁老其阅。再试者为蛟门沈公，复庵吴公业已定余第一矣，而沈公侦其为余，遽欲易以他卷。盖阙中庶常二人，其一为吴龙征，沈公所取士也。往试第一者必留馆，沈公恐余留而吴须出，故必欲抑之以为吴地。复庵公力争之。时复庵方以杖谪起家，望甚重。沈公不能夺也，自是不喜余矣。”<sup>②</sup>

## 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二十六岁

居京。

为庶吉士，读书翰林院。

是年，异母弟叶向永病卒于父亲任所广西养利州，时十八岁。

按：叶向高作有《孝子传》，悼念亡弟向永。

①（明）叶向高：《苍霞草全集》，《苍霞草》卷六，第617页。

②（明）叶向高、叶益荪：《莲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514页。



###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二十七岁

居京。

秋八月，解馆。考核为二等，授翰林院编修。

### 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二十八岁

自京归闽。

夏五月，父叶朝荣致仕。临行病重，卒于养利州官舍。叶向高自京师奔粤西迎父棺柩，于赣闽交界处铅山县迎父棺。

是年，次子叶成敏生，夫人俞氏所出。

### 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二十九岁

居家。守父丧。

是年，为长子叶成学聘福州龚炊之女龚氏。

冬，葬父叶朝荣于罗湾山祖坟之左。

###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三十岁

居家。守父丧。

###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三十一岁

居家。守父丧。

### 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三十二岁

北上入京。

是年，次子叶成敏以痘殇，仅五岁。第三子叶成昌生，妾汤氏所出。除服，北上补官。本拟携母同行，至邑中以体弱不堪劳顿归。北上至浙江武林，第三女叶江生，夫人俞氏所出。

冬，母林太夫人逝世。

按：叶向高至京不到两月，母林太夫人去世。时至年关，不得行，滞留京师。

### 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三十三岁

自京归闽。

正月，自京回家奔母丧。

###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三十四岁

居家。守母丧。

是年，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叶向高作诗《闻警》四首，表达对战争的担忧。

###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三十五岁

居家。守母丧。

守母丧期满，除服。

为长子叶成学娶妇龚氏。嫁长女叶命于福州林家。因两姻亲皆居省城，故移居福州。作诗《江州李旋吉与余为笔研交，同上公车，别且十年。访余闽中，别去怅然，赠之以诗》《次许中丞澄澜阁揽胜韵》等。

是年，同里友人郭造卿卒，年六十二岁。叶向高为其刊刻《海岳山房存稿》，并撰有序文《海岳山房存稿序》《卢龙塞略小叙》，铭文《海岳郭先生墓志铭》，诗《叹逝篇·郭建初先生》等。与友人薛君和、林谨任、陈泰始、洪汝含集薛老庄，作《薛老庄》诗。石刻位于福州乌石山天秀岩下。

按：《薛老庄》一诗《苍霞草全集》未收录，《乌石山志》《福建摩崖石刻精品》《福州十邑摩崖石刻》均有收入。

###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三十六岁

北上入京。

夏，季子叶成昌亦以痘殇，仅五岁。

叶向高赴京补官，任国子监司业。途中作诗《赠冯明府》。

按：以资序论，本当典浙试。因同年国子监司业周应宾欲典畿试，故改周为中允，往南畿；而叶向高遂代为国子监司业。叶对国子监近三千大学生进行遴选，首拔蔡宗禹，其次为孙慎行、吴中伟、李士安、陈勋。除李士安仅乡试中举外，其余四人均会试甲等，登科及第。

###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三十七岁

居京。

任国子监司业。

夏，长孙叶益蓂生，父叶成学、母龚氏。

秋，改任右春坊右中允。因国子监缺司成，仍署理国子监事务。又作《天灵山人文集序》一文。

按：谢杰《天灵山人集》拟刊刻，向叶向高求序，叶向高作《天灵山人文集序》。文末有“时万历乙未秋月之吉福清叶向高撰。”<sup>①</sup>

### 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三十八岁

居京。

任右春坊右中允。后同年方从哲任国子监司业，释国子监职务。

冬，次孙叶益苞生，父叶成学、母龚氏。

<sup>①</sup> 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28页。

##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三十九岁

居京。

初，典南畿乡试，为副主考官。因舞弊嫌疑，被罚俸一个月。

按：此为叶向高首次出任科举考试官。原拟叶向高与同年邹德溥出任南畿乡试主考官。邹因案件牵连被换掉，由同年朱国祚出任主考官。在南畿乡试中，二人使用了邹试策的一部分；而邹后又出任河南乡试的主考官。这样，就造成了河南与南京乡试题目的部分雷同。

秋，升任右谕德兼侍讲，掌司经局。

##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四十岁

居京。

秋，升任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掌坊事。随后，充任皇长子朱常洛侍班官。

按：时皇长子缺讲官，同年好友郭正域向次辅张位推荐叶向高，但被沈一贯以“闽人不可作讲官”为由拒绝。后，皇长子缺侍班官，首辅赵志皋越过沈一贯直接奏请以叶向高补，得允。沈一贯常在讲筵上为难叶向高，但叶向高为朱常洛所喜，称其为“飞须先生”。

秋，朝廷举行武科会试。以资历叶向高当为主考官，但未得万历帝点用。

按：本拟叶向高作主考官，以中允袁宗道作陪，范醇敬任副主考官。但万历帝却点用了袁宗道和范醇敬，因前一年京畿主考亦点陪，遂朝堂议论哄然。翰林修撰焦竑因上疏言此被贬。叶向高不仅宽慰袁宗道，并将自己草拟的策试赠与袁宗道备用。叶向高因此颇受共事官员敬重。

是年，作诗《送庄静父之朝鲜》。又上《请止矿税疏》《再请止矿税疏》等奏疏，请求罢免矿监税使。

## 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四十一岁

往南京任职。

初，廷推阁臣。叶向高初次被推荐。与闽籍官员陈经邦、黄凤翔、李廷机四人均备选其中，为一时之盛。

四月，同籍友人谢肇淛以忤湖州知府，调任东昌司理。是月或下月入东昌<sup>①</sup>，叶向高作诗《送谢在杭自湖州移理东郡》送之。升南京礼部右侍郎。

夏，第三孙叶益菽生，父叶成学、母龚氏。

秋，叶向高赴留都南京，季女叶江随行。夫人俞氏送次女叶湖归家，嫁女于方家。

按：叶向高在南京与前辈兼好友李廷机联曹，时同年好友郭正域亦在南京任国子监祭酒，经常相聚浏览名胜。《蓬编》：

余至留都与九我公联曹，时相过从。而明龙为南祭酒，聚首欢然，留都故称佳丽地，公暇招寻揽胜，常无虚日。真仕宦之仙境也。大宗伯为琼州忠铭王公，已被劾，不视事。亡何，去。<sup>②</sup>

叶向高在南京任职期间所作诗，具体时间难以分辨，列于此：《同李元冲、刘少白游一拂词兼登清凉台》《署中有独鹤，送奉常沈、郑二先生为偶而蓄之。赘以短歌》《和太宰曾见台先生赠别用前

<sup>①</sup> 陈庆元：《谢肇淛年表》，《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5页。

<sup>②</sup> （明）叶向高、叶益菽：《蓬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524页。

韵》《太宰曾见台先生再考四篇》《同孙显卿、李伯东、藩季选邀徐学使同年登平远台，得“扉”字》《登摄山绝顶》《游燕子矶》《游龙井泛湖夜归，时同何观察、蒋计部》《瓦官寺逢于景素有赠，时曾太宰在坐》《陪曾见台先生集清凉寺》《莫愁湖》《同耿中丞游棲霞途次即事》《同刘、朱二司成游牛首》《同刘、朱二司成游棲霞楼，至郊外值雨不果》《朱文宁司成招同刘幼安游棲霞阻雨，奉次于文若见潮来韵》《奉和赵心堂先生招游清凉台用韵》《再次讚一拂先生二首，先生吾邑人，尝读书清凉寺》《和赵司寇题方正学先生祠四首》《谢司寇、郑国博招饮鸡鸣寺》《中元谒陵后，邀曾太宰、范司空、耿中丞集灵谷寺，用太宰韵》等。

是年，作《送大宗伯王忠铭先生归海上》四首。曹学佺任南京大理寺左寺正。叶向高约于此时与曹学佺相交。又，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引荐下，结识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叶向高对其学识和见闻叹服不已，与其交往甚深。叶向高进入内阁后，还曾在北京寓所两次接见利玛窦。

###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四十二岁

居南京。

是年，上《南直隶采矿疏》，请求罢免矿监税使；又上《公劾辽东税监疏》，弹劾辽东税使高淮。

按：叶向高于疏中历数高淮罪恶，请求万历帝下令将其下狱治罪。惜其为开矿获得的极大财富迷惑，始终未肯听进群臣进言，致使派遣到地方作矿监税使的太监日益骄横跋扈、摧残百姓；直至万历帝驾崩之际，才遣诏下令罢免一切矿税，撤回全国各地的税使。

###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四十三岁

北上入贺，后返家。

北上入贺，作诗《入贺至南徐逢张西江同年有赠》《入贺至近郊有赋》。后归至维扬，闻万历帝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叶向高以三品得封荫。叶向高代为南少宰，任南京吏部侍郎。又过江西铅山，听闻福建有倭寇，作诗《过铅山吴明府招游观音山有作，时席上闻有闽警》。

回乡，暂居福州，借方伯陈荆山宅。年底，至福清。

是年或次年，为曹学佺集子作序，作《曹大理集叙<sup>①</sup>》一文。

按：据《曹大理集·石仓文稿》本“南京吏部右侍郎同郡叶向高撰”，此序作于叶向高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故应为是年或次年。

### 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四十四岁

居家。

春，由福清归里祭扫。随后，北上回南京供职。行至剑浦返归，经游雪峰寺，作《赠雪峰寺月庵上人》《将上南轮谢病憩雪峰寺》《游雪峰寺宿陈生宅》等诗。抵家。

是年，季女叶江病夭，年十三。心情不愉，在家休养。作诗《病居斋园偶成》《斋居上太宰曾先生》。

按：三女叶江为叶向高所喜，许于叶向高同年吏科都给事林材次子。万历三十四年（1606）二月，归女丧于林家。

<sup>①</sup> 目录“叙”作“序”，见（明）叶向高：《苍霞草全集》，《苍霞草》卷八，第792页。

稍后，迁居县城福清。

按：初，购得龚氏宅，甚狭隘不便；后叶向高于福清县城西关外购地数亩，辟园筑室，为游息之所。

封诰下，长子叶成学得荫尚宝司丞。

十一月，应泾江友人林可继、可度、大默之邀，偕表弟郭汝偕往游九鲤湖，作诗《游九鲤湖四首》《游麦斜岩四首》《夜游囊山寺》，文《游九鲤湖记》。

冬，焚黄。作诗《焚黄感赋呈邬令君四首》。

是年，应吴汝恒、汝缙、汝扬之邀，同友人薛履章、陈可钦、陈世闻诸人游连江玉泉寺，作五言律诗一首。石刻位于玉泉山。

按：游玉泉寺一诗《苍霞草全集》未收录。

##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四十五岁

入南京。

元月，应南太宰吉水曾见台邀请，返南京任职。友人曹学佺前来相送，与曹学佺、陈宏己游瑞岩，作《游瑞岩》诗。经福州茶洋驿，作诗《宿茶洋驿》。

抵南京，署理户、礼二部。

七月，“楚藩伪王案”发。案始发，叶向高即劝止好友郭正域，不听，遂祸及身。因攻沈一贯短，被遣，听勘去。

按：“楚藩伪王案”起于藩国楚王的继承者问题，引发楚王宗人、家族之间矛盾。本属于皇族内部的家庭纷争中，逐渐演化为朝臣派系之间的争斗，尤其是首辅沈一贯与次辅沈鲤之间的权力博弈。郭正域和次辅沈鲤相亲厚，遂与首辅沈一贯等人意见向左。叶向高虽然极力劝止好友，可惜友人并不听劝，最终在与沈一贯的斗争中失败，被遣去。《蘧编》：

余初闻此议，即贻书劝止明龙。有“七国未削，错身先危”等语，而明龙不听，卒及于祸。<sup>①</sup>

十一月，“妖书案”发。株连蔓引，长安大乱。

按：“妖书案”为首辅沈一贯所利用，成为打击次辅沈鲤及其同党的机会。《蘧编》：

会有人告书为贖生光所撰，当廷鞠。四明意欲其引归德与明龙，大司寇萧大亨屡诱之，光终无言，顿首伏罪而已。宗伯李公与御史沈裕汤、兆京牛应元力言当坐生光，大珥陈矩亦以为然，议乃决。当是时，使生光有一言则归德、明龙与予、三二君九族皆齏粉矣。然非陈珥调停于内，李公与三御史主持于外，生光不死，祸尚未可知也。<sup>②</sup>

在党派林立、斗争激烈的万历后期，“妖书案”震荡朝野、影响甚大，更是成为党派之间相互攻讦、制造冤狱的利刃。而在郭正域被诬陷、逮捕之际，叶向高未能代为上疏伸冤，故而被好友误会，两人由此产生嫌隙。叶向高在《蘧编》中表明心迹道：

余自二公被谗，为废寝食者月余。屡欲上书白冤状，而相知者谓：“如此，恐速其祸。”故不敢发。<sup>③</sup>

说明自己本有上疏救援之意，但为人劝止。认为于“妖书案”炽烈之时上书，无疑火上浇油，不仅不能救助友人，且有可能加速灾祸，故而未上书。由前面材料可知，叶向高与首辅沈一贯关系并

①②③（明）叶向高、叶益荪：《蘧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528-529、529-531、532页。

非融洽，叶向高为沈一贯所不喜，中间又有不少纠葛，叶向高若上书，确有可能加速沈一贯对好友的惩治。

是年，作诗《赠沈将军》《赠东沙获倭归宛陵》<sup>①</sup>《闻海上获倭寄赠》<sup>②</sup>

##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四十六岁

归家，后北上述职。

六年任期满，本应进京述职考绩。但因“妖书案”事态仍在扩展，归家闲居。

按：时好友郭正域被牵连其中，叶向高为救好友，上书沈一贯劝其平息风波，却激怒沈一贯，被斥“本无风波，谁作风波？本无荆棘，谁生荆棘？”<sup>③</sup>

初，本拟用叶向高为教习庶常。李廷机与周应宾写信告知，但因得罪首辅沈一贯，无果。

秋，北上完报满事。行至界河驿，以痲疾卧邮亭，作《报满北上卧病界河驿枕上口占八首》。又，忽报有南京大宗伯之命，复中寝。抵京后，从尚宝蔡杲处得知，任命南京礼部尚书的疏本已发，又被沈一贯追回。

九月，于慎行六十寿，叶向高作《奉寿大宗伯于谷峰先生六十》诗贺之。又，作《闰九日北上述怀》诗。

冬十月，疾稍愈，复北上。作诗《甲辰春同朱文宁太史游西湖宿包氏山楼，其年初冬余复北上，过武陵得太史书邮寄》《广信宿民家败屋时公署皆扁铨待部使及从官》二首《过任丘投宿无所夜行至鄞州有作》《任丘道中遇雪寄周令》《渡江即事》等。

十二月，南归。作《出都答谢司寇赠言并别》。过滁阳，应友人林仲山（福建闽县人）之邀游醉翁丰乐亭，作《余三过滁阳拟游不果，兹以考绩道此，遇太卿林仲山先生招饮，再日尽览丰乐醉翁琅琊诸胜，喜而赋此》《过滁州赠太仆林仲山先生，时自北移南》《过滁州赠卢守》等诗。行至邹，时岁除，为邑令梁州彦所留，除日游译山。作《登泰山》《除夕寓邹县谢梁令君》《除日同宋鸣汝登译山，东梁方楫令君》等诗。

是年，作《改建岳屿水寨记》文。好友邓原岳卒，<sup>④</sup>年五十。作五言古诗《叹逝篇·邓少参汝高》，悼念亡友。

按：叶向高与邓原岳交往颇深，除了讨论时政的大量尺牍之外，叶向高亦有诗《送邓汝高督餉两浙》《寄怀邓汝高学使》、文《邓汝高诗序》等。

##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四十七岁

归南京。

是年，应友人林仲山之邀，作《重修醉翁丰乐亭记》《丰乐亭五贤祠记》送之。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遂成“东林党”的发端。

按：《明史·顾宪成传》：

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既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

<sup>①</sup> 此诗未见《苍霞草全集》中，沈有容《闽海赠言》有收录。见（明）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

<sup>②</sup> 此诗未见《苍霞草全集》中，沈有容《闽海赠言》有收录。见（明）沈有容辑：《闽海赠言》。

<sup>③</sup> （明）叶向高、叶益荪：《莲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532-533页。

<sup>④</sup> （明）徐著，陈庆元、陈炜编著：《整峰集》，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1160页。

之说。邑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时是，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自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sup>①</sup>

可见，东林书院为东林党之发源地，而顾宪成、顾允成最初讲学时，以讲学为主，亦有批评引论时政的成分，而众多被废黜、罢免、归仕之清流之士的加入，使东林书院的政治成分愈加厚重，而不是单纯的讲学之所。

###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四十八岁

居南京。

初，叶向高庶母林氏病卒，杜门屡疏求归不许。作诗《安甫赵君与余同自留礼移留铨，相得甚欢。安甫以光禄入贺千秋，属余方乞归。赋此言别》。

是年，好友谢肇淛入贺，间道过家。<sup>②</sup>叶向高作诗《送谢在杭比部入贺徽号兼过家省视》赠之。又，好友曹学佺为叶向高刻《苍霞草》撰《序》。

按：业师陈庆元先生在《曹学佺年表》中说：“是岁，为叶向高刻《苍霞草》撰《序》，并论明二百年文章之弊。”<sup>③</sup>但曹《序》未见今存《苍霞草》及叶向高其他诗文集。叶向高对曹学佺文学才识颇为赏识，为闽中诸人最高，推测曹《序》未必不用；又据《苍霞草自叙》知叶向高诗文集曾刻过两次；推测，或曹《序》刻本今不存。

###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四十九岁

入京。

元日，同僚友人朱司成五十寿，作诗《朱司成以丁未元日为五十初，度诗以寿之》。

夏四月，圣旨命会推阁臣。

五月十七日，廷推阁臣。与推者七人：东阿于慎行、富平孙丕扬、任丘刘元霖、济南赵世卿、晋江李廷机、晋江杨道宾、福清叶向高。二十六日，朝命加于慎行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衔；叶向高、李廷机升礼部尚书，各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又，起用在籍原内阁辅臣王锡爵为首辅。

夏，作《祭曾见台》一文。

初秋，北上。曹学佺作《送叶相公》送之。叶向高作诗《途次怀里中友人》《发三山乡缙绅祖饯途次寄谢》等。

八月，遂返棹至泃河，作《过泃河寄梅工部》《泗亭再逢范异羽有赠》《泗亭书怀奉呈于谷峰先生》《谷峰先生贻书并诗见讯次韵奉答》《九日舟中怀友人》《维舟泗亭李中丞数书相问邮寄》《自泗亭归至邳山阻风》《返棹至泃河闻命促行寄李中丞》《王太行追至泃河漫赋》《再宿泗亭有作》《王太行奉命见召赴阙敬赋小诗以赠》《蒙召再辞，维舟泗亭候命。值中秋同盛太古昆仲、吕公原小饮述怀》《泗亭中秋夜用友人韵》等诗。得旨，复北上。至东阿，晤于慎行，相约朝见日期。作诗《过东

① （清）张廷玉：《明史》，第6031页。

② 陈庆元：《谢肇淛年表》，《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6页。

③ 陈庆元：《曹学佺年表》，《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77页。

阿大宗伯于谷峰先生招饮赋谢》《访谷峰先生奉次见赠韵》《过东省答寄黄钟梅中丞时中丞新晋少司马赠之》等多首。

十一月，抵京。十三日，廷见。于慎行时已病重，不旬日即没。作诗《挽于谷峰先生五首》、文《祭于谷峰先生》。二十五日，叶向高入阁供职。

按：因王锡爵辞不赴任；于慎行赴京后又病卒。此次内阁成员有：朱赓、李廷机和叶向高。叶向高本在李廷机前，但因李廷机为叶向高父叶朝荣同年，又资序在前；故而叶向高上疏请示万历帝，先李公而后已，得允。此时，内阁以朱赓为首辅，叶向高、李廷机仅从旁协助，听命建言而已。所推七人中，只孙丕扬、赵世卿非词林出身。可见，明代翰林院、庶吉士有“储相”之称，并非虚言。

###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五十岁

居京。为内阁辅臣。

元旦，与首辅朱赓、辅臣李廷机同至宫门拜贺，按旧例给予赐宴及烧割一份。作诗《戊申元旦书怀》《元日偕同官诣宫门伏谒蒙恩赐宴仍遣中官颁御饌至邸中恭纪》。叶向高与李廷机同至思善门请东宫讲学、考选、起废等事，内珰以思善门非上疏之地，不受。

五月，辽东税监高淮以暴虐被辽人逐，逃入山海关。叶向高上疏言高淮罪状，平息朝廷纷乱。

十二月，次辅李廷机因遭弹劾而称病闭门不出。自此，内阁只余叶向高一人，遂以独辅主持政务，但票拟等事务亦列李廷机名在己前。

是年，作《寿谢司寇绎梅，司寇时与余较奕》《同谢司寇、郭中丞游张惠安园，观牡丹》等诗。

###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五十一岁

居京。为内阁独辅。

元月初九日，讹传虏警。京城大乱，叶向高居中调度各方、安抚百姓。

六月，辽东巡抚熊廷弼请屯田。叶向高等认为屯政无益战事，未准。

十二月，上疏请停免买办银，允准。长子叶成学携长孙叶益藩进京侍奉叶向高。

按：对于请停免买办银一事，叶向高颇为自得。《蓬编》：

自此，户部岁省二十万金矣。此事行之已三十年，使前此阁臣有力争之者，其所省当不费。而因循至此，惜哉。<sup>①</sup>

###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五十二岁

居京。为内阁独辅。

元月，李三才遭邵辅忠、徐兆魁等相继弹劾，叶向高营救未果。

按：在是否任用李三才的问题上，叶向高没有明确地表达立场。叶向高既看到李三才的出众才能，又发现其张扬自矜的缺点；虽然不满齐楚浙派的丑化抵牾，但对顾宪成等人的做法也不赞成；为了止息争端，更是劝阻徐缙芳对李三才的弹劾。最后，这场斗争以李三才被削籍为民收场。事情虽然平息，但叶向高认为门户之祸、党派之争由此开启。

闰三月，子叶成学归家，长孙叶益藩留京侍祖父叶向高。

<sup>①</sup>（明）叶向高、叶益藩：《蓬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569-570页。



五月，叶向高为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请旨赐葬北京，得允。

按：叶向高与利玛窦有较深的交情。利玛窦逝世后，叶向高请求万历帝下旨赐葬利玛窦于北京。利玛窦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秋，作《重修大龙兴寺碑》

九月十九日，奉命会武宴主席。

十一月，叶向高支持应天巡抚徐民式均田赋之请。

十二月，吏部考满。加叶向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尚书如故，荫一子中书舍人，照新衔给予应得诰命。

是年，徐作《上叶相公初入内阁》贺之。<sup>①</sup>

按：《鳌峰集》中《上叶相公初入内阁》一诗收录在徐庚戌年卷中，此时距叶向高入直内阁已经三年，徐于此时作《上叶相公初入内阁》诗贺之，似不太贴切。妄自猜度，徐《上叶相公初入内阁》诗似置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或三十六年（1608）更为妥帖。

##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五十三岁

居京。为内阁独辅。

元月，督促造福王府第。京官考察，循例自陈。

三月初二日，京官考察疏下。

按：此次考察牵连甚广，纷争不断。以顾天竣、李腾芳、汤宾尹三人被论为开端，有“淮上之党、东林之党、顾李之党、王元翰之党”之说，其后阉党王绍徽、乔应甲、岳和声亦夹杂其中。在《蓬编》中，叶向高始用“东林诸人”形容顾宪成、李三才等人，“东林”、“党”、“东林之党”等词开始陆续出现。叶向高的这些史料记载，或可成为“东林党”研究的重要史料。

五月，南考察疏下。南考察中，诸党亦相互攻击、纠缠不休，门户之祸日益炽烈。以段然、刘时俊和胡嘉栋三人处分不同为祸端，东林诸人再次参与其中。

按：叶向高坚持不党不群、中庸平和的处事之道，虽然对东林正直之士多有保护、救援，但对东林党的一些作为并不十分赞同：

而东林诸君以段因已失官，复罹察典。意不能无少望，语言不平，史公自此恨东林。南台省相与助之，引绳披根，釁端大启矣。要之，段、刘之处，原不为过。东林当付之忘言。及其有言，史公亦当置之勿较，而皆不能然。彼此俱失矣。然东林既已退休，朝事自不宜与，而哓哓不已，致从众怨。<sup>②</sup>

秋七月，曹学佺赍捧还，离京。叶向高作诗《送曹能始南归》。

八月，叶向高致书福建按察使陈邦瞻，主张对通倭海商严格查办，重处与通倭海商勾结的水师官兵。

十月，朝廷颁万历四十年历。南京发生私铸钱币案，叶向高平息事态。

##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五十四岁

居京。为内阁独辅。

六月，“代藩”事起。叶向高主张立长。

<sup>①</sup>（明）徐著，陈庆元、陈炜编著：《鳌峰集》，第1214页。

<sup>②</sup>（明）叶向高、叶益荪：《蓬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608-609页。

按：代王之子鼎渭、鼎莎兄弟二人争为世子，二人皆为庶子，后兄鼎渭立为世子，事乃定。朝中诸官员各有支持，引起纷争不小。叶向高认为二子均不当立为世子，但两相比较，倾向立长。叶向高比之为皇太子朱常洛与福王，认为不能以母贵论，若立次子鼎莎，则怕援此为例，他日动荡国本，故而支持立长。

七月，苦请浙江、江西、湖广、各省考官及阁中题应天考官，发。但应天及江、浙、湖、陕等地因已晚而改期，为未有之事。又，叶向高写信给福建巡抚丁继嗣，要求丁加紧海防，避免倭寇以通商为由侵入。

八月，请考选疏。

九月十九日，李廷机辞朝行。

按：此前，叶向高虽实独立处理阁务，但李廷机之名尚在，辅臣名义上有两位。此次，李廷机去，内阁只余叶向高一人。是时，为给事中范济世、张廷登连疏言时政所侵，叶向高具疏乞罢，又密揭言考选事。万历谕旨挽留，首称叶向高为“辅弼重臣”。此前，均称“阁臣”、“辅臣”等。

十一月，点用蜀抚，以平息四川夷獠之乱。

是年，同年好友郭正域卒，年五十九。作有《同李九我祭郭明龙文》《祭郭明龙文》等文。

##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五十五岁

居京。为内阁独辅。

二月，奉特命主考会场，任癸丑会试总裁。

按：因内阁仅叶向高一人，主持考试期间，并兼票拟等政务。圣旨初下，叶向高即知与礼制不合，惶恐万分，力辞就任。《蓬编》：

遂不得已入，独心以票拟不便为虑。而上每日遣中官送章疏入闱中，拟上。中官止大门外，俟拟完传出，日只一次。其初九、十二、十五三日以试期戒严，则暂辍不发。其处置周详，一至于此。真出意料之外，人皆叹服。<sup>①</sup>

阁臣于科举会场主持政务，身兼会试总裁与票拟等事，为历代所无。叶向高小心谨慎，对自己的周详处置亦颇为自得，但仍被言官攻击。

六月，“王曰乾案”发。叶向高乘机促成福王之国事，迫使万历帝定下福王之国日期。

按：叶向高受立长立嫡观念影响，又与皇太子朱常洛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保全东宫储君之位、请求福王之国更是尽心尽力。叶向高不仅坚持上疏请求福王之国，更加善于借助外部事件和舆论造势推进福王之国。《明史·叶向高传》：

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锦衣百户三曰乾者，京师奸人也，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相讦告。刑官讫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惊，将拟曰乾死罪。曰乾遂讦奏郑妃内侍姜严山与学等及妖人王三诏用压胜之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拥立福三。帝震怒，绕殿行半日，曰：“此大变事，宰相何无言？”内侍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类往年妖书，然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道具在，一讯即情得。陛下当静处之，稍张皇，则中外大扰。至其词牵引贵妃、福三，尤可痛恨。臣与九卿所见皆同，敢以闻。”帝读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

<sup>①</sup>（明）叶向高、叶益荪：《蓬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658-622页。

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贴然无事。”帝尽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sup>①</sup>

八月，会推阁臣，共七人：方从哲、刘元震、黄凤祥、吴道南、孙慎行、孙丕扬、吕坤。叶向高极力请求起用旧辅沈鲤，未果。又选庶吉士。庶吉士本应在五六月间进行，因叶向高杜门阁中无人，故推迟至此。

九月，十九日，奉命会武宴主席。辅臣方从哲、吴道南入阁。

十月，万历帝以来年春贺李太后七十圣寿留福王，谕旨阁臣，被叶向高封还拒绝。

按：《明史·叶向高传》：

贵妃终不欲福王之国，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寿，三宜留庆贺。帝令内阁宣谕。向高留上谕弗宣，请今冬预行庆寿礼，如期之国。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谕。向高言：“外廷喧传陛下欲假贺寿名留福三，约千人伏阙请。今果有此谕，人情益疑，将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静。圣母闻之，亦必不乐。且潞三，圣母爱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为？”因封还手谕。帝不得已从之，福王乃之国。<sup>②</sup>

可见，福王之国的阻力主要来自万历帝和郑贵妃及福王等人势力。叶向高尽力斡旋，扭转皇帝的心意，并借助形势使其不得不送福王之国。

十一月，以延镇三次大捷，加叶向高少保兼太子太保、进武英殿大学士、改户部尚书，荫一子中书舍人。叶向高请辞，得允。又请减福王庄田二万顷，亦得请。初八日，以一品满三年，报考绩。

十二月，加叶向高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荫一子尚宝司司丞，给予应得诰命，赐宴礼部。四辞加恩，不许，乃受。

按：在此次加恩圣旨中，首次称叶向高为“元辅”，赏赐亦超出常数。

##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五十六岁

居京。为内阁首辅。

元月，叶向高制定福王之国之路线，请改子叶成学从新荫尚宝司司成，得允。

二月初九日，李太后病逝。

按：万历帝下令在全国古刹内选五处分置大藏经，为皇太后祈冥福。叶向高为家乡的黄檗寺亦乞得一处，得大藏经六百七十八函、紫袈裟三袭及帝御笔亲题匾额“万福禅寺”。

三月二十四日，福王就国起行。

按：叶向高在《蓬编》中表述了促成福王之国的艰难、漫长之路，为此事不遗余力：

福王留邸中十余年不之国，东官又久不出讲，人情危疑，口语日多，至有不忍言者，中外陈请之章不可枚数，皆以为此为宗社安危所关，而责余力请。余为此废寝忘食，呕心沥胆，所为婉言、直言、危言、苦言以请于上者，无所不至。赖上圣明不加罪责，至于封还御札亦曲赐优容，吉期遂定。<sup>③</sup>

又言福三之国，朝野欢呼，在自己任期内完成此项工作亦颇为欣慰：

三行后，中外人情莫不举手加额，谓自此根本无忧，国家无疆之福。下至舆隶市井小民，无不欣喜。余私念此事非主上铁石心肠、雷霆神断必不能决，此汉高帝、唐太宗所不能及，真圣主也。余以不才幸完此事，稍可报国。<sup>④</sup>

①② （清）张廷玉：《明史》，第6033页。

③④ （明）叶向高、叶益荪：《蓬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746-747，749页。

五月，福建税监高宥被调往广东带管，叶向高上疏劝帝勿听其往，并陈高宥在福建恶行，请求撤回高宥。十日，上疏请求罢免福建矿使税监高宥。十一日，再疏请求罢免高宥。同日，阁臣方从哲、给事中姚永济、郭尚宾亦上疏弹劾高宥，帝仍置之不理。二十七日，叶向高第三次上疏弹劾高宥。

六月二十五日，叶向高第四次上疏，请求罢免高宥。帝乃下诏召回高宥。

按：因请撤高宥事，叶向高与好友董见龙决裂。董见龙认为叶向高在处置高宥一事上，为高宥留有余地，因而对叶颇不满。《蓬编》：

方余屡请撤案疏中有“案自为救死计”语，见龙咎余为案地。不知此辈穷极无聊，而内中为之羽翼者，实繁有徒。若不稍开以生路，彼内外协力，势将溃决。<sup>①</sup>

足见，叶向高处置穷凶极恶之徒亦不赶尽杀绝，对大奸大恶之辈亦留其生路，是平恕、中庸之性使然，亦是自保求全之计使然。

七月初十日，因求去不允，遣家人出城，并移居福州会馆候旨。谕留圣旨中，首次称叶向高“首辅”。

按：自万历四十年（1612），李廷机去后，叶向高为内阁独辅。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方从哲、吴道南入阁，万历帝对叶向高的称呼由“阁臣”、“辅臣”到“辅弼重臣”再到“元辅”，至此，始给叶向高“首辅”名分。

八月二十三日，叶向高致仕。二十七日，叶向高启程离京归家。

按：叶向高内阁主政期间，主要政绩在于促使福王之国、努力维持国家机构运转、调和日益激烈的党派斗争。叶向高自评主事八年间，“未尝害一人，未尝受一人钱，向六曹请一事”<sup>②</sup>；“惟是当士大夫分曹树党之日，诸以攻门户为名者，责余不为左袒，耽耽无已。然终不能他有所加，只以调停为余罪。”<sup>③</sup>叶向高在党派间保持中立，对待党派斗争的态度，亦多有所贬抑、否定。

十二月初一日，叶成学卒，年三十七。初三日，叶向高抵家。

##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五十七岁

居家。

二月，邀汪泗论、吴应珍游福清瑞岩山，作诗一首。石刻位于瑞岩寺附近山道旁。

按：此诗《苍霞草全集》未收录，《福清市志》《福州十邑摩崖石刻》均有收录。

春，修曾祖坟。叶向高发起募捐，重建福清名刹黄檗寺及藏经阁，作《重兴黄檗募缘序》一文。砌通乡道路，建“赐金桥”以昭君恩，作《赐金桥记》记之。又砌邑治南白水湖路。

夏月，邀同友人亲故同游黄檗寺。叶向高作《夏日江孝廉、林太学诸丈邀游黄檗寺，观龙潭四作》等诗，友人何乔远亦应邀前来，并作诗《和叶相国游黄檗韵》，与叶向高唱和。

按：据《黄檗寺志》载，叶向高另有《人日游龙潭》《同欧阳邑侯游黄檗》《观龙潭记游》《登绝顶》《夏日江孝廉、林太学诸丈邀游黄檗寺，观龙潭四作》等诗多首。其中《人日游龙潭》一首作于正月初七日，《同欧阳邑侯游黄檗》一首作时未可知，《观龙潭记游》四首、《登绝顶》四首与《夏日江孝廉、林太学诸丈邀游黄檗寺，观龙潭四作》极可能是是年夏日所作。而《观龙潭记游》四首与《夏日江孝廉、林太学诸丈邀游黄檗寺，观龙潭四作》除第一首略有不同外，其余三首完全一致，疑为同一作品。

七月，按臣李凌云、方行部至其家行存问礼，并荫一孙做中书舍人。又因李太后山陵礼成，赐叶

①②③（明）叶向高、叶益荪：《蓬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28、29页。

向高银一百两、苧丝四表里，以上赏赐皆属异数。

秋冬之间，造坟三所，一瑶峰，一华阳，一香山。

按：“儿成学筑坟且两载，余归视其穴稍低，乃移而上三丈许，作巽山乾向。形势更壮，为圻三，儿成学葬其中。余自负以此地在吾邑不多见，人亦云然。”<sup>①</sup>由以上记载可见，传说中有叶向高善于勘舆风水之说，似有依据。

##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五十八岁

居家。

春，与举人石应相（当时为孝廉）倡修石竹山观音阁及僧房，石应相又修桥、建半山亭。作诗《登石竹山观雨》，又有文《题石竹山缘薄》。据《蘧编》载：“石竹，何氏九仙所栖。岩壑奇绝，祈灵如响。先少师公为诸生，得梦甚验。余为孝廉，往祈。仙告以‘腰缠白玉带’，余以为妄。而其后果然。”<sup>②</sup>

秋八月，游连江青芝山，作七律二首，石刻位于青芝寺附近猿公洞。又同万侯编、蒋行义登长乐晦翁岩，作七律二首，石刻位于晦翁岩。

按：以上四首诗《苍霞草全集》未收录，青芝山律诗二首，《福建摩崖石刻精品》一书有收入；晦翁岩律诗二首，《长乐市志》《福州十邑摩崖石刻》均有收入。

秋，建石隐山房、福庐山房（或疑二山房为一，不可考，故存疑。）于福庐山，鸠缘建福庐寺，作《题郭庐山》《题福庐山缘薄》等文。又为弟叶向亮造寿坟于福清龙田。

按：叶向高屡建寺院，目的在于增加山水游览之趣。如《修香山寺募缘序》：

客或谓余作无益之事，且为异教树赤帜。余谓以法眼观则山河大地皆成幻场，即尧舜功业究竟亦是无益；若以现在观则一丘一壑皆造物安排为吾人乐地，能收点一分即受用一分。至于琳宫梵院，乃吾所借为妆点山水之助，何必以异教为嫌？今富贵人家求田问舍，经营别业，至死不休。曾不一再传已非其有，何如割其十百之一二，为名山胜境作些小功德，传留无穷。<sup>③</sup>

再如《蘧编》：

邑缙绅既不能输助，又嘲余佞佛。余笑曰：“佞佛者，将以求福利也。余以胜概还之山，以游观公之人，佛不任德，余岂任福，何佞之？”<sup>④</sup>

秋，作七言律诗《友人怀游欧阳先生石室》。石刻位于清源山慈恩寺后。

按：此诗《苍霞草全集》未收录。

十月，与友人洪有声、黄国鼎、郭梦詹访何乔远山房，游清源山，并留有题刻。石刻内容为“万历丙辰孟冬朔日，大学士福清叶向高同洪工部有声、黄宫谕国鼎、郭太学梦詹访何仪部乔远山房，到此手题。”

是年，为邑人请改仓粮折色，岁省数千金。叶向高向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推荐故友沈有容。

##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五十九岁

居家。

春，与友人董应举、吴伯孚、石应相游石竹山。作诗《董大理见龙招同吴太学伯孚登石竹岩，时石孝廉应相新辟径路甚奇绝》，石刻位于石竹山牛蹄洞岩壁。

①②④（明）叶向高、叶益荪：《蘧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4册，第41、44、45-46页。

③（明）叶向高：《苍霞草全集》，《苍霞续草》卷五，第414页。

按：此诗《苍霞草全集》未收录，《福清市志》《福建摩崖石刻精品》《福州十邑摩崖石刻》均有收入。

夏，福庐山房修成，作《福庐山房记》。

七月十七日，异母弟叶向亮卒，年五十五岁。

九月初五日，曾孙秀哥生，次孙益苞所出。

冬，次孙叶益苞、季孙叶益荪俱入县学。又为季孙叶益荪娶妇郑氏。又，造坟于百丈岭，为圻四。

是年，叶向高作《赠东沙获倭还归宛陵有引》<sup>①</sup>等诗。

##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六十岁

居家。

正月初三日，葬长子叶成学于新宁里华阳。同日，又葬弟叶向亮及弟妇郑氏于龙田。

二月初六日，曾孙妈哥生，长孙叶宜藩所出。

三月，长孙宜藩入太学，赴京。邀友人曹学佺等游福庐山。

按：此次福庐山之游，叶向高为向导，曹学佺、新安范穆其、三山林异卿同游，福清薛君、施君、何君叔侄辈作陪；共得诗若干首，并梓之。其中，叶向高作《福庐游记序》、曹学佺作《福庐游记》《福庐岩志》《福庐游稿》及诗《游记一首》《听泉阁》。后数月，陈振狂来游，亦有诗有游记，叶向高作《题福庐游稿》。据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一书考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末刻本《石仓全集一百八卷》，曹学佺《福庐游稿》一卷，正文前有叶向高《福庐游记序》，卷头题“福庐游稿”，署“闽中曹学佺能始著”，实仅一篇游记。<sup>②</sup>

三月，与友人陈泰始、洪海舍游石竹山，作诗二首。

按：此二首诗《苍霞草全集》未收录，《福清市志》《福建摩崖石刻精品》《福州十邑摩崖石刻》均有收入。

七月三十日，叶向高六十寿。乡里亲戚及门生故旧来贺，曹学佺作《福唐相公初度奉赠一律》为其祝寿。

##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十一岁

居家。

十月初五日，曾孙同哥生，季孙叶益荪所出。

十一月，葬外祖父、外祖母及舅、舅母、二舅、二舅母六丧于吴塘边，长舅无出，别葬他坟。为前母郭夫人、康夫人的父母造坟举葬。又为龙田何氏妹造坟。

## 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六十二岁

居家。

二月，不眠之症发。后病少愈，但时作时止。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崩。

<sup>①</sup> 此诗未见《苍霞草全集》中，沈有容《闽海赠言》有收录。见（明）沈有容辑：《闽海赠言》。

<sup>②</sup> 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373-374页。

八月朔日，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是为光宗。二十日，谕内阁旨中，赞叶向高“匡时伟器，经济宏才”。旨召叶向高进京复职，为多方所阻。

九月朔日，光宗崩。初六日，皇太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以是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改明年为天启元年。叶向高具疏恭贺。

十二月初七日，得旨，命叶向高入阁奉职。二十三日，行人吕奇策到，请叶向高赴京。

按：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叶向高在家度过了将近七年的山林田园生活。经常与闽地文人聚首，相携尽游家乡风景名胜。期间作有诗歌《游灵石寺》《登鼓山》《游应峰旧寺觅僧不遇》《赠城山庵岐上人，上人旧主持吾里福兴寺》《题仙井岩》《游万石山》《游磐石饮主人家》《过太园楼卜得一地可建精舍，其旁护国寺茶园今废》《等东金山大雾忽霁》《登罗星塔》《游青芝诗》《游云窝怀陈司马》等。

### 明天启元年辛酉（1621）六十三岁

赴京。任内阁首辅。

正月十三日，行人吕奇策归，叶向高具疏请辞。

闰二月，熹宗复召叶向高。

三月，努尔哈赤攻城，沈阳失陷。随后，辽阳亦被攻陷。朝廷官员催叶向高出。

春夏间，时间辽报危急，与曹学佺有唱答。

六月初九，自福清启程。曹学佺作《奉送叶相公被召还朝四十韵》送之。

七月初七日，叶向高至崇安。因病请辞，不准，勉强北上。二十三日，至杭州。以病入居城内，遇黔中揭奏叙劳加恩，晋叶向高中极殿，荫子尚宝司丞，兼赉银币。辞不受。

按：黔中捷奏，为叶向高万历年间在阁时边关捷事。天启帝于此加恩，实滥赏之始。

八月初八日，自武林登船后，患疾。抵嘉兴，得友人荐当地名医王三古，于是随行照料。达苏州，与族侄叶成章会晤，病稍减。过常州，与礼部尚书孙慎行（为叶向高任职太学时所简拔学生，有师生之谊）晤面，停两日再行。

九月初一日，从京口渡江，病稍愈。作《渡峡江风霁，呈方壮行、余有徽二丈》《京口渡江别薛仰惠表兄》。门生范凤翼、朱一冯（疑为朱一鸣）及外甥何昭甫来见，送至淮阴。十三日，乘船从淮阴渡黄河，遇黄河龙王，刻碑纪念之。入汴河，得邸报。知熊廷弼劾毛文龙，叶向高疏上，为毛文龙辩白。过夏镇，友林汝蕞来见，饮于镇山书院。作律诗一首。

按：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久已不合，王化贞为叶向高门生，毛文龙又为王化贞所提拔，加之叶向高之前即对熊廷弼颇有微辞。因此，在熊廷弼与王化贞的辽东战事的立场矛盾上，叶向高支持、庇护王化贞，处处掣肘熊廷弼，以致酿成辽东失事的后果。这亦是叶向高为后人诟病的一点。

又按：东南沿海多信仰蛇，天妃即是。而叶向高渡黄河遇龙王，将龙王和海洋社会的守护神天妃妈祖相提并论。把此次复出归为天意，为自己罩上神秘色彩，制造舆论。

十月十一日，至德州，从陆行。二十一日，抵京。二十二日，面君，二十五日，即入阁办事。二十六日，疏救刘宗周，刘得以轻罚。并请发帑金救边，后允发二百万。

按：叶向高此次出任内阁首辅，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为辅政，时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要职，左光斗、魏大中、黄遵素等为言路官，东林党人掌握朝政，达到极盛。但宦官魏忠贤在宫中与客氏勾结，又笼络朝中被东林党排斥的官员，迅速崛起，遂形成阉党。阉党很快取得天启帝的宠爱与偏护，大肆构陷忠臣、打击东林党人。

十一月，以延镇捷功叙劳大臣，加赉如前黔捷。叶向高辞不受。

十二月，请叙戚继光抗倭功，得允。二十一日，请谒皇祖、皇考陵，途次作颂德诗十二章、《谒陵诗》二首，颂德诗今亡佚。庆陵工成，加恩内阁。晋叶向高中极殿大学士，荫一子尚宝司司丞，赏银五十两，苧丝三表里。辞不受。

是年，作诗《度分水关》六首、《出关别江仲鱼》《谒陵诗》二首等，文《新建首善书院记》《重建福建布政司堂记》等。

按：叶向高任职半年间，加恩三次，天启帝之滥赏可见一斑。又，今有《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龛征录》收录叶向高，为此年所作。

## 天启二年壬戌（1622）六十四岁

居京。为内阁首辅。

元月二十日，辽东战事失利。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等弃辽东大片国土逃入山海关。张鸣鹤、沈樞（水旁）论辽事与廷弼，熊与王俱下狱论死。

二月，以辽东失事叶向高引罪乞罢斥。四川永宁奢酋之乱平定。廷试，文震孟为状元。

三月，阁臣集体杜门乞罢。后，叶向高上《时政疏》，条陈政务五款。

四月，内珰中官与朝臣纠劾，叶向高疏救官员，与阉党力争。礼部尚书孙慎行复纠“红丸案”，弹劾旧辅方从哲。叶向高力主息事宁人，孙遂与叶绝交。

五月，楚中乡官陈大道等合疏为张居正颂枉，得允复原官及赦免家人等。山东爆发白莲教农民起义。

按：“张公刚愎而有才。穆庙崩，与高公拱同受遗命，辅神皇。亡何，以计逐高公，而自当国。时神皇方十龄，太后委政张公，冯瑄保为内援。权势熏灼，侔于人主。神皇恭己无所预，张公亦锐欲有为，不避怨谤。而以夺情事为人所攻，肆行杖谪，大失人心。三子皆甲第状元、榜眼，无所顾忌。没后，人共攻之。神皇亦夙恶其专，褫官夺谥，戕其子，籍没其家。”<sup>①</sup>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叶向高颇以张居正的结局为鉴。

六月，大臣上疏因熊廷弼事相互攻讦，叶向高努力调停。

七月，高攀龙因陈讲学要务疏及李选侍等，被斥责。叶向高为其请求，得轻罚。天启帝册封慧妃，命叶向高捧册以重其典，叶向高力辞得免。

九月十九日，奉命会武宴主席。疏请停刑并申救门生王化贞，停刑得允。二十二日，册封信王朱由检（即崇祯帝），命叶向高捧册。

十月，诸臣攻邹元标等人建书院聚众讲学，天启帝欲毁书院，叶向高力争得保。

十一月初一日，疏救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鄴，未果。二十日，平定山东白莲教农民起义，刑部献俘徐鸿儒等人。请补阁臣，得允。

十二月，御史夏之令疏攻毛文龙，天启帝欲重责夏；得叶向高力救得免。夏之令本与叶向高不合，由此对叶向高释怀感激。

## 天启三年癸亥（1623）六十五岁

居京。为内阁首辅。

<sup>①</sup>（明）叶向高、叶益荪：《莲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4册，第44页。



元月，廷推阁臣九人：孙慎行、盛以弘、朱国祯、顾秉谦、郑以伟、张问达、赵南星、朱延禧、魏广微。点用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四人。因点末而不点首，舆论大哗。叶向高疏请续点，未果。玉牒修成，加恩阁臣，晋叶向高中极殿大学士、荫一子尚宝司丞、给予诰命。

按：此次廷推，依附于魏忠贤的顾秉谦、魏广微得到廷推及点用，阉党擅权，已经侵及人事任用。阉党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狼狈为奸，祸乱朝政。而东林党被打压，许多官员已经被弃用，阉党对东林党等朝中正直之士的打击迫害已经逐渐展开。

五月，拟进《御制光宗实录、宝训、序文》。

七月十六日，恭进《光宗实录》，加恩上柱国兼支尚书俸、荫一子尚宝司丞、照新衔给予应得诰命，四辞加恩，得免上柱国兼支尚书俸。

按：此《光宗实录》经叶向高等阁臣审阅，惜后来多篡改，尤其是张差事、红丸案、移宫案三事不复原貌及史实。

八月，廷推李三才南吏部尚书、余懋衡陪，冯从吾吏部侍郎、曹于忭陪，点用余懋衡、曹于忭二人，阁中揭请点用李、冯二人，未允。九月初二日，天启帝遣御前牌子王忠赏赐，叶向高疏谢。

十月，以平定山东白莲教农民起义叙劳加恩内阁，晋叶向高上柱国兼支尚书俸，赏银六十两、彩段二表里，荫一子尚宝司丞；辞不受。

闰十月初九日，进诏书稿，并请召用建言降谪诸臣，不允。毛文龙辽东捷报，叶向高请发帑金给饷并行犒赏，天启帝令群臣捐俸充边饷。

十一月，天启帝亲行郊祀，叶向高奉命分献星辰坛。以皇子生推恩阁臣，加叶向高上柱国兼支尚书俸，荫一子尚宝司丞；叶向高两辞，仅接受荫子之恩。

十二月十一日，以甘肃、延绥、宁夏三镇大捷叙劳，加叶向高上柱国兼支尚书俸，荫一子尚宝司丞，赏银六十两、彩段二表里，给予应得诰命；辞不受。又以一品考绩满六年，加上柱国太傅、支尚书俸、余官照旧，荫一子与做尚宝司丞，给予应得诰命，赏银五十两、大红苧丝坐蟒一袭、彩段四表里，羊二只、酒二十瓶，新钞三千贯，仍赐宴礼部；得辞上柱国太傅、支尚书俸、赐宴礼部三项。

是年，当考选。官吏先到者五月即受官职上任；后到十余人滞留京师，吏部请选不允，叶向高多次揭请，亦不允。

按：万历时，官员缺乏、官署多空；天启时，官员雍滞、人满为患。二者均导致国家机构几乎不能正常运转，由此亦可见大明王朝不可挽回的亡国命运。

## 天启四年甲子（1624）六十六岁

居京。为内阁首辅。

元月，因疏陈政务，被疑讥刺吏部尚书赵南星，二人日渐疏远。二十四日，疏请召还降谪各官文震孟等人，不允。

二月三十日，天启帝病急召阁臣，必使叶向高至方令入觐。见罢，天启帝即命中官送叶向高至阁办事，自是入阁。

按：“二十八日”《蓬编》作“十八日”。但察《蓬编》前后记载，此处前为十九日事，之后为三十日之后日，并接下来即叙三月事。因此，此处的“十八日”前当漏“二”字，应为“二十八日”。

四月，给事中傅熹疏攻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并及汪文言，诸珰乘机谗言于天启帝，叶向高为平息祸乱，一力承担起用汪文言之过，阁臣亦极力申救东林诸人，未允。汪文言被处死。

按：叶向高认为，东林诸人虽公正忠直，不随波逐流，但过于争名躁进，以致引来杀身之祸。《蘧编》叶向高评论东林诸人：“盖此诸公虽立身持论皆有可观，不随俗波流。而争名躁进之念，终未能忘于出处。进退存亡得失，大关键全不虑及。余惓惓言之而不听，亢而取悔，卒杀其身。以败天下事。名不及范滂、李膺而祸同于李训、郑注，深可痛也。”<sup>①</sup>

六月，御史杨涟上疏奏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又，叶向高同籍、御史林汝翥得罪诸瑄，搜其家欲置之死地，林逃；叶向高以林汝翥同里，被内瑄围宅欲搜其家，后乃散。

按：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东林党人及朝中正直之士力邀叶向高相助，以攻魏忠贤。叶向高认为杨涟等人不可能将魏忠贤扳倒，劝其不宜过激，却因此得罪东林党，被斥为懦弱怕事；事发后，叶向高为平息斗争、缓和矛盾，劝天启帝令魏忠贤释权归第，以保全其性命，并尽力拯救被责大臣，又得罪魏忠贤，成为阉党除去的首要目标。在这次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中，阉党控制朝政。阉党爪牙崔呈秀造《东林同志录》、《天鉴》，王绍徽模仿《水浒传》一百零八将名单造《东林点将录》，尽罗不附魏忠贤者，拟一网打尽。其中以邹元标、顾宪成、刘一燝等人为主，叶向高为首，被封为“及时雨天魁星叶向高”。

按：中官未得旨而围首辅宅邸，魏忠贤阉党权势之大。叶向高受此大辱，益坚定归仕之心。《蘧编》：“余具揭自明，且云中官围阁臣第，是国家二百余年所无之事。臣若不去，将何颜以自立？”<sup>②</sup>

七月初七日，允准致仕；并加叶向高太傅、荫一子中书舍人，仍遣行人护送驰驿归里，加赐银一百两、彩段四表里、大红苧丝坐蟒一袭，地方官以时存问，月给廩米五石，舆夫八名。又特旨加赐银一百两、彩段六表里、大红苧丝坐蟒一袭，皆异数也。初十日，疏谢并辞加恩，不允；再辞，允免太傅。十三日，上御门面辞，升金台至御座前叩首拜别，并劝天启帝寡欲养身、勤政讲学等。是日，出都城，暂居正阳门外。十八日，遂行，百僚皆出饯行。夜半至潞河，登舟。二十一日，发舟。二十三日，与董见龙饮于蔡村。二十四日，至天津，同官毕自严、门人钱士晋皆招饮。

按：故事，告病官不面辞，辞朝官亦只于丹墀行礼。叶向高事重其礼，以显其爱君忠君之意，复具疏条陈要务。

按：叶向高此次主持内阁三年期间，夹在阉党与东林党之间，备受攻击，较之万历时期主持阁务更为艰难。叶向高言己为政之苦：“其时党祸复炽，门户诸君多争官竞进，眈眈者已伺其隙。而太宰赵君刚果自用，物情愈失。余再三规劝，竟不听。中官素欲揽权，屡传中旨。余触事力争，久亦厌苦。士大夫往往有欲藉内里以行其意者，比杨疏上，益驱与之合。余亦无奈何矣。故虽举朝留余，而余不得不去。”<sup>③</sup>又重申自己为人、为政之观念：“而识者多谓余归事必决裂，后果如其料。又以余为见机。余何人，敢当明哲之称？第生平谓大臣之道不可则止，不能则止，自处当如是耳。而攻门户者终不释然于余，不能解也。”<sup>④</sup>而时人已有认识到叶向高居中调停的作用，同官韩爌被遣去后贻书叶向高：“若瓮十年相业，当在泰之九二。彼断断者不免调停之疑，将尚于中行非乎？藉令客岁鬻萌将兆之时，瓮尚在政地，仍用此法调剂其间，定不令决裂至此。”<sup>④</sup>

又按：叶向高出都后，遭到给事中诸官员的疏攻，皆因选庶吉士入馆一事。当岁是科所选庶吉士入馆已二十人，已多于常数，但尚有欲留馆中者前来求情，叶向高未准，因而遭到诸人忌恨，被攻。《蘧编》：“忆余初入馆时，山阴朱文懿公告余曰：‘今阁臣难做，只选庶吉士一事，便无处法。’盖谓散馆为科道者，便攻阁臣也。此习近年方炽，余同年尚不然风会之流，此亦一端云。”<sup>⑤</sup>可见，选庶

①（明）叶向高、叶益荪：《蘧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4册），第238页。

②③④（明）叶向高、叶益荪：《蘧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4册，第257-258、262、264、280页。

③②③（明）叶向高、叶益荪：《蘧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4册，272-273、278-279、282-282页。

言士、入翰林院是科举中士的梦想，以图借此他日能够平步青云、入主内阁。庶言士为“储相”之称，并非空穴来风。

九月初旬，过淮安。经黄河遇龙处，专门到立碑的龙王庙拜祭。重阳日，自维扬。初十日，渡江。门人万缵留居京口两日。门人张文熙招游花山。至昆陵，门人周延儒招游，张善权、周警余（周延儒父亲）、陈一教、蒋士奇、毛士龙、万象新等皆同游，留连六七日。至姑苏，同年申用懋、门人文震孟、周顺昌、熊秉鑑、吕纯如、李逢节、陈必谦、周宗建、吕克孝、姜云龙等云集，皆同游范长白天平山房及石湖上方山诸处，留旬日方行，作诗《过姑苏徐京兆命诸公子招游西山，不果赴有作》。过武林，王洽招隐西湖，作诗《林纯卿罢郡幕挟燕姬卖浆武林有赠》《寄题林纯卿孤山精舍》等。途经杭州，意大利天主教会传教士艾儒略谒见，遂邀艾儒略往福建。艾儒略随行至福建，成为入闽传教的外籍传教士第一人。

按：明末福建是一个社会环境较为宽松、开放的地方，因此人们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艾儒略入闽后，与福州的名流文人、士大夫很快结交。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有《熙朝崇正集》（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收录的诗作大部分是闽中诸公赠艾儒略的，赠诗者达九十六人。

十一月二十日，抵福州。

十二月初十日，抵家。护送中书舍人吕邦涵以岁暮至。十五日，曾孙叶进昱生，长孙叶益藩所出。

是年，友谢肇淛卒，年五十八。

## 天启五年乙丑（1625）六十七岁

居家。

二月初七日，自福庐归，妻俞氏病。初八日夜，去世。徐作《祭福唐叶夫人文》。

四月初九日，得旨抚慰并令查例优恤。十七日，于龙田石竹山观音阁旁造坟，中为圻四，两摆各一，共六圻。因与福庐山近，本拟为葬骨之所，后得方岳里赐茔，遂辍不用。

六月，接吏部咨文，以庆陵工成，加叶向高上柱国，荫一子尚宝司丞，赐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给予应得诰命。

八月，遣人具疏辞，并疏谢予妻祭葬。二十六日，改造香山坟。

十月，党魏忠贤大兴牢狱，东林党人被大肆打击清除。

按：叶向高评此时阉党魏忠贤之权势煊天：“刑之惨酷，为从来人世所无。死日血肉模糊，莫可辨识。脏未完者，复行原籍追比。碎其家枝，蔓及乡党，无脱者。人人童足而立，以得死为幸。自是谴斥逮系无虚日，魏忠贤之升奖亦无虚月。”<sup>②</sup>又言内外阉党之勾结：“而朝缙绅走外魏之门如市，杀机毕张。与中人通呼吸，居前者畏而媚之，唯唯奉行，无一能救正，卒开缙绅大祸。”<sup>③</sup>

十一月初一日，得旨不允辞。欲再辞，因数遣人人非宜，遂罢。但诰命不敢领。

是年，作《福庐灵岩记》。

## 天启六年丙寅（1626）六十八岁

居家。

正月，勅修《三朝要典》。初欲编诸党人籍榜于朝堂，后觉其非，改。

二月二十三日，造赐茔于闽县方岳里，为圻四。叶向高又捐资修治亭舍。遂成坦途，行者方便。

三月初二日，至方岳里。省中诸亲友陈四游、李纯庵、林得山、洪汝舍、薛君和、林异卿、龚克

广、陈养嘿、陈云生辈咸以卜吉来贺。养嘿邀至省，留连一日。

四月，携陈鹿门、龚克广、林异卿自省城福州同归方岳里，观筑坟。

六月初五日，登石竹山绝顶，赋诗纪游。

闰六月，病发。

七月，经三医生调护，病减。二十五日，到福州求医，无效而返。

八月二十五日，同薛君和乘舟入省，历观诸名墓。又游升山诸胜。

九月重阳后，归家。二十六日，疏进，助大工银二百五十两。以有旨命林下诸臣各行捐助故也。

十月初八日，葬一品夫人俞氏于赐莹。

是年，友蔡复一卒。

## 天启七年丁卯（1627）六十九岁

居家。

二月，叶向高往福州吊曹学佺母丧。

四月初七日，入省会福州。八日，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造謁叶向高于法海寺礼阿育大塔，适曹学佺在座，相与论学，艾儒略赠《圣经》。后艾儒略撰成《三山论学》一书。又游闽王墓、胭脂山，又时泛舟福州西湖，或至洪江避暑。

按：叶向高、曹学佺与艾儒略在福州“三山论学”，宣扬传播了天主教的教义和思想，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思想碰撞。“三山论学”历时两天，曹学佺没有参加第二天的讨论。叶向高以儒家思想为出发，曹学佺是一位深谙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佛教徒，叶向高和曹学佺针对天主教的信仰提出了天主主宰万物、善与恶、生与死、天主降生等二十多个疑问，艾儒略则作为天主教的传教士，对叶、曹二人的问难进行解答。

五月二十七日，归家。徐致书叶向高论《闽王墓诗》。<sup>①</sup>

六月十六日，改觉是堂为祠，移奉父母及前母郭夫人、康夫人四主人祀，以贞烈姊、长卿弟衬。二十六日，偕龚克广往省城治疗。

八月，中秋前后病加剧。十八日，孙叶益藩、叶益苞奉叶向高自舟归。二十四日，天启帝崩。二十九日卯时，叶向高卒。曹学佺前来吊唁，作《莫福唐叶相公文》。

九月，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崇祯元年。首询及叶向高，有召用之意。问已逝，乃罢。

十月初，乃接殿工成，加叶向高太傅之旨，并赐银五十两、彩段两表里、大红坐褥一裘。后斋至，家人谨代领银币。

## 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

五月初六日，长孙叶益藩具疏为祖叶向高疏谢并乞辞加恩，得允。

七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何如宠题疏请祭葬。奉圣旨：“叶向高三朝元辅，绩懋匡襄。准照例与祭九坛，遣本省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加祭一坛，差官开圻合葬，还与他谥。”

十月二十九日，吏部尚书王永光题疏请赠荫。赠太师，荫一子与做尚宝司司丞。

（下转第115页）

<sup>①</sup>（明）徐著，陈庆元、陈炜编著：《鳌峰集》，第1307页。

# 龚用卿诗歌中的“馆阁气”

林晓玲, 宫伟伟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8)

**摘要:** 龚用卿是明代中期福建著名的诗人、循吏, 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 一生历经孝宗、武宗、世宗三朝, 著有《使朝鲜录》三卷、《云冈集》二十卷、《玉堂稿山居集》若干卷。以1542年辞官为界, 龚用卿诗歌前期雍容浑穆, 馆阁气象浓厚; 后期清丽淡雅, 兼具山林与馆阁气息, “所作大抵馆阁体”。

**关键词:** 龚用卿; 云冈选稿; 诗歌; 馆阁作家

龚用卿(1501—1564), 字明治, 号云岗, 是明代中期福建著名的诗人、循吏。“幼慧, 长善属文, 诵习经史, 过目不遗”<sup>①</sup>。嘉靖五年壬午(1526)科第及第(状元), 官授翰林院修撰, 后升擢为左春坊左谕德。曾参与修撰《明伦大典》《大明会典》等典籍。嘉靖十五年(1536), 龚用卿奉命出使朝鲜, 为官清廉, 不辱使命, 使“远人钦服”。嘉靖二十一年(1542), 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在任上, 他增修学舍, 整顿监规, 使士风为之一变。后因弹劾严嵩, 听候调派, “以病乞归”, 在家乡建构别院, 与知友觞咏其中。后虽有人举荐他重新入仕, 但因“时有忌公者, 阴沮其进”, 终未再仕。嘉靖四十三年(1564), 倭寇进攻福建, 用卿避居建瓯。以微疾终, 终年64岁。存世有《使朝鲜录》三卷、《云冈集》二十卷、《玉堂稿山居集》若干卷。

谢杰《在大司成云冈龚先生略集叙》曰: “我明人文丕振蜚声于馆阁者, 蝉联踵接, 何可胜数。乃先生尤为馆阁中白眉。”<sup>②</sup>《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明代龚用卿的《云冈选稿》云: “用卿, ……嘉靖丙戌进士第一, 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是编: 首赋、次词、次诗、次杂文, 考古人以词为诗余, 今编入诗前殊乖体例, 所作亦大抵馆阁体也。”<sup>③</sup>本文以龚用卿的《云冈选稿》为主要文献基础, 并参照其他相关材料, 分析龚用卿不同阶段的诗歌内容和特征, 以及馆阁作家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

龚用卿今存诗约七百首, 多为写景咏怀诗和酬酢赠答诗。以1542年龚用卿辞官为界, 可将其诗风分为两类, 前期多为馆阁体, 后期则偏于茶陵诗派所提倡的诗歌风格, 将山林气与馆阁气相融合。

## 雍容浑穆, 馆阁气象——龚用卿前期诗歌创作特征

明代状元主要供职于翰林院, 其仕途直指内阁。这种馆阁文人的身份, 决定了状元诗文与馆阁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sup>④</sup>龚用卿作为状元, 其诗歌亦然, 诗歌题材主要描写圣主贤臣之光华瑞泽, 馆阁

**作者简介:** 林晓玲, 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 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

宫伟伟, 男, 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汉唐文学。

① (清) 龚葆琛纂修: 《福州通贤龚氏支谱·行述》, 清光绪九年刻本, 第4页。

② (明) 龚用卿: 《云冈选稿》二十卷, 明万历三十五年龚耀刻本, 第1页。

③ (清) 纪昀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年, 卷177, 第1837页。

④ 郭皓政: 《从明中期状元诗文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 《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生活之雍容，山川之奇伟壮丽，渔夫、野林之闲适雅趣等，诗中所呈现出来的特征符合其馆阁文人的身份。

“馆阁体”作为一种文章体式名称，最早见于元初刘祁的《归潜志》卷十二《录崔立碑事》，指的是内容上以歌功颂德为主，作者身份属于郎官品级，文章形式、语言具有程式化和典雅等特征的诗歌体式<sup>①</sup>。由于馆阁文人所处地位比较特殊，其文章往往带有“馆阁气”，与一般文人的文章风格有别。

首先，从题材取向而言，龚用卿作为馆阁文人，一方面受社会环境及孔孟孝道仪礼之法的约束，对于高高在上的皇帝多怀敬畏之心；一方面又亲身体会到他国对大明王朝的推崇伏拜，心中不免产生身为天朝上国臣子的自豪感，如《送大行东玉高君奉使还朝序》<sup>②</sup>文中龚用卿自豪地宣称“天子威信之被远过有唐”，其言语虽有夸大之嫌，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龚用卿对明朝的自信。其诗歌作品无外乎朝廷大典、战事军功、庆赏贺寿、天象祥瑞等时政大事，以及馆阁陪侍出游、御制恭和入值等生活。此类题材诗歌具有浓厚的馆阁气。如《候驾谒陵》（其一）：“长安驰道接昌平，翠辇葳蕤出凤城。玉节金璋喧鼓吹，旄衣中使夹銜行。”（其二）：“百宝沉香金羽盖，珠帘玉几远游冠。山陵扈从罗千吏，门外高呼拥百官。”又如《早朝》：“严警动帝寝，芝火焰广除。祥飏入紫微，佳气护皇居。肃肃未央宫，赫赫承明庐。龙楼突兀起，凤阁左右舒。紫殿罗高馆，玉桥映清渠。……”诗中诸如“金”“玉”“凤”“紫”等具有皇家代表的字眼极多，内容主要为叙述圣朝景象或感主圣恩。馆阁气十足。

再有龚用卿是使臣，他在出使朝鲜过程中写下了大量诗篇，内容多为酬酢唱和及行旅游览诗，这些诗多被《皇华集》收入。他在李氏朝鲜所唱和的诗歌中亦多显示大国强盛的气息，雍容浑穆。例如《赐告归之常山喜述》：“壮年学宦近云霄，乞得闲身伴海樵。多病只因麋鹿皮，无才何补圣明朝。山林未省江湖虑，关塞犹闻羽檄遥。仕路风尘已如此，冥鸿远去不须招。”诗歌大意，大明朝天下太平，作者因眷恋山林，自觉留在官场已没有作为，所以只好选择离去。在龚用卿的笔下，大明朝似是昌盛无比的，如“海上何须觅蓬岛，万载皇明此山河”（《桂洲少师以应制纪胜诸咏见寄因忆辛卯秋》），又如“自惭凉薄质，无补圣明朝”（《玉田道中》），再如“皇威震夷夏，海内已晏清”（《送陈需斋给事高东玉大行使琉球》）等，而“山林未省江湖虑，关塞犹闻羽檄遥”正是他对一个昌盛王朝的阐述，类似的话语也出现在《赠朝鲜国王》一诗中，他夸朝鲜国“中林不复鸣鸿雁，在野无闻咏考盘”。《鸿雁》《考盘》都是诗经中的诗篇，龚用卿这里意指，朝鲜李朝政治昌明、百姓和乐，所以没有因政治黑暗而遁世的隐士，也无颠沛流离的游民。而这也正是其心中“太平盛世”的表现。对比龚用卿生活的晚明社会：政治腐败、东南有倭寇侵扰、北方有鞑靼攻袭、政治和经济出现深刻危机的社会背景，这些描写显得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这也显示出馆阁作家的不足。

龚用卿还写有不少生活杂感诗。如《塔湖看网鱼》：“拍肩三五小孩童，孱弱操舟疾似风。举网洪流随上下，得鱼沽酒是年丰。”诗人描绘了一幅灵动、和乐的孩童弄舟图，用“孩童”“洪流”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对比，将孩童的天真稚嫩而又敏捷勇敢衬托出来。“得鱼沽酒是年丰”显示的是一种生活的情趣，也是诗人心中的美好愿望，亦是其长期脱离劳动人民、生活无忧的馆阁作家之语。此类诗歌还有《夏日山亭观获》《瑶芳亭观打渔》《碧练亭观种田》等，诗歌所传递的不是作者参与田间劳作所抒发的感慨，而只是其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的体会，所以龚用卿笔下模仿陶渊明的一系列诗歌少有陶诗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淳。所谓《村居杂咏》《村居对月》之类的田园诗也只是地主人家的

① 徐伯鸿：《台阁体不能等同馆阁体辨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注：文中龚用卿所有作品均选自龚用卿：《云岗选稿》二十卷，明万历三十五年龚耀刻本。

富贵之语,形似而神非。

## 山林气与馆阁气相融合, 清丽淡雅——后期诗歌创作特征

龚用卿在嘉靖二十二年(1542),因弹劾严嵩被劾,听候调派。后以病乞归,于福州独山建别墅,疏池艺圃,遍植花草,日与知友觞咏其中。居乡二十多年,饮酒品茶、吟诗作画,闲散至极。这期间先后有人疏荐,均因有人“阴沮其进”作罢。他的辞官应该是一种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使龚用卿产生远离政治的心态,向往到田园山水中去涤荡心灵。这与之前的馆阁作家对政治的热情礼赞发生了转变,诗风亦趋清丽淡雅。

这期间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写景游览诗。诗中的内容,用“花鸟林渔、山水云楼”八字或可概括大半。诗歌所作地点多在福州。古城福州,以“三山”为标志,“三山现、三山藏、三山看不见”流传甚广,以城中屏山、于山和乌山最为出名。龚用卿将自己对闽地山水的喜爱之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在诗句中。今《鼓山志》《乌石山志》《于山志》保留了不少龚用卿的题咏之作。如他曾在春风送暖、柳色嫩黄的初春时节驻足亭间,饶有兴趣地观看农民种田,倾听“满田儿女唱田歌”(《碧练亭观种田》);曾在越王山上乘凉,“闲与山僧坐论禅”(《越山上乘凉》);亦曾登高望远,“独立秋崖听晚蝉”(《登乌石山偶成》);还曾在星辉下,泛舟台江“开廉对月”,直到“江上渔翁罢钓时”(《台江舟中对月》)。诗风雍容雅致,有“王、孟”之风。这既与其馆阁体的风格相符,同时又有了新的变化。诗人偏向于描摹景物,寄托闲淡心情。此类诗歌反映了龚用卿诗歌向茶陵诗派诗风转变的过程。诗歌中多文人情趣的挥洒,少馆阁体的偏枯与局促,具体体现在创作的生活化、文人化以及抒情化。

龚用卿的绝句风格清幽淡雅,带有较浓的山林田园气息。《云岗选稿》共收录221首绝句,其中山水田园诗是其诗歌艺术成就最佳的一部分。

龚用卿的五绝清幽雅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过剑水》:“径路微如线,松风鼓水纹。轻舆三十里,动破岭头云。”仿佛一幅会动的摹景水墨画,让人不觉融入其清幽的意境里。又如《发开城道中》:“绿水临长壑,春风吹白茅。溪边一石塔,上有鹤来巢。”用语洗炼自然,造景清雅,让人读之如入其境,作者心中的那份闲情雅致,亦随之浮现于笔端。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他的六言绝句中,如《崇安道中》:“轻烟篱落灯火,旭日草屋鸡豚。数尺门临流水,一声犬吠山村。”寥寥几笔,便将山村的静谧生活和自然风光展现在读者眼前。此外,语句上的工整、对仗也是其六言绝句的一大特色。龚用卿的六言绝句是工整而谨严的,如两幅绝妙的对联,却极少雕琢修饰之痕。这与其深厚的八股文功底有关。

又如他的七言绝句《望海寺》:“海上石山山上寺,寺中惟有一山僧。自耕数亩荒田地,独守寒庐夜夜灯。”顶针叙事,平白直叙而意在写“山僧”的生活场景。“自耕数亩荒田地,独守寒庐夜夜灯”诗意孤清而富有禅意。此诗被钱谦益《列朝诗集》收录。再如《题画》:“独向江头坐钓矶,浮岚空翠点春衣。临流回首看归鸟,高树无风山叶飞。”这首诗是题画诗,然作者却独具匠心地选取画中最有动感和韵味的几种景物:“渔夫”“浮岚”“归鸟”“高树”,按照由近及远、由远及近的方式一一道来,使其对画中的景物叙述显得井然有序,而作者鉴赏画作的功力也凸显无遗。《独步庭中偶成》“茂树庭前长绿荫,芭蕉抽叶已成林。道人终日无余事,独立花间听鸟音。”将其百无聊赖、闲散之极的生活状态描绘出来。这些人人可见、平常普通之景物,经龚用卿的提炼,即变得灵动而或清幽,或淡雅。

此外,龚用卿虽因弹劾严嵩被劾,及“阴沮其进”而辞官居乡二十多年,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出现感时愤俗或者啼饥号寒的诗作,而是保持着和平温厚的心态。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抒写清幽雅致

的生活景致，抒发恬淡悠然的情思，为馆阁体诗风带来新意。无论是前期的馆阁体，还是后期趋于茶陵诗派，龚用卿的诗歌仍带有浓厚的馆阁文学的痕迹。

龚用卿因馆阁作家身份使然受馆阁文学影响，其古体宗汉魏六朝诗，受陶谢等人的影响较大，这点龚用卿自己在诗中亦多次提到。如《读陶诗偶作》：“阅读古人作，吾爱陶渊明。冲淡近自然，语句出天成。”又如《题谢同年桐城归兴卷》：“陶谢青山句，羲皇白日眠。”谢灵运善用富艳精工的辞藻记叙游赏经历、描摹自然景物以及好谈“玄言”的风气在龚用卿身上也有体现。如“道人”形象经常出现在龚用卿的诗中。他在《游山》中说自己“髫年学道术，夙志负幽期”；《将至温陵道中》又说“但得探幽奇，玄理或可测”，显示出浓重的道家色彩。在《独步厅中偶成》一诗中，他更是以道人自喻，说自己“道人终日无余事，独立花间听鸟音”。这与明朝嘉靖帝迷信道教、爱好青词、重用善写青词者不无关系。

近体龚用卿崇尚唐诗，谢杰在《大司成云冈龚先生略集叙》中说龚用卿诗“大都步趋杜陵”<sup>①</sup>。例如其七言古诗《秋雨叹》：“村妇持筐撷野蔬，蔽形不掩罗裙襦。乱发蓬肩赤双脚，欲语不语声长吁。路傍问之吞声哭，只言家室愁均输。夫身系豕不得出，日食已晚未得补。归来无薪可供爨，羞向堂前问舅姑。君不见春间斗米值百钱，娇女为婢男为奴。”整首诗感情沉郁。作者以一个贫苦村妇的形象，饱含感情地为读者叙述了村妇一家之苦。前文极力铺叙农妇惨状，从整体到细节，镜头平稳地拉近，乱发蓬肩、赤双脚，使人不禁为其惨状动容。接着通过路人的询问，吞声呜咽的神态描写，将人的心弦扣得紧紧的。尾句道出这一系列惨状的根源，“君不见春间斗米值百钱，娇女为婢男为奴”读之尤觉骇人。当然这类诗歌作品极少，仅在其后期作品中偶然见之。特别是，龚用卿的五古诗多为描山摹水，彰显高洁之志。虽有“民劳亦以瘁，嗟哉天地高”（《闻东南大旱有感》）之风致，“昔时歌舞地，夜雨鸣寒虫”（《感遇杂兴》）之忧思，但也仅是凤毛麟角，很快便被“吾爱张留侯，富贵如脱履”之类的高风雅趣所湮没。并不如谢杰所说的，“大都步趋杜陵”。

在杜甫和李白之间，龚用卿更多的是向李白学习。如“阳和被江皋，已绿瀟洲草。”（《西园同蔡太常王光禄欧通政赏红梅分得草字》）化自李白“东风已绿瀟洲草”；他诗中瑰丽、奇险的幻境，如《题梅主事居庸关图》《送许士永郎中使浙》中把酒不羁的形象，无不透露出作者对李白这种飘逸人生的向往。正如他在诗中所期许的那样：“奇方出神仙，何不遇唐贤。色比咸阳美，人传斗十千。”所以，龚用卿七古诗中表现最多的依然是那份寄情山水的放浪与不羁，而非杜甫式的敦厚与沉郁。

综上所述，龚用卿诗歌受其馆阁作家身份影响，题材主要描写圣主贤臣之嘉谟雄烈，馆阁生活之典雅雍容，山川之奇伟壮丽，渔夫、野林之闲适雅趣，城阙楼阁之琼光夺目等，虽然后期诗作更多地将山林气与馆阁气相融合，多清幽雅致之作，然其诗歌精神内质无不宣示着作者的行文风格——大抵馆阁体也。

（责任编辑：林春香）

<sup>①</sup> （明）龚用卿：《云岗选稿》二十卷，万历三十五年龚耀刻本，第1页。



# 《九歌》异代有嗣响

——黄道周《九诉》析论

郑晨寅<sup>1</sup>，王照年<sup>2</sup>

(1.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漳州 363000；

2.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九诉》是明末大儒黄道周对《九歌》有意识的仿写，同时又有所创新，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对《楚辞》的喜爱、漳州民间信仰的文化氛围以及黄道周自身对彼岸世界的遐想，都对他仿《九歌》而创作《九诉》产生了影响。同时，黄道周的《九诉》亦体现了一定的政治寄托，这与闽学开创者朱熹《楚辞集注》中“忠君爱国”之寄托说的影响不无关系。在《九诉》中，诗人屡遭神灵离弃的结局，正是封建社会中贤士怀信侘傺、欲诉无门的境况之写照。

**关键词：**《九歌》；黄道周；《九诉》；民间信仰；政治寄托

屈原作有《九歌》《九章》，宋玉又有《九辨》，遂启后世文人以“九”名篇之风。其后乃有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及傅玄《九悯》、陆云《九愍》等，皆以九章成篇，其旨多为悼念屈子、感慨矢志。因其体制相类，主题相近，虽规模未大，却亦成为骚体赋的一种独有之格局，是为“九体”，可与大赋之“七体”相互辉映。

虽然同样以“九”标题，但细审“九体”诸篇，实更近于《九章》而非《九歌》。《九歌》源于楚国民间乐歌中之巫歌，王逸《楚辞章句》已备述之。《汉书·地理志》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篇》曰：“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九歌》虽经屈原改作，但仍属娱神之“巫音”。因此，在“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礼教背景下，在必须具备特定的民间信仰氛围的前提下，仿写《九歌》比仿写《九章》更为不易。笔者目力所及，真正仿拟《九歌》并取得成功的只有明末大儒黄道周所作之《九诉》。

## 一、《九诉》与黄道周拟骚之作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幼平、琦若等），人称石斋先生，福建漳州漳浦县铜山深井村（今属东山县）人。他少年立志苦读，博览群书；为官时直言敢谏，风骨凛然；明清易代之际受

---

**基金项目：**闽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闽南文化专项）“《黄漳浦集》点校与研究”（SS11001）；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黄道周对朱子学的发展研究”（FJ2015B070）。

**作者简介：**郑晨寅，男，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师教育系副教授、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兼职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儒学研究、黄道周研究。

王照年，男，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献学研究。

命于危难，率师抗清，兵败被俘，于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殉节于南京。其文章风骨高天下，与刘宗周并称为“明末两大儒”。黄道周有拟骚之作多篇，主要见载于清陈寿祺所编《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sup>①</sup>，其中卷三十六为“骚赋”卷，共收有拟骚、续骚之作九篇六十二章：《睿骚》（凡九章）、《续招魂》（凡三章：《号招》《广招》《礼魂》）、《续离骚》（凡二章）、《九绎》（凡十一章）、《九戾》（凡十一章）、《九诉》（凡九章）、《刘招》、《续天问》、《丛骚》（凡十五章），以及《闻雷赋》《梁山铎山赋》《洞庭赋》《平一赋》四篇赋作。上述诸篇共同构成黄道周规模宏大的拟骚作品系列，拙文已有论及，可参见。<sup>②</sup>

与黄道周《九绎》《九戾》之“九体”作品不同，《九诉》乃仿屈原《九歌》而作。《九歌》共十一篇，描写了九位神灵：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九诉》则为九篇，也描写了九位神灵：天帝、大司命、少司命、偃佺、山鬼、龙女、三尸、东华帝子、诺皋将军，最后以“乱”辞作结，可以看出黄道周对《九歌》有意识的仿写，同时又有所创新，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黄道周虽然并非以诗文名世，但实际上，他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其一向为人们所称道之书法。以下即拟按篇章顺序对《九诉》作一番评析，既可使人一窥《九歌》之流风余韵，亦可略见黄道周文采之一二。

## 二、《九诉》析义

### （一）《帝无臣》

“帝不恠兮轩鳞均，窳闾闾兮无人阍。班流兮生清慨，纫琪花兮不足佩。下徵荃兮蠹元圃，纫霞文兮縞为组。干焚轮兮叶以繻，曷不代兮兰荪。息衰鬻兮韬燿电，御紫宫兮开清宴。斥青皇兮讨朱明，荃谓尔兮不平。日暮暮兮跻龙宫，荃将棲兮博山。河汉凝兮长漫漫，窳不亲兮天之颜。言借翼兮飞世间，游不迥兮軫不还，哀余思兮涕潺潺。”

与《九歌》起首即描写祭祀“天之尊神”——东皇太一一样，《九诉》首章《帝无臣》亦以描写天帝开篇。据《淮南子·天文训》：“紫宫者，太一之居也。”故从“御紫宫兮开清宴”来看，此天帝当有至高之神格，亦即《九歌》之太一神。不同的是，《九歌》中东皇太一于“吉日兮辰良”受祭，故有“欣欣兮乐康”之场景；而此帝则甫出场即“不恠”，又有“斥青皇兮讨朱明”之举，“青皇”即青帝，为东方之神，“朱明”则为南方之神，用“斥”、用“讨”，可见天帝与下属臣民之不谐，这或许也是篇名“帝无臣”之意吧？取其中透露的君臣之际遇以观之：君王采琪花不足以佩，不良之政有如旋风（焚轮）卷叶，又不能代以兰荪，善政不得而行；而君臣之间言路不通，臣子刚追随至龙宫，国君（荃）又将棲于博山（传说中的海外仙山），臣子终究无法一亲天颜，借飞翼又不能远翔，最终只能涕泗潺潺。“河汉凝兮长漫漫”一句颇具象征意味，河汉即银河，为传说中分隔牛郎织女之所，《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云：“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处当借指君臣之间的鸿沟。如此则君臣不能相遇合，欲行仁政而不可得，恰如其《九绎·荃之赋》所叹“荃不知兮所亲，荃所亲兮匪予”，故有哀思绵绵，发为歌诗，上诉于天，这或许也是“九诉”之名的由来。诉者，下告于上也，然则黄道周作此组诗，实为借助《九歌》之格制，向诸神灵诉说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

应该说，由于《九诉》作于黄道周丁忧期间（23岁丧父），故不可避免会浸染着浓郁的身世之

① 陈寿祺编：《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清道光刊本。以下简称《黄漳浦集》。

② 郑晨寅：《论黄道周拟骚之作》，《中州学刊》2012年第2期。

悲;另一方面又如《续修四库总目提要》所言,包括《九诉》在内的《续离骚》七卷乃黄道周“感于屈子之失时、不遇、遭忧而作”<sup>①</sup>,蕴含着他怀才不遇的抑郁失志之情。当时已届明季,神宗皇帝昧于治国,勇于敛财,国家已深陷内忧外患之中。黄道周虽僻居闽海而心忧天下,据《黄漳浦集》卷首《年谱》记载,黄道周曾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七月“献时事策以干藩臬”,但“不用而去”;次年又欲上书大理寺,“不果”;万历三十四年(1606)再次上书福建当局,仍“不遇”,其一腔报国热情与所受之冷遇恰成鲜明对比;再加上万历帝“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的历史事实(《明史·神宗本纪》)，“帝无臣”之言实不为过。考虑到本诗的写作时间正是在这几次上书不成之后,则“帝无臣”应可视为全诗的背景与基调。

### (二)《大司命》

“肃窥宫兮寂不可方,中有人兮显类藏。擎玉衡兮颡以颡,不得执兮君惟常。君信巧兮阴与阳,双斗屣屣兮难为量。灰塵纷兮离九疆,清庭兮寂房。叫厦叫兮倏而荒,緝緝云兮高入墻。列虎豹兮齐以戕,焚木难兮斗神羊,矻不得近兮睽眦若盲。安得御兮揽故乡,舞七魂兮荃之旁,斩操蛇兮诛陆梁。君不可兮中逾伤,信存兮疑亡,惘徘徊兮飞安翔。”

从“君信巧兮阴与阳”“矻不得近兮睽眦若盲”来看,诗人对主宰人生死的大司命惑于虚伪反复之小人、从而疏远贤人的行为是很不满的;而其“焚木难兮斗神羊”之举更是不可理喻,“木难”乃宝珠名,《文选》有曹植《美女篇》:“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李善注引《南越志》:“木难,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也。”“神羊”即指能辨别邪佞的神兽獬豸,《述异记》载:“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由于善恶不分,诗人想申诉于大司命并无效果,欲斩操蛇、诛陆梁、从而清君侧当然更是不可得,最后只能“惘徘徊兮飞安翔”,不知所之了。

### (三)《少司命》

“与君游兮九嶷,君自尊兮予自卑。有言兮不尽辞,君飘飘兮曳绛旗。君须兮余后来,揽九州兮烦若思。终别绝兮交无时,恩不固兮怨终至。春辰兮为期,霜惨惨兮而在内,君屡辞兮非君为。誓不顾兮佻然逝,星摇摇兮日将出,草披披兮而在坠。与君兮结好,思所终兮捐其早,勉出涕兮为君道。”

在此,诗人言其与少司命一同遨游交好,然终究尊卑有别,言不尽辞,恩不固而怨终至,最终少司命亦佻然远逝,“君屡辞兮非君为”,其中或多有难言之隐;“勉出涕兮为君道”只能看作是诗人对着神灵飘逝的背影之喃喃自语。

### (四)《偃佺》

“交不夙兮情不素,哀相去兮欢相慕。欢相慕兮惠然顾,倏相并兮为余误。春风颼颼兮生蘼芜,华既实兮众英殊。言入出兮与君俱,君解衣兮降白露。逐间道兮不一遇,幽谿深兮多灵雨。天不高兮云欲下,君何为兮汉之渚。言思君兮不得去,夙何时兮君中坚,约薰芷兮同精专。握手兮交行,虽无言兮誓不捐,誓则捐兮变盐海。荡故宫兮及余罪,俯予美兮尼子车,天漫漫兮谁千载。”如果说以上三位神灵以及下文之“山鬼”乃源于《九歌》的话,那么自“偃佺”而下的其他几位神灵就明显属于不同的信仰体系,也正是这些神灵使《九诉》呈现出与《九歌》不同的风貌特征。偃佺为传说中的仙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偃佺之伦暴于南荣。”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注曰:“古仙人,姓偃。”旧题为刘向所撰之《列仙传》则记载:“偃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葛洪《抱朴子·释滞》云:“唐尧之有四海,可谓太平也,而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类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86页。

偃佺不佐焉。”诗人欲结好于偃佺，逐问道、涉溪渚，相约精诚一心，然最终亦失望以归。《诗·陈风·防有鹊巢》云：“谁侑予美？心焉惕惕。”“侑”者，欺诳也，“尼”或当为“柅”，塞于车轮下的制动之木，《易·姤》初六爻辞云：“系于金柅。”此处为遏止之意。因此，“侑予美兮尼子车”一句即表明因有小人进谗言加以阻挠，此约不成、此诉无望了。

#### (五)《山鬼》

“蹇木末兮降白羽，朝楚楚兮不得暮。揭车兮射干，縈为綦兮曷以餐。美人兮气若兰，云髻髻兮條而散。霍离余兮江之畔，既嘲余兮又微盼。余不信兮君之惠，款折柔桑兮杂碧草。将贻兮远道，莫授余兮云未老。江有滋兮生白沙，溯洄涧兮棲杂窠，窈冥冥兮奈若何。秋青兮夜紫，游蝮蛇兮横深水。君卜家兮余里，纷以箨兮縈茅茨。岁既暮兮风若其，君离余兮余不思。”

如上所述，偃佺为槐山之仙，这或许是接下来由山鬼出场的原因之一吧。与《九歌》中“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的山鬼相似，此山鬼的出场亦是明丽动人，她飞临于木末，伴随着白鸟，四周环绕着揭车、射干等香草，吐气如兰，令人神迷。但双方却不能相互信任，山鬼“既嘲余兮又微盼”，诗人则心存疑虑，“余不信兮君之惠”，最后只能是“君离余兮余不思”，分道扬镳了。

#### (六)《龙女》

“江有濶兮天益高，君叫怒兮生洄涛。日冥冥兮思君劳，君不来兮中胶胶。灵何方兮淼若逃，暮期君兮江上皋。来无期兮为君怒，羌知君兮不得敖。晞露兮中相綯，自有双虬兮焉得翱。追云车兮鸣天鼗，横银河兮曷容刁。君视余兮非所操，蹴岱华兮崩长壕，衔木石兮遏奔涛。与君异兮今已遥，欲从君兮从断鳌。中不任兮上诉，逢帝子兮方含怒，君顾余兮为谁故。”

龙女与山鬼同为女性神灵。龙女本是佛教中一个温婉伶俐的神灵，据《法华经·提婆达多品》载，龙女为二十诸天之一娑竭罗龙的女儿，八岁时偶听文殊在龙宫说法，幡然觉醒，以龙身成就佛道，后为观音菩萨右肋侍，协助观音教化众生。《太平御览》引《梁四公记》略云：梁武帝以烧燕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喜，以珍珠报之。岑参《龙女祠》诗云：“龙女何处来，来时乘风雨。祠堂青林下，宛宛如相语。”而“柳毅传书”中知恩图报的龙女更为人所熟知。但此篇则描写了一个手挟风雷、纵横天地的龙女，“蹴岱华兮崩长壕，衔木石兮遏奔涛”诸语，颠覆了龙女的传统形象。而诗人更适逢神灵盛怒之时：“君叫怒兮生洄涛”“来无期兮为君怒”“逢帝子兮方含怒”，故亦上诉无门。

要特别指出的是，闽地有一位地产神灵亦被人们称为“龙女”，即源于莆田湄州的妈祖。南宋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称：“神，莆田湄州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歿称道贤神女，或曰龙女也。”<sup>①</sup>南宋时，妈祖信仰由兴化传入闽南，被出入往来于波涛之间的闽南人视为保护神，“天妃妈祖”在闽南沿海一地可谓家喻户晓，泉州宋代已有妈祖庙，漳州可知最早的妈祖庙则建于元代，明清时更多。黄道周好友、龙溪举人张燮《东西洋考》中对妈祖信仰有较详细记载，中云：“（妈祖）长能坐席乱流而济，人呼神女，或曰龙女……常衣朱衣飞翻海上。”<sup>②</sup>而据说漳州现存最早的妈祖雕像乃由明代嘉靖探花林士章由湄州携至漳浦乌石奉祀。<sup>③</sup>故长居漳浦的黄道周笔下的“龙女”或许亦有妈祖的痕迹。

#### (七)《三尸》

“灵鼓集兮间清吹，纷娱人兮乐以萃。鱼何为兮水周，麋何为兮庭际，予何来兮前颞颥。春风平兮草葳蕤，郁黄庭兮开绛旗。寂浮磬兮奏元池，嫩百神兮舞参差，余携子兮将施施。予无家兮予所

① 转引自李露露：《妈祖信仰》，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② 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祭祀”，明万历刊本。

③ 段凌平：《漳台民间信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6页。

私,荃则仁兮以慈。予不创兮祸所归,众莫知兮予所为。白云生兮蒸蒸,水流兮磷磷,将高驼兮为帝陈。”

葛洪《抱朴子·微旨》云:“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可见“三尸”(或称“三尸神”)是道家所认知的在人体内作祟的神。《抱朴子·遐览》著录有《三尸集》一卷。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庚申部》有“三尸九虫”及其克制之法的详细记载。段成式《酉阳杂俎·玉格》则有“三尸一日三朝”的记载。一日三朝,亦可称“九诉”了,与诗人上诉于天有相通之处。而据《福建节庆习俗》载,民间传统习俗“扫尘”(也称“掸尘”,闽南语称为“清屯”)据说也与三尸神有关。<sup>①</sup>“元池”当即“玄池”,神话传说中池名,《穆天子传》卷二载:“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将高驼兮为帝陈”,“高驼”或当为“高驰”之误,《楚辞》中多有此语,如《离骚》:“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九章·涉江》:“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九歌·东君》:“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等等。本诗形象地描写了三尸神寄人体内、言人过恶的特点:“予无家兮予所私”“予不创兮祸所归,众莫知兮予所为”,体现了诗人对“三尸”的监督意识之肯定。

#### (八)《东华帝子》

“明霞冠兮芙蓉珮,予驭云兮为君盖。霓裳兮紫衣,予搴虹兮为君带。日生兮暘谷,照扶桑兮生华萼。碣石高兮临水深,晞余发兮为君沐。君赦予兮不肯庸,靡予马兮繫苍龙。纷所登兮尚以穹,从君左兮不及右。与君御兮交手,花骈骈兮日色耀,岁将暮兮与君遘。君交多兮不专,多贵游兮弃贫贱。雷阗阗兮交鼓,鸣玉兮杂土。予有言兮不得闻,朝暮伺兮见微氛。东风颺兮云从散,日御君兮不一见,从小昊兮非予善。予独处兮思离离,魂飘摇兮为君旗,日向昏兮中心悲。”

“帝子”即帝王之子,则东华帝子当为道教仙人东华帝君之子(在闽南、台湾等地民间至今仍有东华帝君信仰,其诞辰为二月初六);据“从小昊兮非予善”句,又或与东帝太皞(太昊)伏羲氏有关,待考。诗人认为其交友不专、嫌贫爱贵:“君交多兮不专,多贵游兮弃贫贱”,因此上诉亦不能闻:“予有言兮不得闻”,故只能“独处”而“日向昏兮中心悲”。

#### (九)《诺皋将军》

“伏氐轮兮石上云,下辮以金鬻气龙群。予所宫兮中为君,藉芊眠兮闾元垠。君不悻兮予急急,予跳号兮君则不闻。闾闾开兮帝宥宥,洒银河兮滌众慝。百灵登兮珮缤纷,拥长剑兮搏霞文。升所知兮上帝欣,安得荃兮结君勤。下泰华兮搴萑芸,酌太阴兮御清氛,哀下人兮筮予魂。与君处兮晨以昏,渺不知兮君恩。”

诺皋为道教之太阴神,葛洪《抱朴子·登涉》记载了一段咒语,咒曰:“诺皋,太阴将军,独开曾孙王甲,勿开外人;使人见甲者,以为束薪;不见甲者,以为非人。”诗中亦有“酌太阴兮御清氛”之语,表明其神职。《淮南子·天文训》又云:“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多。”开始时诺皋将军亦“不悻”,诗人虽跳号不已,其诉仍不为所闻;后虽亦有哀筮筮魂之举,但君恩渺茫,终不可知。

#### (十)乱曰

“天门以幽不可方,声高以邈神哉襄,神哉蹇蹇霓杂纒。矫予美好不得扬,持人以怒中齟严,望而不跻何踟蹰。修絜以诚冀有明,晋矣不征谁为臧,东风离离余将行。”

《九歌》末了以《礼魂》作结,而《九诉》以“乱”辞收束。在经历了“九诉”之后,诗人发现天门幽远难致,下界声音难以上达,最终只能“修絜以诚冀有明”,坚持自身的高尚纯洁,希望神

<sup>①</sup> 福建省文明办编:《福建节庆习俗》,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9-10页。

明终有一天能发现自己的美好，于是借东风而远行，整个上诉也就此戛然而止了。

《九诉》意境之恍惚，造语之奇崛，都给文本的阅读制造了不少困难，笔者只能是强作解人，惟愿以上浅析能对今后更加深入地解读黄道周辞赋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三、《九诉》的思想艺术特色

#### (一)《九诉》对《九歌》(《楚辞》)的模仿与借鉴

黄道周从小喜爱屈原与楚辞，他的生平与屈原亦有诸多共鸣之处，并对屈原的作品作了全面的仿写、续写，其中《九诉》是对《九歌》的仿写，《九诉》中有《大司命》《少司命》《山鬼》，再加上《帝无臣》之“帝”，共有四位神灵与《九歌》相同。

在句式上，《九诉》亦仿《九歌》，多以“○○○兮○○○”为主的二分节奏；在语言上，亦多借用《九歌》及《楚辞》中其他篇章的词汇，如“惘徘徊兮飞安翔”(《大司命》)与“高飞兮安翔”(《九歌·大司命》)、“言入出兮与君俱，君解衣兮降白露”(《偃佺》)与“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九歌·少司命》)、“众莫知兮予所为”(《三尸》)“与众莫知兮余所为”(《九歌·大司命》)、“晞余发兮为君沐”(《东华帝子》)与“晞女发兮阳之河”(《九歌·少司命》)等等。

在此又以《九诉·山鬼》为例，即有：木末(《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冥冥(《九歌·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蝮蛇(《楚辞·招魂》：“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美人(《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揭车(《离骚》：“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射干(《九叹》：“掘荃葳与射干兮，耘藜藿与蓂荷”)、远道(《哀时命》：“骋骐驎于中庭兮，焉能极夫远道”)等等。末句“岁既暮兮风若其，君离余兮余不思”则反用《九歌·山鬼》之“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其意，变“思”为“不思”；而其凄清之境、哀婉之情亦与《九歌·山鬼》有相似之处。

在对不同对象的描写上，《九诉》也大多能因“神”而异，塑造出独特的“这一个”，诸如幽处深谿的偃佺、吐气如兰的山鬼、断鳌立极的龙女等等，无不各具面目，而这也是对《九歌》描写手法较为成功的借鉴。

在叙述角度上，由于《九歌》是祭歌、巫歌，表演者既要模拟、表现神灵的情态举止，又要代民众娱神祈福，其叙述角度就难免多样化，故朱熹《楚辞辨证》云：“《九歌》诸篇，宾主、彼我之间最为难辨。”<sup>①</sup>《九诉》也有类似叙述角度的变化，如《偃佺》中的“言思君兮不得去，夙何时兮君中坚……荡故宫兮及余罪，俯予美兮尼子车”，数句之中就出现了“君”“余”“予”“子”四个人称词；《三尸》中则更有予、余、子、荃、帝、百神等诸多角色，应该说这亦是模仿《九歌》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但由于《九诉》是以“诉神”为核心的，因此，其叙述角度无论如何变化，都是紧密围绕着诗人向神申诉这一点不变的，这与《九歌》的“迎神——降神——送神”的大体结构自然不尽相同。

#### (二)《九诉》的民间信仰内涵

《九歌》营造了一个瑰丽奇伟的神话世界，体现了浓郁的楚文化特色，《隋书·地理志》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而闽南地区自古受楚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影响，《漳州府志·风俗》(万历癸酉本)云漳州“俗尚淫祀，互作淫戏”，从一个侧面

<sup>①</sup>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9册《楚辞集注》，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7页。

可看出漳州民间崇拜神灵的盛况,上述龙女、东华帝子等可见之。又如《三尸》中“灵鼓集兮间清吹,纷娱人兮乐以萃。鱼何为兮水周,麋何为兮庭际,予何来兮前颞颥。春风平兮草葳蕤,郁黄庭兮开绛旗。寂浮磬兮奏元池,嫩百神兮舞参差”之描述,或可视为当时民间祭祀场景的再现;而漳州诸多民间信仰、民间乐舞仍延续至今,如“漳州傩舞(浦南古傩)”“保生大帝信俗”等已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

从黄道周本身的思想来看,他早年深受道家影响,据《黄漳浦集》卷首《年谱》记载,从八岁起的数年间,黄道周“自经传子籍,旁及诗赋声律,铅汞阴阳之学,无不耽精玄览焉”;十四岁时“喜谈黄白术,有弃家腾举意”,并曾至广东罗浮山一带寻仙访道;一直到崇祯四年(1631)为京官时仍有炼丹出世之念头。其中,道教大师葛洪对他的影响最为巨大。黄道周至罗浮山寻仙访道之举与葛洪晚年入罗浮山炼丹终生之事迹(参见《晋书·葛洪传》)是分不开的;从上文对《僊伶》《三尸》《诺皋将军》等篇章的分析可见出,黄道周对道家的典籍、特别是葛洪的《抱朴子》有着深入的研阅,而《抱朴子》之“黄白”“金丹”诸章或许正是黄道周铅汞阴阳之学之所本。同时,佛家思想对他也产生过一定影响,据其《答曾叔祁书》云:“周之少也,溺于骚雅;比其稍长,溢于老释。”(《黄漳浦集》卷十八)反映在《九诉》中,就出现了诸如僊伶、龙女、三尸、东华帝子、诺皋将军这样为道教、佛教所信奉的神灵。可以说,对《楚辞》的喜爱、漳州民间信仰的文化氛围以及黄道周自身对彼岸世界的遐想,这些都对他仿《九歌》而创作《九诉》产生了影响。

### (三)《九诉》的政治寄托

但写神实是为了写人,正如学者所言:“《九歌》尽管是以神话为背景,描写神生活故事的作品,然而却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展示了屈原对于生活、对祖国、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品质的赞颂。”<sup>①</sup>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闽学开创者朱熹的思想对黄道周之影响。黄道周七岁即熟读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其后更是学宗考亭,成为明末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学者称之为“比较倾向于朱子学格物论的独立思想家”<sup>②</sup>。朱熹毕生致力于儒家经典阐释;儒学著作之外,则于《楚辞集注》用力最勤,其中尤对屈原“忠君爱国”之寄托给予大力揭扬。朱熹认为《九歌》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见其恳切之意”。<sup>③</sup>朱熹对《楚辞》及《九歌》的看法不能不对追慕屈骚的黄道周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黄道周作《九诉》并非是对《九歌》形式上的简单模仿,亦是别有寄托。作为一名秉持忠孝之道、爱国忧民的士人,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主张能上达天听、一展怀抱,可是君主专制体制与“帝无臣”之现状使得他只能借鬼神而抒忧愤。因此,与本身具有娱神祈福功用的《九歌》相比,黄道周的《九诉》更体现了一定的政治寄托;在诗中,诗人屡遭神灵离弃的结局,正是封建社会中贤士怀信侘傺、欲诉无门的境况之写照。司马迁说屈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列传》)、朱熹认为《九歌》“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sup>④</sup>,此言用于黄道周《九诉》也是适合的。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 汤漳平:《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② 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44页。

③④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9册《楚辞集注》,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46页。

# 横槊论兵亦壮哉，海天形胜谈笑来

——张际亮与金门奇人林树梅的倡酬述论

陈 茗

(厦门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 要:** 张际亮和林树梅都是道光时期关心时事的诗人, 都有远大的济世之志。道光年间, 他们在八九年交往中, 多有诗文唱酬。他们都心系沿海的防守与国家的安危。林树梅是不多见的在危难之中从军的文士, 而同为诗人的张际亮, 则靠他的笔, 靠他的声音呼喊于世。张际亮和林树梅的交往倡酬, 是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的一段历史。

**关键词:** 近代文学; 台湾文学; 鸦片战争; 张际亮; 林树梅

张际亮(1799-1843), 榜名亨辅, 字亨甫, 自号松寥山人、华胥大夫, 福建建宁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 近代著名诗人。有《松寥山人诗集》《思伯子堂诗集》《娄光堂稿》。张际亮与林树梅的交往倡酬, 各种研究论著都暂付阙如, 未加注意。在张际亮的一生中, 这段交往还是比较重要的, 有必要进行探讨和研究。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张际亮十八岁, 首应乡试, 至道光十四年(1834), 张际亮已应乡试九次, 均报罢。道光十五年(1835), 开考恩科, 闰六月, 张际亮从江苏来福州。八月乡试, 九月揭晓, 以易名亨辅中举。也就是在这一年的闰六月, 林树梅会晤了张际亮。张际亮有诗记载他们的会面。《谢孝知兄弟招饮席间喜晤林大瘦云因有此作》二首:

横槊论兵亦壮哉, 海天形胜谈笑来。波涛日夜双帆楫, 今古风云一酒杯。指掌分时见金厦, 回头飞渡失澎台。嗟余短剑方无用, 为汝高歌斫地哀。

少年曾多国士知, 廿年空负九年期。江山夕照谁家笛, 关塞秋风此鬓丝。岂有罪言痛河北, 不无望赋感天涯。青樽红烛双行泪, 话到封侯传自悲。<sup>①</sup>

林树梅(1808-1851), 字实夫, 号啸云, 又号瘦云, 同安县浯江(今金门县)人。树梅出生在水师家庭, 从小随父出没风涛, 长在军旅之中, 还曾远渡台湾。林树梅诗古文俱佳, 鸦片战争爆发, 慷慨从军。厦门战事失利之后, 林则徐招其入幕, 称其为“国士”“南金”, 并与之倡酬。著有《啸云诗文集》等。林树梅与张际亮会面缘于谢金銮之子孝知兄弟的招饮, 他俩都是谢家之客, 故得以在席间认识。谢金銮(1757-1820), 字巨廷, 又字退谷, 晚改名颢, 侯官(今福州)人。乾隆五十三年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FJ2015B166)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陈 茗, 女, 文学博士, 厦门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sup>①</sup> 原诗注云:“时六亭先生女婿官孝廉在座。忆戊寅夏秋间, 先生无事, 尝与余登鼓山望海, 因备言吾闽形胜。”见张际亮:《思伯子堂诗文集》, 卷二十二, 玉颢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第867页。



(1788) 举人，曾任台湾嘉义教谕，著有《二勿斋文集》《教谕论》《蛤仔难纪略》。在座的还有郑兼才女婿官孝康。兼才，号六亭，福建德化人，曾任台湾教谕。由于孝知父金銮和官孝廉的岳丈都是宦台名教谕，林树梅数年前又随父驻守台湾前后达三年之久，席间的谈论自然离不开台湾的话题。张际亮诗第一首，横槊论兵、谈笑海天形胜，出入波涛，所咏对象为树梅无疑。诗末，有赞赏并羡慕之意。第二首，表面上看，似抒写自己从十八岁赴乡试，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年，报考了九次，九次失利的悲哀。但是结尾归之于“封侯”，并加注忆当年“备言吾闽形势”，仍然可以看出，宴集者对时局的高度关注。

闰六月廿四，张际亮与林树梅再次相聚，地点是福州西湖宛在堂。宛在堂是清代诗人雅集的重要场所。张际亮有《闰六月廿四日偕梅友孝知孝至卓人炯甫瘦云薰卿宴集小西湖宛在堂口号绝句四首》<sup>①</sup>。席中孝知、孝至，为谢金銮之子；刘存仁（1805—1880），字炯甫，又字念莪，晚号遽园，闽县（今福州）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有《岷云楼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十四卷、《诗余》一卷。翁时稚，字蕙卿，侯官（今福州）人，贡生，有《金粟如来诗龕集》。张际亮的绝句四首，其二云：“来时惯爱寺门前，岚霭分风水独烟。松气自明将夕景，荷花最好欲风天。”颇能状福州小西湖夏末的夕景。除此首外，其余三首所咏“廿载湖田屡废兴”，“艇子沉沙对断垣”，“花事如人奈老何”，则透露其第十次乡试前的怫郁情感。这四首诗，虽然没有直接写到林树梅，但仍然可以看到他们会面时的一些情况。

道光九年（1829）十一月，林树梅自福州冒雪往游太姥山。太姥山在福鼎，亦临海。林树梅一生短暂，大多时间活动于闽海港汉岸口，而闽东北的太姥山则是他游履所至的少数名山之一。太姥归来之后，林树梅作《游太姥山记》、绘《太姥山图》，又作《自题〈游太姥山图〉》二首等。道光十三年林树梅自刻《游太姥山图咏》<sup>②</sup>。林树梅在福州会晤张际亮，讲述游太姥之事，并出示所绘之《太姥山图》。道光十五年（1835）七、八月间，张际亮作《林瘦云游太姥山图》：

东卧岱宗云，南听罗浮雨。北踏太行雪，或醉嵩洛野。平生惯浪迹，万里若庭户。长剑气摩天，短衣倒跨马。忽忽时归来，江山在笔下。林君颇好奇，为我述太姥。丘壑归胸中，纸上无寸土。想见招大风，长啸百灵舞。容成骨朽尽，方朔为漫语。安用写岚翠，此意好终古。君尝帆沧溟，蓬阅了可睹。神鱼衔赤日，夜挂珊瑚树。中有李白魂，骑鲸去何所？吾欲一问之，乾坤谢游侶<sup>③</sup>。

张际亮一向被人视为“狂士”<sup>④</sup>，而林树梅则生性则以“负奇”<sup>⑤</sup>称。林树梅随父亲驻守福州闽安镇，有人淘井得铁笛，归于树梅。林树梅嗜之如命，随时带在身边，“携登太姥摩霄峰，峰头高响冻云裂”<sup>⑥</sup>。在太姥山头吹铁笛，响彻云霄，在土林中一时传为美谈。“狂士”遇见奇人，张际亮对林树梅游太姥山又作诗又绘图，大加赞赏，实在情理之中。这一年，张际亮与林树梅会面的情况大致如此。林树梅当亦有诗赠张氏，可惜今已不存。《游太姥山图咏》刻于会面前两三年，张氏既为题诗，林树梅当赠之以所刻之书。

道光二十年（1840），英夷滋扰闽粤沿海。这年秋天，林树梅在闽北邵武。闽浙总督邓廷楨闻树梅有奇才，囑按察使常大淳、盐法道文康作书招之。树梅应招，从邵武赶到厦门，毅然从军。树梅在军中，为军队勘察地形，寻找泉源，修筑工事，献策献计。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天，林树梅在

①③ 张际亮：《思伯子堂诗文集》，卷二十二，王颀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69、872页。

② 该书第10页有“闽泉同安浯岛林树梅瘦云氏撰”13字。

④ 详《清史稿·张际亮传》《清史列传·张际亮传》等。

⑤ 高澍然：《啸云诗钞稿序》，《啸云诗钞初编》，卷首，道光本。

⑥ 林树梅：《铁笛·啸云诗钞初编》，卷一，道光本。

厦门白鹿洞训练乡勇。三月，张际亮再次接到时任台湾道的友人姚莹的邀请函，拟赴台入其幕，到厦门准备东渡台湾。林树梅邀请张际亮游厦门名胜白鹿洞，此时，张际亮作《厦门白鹿洞观海二首》《瘦云于三月望日携姬人观海登白鹿洞绘图属题时君奉当事聘练乡兵于此》。前题二首云：

一气遥连四大州，谁横铁索截中流？只如唐宋愁戎马<sup>①</sup>，不数燕齐斗火牛<sup>②</sup>。勇忆乘槎难泛宅，醉思请剑尚登楼。天风海日苍茫里，试问扶桑几度秋？

两岛能支半壁天，草鸡长耳忆当年。伍胥潮汐仍终古，杨仆楼船自黯然。云出鲲身横岛外，水浮鼉极动尊前。登临足有兴亡感，鲸饮须同吸百川。<sup>③</sup>

此题，《张亨甫全集》作《至厦门瘦云招同白鹿洞观海遂留饮感怀》。“两岛”，指厦门岛和金门岛。林树梅是金门人，论海防，以为厦、金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防护，郑成功当年抗清，就是以金、厦为据点，金、厦可互为犄角，故张际亮诗亦提到这些事。林树梅熟悉台湾、澎湖的形胜，认为“澎、台为全闽安危所系”<sup>④</sup>，张际亮也将赴台入姚莹幕，故有“云出鲲身”“水浮鼉极”之句。明中叶之前，国家的安危在陆地，在西北；明中叶之后直至清代，国家的安危在在海上，在东南。张际亮和林树梅一样，心系东南沿海的防守，心系国家的安危。次题云：

江海论兵日，英雄望古悲。谁同谢太傅，世屏傅修期。吾子贫怀策，群公幸见知。清笳吹洞裂，骏马踏春嘶。暂佐筹边幕，应麾下濊旗。风潮通一笑，山色在双眉。剑气横钗影，花光照玉姿。水天无尽处，人月共圆时。磊落追豪士，凭陵肆岛夷。金门接烽火<sup>⑤</sup>，父老愧嗟咨。<sup>⑥</sup>

虎溪岩、白鹿洞是扼守厦门的要地之一，林树梅《上总督颜公补陈战守八策》（作于是年二月）曾经论及：“树梅尝请提督陈公分一军驻麻灶埔，离厦城十里，为应援营，而练乡勇，设伏虎溪岩、白鹿洞、半山塘三处，分扼厦城左臂要冲，且密迩寨子山顶，便于四顾，亦与沿岸防军声势联络。”<sup>⑦</sup>出于攻防的需要，林树梅绘事先已经绘有《白鹿洞图》，恰好此时张际亮来到厦门，故请求张际亮题诗于《白鹿洞图》上。张际亮感到欣慰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决策诸公终于懂得起用林树梅，委其以比较重要的责任。张际亮相信林树梅肯定能够擎旗斩将，建功立业于海疆。这一天，林树梅携继室李氏同游，剑气钗影，英雄美人，加以山光海色，在硝烟弥漫的间隙，平添一道美丽的风景。张际亮最后说，林树梅身在厦门，仍然牵挂着家乡金门，时时不忘金门父老乡亲的安危。

张际亮以风涛阻隔，未能渡海前往台湾。这一年五月，张际亮离开厦门。七月十九日，在铁岭，林树梅又与张际亮会面，出画扇请他题诗。张际亮遂作《题瘦云画扇》一诗：

绝好吟诗作画人，无端瘴海冒烽烟。鹭门望断迟消息，为汝连朝独怆神。<sup>⑧</sup>

这首诗的大意是，七月初，英军登岛，厦门失守，林树梅当时在也军中，张际亮心甚念之。诗中“迟”，是等待、期盼的意思。在烽烟中，“连朝独怆神”，焦急地等着林树梅的消息。直到十九日，终于见到了林树梅，他悬在半空的心才终于放下。此时，张际亮想起道光十五年（1835）在福州与林树梅见面和别后诸事，有感而作《见怀诗》，诗云：

轻财好客贫难继，讲武从戎壮可豪。莫负人间老周处，诗名万古一秋毫。<sup>⑨</sup>

“轻财好客”“讲武从戎”，颇能状林树梅的性格特点。张际亮勉励林树梅学周处，以为人生在世首要

① 注云：前代边患多在西北，至明中叶东南夷患始烈，亦天地自然气数也。

② 注云：逆夷火器最利。

③⑥⑧ 张际亮：《思伯子堂诗文集》，卷二十九，王颀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8、1129、1161页。

④ 林策勋：《从伯祖啸云公传》，浯江林氏家录，家印本，1955。

⑤ 诗注云：君家在金门。

⑦ 林树梅：《啸云文钞初编》，卷十二，道光本。

⑨ 林树梅：《啸云诗钞初编》，见《怀人绝句，其二自注引》，卷六，道光本。

是建功立业，诗名并不重要。经事济世，也正是林树梅所为之努力的。林树梅寄以《怀人绝句》其二：

寄声勉我学周处，把卷因君怀谢公。一代雄才真杰出，倚楼高唱大江东。<sup>①</sup>

“因君怀谢公”句，即《瘦云于三月望日携姬人观海登白鹿洞绘图属题》“谁同谢太傅”。林树梅回想起前两次交往，以及张际亮的两次赠诗，不禁称赞张际亮为“一代雄才”，不禁想起他依楼高唱大江东去的豪迈气概。在抗击英夷的战争中，张际亮之前的赠诗，无疑是对林树梅自己的一种鼓劲。

厦门分别之后，张际亮辗转于浙东，历尽艰辛，九死一生。道光二十三年（1843），台湾道观察姚莹遭诬陷，被解入京，过淮上，张际亮一路上一直陪着他上京城。同年九月，姚莹获释，张际亮却劳苦得病，最终卒于京城。林树梅获知张际亮病故的消息，伤心万分，作《哭张孝廉亨甫》二首：

天既生吾子，多才不与年。惜为名士误，还有好诗传。返骨金台下，伤心碧海边。诸孤方幼弱，何日卜新阡。

往岁高歌处，遗踪得再寻。<sup>②</sup>直倾三副泪，未厌百回吟。设位重呼酒，临风欲醉琴。白来悲壮语，最是感人深。<sup>③</sup>

第一首，林树梅重游厦门白鹿洞，追寻前年自己与张际亮的游踪，看到张际亮留于壁间之诗，反复吟诵，洒洒祭奠；又想到张氏诸孤，年方幼弱，泪下如霰，悲痛不已。林树梅非常看重与张际亮白鹿洞的会面，《重游虎溪岩白鹿洞志感四首》其三亦云：“题壁山灵护，重吟思邈然。”自注：“辛丑闰三月，张亨甫孝廉过访，留句犹存壁间。”留壁间诗，即张际亮《厦门白鹿洞观海二首》。

张际亮和林树梅，一个出生在闽西北的山区，一个出生在闽东南的海岛，他们都是鸦片战争时期具有崇高爱国情操的诗人。如果从道光十五年（1835）在福州的开始会晤算起，林树梅与张际亮的交往时间最多也就是八九年的光景而已，而重要的会面也不过两次。一次在福州，一次在厦门。福州会面，张际亮正好在第十次乡试前后，心情复杂。厦门那一次，与英军开战前夕，战局吃紧，林树梅适在军中，张际亮有渡台的打算。林树梅和张际亮都是关心时事的诗人，一个是“狂生”，一个是奇士，相见恨晚。他们都有远大的济世之志，但历史并没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舞台。危难之中，当事诸公突然想起林树梅，实有病疾而不得不投医的尴尬；诸公偶然也会听一点林树梅的意见，如训练乡勇、寻水源掘井之类，但在全局攻防的构筑，运筹帷幄制定策略、战术，林树梅离作战中枢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林树梅毕竟还是厦门战事中实际参与防守的战士，是不多见的在危难之中从军的文士。比起林树梅，同为诗人的张际亮，他的诗文的影响要大得多了，但是，他一直到过世，也只能靠他的笔，靠他的声音呼喊于世。张际亮卒时仅仅四十五岁，而与林则徐相约于军前的林树梅，却连四十五岁也不到，四十四岁便郁郁而终。文人际遇如此，每读张际亮和林树梅诗文，不能不让人扼腕痛惜。

张际亮是近代著名诗人之一，研究论著已经不少；林树梅是闽台都很关心的近代名人。张际亮和林树梅的交往，似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以上论述，或可补张际亮研究的不足，亦可窥探出生于海岛的林树梅与内陆诗人交往的一斑。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 林树梅：《啸云诗钞初编》，卷六，道光本。

② 注云：辛丑闰月，亨甫过访，留诗白鹿洞壁。

③ 林树梅：《啸云诗钞初编》，卷七，道光本。

# 浯江林豪首渡台湾诗文及行止探究

宁国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清末金门诗人林豪首渡台湾, 停留头尾七年, 可说是林豪一生的转折点。尤其林豪在艋舺巧遇办理困练兼诗友林的林占梅, 受邀寓居潜园, 改善了生活上的压力。而凭着林占梅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及影响力, 林豪才能着手撰着《东瀛纪事》及编修《东瀛纪事》, 也影响林豪未来一生在台湾文坛及史学中的地位。林豪在台湾的诗作, 共留下台阳草上100首、台阳草下98首, 记述着他在台的行止, 同时也记录着清代台湾社会生活的实景。

**关键词:** 浯江诗人; 林豪; 游历台湾; 诗人创作

## 一、前言

林豪, 本名杰, 字嘉卓, 一字卓人, 官章豪, 号次通, 福建金门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十九日巳时, 卒于民国七年(1918年)五月十三日卯时, 享寿八十八岁。是清金门岁贡生林焜熿之子。

林豪一生著述极丰, 以“浯江诗人”自居。杨云萍在所著的《台湾史上的人物》一书中, 尝谓: “宦游来台的大陆人士, 每有关台湾的著述, 只是若以著述的数量论, 林豪当被推为第一, 至少他是数量最多的一位。”<sup>①</sup>, 并将林豪列为120位台湾史上的人物之一。

在林豪的诗文人生中, 若以居地及年龄而论, 可分为几个重要阶段:

### (一) 求学、考试

二十九岁前。这段期间, 十五六岁赴厦门求学五年、十九岁己酉补弟子员、二十九岁己未恩科乡试成为举人, 也经常往来于闽省与金厦间。

### (二) 东渡台湾

三十二岁至三十八岁, 游历台湾北中南各处, 遇挚友, 居潜园, 撰着《东瀛纪事》, 编纂《淡水厅志》, 在台并留台阳草上下古今体诗198首。这段期间可说林豪的转折点。莫下日后三度澎湖之行, 成为文石书院山长。

### (三) 澎湖行作育英才

三十八岁至六十四岁, 林豪三任澎湖文石书院山长。第一次担任文石书院山长(39岁-40岁)在同治八年至九年。第二次担任文石书院山长(48岁-52岁)在光绪四年至八年。第三次任文石书

**作者简介:** 宁国平, 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sup>①</sup> 杨云萍:《台湾历史上的人物》,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1年, 第220页。

院山长（62岁-64岁）在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sup>①</sup>。

在澎湖这几段约计十年期间，林豪身为书院山长，除了作育英才外，并编纂《澎湖厅志》，写下澎湖草古今体诗九十七首。

#### （四）榕城行与赴京会试

二十九岁己未恩科乡试成为举人，次年（三十岁）至六十岁，共七次公交车北上。林豪中举人之后，据其自述七次赴京会试，虽不幸落榜，但在赴京途中，或会友，或游历山水，或拜访旧友故人居地，或闹中诗作等，均留下纪行诗，共176首。

#### （五）下南洋游新加坡

光绪三十三年，林豪七十七岁，携孙南游新加坡。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七日，林豪告别星加坡亲友，坐轮船归乡。四月十六日，轮船入厦门港，返回故里金门。林豪赴新加坡，除了负有劝捐之任务外，对他而言，可说既新奇又兴奋，也留下南游草古今体诗八十二首。

#### （六）小巢居金门，读史吟诗纂修《金门志》

林豪的一生，除了在厦门求学五年、东渡台湾七年、澎湖行十年及参加乡试、会试，大部分人生，都居住于金门后浦东门的小巢居——林家花园。在这段漫长的时间，读史，准备会试，参与地方事务，编修《金门志》，撰述《淡水厅志订谬》，为金门地方史作了很大的贡献。林豪在金诗作有404首。

#### （七）从事社福公益，编订一生诗集录

林豪在金门期间，不只读史吟诗及编书撰文，亦从事社福公益事业，如协助浯岛城隍庙翻盖、议建节孝祠敬重节妇、营办育婴堂救护女婴、上陈当道兴革除弊、倡议集资兴建同安渡头便桥等。最重要的是在其人生最末段几年，开始着手删订其诗作，将原先生平所作，约三千首以上，多选有关风化、史乘及纪游、乡居之作，视为可存者，编订十二卷<sup>②</sup>，辑成《诵清堂诗集》，计有1018首。

本文主要探讨林豪离乡背井，首次东渡台湾七年的行止及其诗文，这个阶段可说是林豪人生的转折点。林豪初到台湾，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因缘际会，巧遇诗友兼挚友竹塹林占梅。林占梅可说是改变林豪一生的重要推手。林占梅其后更邀其寓居潜园、鼓励撰着《东瀛纪事》、编纂《淡水厅志》，才有其后的澎湖行，三任文石书院山长。

在寓居台湾期间，林豪曾多次来回游历北中南各处风景名胜，留下可观的台阳草上100首、台阳草下98首（其中14首非首渡台湾诗作），而记述、分析这些纪游诗、感怀诗、咏史诗的诗作年代及其背景意义，也是本文另一个重要的目标。

## 二、买舟东渡，访友并游历台郡

林豪赴台的动机及目的，在《东瀛纪事》自序中说的极为清楚：“余自壬戌七月应淡水族人之招，买舟东渡，拟便道南下访友；时彰化贼氛正炽，路梗不通，适家雪村方伯奉檄办团，相晤于艋津旅次，一见如故，遂邀余寓其竹塹里第之潜园别业。未几，平贼凯旋，嘱余为典笔札；暇辄相从论诗，荏苒者四载于兹矣……”<sup>③</sup>

自序中的“淡水族人”即清镇总兵林向荣。林豪除了接受林向荣之邀请外，游历古迹名胜及寻

<sup>①</sup> 徐慧钰：《林豪之澎湖经历初探——三任文石书院山长》，收录于《澎湖研究第一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澎湖县文化局，2000年4月，第208-223页。

<sup>②</sup> 林策勋刊序，林豪著：《诵清堂诗集》，菲律宾，宿雾市：大众印书馆刊本，1957年5月，第1-2页。

<sup>③</sup> 林豪：《东瀛纪事》，自序，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6月，第1页。

求发展机会也是另外主要的目的。

### (一) 买舟东渡抵八里坌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七月,林豪三十二岁,应淡水厅(即今之台北市、新北市及桃竹苗地区)宗族之邀请,买舟东渡,拟想顺路南下拜访亲友。

林豪之所以要东渡台湾,主要因为林豪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赴榕城(即今之福州)参加乡试,于返乡途中,由渔溪泛舟至兴化(即今之莆田),曾造访与其父亲林焜熿有同事之谊,而时任兴化龙江镇军的林向荣,林向荣以高规格接待,告知即将调升台湾镇总兵,嘱林豪东渡相访,有诗作《晚次兴化家龙镇军署内,即席作》为证:

长揖军门礼数宽,又劳遣使候江干;绮筵烛施谈锋健,铃阁秋高剑气寒。  
潮落七鲲迎节钺,山回九鲤恋征鞍;刺船海上平生愿,定挟奚囊谒将坛

——公囑余东渡相访<sup>①</sup>

其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十二月初八日,林豪从厦门公交车北上,准备参加会试,翌年正月二十六日抵王家营时,遇捻变南还,无法应试,二月十七日抵杭州,闰三月一日回到东门后浦老家。之后二年间,林豪往来于金厦之间,寄情于游历山水及咏读诗书。此时清朝对闽粤移民赴台的禁令已不似康熙、雍正及乾隆时期那样严苛,虽仍禁止携眷同行,但只要取得原籍地方官的照单(许可证),并经台湾海防同知许可,即可赴台。眼看许多闽方人士赴台闯事业,林豪为求发展,乃想起林向荣之邀,兴起东渡台湾,一兼二顾,游历台湾并拜访台湾镇总兵林向荣。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七月,对于首次东渡台湾,林豪难掩兴奋及雄心壮志之情,赋诗《将之东瀛杂别》一首:

十年梦作玉山游,今日来看徽外秋;破浪未消宗子志,渡江谁是祖生流。  
关心烽火添乡思,入眼莺花搅客愁;欲斫扶桑作椽笔,挂帆应指海东龙。<sup>②</sup>

林豪坐船到台湾北部的八里坌口(今淡水八里)登岸。八里坌是清朝开放台湾对大陆三大渡口港口之一。当时清朝为了管制往来的人民,乃指定开放台南的府城、中部的鹿港以及北部的八里坌,作为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相互往来指定港口。<sup>③</sup>林豪到达八里坌口的初印象,赋诗《舟入八里坌口》云:

轻舟不系梗随萍,八里坌前望杳冥;雪压邨山千仞白,潮分官渡一条青。  
野烟似靄藏孤寺,瘴雨如珠落小舸;寥沉海邦风景暮,几行雁阵下渔汀。<sup>④</sup>

### (二) 抵台湾寓艋舺 游览名胜 访友诗酒唱和

林豪初抵台湾,寓居艋舺,观察情势。在未寓居潜园这段期间,林豪原拟南下拜访时任台湾镇挂印总兵官林向荣,时因戴潮春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起事于彰化,林向荣统兵进剿,先解嘉义之围,转战进驻斗六门。五月,戴党犯斗六门,林向荣镇量尽被困住,九月十七日夜,与胞弟生员而皋,暨副将王国忠等俱殉难。林豪闻讯,挽以《诗挽家龙江镇军》云:

斗大孤城卷暮埃,将星惨淡坠江隈;出师岂作生还想,入阵先寻死所来,  
枵腹登陴天为泪,裹疮杀贼气如雷;二难他日标青史,合取王黑一例陪。<sup>⑤</sup>

① 林豪:《晚次兴化家龙镇军署内,即席作》,收入《涵清堂诗集》卷四《榕城草》,第13页。

② 林豪:《涵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将之东瀛杂别》,第1页。

③ 李明珠等编,戴宝村著:《移民台湾:台湾移民历史的考察》,收入于《台湾史十一讲》,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2006年12月。

④ 林豪:《涵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舟入八里坌口》,第1页。

⑤ 林豪:《涵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挽家龙江镇军并序》,第4页。

林豪南下拜访林向荣之愿已无望，仍留謁伺机而待。其间曾至枋尾庄野望（今之新北市景美），而有《暮秋枋尾庄野望》诗二首；又到鸡笼头（今之基隆）渡口，其长兄林长庆<sup>①</sup>殉难处晚眺，备极哀伤，赋诗《鸡笼头渡口晚眺，是先长兄杀贼殉难处》一首。

林豪居謁期间，淡水人士设道场于龙山寺，超荐咸丰七、八年间因分类械斗而死亡近万的亡魂，当时阴雨接连数日，天色愁惨，林豪感触良多，因而赋诗《招魂曲》一首：

君不见龙山寺口白旛浮，香坛烟烧风飕飕。是日阴霾匝地气凄惨，新鬼故鬼声啾啾。不知妻哭夫兮，父哭子；但闻哭声震天，天为愁。去年蛮触苦相怒，忽地烽烟不知故。朝驱子弟寻仇家，暮挺干戈逢狭路。生灵刈尽村为墟，碧血消沉万骨枯。化作虫沙归未得，魂招何处徒嗟吁。吁嗟魂兮归来些，莫向沙场犹醉卧。忏悔应悲杀业偿，皈依且礼空三座。空王座下众生愁，汝曹任侠夫谁尤，何不荷戈去杀贼，死为忠义犹千秋！<sup>②</sup>

其时的林豪未能拜访到林向荣镇军，未来去向不定，心情是有些郁闷的。故而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诗赋《遣闷二十二韵》，自述“海邦汗漫游，南北游将遍。…面目足风尘，登临挟笔砚。…枯坐烘炉间，渴想清霜咽。…诗魔苦相缠，墨汁聊复溅。…”读之，颇令人心酸。

林豪不改诗人游历性情，除曾与友人冒雨泛舟游剑潭，并宿于位在土林的潘少江员外斋中。此外，并一再造访位在龙洞山麓（圆山附近）同年举人陈维英（迂谷）所居怡园之西的太古巢，因其依山构屋，前俯八卦潭，上有鸡鸣石诸名胜，景色怡人，林豪常与文人雅士在此诗酒唱和，快乐似神仙。<sup>③</sup>

林豪此时也南下抵台南府城，游览赤嵌楼，赋诗《赤嵌城怀古》云：

骑鲸大将卷牙旗，十丈戈船破浪时；黑海有灵浮窟宅，红毛无地长蛟螭。  
天涯杜宇归何处，岛上田横奉者谁；太息采薇歌罢后，五妃墓下草离离。  
五花战阵下楼船，八罩潮回涌碧泉；海国莺花开世界，荒陬岛屿靖烽烟。  
祭文慷慨称穷士，降表凄凉识戴天；不是将军饶侠概，入都能免于胥鞭。<sup>④</sup>

林豪又前往位于台南市的五妃墓，有五言律诗云：

海外无遗土，闺中有五人；一坯埋艳骨，九死殉孤臣；环佩芳魂杳，靡芜故径春；妾心同古井，浩浩白于银（近墓有井，味甚清冽）。<sup>⑤</sup>

随后林豪即北返，途经云林、嘉义、台中等地，分别有《虎尾溪》《初十日次嘉义县二首》《大肚溪》《房里溪即景》诸诗。

林豪于同治二年即南下，从《初十日次嘉义县二首》中第二首《去岁红巾似猬张》可资证明：

去岁红巾似猬张，登埤饮血气逾扬；一军愿作睢阳雀，九死羞牵郑伯羊。自誓王黑城是冢，更怜许远马为粮。（副将王国忠守城数月，后从林镇；斗六门之溃，骂贼被害。邑人许山，竭家财济军；垂尽，其媳出私贲继之）；我瞻雉堞软迟久，此地千年草亦香。<sup>⑥</sup>

### 三、謁津旅次遇林占梅 邀寓居潜园

#### （一）寓居潜园年代探考

正当林豪四处漫游，南北游将遍，顿感进退两难之际，所幸在謁的旅馆与正奉官方指令兴办团

<sup>①</sup> 林豪长兄嘉庆，生于嘉庆己卯（公元1819年）五月六日辰时，卒于咸丰癸丑（1853年），享年35岁。见陈国兴：《林氏家乘》。

<sup>②③④⑤⑥</sup>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2、8、8-9、9、8页。

练的林占梅会了面，因同为诗友，一见如故，林占梅乃邀请林豪到他在竹塹城内的潜园别墅居住，此时已为同治二年。

有关林豪何时寓居林占梅位于竹塹的潜园，说法不一，兹归纳如下：

1. 徐慧钰选注的《林占梅集》，在林占梅年表中为同治元年（林占梅42岁）。<sup>①</sup>
2. 郭哲铭注释的《诵清堂诗集注释》，于林次逋先生年谱列为清穆宗清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sup>②</sup>
3. 林文龙编著之《台湾史迹丛论》中册，（清末寓台诗人林豪事略）虽未明述时间，但认为林豪在同治二年仍在艋舺，三年初在潜园。<sup>③</sup>
4. 黄美娥教授博士论文《清代台湾地区竹塹地区传统文学研究》，讨论林豪在台行止中，虽未明述何时寓居潜园，但非在同治元年，而是同治二年秋天后。<sup>④</sup>

林豪诗文中虽然没有记述何时到潜园居住，但可断定是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秋天之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正月初二日之前。同治二年，林豪曾因一事无成，心情烦急郁闷，于夏日写下《遣闷二十二韵》：

海邦汗漫游，南北游将遍。亲故音书稀，家山望眼倦。匆匆两度春，忽忽一闪电。面目足风尘，登临挟笔砚。青磷闪战场，败瓦堆空县。烽火矗中宵，莺花满芳甸。鯨身沙欲沉，鹿耳浪如练。游览感沧桑，去来语海燕。城抽竹万竿，郡瞰波三面。旅梦逐鸥回，乡音听莺啭。身卧瘴烟间，心随蛮俗便。摸金校尉多，注瓦文字贱。世路珠九曲，人情钢百炼。邯郸卒争雄，邹鲁风谁羨？得句声亦雌，吹箫调易变。远抛犵鸟乡，空把归鸿恋。赤日午熏熏，黑云生片片。雨中煽炎风，空际飞火箭。枯坐烘炉间，渴想清霜咽。安得绿蚁浮，特把朱明饯。诗魔苦相缠，墨汁聊复溅。一服清凉散，中心空眷眷。<sup>⑤</sup>

林豪在《遣闷二十二韵》诗中，认为“匆匆两度春，忽忽一闪电；身卧瘴烟间，心随蛮俗便；赤日午熏熏，黑云生片片；枯坐烘炉间，渴想清霜咽”。可知林豪已白白度过二年，生活困苦，一事无成，所居处环境显得简陋，更不用说住在别墅。其次，林豪于此同时也经常到位居圆山麓的同年陈维英处饮酒唱和，并住宿其家中，显见其随处而安。

此外，从林豪所著《东瀛纪事》下卷《灾祥》中确认林豪于同治三年正月初二日已在潜园。在《灾祥》中记述：“彰化内山野番之处有所谓玉山者，人迹罕至，值天气清明，山色偶现，见之者则为吉征。癸亥之冬，丁观察南下平贼，于路见之。及岁试，以《玉山连见三日》为古学题云：甲子正月初二日，余在潜园，人传玉山见矣，余登啸望台最上层望之，见三峰遥峙天外，其白如玉，中峰尤高，左一峰微作蔚蓝色，良久始隐。”<sup>⑥</sup>林豪并作《正月初二日望玉山》五言律诗一首：

一白连天远，三峰削玉成；芙蓉开顷刻，冰雪现峥嵘。

万里罗云净，千层石骨明；山腰风忽动，幻出碧岚横。<sup>⑦</sup>

从上所论可知，林豪到潜园的时间应该是同治二年十月十八日前，因林占梅当时亲率团练义勇军，南下平戴潮春之役，而他们于艋舺旅馆相见的时间，必是南下之前。换言之，更精确推算，应在同治二年八、九月之时。

① 徐慧钰选注：《林占梅集》，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年12月，第30页。

② 林豪著，郭哲铭注释：《诵清堂诗集注释》上，台北：台湾书房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9月，第15页。

③ 林文龙编著：《台湾史迹丛论》中册，《清末寓台诗人林豪事略》，台中：国彰出版社，1987年9月，第48~49页。

④ 黄美娥著：《清代台湾地区竹塹地区传统文学研究》，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9年7月，第233~236页。

⑤⑦ 林豪：《诵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5、2页。

⑥ 林豪：《东瀛纪事》，《灾祥》，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6月，第55页。



## （二）居潜园三处，初任文书工作，次任姬人西席

林占梅潜园、郑用锡北郭园、陈维英的太古巢是清代中叶以后著名的文人园林。而园林通常是作为文人雅士荟集之处，以至结交权贵的场所。林豪能到林占梅潜园居住，心情自是极为兴奋。因此到潜园之后即有《初到潜园 呈主人雪村都转》一诗，呈送林占梅。林豪其时的心情充满希望与信心，用词遗字与《遣闷二十二韵》也就不同：

我闻海上蓬瀛称仙山，山中奇峰碧水何回环。帝嫌岛上风景太寥落，特遣名手为山开孱颜。玉京仙人旧是玉皇吏，手斫扶桑作管光烂熳。是造五凤高楼之巨手，何况一泉一石指顾间。果然云窗雾阁起平地，五步十步迷离难跻攀。有如蚁穿盘中珠九曲，步步豁人心目弯复弯。又如史公文字公孙剑，处处将收故纵往复还。倒卷银河之水从天泻，灌注名花奇草流潺潺。或荡沙棠随流去荡漾，柳堤竹岸梅坞知几湾。或弄玉箫银管发清响，鸞起山精木客鸣青鸾。偶然唱到人间可哀曲，先生恍然拊髀泪一潸。当今狐妖鼠辈塞天地，桃源之人何独看花闲。斫地而起遂殪负嵎虎，天帝含笑遥将玉简颁。其乘轻车一出视人世，芟尽天荆地棘医时艰。鰌生岛上一介垂钓客，幸为前马执鞭将骥扳。园中花勿伤离草勿恨，人生聚散原如水上鹇。行当澄清宇内遂初服，然后归饮花下将园关。<sup>①</sup>

林占梅其时督军南下平戴潮春之乱，凯旋而归后，吩咐林豪担任典笔札（即文书工作），有空的时候常常一起谈论诗歌。同治六年十月初三日，林占梅纳杜淑雅为侧室，遂命姬人杜氏、侍儿芳奴从而问字。依林占梅自述侧室杜淑雅自幼随父母常居林占梅家中，性情乖巧娴慧，甚得人缘，林占梅曾送她读女私塾，也请林豪当老师教她诗文及书信，杜氏长大以后文静美而端庄。宗亲劝林占梅将之纳为妻妾，以广嗣系。林占梅特别高兴，作诗《十月初三日纳侧室杜氏》<sup>②</sup>以志喜，诗云：

堂前纤月斗新蛾，入院风轻瑞霭多。恰喜杨稊生意茁，试将桃叶小诗哦。

宜男冀应螽斯相，之子无惭燕尔歌。笑我乔松苍老态，逢春竟复附青萝。

林豪对此，有诗《雪村都转馆余于碧海堂，命其姬人杜淑雅、侍儿芳奴从问字焉，主人首唱一章，征园中群客属和，次韵奉二首》：

添香小史袖翻红，随侍兰香诵国风。彤管闲抄官韵细，乌丝好界墨痕融。  
谢家咏絮才应比，卫氏簪花格自同。欲度金针惭未称，望渠玉尺擅瀛东。  
绮席宵开烛影红，潜园雅慕古人风。吟成白雪声声脆，韵到朱唇字字融。  
听歌姬凤仙、如意弹琵琶。杜若品原香草并，林逋性与玉梅同。三人期望殷勤甚，亲酌金樽小阁东。<sup>③</sup>

林豪在潜园的居处，初馆于碧海堂，后移寓雪香馆，最后居邻花书舫（注：诗中为邻花书舫恐为梅花书舫之误）落成后，改寓于此。林豪对所居寓处，均能淡然受之，各有赋诗以表对居处环境的欣喜之意。移居雪香馆时，门前多种桂树，有《移寓雪香馆二首》：

精舍玲珑桂树高，新开别馆绝尘嚣；案头几卷残书在，也费儿童检几遭。

吟声雏凤识清才，午课刚完晚色催；低唤侍儿褰绣幕，桂花香里抱书回。

当移居邻花书舫落成，林豪亦赋《园中新构邻花书舫落成，移寓其中，赋此奉谢雪村主人》七言律诗：

别墅移来位置新，笔床茶灶总随身；清流绕屋魂俱冷，瘦石当轩态可亲。

①③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11-12、12页。

② 林占梅：《潜园琴余草简编》，《台湾文献丛刊》。

宅比孤舟容野客，花为四壁结芳邻；也知胜地非吾土，且共盘桓觅句频。<sup>①</sup>

林豪对新移居的邻花书舫，周遭环境花儿多，与花为邻，尤其菊花。有《邻花书舫对菊》五言律诗一首：

离馆开丛菊，萧疏伴客愁；花迟因避热，骨瘦为争秋。  
篱下微根托，霜中短干抽；依人同此感，寂寞坐庚邨。<sup>②</sup>

#### 四、潜园唱和诗文 薄游郡垣觅归期

林豪居留潜园四年多，除了处理林占梅私人的书信等文书工作之外，亦担任女塾教书工作，闲暇时与林占梅及来园诗友唱和诗文，此外并薄游中部及南部各处，访视贤士大夫、田间野老，撰成《东瀛纪事》上下二卷。复于同治六年（1867年），应淡水厅同知严紫卿之邀请，纂修《淡水厅志》十五卷。

其时，林豪渡台已六年多，开始想念家乡金门，于是在同治七年过年后，留别潜园南下，二月二十日到彰化与林占梅告别后，从梧栖坐船返金。

##### （一）林豪与林占梅的诗文唱和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10月18日林占梅率军南下平戴潮春乱，平复彰化，林豪闻讯，作五言律诗《闻雪村都转连战皆捷，遂复彰化喜作四首》：

洗尽儒生陋，鏖兵当壮游；鸦军三面出，虎负一朝收。  
马上挥毫壮，囊中得句遒；平淮如勒石，靖海媲前侯。  
去岁传兵日，狼烟大甲昏；谁能挥袂起，誓与此城存。  
贼已投鞭想，人疑卧榻吞；非君筹战守，举国已狼奔。  
麤虎凶顽极，潢池可恃不？盗兵空自大，膏斧却谁仇。  
昔漫凭城固，今应入穴愁；飞蓬焱焱火，灰烬詎曾留。  
兵岂从天降，刀光带雪挥；敌惊重险失，民虑我公归。  
露布欣遥边，霜戈矫若飞；国人望慈父，额手爱恩威。<sup>③</sup>

同治二年十月十八日，林占梅亲统一军，南下平戴潮春之乱，至十一月初三克复彰化，只七日，林占梅于戎马余间，不忘结习，凯旅时因就途次所得之句，命之日《南征八咏》<sup>④</sup>，林豪读后，有《读雪村都转〈军中八咏〉奉题》七言律一首：

策马沙场壮此行，宝刀光里涌诗情；笔锋直扫萑苻胆，墨汁长挥草木兵。  
慷慨勒崖酬壮志，淋漓磨盾仰才名；披观檄草兼诗草，如听军中伐鼓声。<sup>⑤</sup>

林占梅经常因公事团练或赴各地游览未在潜园，林豪曾赋诗《寄怀雪村方伯》七律一首以表思念：

不见逋仙近半年，啸台矫首眼将穿；名园花事繁逾昔，谢女诗才妙胜前。  
篱畔定萦游客梦，囊中应满看山篇；秋英万本含霜久，待赏芳尊句共联。<sup>⑥</sup>

斯时（估约同治三年），潜园菊花盛开（菊花秋天盛开），林豪曾赋《题并蒂菊花》：

应是秋心爱逞奇，双双吐艳不曾离；莫嫌隐士耽孤冷，晚景犹开并蒂枝。

①② 林豪：《涵清堂诗集》卷七，《台阳草下》，第2、18页。

③⑤⑥ 林豪：《涵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9、12、13页。

④ 见林占梅：《南征八咏有序》。

三载羁楼海外天，秋来瘦影有谁怜；黄花相傲还相笑，独对花枝独自眠。<sup>①</sup>  
 林豪藉黄菊开花，主人林占梅不在潜园，赋《再寄雪村主人四首》七绝诗四首：  
 一篱黄菊含英久，露滴霜凝总未开；知道主人有花癖，且留晚节待君来。  
 双僮月下烹茶至，小女窗前问字频；时饮一杯吟数句，秋来安稳作闲人。  
 庭前闲煞一篱霜，王事羁身想未遑；为报花前几番醉，客闲还胜主人忙。  
 闻道丹青日日暮，看山看水便亲图；图中不少标题语，能寄行囊近作无？<sup>②</sup>

同治五年，林豪作《逐疫行》《后逐疫行》二首古诗，其中《逐疫行》说明当时天灾人祸，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并暗讽天灾连年，恶吏剥削贪婪无度，藉逐疫神灵仪式，鬼话连篇愚弄黎民苍生的官场文化：

炎风煽地如炉烘，妖云十丈垂天红；祝融炽炭旱魃舞，阳亢阴死蒸藁隆。  
 十里五里成焦土，五月六月悲三农；疫鬼跳梁舞而出，白昼攫人入其窟。  
 十旬大索天亦惊，一城哭声气愁郁；有司曰噫无他策，谕令尔民且逐疫。  
 狩狩闯出丈六躯，眈眈四目射妖域。连宵鼓堕喧通衢，欲荡么魔禳此疾。  
 疫鬼愀然语有司，公今误矣逐何为。溯公下车清和节，可有甘雨车前随？  
 公心为炉沸涕鼎，煅炼成狱张炎威。摸金校尉虎而冠，张牙舞爪如鹰饥。  
 或摧风翅晒赤日，或肆狼餐剜膏脂；或入瓮中醉其骨，或纳一网敲其皮。  
 或头为焦或额烂，大者剥肤小噬肌。累累狂狱如束湿，无辜吁天天岂知！  
 未免閻左蓄怨毒，上干天怒灾乃施。吾曹戾气所酝酿，乘时为厉应奔驰。

随公一气为消长，气焰所趋不可医。君不见南交吏酷珠尽徙，东海如冤天不雨？蝗蝻入境市有虎，毋乃感召白天鼠！古来青祥黑眚为咎征，鸡祸犬祸随所取；白妖水怪有白兴，吾曹与公问谁使？公元杜陵忠爱之胸襟，纵诵子章髑髅能止灾不侵？误读周官效安石，欲遣方相禳氛禳；执盾扬戈直戏耳，抱薪救火灾愈深。而况吾曹纵敛手，未必公能舍此现婆心！区区小民何足惜，侬公之囊果吾腹；天若爱民不遣公，吾曹为祸公岂福！不然公如两袖清风清，吾曹逝矣何庸逐！有司曰噫无他策，此曹嗚张何能斥！欲解苍生命倒悬，安得青天一声鸣霹雳！<sup>③</sup>

《后逐疫行》直指官方逐疫鬼之无效而更加猖狂。呼吁要减少民间诉讼，才不致“两造一例无完肤，两家破碎同嗟吁”，增加疫鬼盛行：

长官匆匆逐疫鬼，举国若狂喧不已。疫鬼不去更猖狂，反唇相稽非无理。长官闻之心漠然，尔曹胡不相谅焉。此邦民情尽险诞，脑后插笔多争端。未免水懦积斯弊纷纷。赴愬安能一一为平反。缅昔无为称美俗，公府萧然少积牍。圣人治民贵无讼，使民无讼自有策。人情莫不爱四肢，我有屠伯之手残其肌；人情有钱皆宝惜，我有钩距之才倾其囊。金作赎刑遵古帝，堂上输金古之制。小民罔上为诈虞，我能使无辜者起，无情者嗷嗷；两造一例无完肤，两家破碎同嗟吁。谁不裹足相戒为畏途，从此分溜别渥皆多事。使民浑浑罔罔游唐虞，刀锯白来胜樽俎；妙用果能息雀鼠，而况好官不过多得钱。刘宠选钱义有取，乃知苍鹰乳虎皆循良。罗织之经亦治谱，直挽刁风追古处。疫鬼愀然不复问，尔民何罪濯泉健。罚锾新例九幽无，何如相从地下遁。君不见閻摩殿上刑虽峻，不索黄金鬼不怨。<sup>④</sup>

林占梅读后，有感而作《读卓人孝廉〈逐疫行〉走笔率成绝句》七绝一首：

嗷嗷到处听哀鸿，鸱血今尤匝地红。召伯不来屠伯至，欲教活劫遍瀛东。  
 鼓吹声高读喜闻，朝朝挖眼复抽筋。最伤炮烙过钳网，入瓮何时请此君。

①②③④ 林豪：《诵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13、13-14、17、18-19页。

人命庭前等草菅，可怜十室九沉沦。果然一笑方包老，不是朱提不解颜。  
太息睚目此并餐饕，择肥而噬岂能逃。伤心最是行途者，胸次难平拟续骚。  
鬼才说鬼恰相宜，走出先才腕更奇。一样文章千变化，贪狼鬼魅各支离。  
自古灾祥感召多，蝗飞入境虎过河。酿成厉气将何遣，逐疫还祈大吏惟！<sup>①</sup>

对此，林豪在《瀛海客谈》中，回忆：

同治丙寅，余适馆潜园，时方早疫，雪村方伯见余《逐疫行》二首，即题其后，有云：“鬼才说鬼恰相宜，闯出仙才腕更奇；一样文章千变化，贪狼妖魅各支离。”虽冲口而出不加雕饰，亦倾倒至矣。旋黏屏上以示人，谓能于唐宋大家外，自辟境界。余有忝斯言，敦请坐客指谬，方伯忽张目，云：为人固不可自是，亦不宜太谦。譬如驰马，彼必待扶掖上骑，犹紧抱辔头，不敢稍放；君则一跃而上，挥鞭疾驰，绝尘而奔，而磬纵送，若行所无事，仍盘回原处，一笑下骑，面不改容，此岂他所能测识哉！将教何人为君指正耶？按家雪翁方伯着有《潜园琴余草》十余卷，七古学吴梅村，如唐摹晋帖；近体师剑南，则迥肖矣，而同时罕有识者。然则方伯对客之言，殆有所感而发乎？抑岂借题而自况耶？<sup>②</sup>

林占梅长林豪十岁，经常与林豪论诗，指导评论。林占梅曾作《与家卓人孝廉论诗》：

生平趣向正无偏，使典驱坟出自然。遣兴不分唐宋格，耽吟常见性灵篇。  
呕肝莫漫追长吉，得手何须托惠连。脱去浮词医尽俗，红尘过关始成仙。<sup>③</sup>

林占梅认为林豪在诗歌格律、文字驱遣能力上，已经臻至随吟成诗的创作地步了。他自己也渐有一番作诗的心得，以为作诗当笔随意走，抒发性灵，强调使典故但已出于自然，脱去浮辞滥调，也就无需去分别唐宋格调。

对于林占梅的诗词评论，林豪在《瀛海客谈》中，事后回忆，诸多感叹：

竹塹家雪村方伯占梅，阅余诗草，执笔题云：“吾家卓人人中龙，词坛能开五石弓；吾家卓人人中鹤，矫矫入群卓立独。”时忽有账房司事以帐簿进，雪翁与之接谈良久；既毕，欲再足成，而兴会索然，已为所沮矣。遂未勉强下笔也。余见其公私辑集，亦不忍催令脱稿，谓可留以有待也。何期一别遂成千古。哉呼！<sup>④</sup>

林占梅诗作《悼亡》，林豪读后赋《集唐题雪方伯悼亡诗后四首》回主人。<sup>⑤</sup>

## （二）潜园感赋

林豪在潜园中的日子不算短，约有四年多，生活暂可安定下来，比起在颺舸的日子，自然惬意多了。但书生本色不改其多愁善感的性情，林豪居潜园的诗作可包含多个层面，或抒发情怀，或忧心国事，或感怀故里，或著书吟咏，或诗友唱和，或纪游览胜等，均可在台阳草诗文中见其迹横。

### 1. 抒发情怀

潜园的环境，有如世外桃源。林豪在潜园授课、纂书之余，有时悠闲，时而占诗，尤其喜欢菊花。花在诗中成为重要的寄托对象，也成为诗人的对话倾诉的朋友。在未赴台闲居在金时，即赋《红菊》七言律诗一首。移寓，<sup>⑥</sup>有《邻花书舫对菊》五言律诗；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菊花秋天盛开，林豪又赋《题并蒂菊花》七言绝句二首：

应是秋心爱逞奇，双双吐艳不曾离；莫嫌隐士耽孤冷，晚景犹开并蒂枝。

①③ 林占梅：《潜园琴余草简编》。

②④ 林策勋刊序，林豪著：《瀛海客谈》，编入《涌清堂诗集》，菲律宾，宿雾市：大众印书馆刊本，1957年5月，第1、1页。

⑤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19~20页。

⑥ 邻花书舫系潜园十二景之一，恐是梅花书舫之误。

三载羁楼海外天，秋来瘦影有谁怜；黄花相傲还相笑，独对花枝独自眠。<sup>①</sup>

《再寄雪村主人四首》七绝诗四首中亦提及菊花；林豪居金门后浦林家花园，准备乡试时，亦曾赋《红菊》七律一首：

风霜几度阅空山，衬得斜阳一抹殷；三径孤芳秋有色，百花相对冷无颜。

左徒餐后才华艳，彭泽归来醉态闲；莫厌结囊频采采，爱他晚景独斑斓。<sup>②</sup>

林豪也曾在园内相思树下沉思，赋《潜园小螺墩纳凉墩上相思树甚多》七言绝句一首：

相思树下最相思，石榻茅亭布置宜；满地绿阴清梦觉，鸟声才报午晴时。<sup>③</sup>

潜园景色怡人，林豪移寓邻花书舫，常漫步其中，兴来吟七言律诗《桥亭口占》云：

花作邻居竹作屏，碧栏红板接烟汀；一竿冷浸桥头月，万绿阴垂水上亭。

画舫轻摇随蛱蝶，钓丝系久立蜻蜓；数声玉笛来何处，风度歌唇隔岸听。<sup>④</sup>

林豪在潜园的生活，虽然食住均不必忧愁，但因体质柔弱，时常生病，从诗中即可略见端倪，尤其时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赋《潜园秋日感兴》：

崎岖世路但孤行，磨蝎填官事莫成；白发随人如有约，青鳧于我本无情。

秋深病榻兼风雨，乱后知交半生死；高卧江干感摇落，故园回首一沾缨。<sup>⑤</sup>

《园中闲趣二首》：

卧病江干阅岁时，晚来携杖步东篱；花经宿雨开偏早，云恋空山出每迟。

过眼烟岚无稿画，拂窗风竹有声诗；当前妙景谁拈出，会得闲情静者宜。<sup>⑥</sup>

《岁暮书怀》七言律诗：

卧病天涯半载中，身如秋叶卷霜风；吟多祇自书孤愤，日暮凭谁送五穷。

有梦还家随旅雁，无衣卒岁笑寒虫；年年海外成何事？几卷新诗两鬓蓬。<sup>⑦</sup>

林豪患病，甚至惊动当时聘请林豪纂修《淡水厅志》的淡水同知严金清，严金清特地到潜园探慰林豪。林豪赋七言律诗《严司马视疾寓园 赋诗奉谢》：

病躯无计逐愁魔，遁迹林泉少客过；消渴文园空作赋，呕肝昌谷佯清歌。

敢劳车马江干驻，愧少珊瑚架上罗；一曲高轩吟未已，尽驱二竖返山阿。<sup>⑧</sup>

## 2. 感怀故里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粤寇李世贤踞漳州，金门、厦门等处戒严，林豪闻讯，忧心家乡亲友安危，赋《闻警》七律诗：

羽檄惊传出浙河，故乡烽燧近如何；围城尽作王黑冢，入阵谁挥狐父戈。

狗已丧家犹吠影，鲸因漏网尚翻波；不堪闻雁沧江上，独对秋风洒泪多。<sup>⑨</sup>

林豪有时想起家乡事，对于远在一海之隔的金门，音讯不通，而本人在台又非很顺利，不禁失眠难寝，赋《不寐》五言律诗：

忍泪封家信，排愁把客卮；高台风起夕，短烛夜深时。

生计同鸥冷，乡心有雁知；萧条无一事，不寐又吟诗。<sup>⑩</sup>

林豪在潜园，生活起居不虞匮乏，但毕竟是只身在台，孤寂度日，遇到同乡里人，欣喜万分，深谈到三更半夜，如赋《喜晤里中族人，即送其旋粤二首》：

但听乡音似到乡，海天一笑共倾觞；相看客舍秋光好，重话家山况味长。

①③⑤⑥⑨⑩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13、19、21、27、20、20页。

②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一，《小巢居课余草一》，第6页。

④⑦⑧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七，《台阳草下》，第4、18、8页。

摇橹夕游无亮宅，餐英朝采左徒囊；深谈坐到三更后，露气侵衣夜色凉。  
说到萍踪一叹嗟，旧游如梦愿犹赊；马头尘起归途渺，梦里波翻战鼓挝。  
珠市十年君负囊，瑶台万里我回槎；何时泛棹随东去，共访花田绝代花？<sup>①</sup>

林豪内弟来访，送其返乡时，心有感触，赋七言律诗《送内弟旋里》：

蒲帆猎猎勤西风，送子天涯思不穷；旧馆秋深芳草外，炎荒人老瘴云中。  
五更归梦惊残桥，两地离愁逐转蓬；握手嘱君无别语，为余携帚扫篱东。<sup>②</sup>

此时，林豪已开始回想家乡的一切，尤其常从同安渡口至厦门，而厦门也是求学的地方，足迹遍及厦门各名胜古迹。从《忆鹭门四首》即可看出林豪对厦门的怀念：

鹭门何处好，鹿洞入层云；古刹不知路，疏钟时一闻。  
飞鸿烟际出，画鹢镜中分；欲访衔花迹，高歌倚海门。  
鹭门何处好，万石古岩前；泉细穿危壁，窗幽锁暮烟。  
远岚青到海，列岫碧参天，万壑千岩转，玲珑异境传。  
鹭门何处好，佳胜虎溪名；苔蚀松根老，云封石齿平。  
中峰含雨意，下界递钟声；销夏湾堪觅，沿途瀑布横。  
鹭门何处好，最好是榕林；阁矗云霄近，窗连海气深。  
方塘沉素月，石榻护凉阴；市隐传佳境，诗题扞壁寻。<sup>③</sup>

### 3. 忧心国事

林占梅率军南下平戴潮春之乱，克复彰化城，林豪闻讯，即赋《闻雪村都转连战皆捷 遂复彰化喜作四首》；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林豪闻曾国藩率军克复江浙等处，喜极而赋七言律诗《闻官军收复金陵，江浙等处一律肃清，喜而成咏》：

何事今朝酒不辞，倾杯难得太平时；活民拟上长沙策，入蔡争传韩子碑。  
有命看人飞食肉，无才放我细裁诗；白门柳色曾攀处，好策征鞍访故枝。<sup>④</sup>

对于兵荒马乱，造成百姓生离死别，生灵涂炭，林豪赋七言律诗《书叹》：

兵荒而后米珠腾，屠伯何堪杀气横；越地征输歌白纛，汉廷罗织贵苍鹰。  
千家破碎魂成市，四顾萧条血满城；安得道州勤抚字，春陵一曲慰群情。<sup>⑤</sup>

又如七言律诗《凄望》，林豪也关心同治三年，中法越南战事及内地陝甘回变，左宗棠西征，因而赋七言律诗云：

炎方几处接狼烟，漳海携枪又去年；南国甲兵雄二广，西风笳鼓动三边（时陝甘用兵）；  
空城日暮饥泉集，战骨秋深野草缠；寂寞沧州羁客思，中原凄望总萧然。<sup>⑥</sup>

### 4. 著书吟咏

林豪在潜园期间，撰著《东瀛纪事》及编纂《淡水厅志》。于同治六年，受淡水同知严金清之邀编纂淡水厅志，赋五言律诗《志局书怀示诸同事》：

淡水征文献，于今二百年；风霜濡大笔，兵燹感遗编。  
扫榻高朋集，扶轮地主贤；干旌勤下问，礼意极殷拳。  
一代名山业，千秋俎豆开；烟云资润色，坛坫属清才。  
往事悲淘浪，高文压选台；相如消渴甚，附驥好追陪。<sup>⑦</sup>

另外，于编纂淡水厅志期间，与林占梅选辑淡水厅辖区节女烈女，其事迹可传之于世者，系以短

①②③⑥⑦ 林豪：《涵清堂诗集》卷七，《台阳草下》，第15-16、8-9、17、18、19、1-2页。

④⑤ 林豪：《涵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13、21页。

歌，而成《淡水杂咏五首》。其中，《围城雨》记淡水林氏之善祷；《负翁行》记闽人蔡开基妻黄氏弃儿与金，负翁逃难；《盆中金》记竹塹女林氏纪姑弃金保全节；《剪舌哀》哀黄氏鹤娘剪舌殉主；《牵衣哭》记戴潮春兄戴万兰未婚妻罗氏望门守节投缢死。

林豪精于集唐诗，在台期间除了《集唐题雪方伯悼亡诗后四首》《集杜再题吴修轩遗稿》《春日雪村主人挈眷偕游青草湖祭扫其继陈氏墓 即事集唐八章》，同治六年另有《九日集杜》：

干戈衰谢两相催，并马今朝未拟回；白日放歌须纵酒，百年多病独登台。  
无边落木萧萧下，但见群鸥日日来；一卧沧江惊岁晚，教儿且覆掌中杯。<sup>①</sup>

#### 5. 诗友唱和题图诗

同治五年除夕，诗友陈七榕士等人到潜园畅饮，林豪赋《丙寅除夕，嘉义陈七榕士、山左刘四鲁生、汀州戴三筱林同饮园中寓斋，率成二首》：

蜡烛闻歌也泪流，谁家今夕会朋俦！屠苏酒热还拈柬，爆竹声多怕倚楼。  
梦里青山同岁杳，尊中绿鬓问谁留！如何岁岁求如愿，独坐萧斋咏四愁。  
座中谈笑尽英流，独让元龙据上头；安道琴弦弹古调，伯伦酒榼洗今愁。  
鲜堆冬笋香堪嚼，红擘年柑露未收；一任岁移浑不觉，尽情取醉卧西楼。<sup>②</sup>

林豪的诗友吴修轩曾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中秋夕至潜园云香馆，为林豪所撰着《东瀛纪事》撰序，而林豪也为吴修轩著书《东溟草》写序，曰《奉题吴修轩先生东溟草》；吴修轩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过世，林豪备极哀容，并于清明节扫墓，赋诗《清明日祭亡友吴修轩二首》，诗中述及二人平日友谊，饮酒咏诗，如今永别成相思：

别君五六月，邈如百年期。东风忽已至，野祭何累累。念我平生交，弃掷在路歧。思君如昨日，恍惚同游嬉。俯仰成今昔，泪下如绠丝。与君各秦越，好风吹聚之，既聚还复散，天者不可知。缅昔云香馆，高谈扬两眉。谈剧继以饮，饮罢还吟诗。愿如平日饮，努力倾金罍。大块同浮沤，造化一小儿。君为小儿弄，游戏一至斯。终当从此别，且复申此词。小别数十年，屈指慰相思。君其备一酌，酬我今日卮。

君母寿七旬，君嗣年十五；此时向天涯，哭望挥泪雨。岂无酒与浆，遥遥冀江浒；瀚海风波恶，恐为蛟龙阻。君其佑后人，一坏妥故土；年年有麦饭，岁时常澆汝。<sup>③</sup>

林豪在编其遗稿时，又以集杜诗咏云：

数篇今见古人诗，借问苦心爱者谁？庾信平生最萧瑟，杜陵远客不胜悲。  
同舟昨日何自得，故国平居有所思；陶冶性灵存底物，风流儒雅亦吾师。<sup>④</sup>

诗人咏诗题字是很平常且很有趣的爱好。林豪在台期间留下的题图诗有三首，其中二首在潜园所题，分别为《题蝴蝶图》《自题朱颜问字图》，另一首为《题仙人对饮图》。《题蝴蝶图》应是林豪初抵潜园后之作，画中人已故去，而蝴蝶踟蹰舞态至今存，颇有羡慕蝴蝶自由飞舞，不知愁之味：

画中人去蝶魂回，几度东风几度开；瘦影年年芳草里，管他春去与春来。  
五十年前旧墨痕，踟蹰舞态至今存；黄金重染生花笔，续得庄周梦里魂。

时画工黄珠生重加妆染，故云。

游仙香梦任勾留，双舞双飞春复秋；谁得身如蝴蝶好，一生花底不知愁。<sup>⑤</sup>

另一首在潜园题图诗为《自题朱颜问字图》，描述林豪在潜园当西席教师，林占梅姬人杜淑雅及伺妾芳奴到堂前问字，林豪教其诗书字画，收得女门徒，应是最快乐的时光，其图诗云：

①②⑤ 林豪：《涪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22、27-28、9页。

③④ 林豪：《涪清堂诗集》卷七，《台阳草下》，第2、18页。

修篁满院绿荫铺，莲步姗姗入画图；敢道绣鸳传妙诀，聊同老马指长途。

抱书上学穿花至，问字登堂倩婢扶；自笑羈栖今五载，论诗赢得女门徒。<sup>①</sup>

林豪三首题图诗中之《题仙人对饮图》，应是同治元年所题诗，时林豪尚未到潜园，浸于园林诗友唱和。林豪对图中，仙人饮酒无量钱不愁，陶然而醉忘了我是谁，大有欣羨之意。《题仙人对饮图》云：

仙乎！仙乎！其长安之博徒，抑燕市之狗屠。飘然如猬眉与须，庞然而大清且臞。酒兵开处垒壁俱，仙乡直接黄公垆。世人皆醉堪嗟吁，仙乎独醒毋乃拘。蓬莱清浅言非诬，十二万年犹过驹。枝头春鸟呼提壶，杖头有钱无愁沽。不如且向酒家觅，从而执榼招奚奴。科头箕踞形不孤，张拳拇战声喧呼。声高有如轰雷驱，声低乃似女儿喁。胜者举杯相揶揄，负者耳热头欲渝。愁城攻破堪欢娱，痛饮何分赢与输。莘有酒不饮公真愚途次，饮而倾颓谁其扶。仙人醉死何时苏，守山千日犹须臾。陶然而醉真忘吾，豁然而醒一胡芦。唯圣无量仙何殊，刘君颂德非为谀。我曾五石盛大瓠，愧负酒债兼诗逋。吟成欲润枯肠枯，仙乎能分一杯无？<sup>②</sup>

诗友浙东张揆卿茂才归浙江参加秋试，林豪特赋诗《送张揆卿归赴浙闈秋试》相送：

论诗樽酒喜相邀，握手河梁意转饶，归思已随沧海月，雄文直压浙江潮。

囊中赤嵌新吟草，梦里青山旧画桡；此去射鵰推妙技，春明相待莫辞遥。<sup>③</sup>

## 6. 纪游览胜诗途次

林豪居寓潜园期间，曾陪同林占梅暨其眷游青草湖，祭扫其继室陈氏墓，即事集唐八首。

同治三年四月，林豪赴台南府城途中，听闻罗冠英为解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率军攻小埔心之危，突入园入，为飞炮所中，殉于阵，曾说：“余虽未识其人，殆古所谓慷慨烈丈夫者耶！可其明顺逆之分，奋不顾身也”，作《途次哭义首罗冠英三十四韵》：

半夜颓云落，双行客泪俱。草茅能报国，章组愧金躯。瀛海啼妖鸟，潢池射短狐。红巾纷若蚁，墨绶散如。柱孰中流砥，声闻攘臂呼。扬徽初誓众，斫地独前驱。慷慨挥蛇剑，从容捋虎须。跳梁锋正炽，转战势尤孤。出险还磨盾，同仇更执殳。腰横金钹矢，敌避黑云都。大甲烽频警，重申令未孚。辅车原互应，犄角每相需。壑北开官局，张巡奉火符。兵威疑草木，志矢卫榆榆。驰檄才筹划，投鞭屡觊觎。趲靴全力搏，卧榻有心图。君也空拳奋，群自信道趋。山头飞霹雳，马上落干菟。乘胜方搜穴，狂奔敢负嵎。四犁清孽种，一鼓扫萑苻。饮血军心锐，登埤众志扶。论功先屈指，扞体少完肤。去岁城池复，群凶次第俘。并蛙犹自大，桀犬尚稽诛。鹿挺篙间触，鱼游釜内枯。相持久糜餉，贾勇独援枹。后劲方高垒，先登已入郛。那知奔彘狗，竟尔殒良驹。热血膏青草，忠魂守碧芜。纳刀光弼侣，裹革伏波徒。惨淡元归葬，沙场哭载途。死当为厉鬼，气早夺群奴。未食天家俸，畴安身后柩。悲歌怀壮士，笔底涕痕濡。<sup>④</sup>

林豪著书咏诗之际，曾将台湾古迹，整理十二处，成《咏台阳古迹十二首》，如《橘洞行》（详《台南府志》）、《暗礁行》（见《府志》）、《五妃墓》（明宁靖王朱术桂侍姬也。事详《府志》）、《梦蕉园》（明举人李茂春隐处，在台南郡治）、《尚书亭》（亭为陈清瑞公建，在台南郡治）、《种金山》（在台南府治）、《曹公圳》（曹公讳瑾，河南解元。任凤山知县，兴埤头水利，民尸祀焉。见《林啸云文抄》）、《水火洞》（在嘉义县。《邑志》所谓“水火同源”也）、《珠山谣》、《剑潭曲》（在淡水八芝兰林保，“剑潭夜光”为郡邑八景之一）、《万军井》（在澎湖妈官澳）、《军门墓》（明金门卢中丞若腾，号牧洲，避地至澎。卒葬太武山上。著述甚富，详《厅志》）。<sup>⑤</sup>

①③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七，《台阳草下》，第3、3页。

②④⑤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六，《台阳草上》，第3-4、14-16、14-16页。



### （三）著书赋诗忆潜园 临别依依七载情

同治七年元旦，林豪在潜园，欢度春节，由于之前故里同乡相继来访，已有思乡意，潜园岁终饮酒强欢笑，仍难免心怀乡情，赋七言律诗《戊辰元旦，即席作》：

爆竹声闹万户春，年年如愿祝良辰；但求酒价随寒减，更望诗情与岁新。

昨夜怀乡犹有泪，今朝索负始无人；强颜席上同谈笑，怕见杯中鬓似银。<sup>①</sup>

林豪既有归乡意，于是作《留别潜园二首》，藉以反省为何来台，生活上的潦倒，反倒是累及好友林占梅，著书及几箱诗篇是最大的收获：

小住名园几度春，依然面目濯风尘；江干鸥侣应怀我，市上猪肝久累人。

问字青娥留后约，题诗白石证前因；相思树下相思泪，独对东风一怆神。

问我何缘海外羁，世情此日太难奇！著书炎微毫将秃，射策春明计已迟。

客路惯冲千尺浪，行装赢得几篇诗；马头一步一回顾，惆怅梅开客去时。<sup>②</sup>

没多久，林豪即整装理行囊从新竹南下，途中经过之处，将所见所闻赋成诗《埤南道下书所见四首》：

长日炎如此，长途叱驭行；火云千片落，岚瘴一溪横。

息担逢园叟，邀余憩豆棚；为言天不雨，晚稻罢深耕。

卓午农家憩，荒凉泪欲潜；平畴封白草，浊雾锁青山。

泉涸鸦锄废，田荒犊背闲；舆夫行且止，杯酒解尘颜。

小坐长松下，幽居未易寻；敞庐依老树，密瓦覆清阴。

日落喧樵唱，溪回咽暮砧；折花有村姬，灿烂满头簪。

荒城鸡屡唱，酷热不成眠；雨散闻雷后，苗枯大暑前。

意烦同磨蚁，俗薄竞趋膻；欲觅清凉散，怀中一洒然。<sup>③</sup>

林豪途经顶店（今之台中大甲镇）见农夫在田间耕作，赋诗《顶店田家即目》；后又南下到府城登赤嵌城望远，感赋七言律诗《夜登台郡西城望远》二首：

苍然月色落杯中，醉倚西楼望不穷；芦荻萧萧渔唱起，烟波滚滚霸图空。

黑沟浪涌天围海，赤嵌秋高叶扫风；梦蝶园荒人不见，涛头如马竞趋东。

浮云万里压边城，天外潮回海若惊；跋浪孙恩谁漏网，负恩颡利敢要盟。

空守楼阁骄青屐，袖底干将泣赤鲸；独向嵌城高处望，美人消息总关情。<sup>④</sup>

林豪当晚在府城住下后，折返至彰化城，当时林占梅抱病造访求见台湾道吴大廷，力求昭雪数年悬案。<sup>⑤</sup> 林豪向林占梅话别，当时林占梅病体已极严重，彼此握手已是无力气说话，林豪此时不知不觉眼泪已潜然泪下，时已是同治七年（公元1968年）二月二十一日，林豪赋诗《重到彰化与雪村方伯话别，时漏将四下矣二首》：

此别知何日，相看各失声；愁添千万绪，海隔十三更！

文字知交泪，风波故国程；残灯何黯黯，怕照此时情！

几载名园住，谈诗喜欲狂；千篇同检点，只字替商量。

愿饮泉明酒，休携李贺囊；来春重鼓棹，有约那能忘（时雪村病体已剧，握手无言，泣数行下，余亦不知泪之何从也）。<sup>⑥</sup>

林豪或许已经意识到与林占梅二月二十一日的话别，恐是最后的会面。林占梅因病情加剧，随后

①②③④ 林豪：《诵清堂诗集》卷七，《台阳草下》，第19-20、20-21、25、22页。

⑤ 徐慧钰选注：《林占梅集》，《林占梅年表》，第31页。

即北上返竹塹，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寅时，卒于潜园，享年四十八岁。林豪后又到鹿港，赋诗《重到鹿港话别》，暗喻自己行止不定：

几度红笺写闷思，旧游重访慰相知；细腰清瘦浑无恙，争奈萧郎鬓欲丝。

旧巢海燕栖才稳，转瞬飞鸿迹又移；笑指天边秋月色，来年春到是圆时。<sup>①</sup>

途中，林豪忆起潜园生活的美好，又赋《忆潜园四首》，诗中述及潜园景色：

忆得潜园好，风光到眼踪；画桥吹柳絮，春雨涨桃花。

帘卷归红燕，池清浣碧霞；香田卅六亩，竹外水为家。

忆得潜园好，回廊曲折遥；穿花移画舫，隔水度清箫。

波转留香闸，篁垂钓月桥；相思墩上树，凉意午来招。

忆得潜园好，层台浸碧流；狂吟登绝顶，长啸倚高秋。

霜气千秋净，岚光羊槛收；挂篱香圃外，对酒几勾留。

忆得潜园好，斋名廿六宜；拥炉朝写韵，呵笔夜评诗。

月上移床对，梅开有鹤知；冷然穿水至，琴韵更迟迟。<sup>②</sup>

林豪结束七年的台湾之行，于台中梧栖渡口乘船，其友人施甘澍并殷殷相送至岸边始回，林豪赋七言律诗《归舟口号》：

曲罢匆匆尽数觞，酒徒远送更神伤（施上舍甘澍殷殷相送，及涯始返）；帆开转觉怀乡急，浪涌偏教索句忙。万里秋光摇健笔，满船诗草压归装；爪痕处处留题偏，一任旁人笑我狂。<sup>③</sup>

林豪结束东渡台湾之行返回金门，行程中想起在潜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对林占梅的照顾及关心，感滴在心头，于是提笔书写《致家雪村方伯书》：

敬启者：月之二十日，由彰分邑分手，行抵梧栖，翹想福星满路，照护行旌，谅必早莅塹城，闾闾欣庆，从此谢绝尘嚣，养其天趣。摩诘辋水，极诗酒之欣，谢傅东山有丝竹之乐，对幽居而意惬，丢稚子以情怡，旧疴霍然，符心祝也。…回忆十载名园，备叨雅爱，绿须传继，评诗白石之间，问字绮窗之下。茶烟酒灶，邀胜侣似题襟，箫鼓画船，荡中流而泛月，当晚课余闲，良宵晤对，平章泉石，商榷古今，还韵则严析秋毫，征典则奇搜宛委。一言偶契，笑口频开，至于炉香欲炉，坐客渐稀，梅韵穿窗，琴声醒耳，此时清境恍惚目前，旧游慨然神往。…夫离合之感，人有同情，况乎文字之交，尤不可多得。不但阁下临歧惆怅，呜咽难胜，以豪之脱略世务，亦复相视枵触，不觉涕之何从也。…豪每不自揣度，欲以著述自娱，尝网罗故实，勒为一书，此行若抵厦门，随付梓氏。…匆匆肅束，并候吟安，言不尽意，豪再拜。<sup>④</sup>

## 五、撰著《东瀛纪事》

《东瀛纪事》系记载清代三大民变历时最久的戴朝春事变，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林豪首次东渡台湾七年的重要著作之一。

### （一）缘起

林豪在《东瀛纪事》“自序”中自述：“余自壬戌七月应淡水族人之招，买舟东渡，拟便道南下访友；时彰化贼氛正炽，路梗不通，适家雪村方伯奉檄办团，相晤于艋津旅次，一见如故，遂邀余寓其竹塹里第之潜园别业。未几，平贼凯旋，属余为典笔札；暇辄相从论诗，荏苒者四载于兹矣。中间

①②③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七，《台阳草下》，第23、22-23、22页。

④ 林豪：《致家雪村方伯书》，林豪手抄本，澎湖县文化局。

薄游郡垣，往复者再，所过之城郭、川原昔日被兵之处，旧垒遗墟，萧条在目，慨然者久之”。<sup>①</sup>

林豪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七月东渡台湾，斯时戴潮春同党已于同治元年三月起陆续在彰化、台中等地起事。原拟南下拜访林向荣镇军的林豪，因当时戴军的势力很庞大，来往道路又梗塞不通，林豪只得待在北部各地伺机而动，此时林豪已知戴潮春民变之事，但未想到后来如此严重。

同治二年，林豪曾南下台南赤嵌城怀古，折返北部途中，经中部各地，到嘉义时即目见因战争所引起的灾害。

林豪北返后，与当时因办团练的林占梅相识于艋舺，旋即获邀寓居潜园。林占梅于同治二年十月十八日率团练军南下彰化平戴乱时，林豪在潜园实时时关注。曾赋《闻雪村都转连战皆捷，遂复彰化喜作四首》《和雪村都转〈书叹〉之作，即步元韵四首》《读雪村都转“军中八咏”奉题》等诗，当时林豪已从林占梅的口述及诗作资料得知有关戴潮春事变的部份事实。

戴潮春事变平复后，林豪数次往来竹塹及台南府城间，同治三年亦曾南下，赋《途次哭义首罗冠英三十四韵并序》。

## （二）过程

林豪数次随意游览竹塹及府城之间，复从当时奉官方命令办理团练的林占梅诗文中得知戴潮春事变的数据，对遭遇兵灾的残余堡垒、遗迹废墟，了然于胸。于是“辄与其贤士大夫、田间野老纵谈当日兵燹流离之故，因即见闻所可及者随笔札记。近又博采旁搜，实事求是，得戴逆所以倡乱者，原委犁然矣”。<sup>②</sup>

林豪曾说：“凡载记之文，宜实事求是，无偏无饰。是以野叟之传闻，质于当轴之封事；老兵之偶语，确于大帅之文移。某尝往复郡垣，辄与田夫、老卒纵谈兵燹乱离之故，随手札记，得数百楮；比归，发篋编次，以成此书，盖易稿者屡矣”。<sup>③</sup> 为了实事求是，验证真相，曾经将此书书稿修订了三四次才定稿，可见林豪的认真及谨慎求实的态度。<sup>④</sup>

## （三）内容

林豪在例言中说：“鹿洲蓝氏纪朱逆事、富春周氏纪张丙事，皆以长编综贯颠末；愚恐无此笔力也。且载逆踞城久，党羽甚众，调兵十余起，头绪尤繁。况同一时也，而鹿港、淡水、嘉义分头攻战，吴帅、曾镇、张守同时用兵。林镇进军之时，正林方伯拒战之候。大甲被围者四，嘉义围攻者三。似难一气贯穿，故必分类编次，始有条不紊也”。<sup>⑤</sup>

林豪对于戴潮春民变的书写，系仿照赵云松先生《皇朝武功纪盛》及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魏源《圣武记》之体例，按照类别予以编辑排列次序，并于每篇文章之末作评论。林豪并说明无法一气呵成以长编综贯全文始末书写之因。主要因为戴潮春案附和的党羽甚多，同时起兵者数处，有如遍地开花，难以一气贯穿，故必须须分类编次，才能有条不紊。《东瀛纪事》初稿成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成书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共分上下二卷，卷上分成《戴逆倡乱》《贼党陷彰化县》《郡治筹防始末》《鹿港防剿始末》《北路防剿始末》《大甲城守》《嘉义城守》《斗六门之陷》《南路防剿始末》九小节，卷下分为《官军收复彰化县始末》《涂库拒贼始末》《翁仔社屯军始末》《逆首戴潮春伏诛》《黠虎晟伏诛》《余匪》《灾祥》《丛谈（上）》《丛谈（下）》九小节。<sup>⑥</sup>

林豪在《东瀛纪事》一书的编写上，系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体例由南宋袁枢所开创的“纪事本末

①② 林豪：《自序》，《东瀛纪事》，南投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第1页。

③ 林豪：《吴序》，《东瀛纪事》，第3页。

④ 林豪：《黠虎晟伏诛》，《东瀛纪事》，第48页。

⑤ 林豪：《例言》，《东瀛纪事》，第5页。

⑥ 林豪：“目录”，《东瀛纪事》，南投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第1~2页。

体”，分为卷上及卷下，共十四篇，正文书写民变各特定事件的始末，文后附对该事件的论断，乃林豪自己针对该事件的评论及批注；《余匪》乃记述戴潮春事变同党于同治三年至五年陆续平定的过程；《灾祥》记载戴案各起事件发生前后的天象、灵异事项；而凡正文不能记载的，均编入于丛谈中。丛谈分为上下二编。下编多为拾取收集的典故，而与戴案无关。

林豪于同治五年写成《东瀛纪事》后，曾请时为淡水厅官署幕僚兼诗友的吴修轩写序；林豪则于同治九年十二月完成自序，但未刊行。至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以小巢居阁刊印。

## 六、编修《淡水厅志》

### （一）缘起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淡水厅同知严紫卿倡议修编淡水厅志，征询地方意见，认为来自福建举人林豪足堪重任，乃亲自拜访当时寓居竹塹城的林豪谓：“淡水垂百余年，考献征文，仅得郑仪部《志略》二卷，大都摭录郡乘，难资考证”。于是在明志书局设局，聘请林豪总主笔负责修志。林豪原自觉才疏学浅，予以推辞婉拒，而林占梅又极力鼓励怂勇，林豪乃勉予同意。于是在仲春商订体例、开局采访。

林豪既已入局总辑，乃申请台湾道吴大廷命训导刘松年（苍石）监办局事，分任者为林占梅、林绍唐（时宾），分校者为明志书局山长黄南、举人陈维英、苏袞荣子褒、浙东生员张揆卿、候选盐大使刘椿（鲁生）、候补从九品余宽（子和，浙江人）等。林豪有志局书怀示诸同事二首：

淡水征文献，于今二百年；风霜濡大笔，兵燹感遗编。  
扫榻高朋集，扶轮地主贤；千旌勤下问，礼意极殷拳。  
一代名山业，千秋俎豆开；烟云资润色，坛坫属清才。  
往事悲淘浪，高文压选台；相如消渴甚，附骥好追陪。<sup>①</sup>

十月，《淡水厅志》稿成，凡十五卷，稿成，署台湾道梁元桂并为之撰序。其后因为林占梅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十月二十九日过世，而淡水同知严金清亦卸任，林豪也回金门，前往澎湖，因此一直未能刊行。林豪所编纂的《淡水厅志》今已佚其书，现只能就其后的《淡水厅志订谬》及其它相关数据拼凑出其篇章内容。陈培桂任同知之后，另外延请候官杨浚修之。杨浚，文士，无史识，多方改窜。林豪大愤，乃撰《〈淡水厅志〉订谬》以弹之。

林豪在编修《淡水厅志》期间，亦曾与林占梅选取闺秀之可传者，各系短歌，以作为采风者浏览，即《淡水志局杂咏五首》各为《围城雨》《负翁行》《盆中金》《剪舌哀》《牵衣哭》。<sup>②</sup>

## 七、寓台诗文探究

### （一）对林豪在台诗作的评论

林豪在台，共留下台阳草上100首、台阳草下98首。其中大部份诗作均为在台七年所作，唯有《自澎湖买舟渡台湾》三首、《寄怀余子和少尉》二首、《台湾尚书亭梅花》三首、《重到台阳感赠》八首、《客中送春曲仿春江花月夜》等诗作，就其所述内容涵义，应是林豪首次任澎湖文石书院山长返台停留台湾之作，时间约在同治九年底至同治十年春。<sup>③</sup>

有关林豪在台诗作，除了林占梅有《与家卓人孝廉论诗》：

①②③ 林豪：《涌清堂诗集》卷七，《台阳草下》，第1-2、4-8、23-26页。

生平趣向正无偏，使典驱坟出自然；遣兴不分唐宋格，耽吟常见性灵篇。

呕肝莫漫追长古，得手何须托惠连！脱去浮词医尽俗，红尘关过始成仙。<sup>①</sup>

其意谓在诗歌格律、文字驱遣能力上的熟悉，已经臻至随吟成诗的创作地步了。而后自己也渐有一番作诗的心得以为作诗当笔随意走、抒发性灵，强调使典自然、褪去浮辞滥调，无庸去分别唐宋格调。

王松的《台阳诗话》中论林豪集句谓：

林卓人孝廉（豪），金门人；游台，馆于林雪村方伯家，宾主甚相得。有题《潜园钓月桥》云：“一竿冷浸桥边月，万叶阴垂涧上亭”；尚见流动之致。孝廉又好集句；此体如满屋散钱，个个上串，唯其线索在手，故能以古人之词为我之词，随意掇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者。<sup>②</sup>

黄美娥的博士论文《清代台湾竹塹地区传统文学研究》将林豪列于“清代台湾竹塹地区重要流寓作家及其作品”章中讨论，分别就其生平概略、著作、在台行止、在台诗作主要容以及在台诗歌写作特色等节加以讨论。黄教授评析其在台诗歌写作特色有三：1. 诗歌语言散文化。2. 擅用顶针修辞。3. 好作歌行古体。<sup>③</sup>

林豪在台诗作以五、七言律诗居多，范围广及游历、园林、叙事、兴怀、咏史、咏物、题画、亲友等类。

## （二）林豪在台诗作及其年代考证列表（依台阳草上、下各诗顺序）

诗作	年代	考证	备注
谿之东瀛杂刻	同治元年	《东瀛纪事》自序：余自壬戌七月应淡水族人之招，买舟东渡，拟便道南下访友。壬戌即同治元年。	以下为台阳草上诗作
舟入八里坌口	同治元年	舟入当时清淤开于渡台湾三大渡口之一：八里坌。林豪7月坐船到八里坌。	
暮秋抵尾庄野望二首	同治元年	林豪初抵台湾，居艋舺，闲暇时赴景美。鸡笼头渡口晚眺。	
是先长兄杀贼殉难处	同治元年	林豪居艋舺期间，到基隆凭吊其兄殉难处。林豪长兄于1953年殉难。	
招魂曲有引	同治元年	林豪居艋舺，里人设道场于龙山寺，超渡亡魂。	
题仙人对饮图	同治元年	林豪题图诗。诗作列于挽家龙江之前。	
同友人冒雨泛舟游剑潭，晚宿潘少江员外斋中	同治元年	林豪居艋舺，云游山水，与诗友游剑潭。诗云：…我从海外搜山水，此游殊足夸亘盟…。	
挽家龙江镇军并序	同治元年	林豪原受龙江镇军林向荣之邀来台，并欲南下拜访，后因林向荣率兵平戴潮春事变，同治元年9月19日与弟而显同殉难。林豪闻讯，挽诗致哀。	
遗闷二十二韵	同治二年	同治二年，林豪仍居艋舺，赋诗遗闷。诗云：海邦汗漫游，南北游将遍。兼故音书稀，家山望眼倦。匆匆两度春，忽忽一闪电。…。	林豪于同治元年抵台。
赤嵌城怀古二首	同治二年	林豪未寓居潜园前，曾南下府城随意游览。〈遗闷二十二韵〉诗云：海邦汗漫游，南北游将遍…匆匆两度春…。	
五妃墓	同治二年	林豪南下赤嵌城时，顺道游五妃墓。	
虎尾溪	同治二年	林豪从府城北上，过云林虎尾溪。	

① 徐慧钰选注：《林占梅集》，台南市：“国立”台湾文学馆，2012年，第207页。

②③ 王松：《台阳诗话》，南投：台湾文献委员会，1994年，第43-44、43-44页。

诗作	年代	考证	备注
初十日,次嘉义县二首	同治二年	从府城北上,途经嘉义县赋诗。诗云:…去岁红巾似猬张,登埤饮血气逾扬…副将王国忠守城数月,后从林镇;斗六门之溃,骂贼被害…。	副将王国忠于同治元年九月殉难。
大肚溪	同治二年	从府城北上,过中部大肚溪。	
房里溪即景	同治二年	从府城北上,过中部房里溪。	
同年陈迂谷中翰斋头,观袁笋咳师遗墨,感赋	同治二年	林豪与同年举人陈维英观袁笋遗墨。	
陈迂谷夏年所居怡园之西,因山构屋,题曰《太古巢》,前筑八卦潭,上有鸡鸣石诸胜,余一再过访,同年出诗索和,次韵奉酬二首	同治二年	林豪居涵耀,一再过访夏年举人陈维英居处,与诗友唱和。	
闻雪村都转连战皆捷,遂复彰化喜作四首	同治二年	林占梅于同治二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南下,11月3日克复彰化城。 诗云:…去岁传兵日,狼烟大甲昏…。去岁即同治元年戴濂春举事。	
题蝴蝶图三首	同治二年	估林豪此时已抵潜园,所赋题图诗。诗境与用诗与未抵潜园有所不同。	
和雪村都转《书叹》之作,即步元韵四首	同治二年	林豪抵潜园后与林占梅之唱和诗作。	
风筝曲	同治二年	林豪于秋天之诗作。诗中谈及…此际秋怀锁未开…雪村观察多情者,中年心绪谁陶写…。林豪此时已抵潜园。	
初到潜园,呈主人雪村都转	同治二年	林豪于夏秋之交抵潜园,呈送主人林占梅心情感赋。	
雪村都转馆余于碧海堂,命其姪人杜淑雅、侍儿芳奴从问字焉,主人首唱一章,征园中群客属和,次韵奉二首	同治六年	林占梅于同治六年十月初三纳侧室杜淑雅。并命侧室杜氏及侍儿芳奴问学于林豪。	
读雪村都转《军中八咏》奉题	同治二年	《军中八咏》为林占梅督军南下及归程诗作,林豪读后赋诗	
对月	同治三年	诗云:客怀冷似天边月,月正圆时客正孤;多谢嫦娥真解意,三年伴我到边隅。 三年指林豪渡台三年。	
客怀雪村方伯	同治三年	林占梅经常四处游览山水名胜,本文编排于题并蒂菊花二首之前,林豪似已熟悉潜园环境,且不见遁仙近半年,应是同治三年诗作。	
题并蒂菊花二首	同治三年	诗云:…三载羁栖海外天,秋来瘦影有谁怜…。三载指渡台三年。	
闻官军收复金陵,江浙等处一律肃清,喜而成咏	同治三年	指曾国藩率湘军打败太平天国,收复南京等地。林豪闻讯,喜极赋诗。	
再寄雪村主人四首	同治三年	在潜园作。	
过大甲溪二首	同治三年	同治三年,林豪南下府城,经过大甲溪诗作。	
途次哭义首罗冠英三十四韵	同治三年	序言:…时同治甲子四月,识于识于赤崁郡城旅次。 甲子即同治三年。	

诗作	年代	考证	备注
淡水迎神曲	同治五年	竹塹城迎神，林豪赋诗。	
逐疫行 同治丙寅，在淡水作	同治五年	同治丙寅，在淡水作。丙寅即同治五年。	
后逐疫行	同治五年	同上。	
潜园小螺墩纳凉漱上相思树 甚多	同治五年	林豪在潜园作。诗编排在逐疫行后。	
集唐题雪村方伯悼亡诗后四首	同治五年	同上。	
闻警时粤寇夺世贤踞漳州， 金、厦等处戒严	同治三年	同治三年十月，李世贤占领漳州。	
不寐	同治三年	同上，其时金、厦等处戒严。林豪心系家乡，诗云：忍泪封家信，排愁祀客厨…。	
潜园秋日感兴	同治三年	同上，林豪于秋日感赋。	
书叹	同治三年	感叹戴潮春兵变，系严酷官吏所致。诗云：…千家破碎魂成市，四顾萧条血满城；安得道州勤抚字，春陵一曲慰群情。	
移寓云香馆二首 门前多种桂	同治五年	诗云…吟声雏凤识清才，午课刚完晚色催；低唤侍儿奉绣幕，桂花香里抱书回。林豪教课后赋诗。	
奉题吴修轩先生东溪草	同治五年	林豪为吴修轩著作《东溪草》题诗。	
祈雨谣	同治五年	与逐疫行有异曲同工之趣。	
九日集社	同治六年	林豪病中作。	
春日园居杂兴三十首	同治六年	林豪病中作。	
园中闲趣二首	同治六年	林豪病中作。诗云：卧病江干阅岁时，晚来携杖步东篱。	
丙寅除夕，嘉义陈七榕士、 山左刘四鲁生、汀州戴三筱 林豪饮园中寓斋，率成二首	同治五年	丙寅除夕，嘉义陈七榕士…丙寅即同治五年。	
志局书怀示诸同事二首	同治六年	序曰：丁卯春，淡水严紫卿司马创修厅乘，招余入局总辑… 丁卯即同治六年。	以下为台阳草下诗作
正月初二日望玉山	同治三年	《东瀛纪事》“灾祥”述曰：…甲子正月初二日，余在潜园，人传玉山见矣，余登瞻望台… 甲子即同治三年。	
清明日祭亡友吴修轩二首	同治六年	吴修轩曾于同治五年秋节前夕为林豪《东瀛纪事》写序，逝于1867年， 即同治六年。	
园中新构邻花书舫落成，移 寓其中，赋此奉谢雪村主人	同治六年	林豪移居邻花书舫。诗作编排在亡友之后，亦是同治六年诗作。	
斋中闲兴	同治六年	诗云：阿谁相访子云居，扫地焚香自著书…。著书指《淡水厅志》。	
晓起	同治六年	在潜园诗作。	
自题宗颜问字函	同治六年	诗云：…自笑羸栖今五载，论诗赢得女门徒。林豪于同治二年寓居潜园，羸栖五载，即同治六年	
送张揆卿归赴浙闈秋试	同治六年	林豪送《淡水厅志》分校者张揆卿赴京会试。	
桥亭口占	同治六年	林豪在潜园诗作。	
淡水志局杂咏五首	同治六年	序言：同治丁卯春，家雪村方伯占梅与严紫卿司马倡修厅志，属余总辑…。丁卯即同治六年。	

诗作	年代	考证	备注
严司马视疾寓园，赋诗奉谢	同治六年	同治六年，林豪编修《淡水厅志》，患病，淡水同知严金清等至潜园探望。	
送内弟旋里	同治六年	诗编排于严司马视疾寓园之后，应系同治六年。	
重修德政祠歌	同治六年	同上。	
咏台阳古迹十二首	同治六年	林豪编修《淡水厅志》，整理台湾古迹十二处。咏诗记之。	
春日雪村主人挈眷偕游青草湖，祭扫其继室陈氏墓，即事集唐八章	同治六年	林占梅继室陈夫人于咸丰9年（公元1958年）林占梅每年都会去祭扫陈氏墓。	
萤	同治六年		
喜晤里中族人，即送其旋粵二首	同治六年	同治六年，乡亲来访，林豪…深谈坐到三更…何时泛棹随东去…。有点开始想家乡。	
喜晤周书莲	同治六年	同治六年，林豪友周书莲来访，诗云：…今年归计吾能决，应共衔杯坐小篷…。友人有劝林豪返乡之意。	
客中杂感四首	同治六年	林豪在潜园感怀，诗云：…自客东瀛北，名园养痾宜；红颜犹问字，青鬓已添丝…。同治六年，林豪生病，林占梅妻杜淑雅同学。	
乞菊	同治六年	林豪在潜园诗作。	
忆鹭门四首	同治六年	林豪已回故乡，开始忆起厦门的名胜古迹。	
邻花书舫对菊	同治六年	林豪移居邻花书舫，秋天诗作。	
岁暮书怀	同治六年	同治六年，林豪生了一场病，感怀特别多，有诗云：卧病天涯半载中，身如秋叶卷霜风；吟多祇自书孤愤，日暮凭谁送五穷。有梦还家随旅雁，无衣卒岁笑寒虫；年年海外成何事？几卷新诗两鬓蓬。	
集社再题吴修轩遗稿	同治六年	吴修轩逝于1867即同治六年，林豪整理其遗稿。	
送吴四小帆内渡	同治六年	应时同治六年岁终诗作。诗云：名园聚首两年同，此别何堪岁又终…。	
鳌山访友二首	同治七年	鳌山即台中清水牛骂头山，林豪南下返金顺道访友。	
重到岷城，寓同里蔡茂才家，感而赋此	同治七年	诗云：…余于甲子初夏到台郡，为茂才哲弟永勉题小照；阅今五载…。甲子为同治三年，阅五载即七年，诗于返金前。	
凄望	同治七年	林豪离开潜园，南下途中所见感赋。	
戊辰元旦，即席作	同治七年	戊辰为同治七年。	
留别潜园二首	同治七年	元旦过后，林豪即准备离开潜园感作。	
暨南道中，书所见四首	同治七年	林豪离开潜园南下途中作。	
顶店田家即目	同治七年	林豪离开潜园南下途中作。	
夜登台郡西城望远二首	同治七年	林豪离开潜园南下至府城。	
岷城寓处和友	同治七年	林豪离开潜园南下至府城寓友处。	
旅次书怀，示家诗宾广文	同治七年	林豪北返途中作。	
重到彰化与雪村方伯话别，时漏筌四下矣二首	同治七年	林占梅于2月21日造访台湾道吴大廷，时在彰化，林豪前往告别。	
忆潜园四首	同治七年	林占梅离开潜园在中部返金前作。	



诗作	年代	考证	备注
重到鹿港话别	同治七年	林豪离开彰化，到鹿港与友人话别。	
归舟口号	同治七年	林豪踏上归途，其友施上舍甘澍殷殷相送，及涯始返。	
自澎湖买舟渡台湾	同治九年	澎湖于同治九年任澎湖文石书院山长期满坐船赴台诗作。	以下非首渡台湾诗作
寄怀余子和少尉二首	同治九年	林豪自澎湖返台访《淡水厅志》分校者余子和，听闻余子和将至澎湖诗作。	
台湾尚书亭梅花二首	同治九年	林豪自澎湖返台仍滞留台湾。	
重到台阳感赠八首	同治九年	林豪自澎湖返台再到府城。	
客中送春曲仿春江花月夜	同治九年	林豪自澎湖返台仍滞留台湾。	

## 八、结论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七月，林豪32岁，应淡水厅（即今之台北市、新北市及桃竹苗地区）族人之邀请，买舟东渡，在台湾北部的八里坌口（今淡水八里）登岸。

林豪初抵台湾，寓居肹肹，观察情势。在这段期间，林豪原拟南下拜访时任台湾镇挂印总兵官林向荣，时因戴潮春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起事于彰化，林向荣统兵进剿，先解嘉义之围，转战进驻斗六门。五月，戴党犯斗六门，林向荣镇粮尽被困住，九月十七日夜，林向荣与胞弟生员而皋，暨副将王国忠等俱殉难。因此，林豪未能拜访到林向荣镇军，未来去向不定，心情是有些郁闷的。

林豪起初四处漫游，南北游将遍，顿感进退两难之际，所幸在肹肹的旅馆与正奉官方指令兴办团练的林占梅会了面，因同为诗友，一见如故，林占梅乃邀请林豪到他在竹塹城内的潜园别墅居住，此时已为同治二年秋夏之际。

林豪在潜园的居处，初馆于碧海堂，后移寓雪香馆，最后居邻花书舫落成后，改寓于书舫，也是林豪在潜园最后居处。林豪对所居寓处，均能淡然受之。

林豪在潜园中的日子不算短，生活暂可安定下来，比起在肹肹的日子，自然惬意多了。但书生本色不改其多愁善感的性情，林豪居潜园的诗作可包含多个层面，或心情抒发，或忧心国事，或感怀故里，或著书吟咏，或诗友唱和，或纪游览胜等，均可在台阳草诗文中见其迹横。

林豪居留潜园四年多，除了处理林占梅私人的书信等文书工作之外，亦担任女塾教书工作，闲暇时与林占梅及来园诗友唱和诗文，此外并薄游中部及南部各处，访视贤士大夫、田间野老，撰成《东瀛纪事》上下二卷。《东瀛纪事》系记载清代三大民变历时最久的戴朝春事变，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林豪首次东渡台湾七年的重要著作。林豪于同治六年（1867年）春，应淡水厅同知严紫卿之邀请，纂修《淡水厅志》。十月，《东瀛纪事》稿成，凡十五卷，稿成，署台湾道梁元桂并为之撰序。其后因为林占梅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十月二十九日过世，而淡水同知严金清亦卸任，台湾道吴大廷调离，林豪也回金门后前往澎湖，因此一直未能刊行。林豪所编纂的《淡水厅志》今已佚其书。

林豪在台湾，共留下台阳草上100首、台阳草下98首。其中大部份诗作均为在台七年所作，唯有《自澎湖买舟渡台湾》三首、《寄怀余子和少尉》二首、《台湾尚书亭梅花》三首、《重到台阳感赠》八首、《客中送春曲仿春江花月夜》等诗作，就其所述内容涵义，应是林豪首次任澎湖文石书院山长返台停留台湾之作，时间约在同治九年底至同治十年春。

同治七年元旦，林豪在潜园，欢度春节，由于之前故里同乡相继来访，已萌思乡意，潜园岁终饮酒强欢笑，仍难免心怀乡情。

二月中旬，林豪决定返乡，于是南下，途经顶店，并到府城登赤嵌城望远，之后折返至彰化城，二月二十一日向当时抱病造访求见台湾道吴大廷，力求昭雪数年悬案的林占梅话别，当时林占梅病体已极严重，彼此握手已是无力气说话，林豪此时不知不觉眼泪已潜然泪下。

林豪结束七年的台湾之行，于台中梧栖渡口乘船，返回金门。

### [参 考 文 献]

#### 一、林豪著作

林豪：《涌清堂诗集》（上）（下），菲律宾宿务市：大众印书馆，1957年5月。

林豪：《澎湖厅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

林焜焯等纂，林豪续纂：《金门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6月。

林豪：《淡水厅志订谬》，附于陈培桂等纂修，《淡水厅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

林豪：《东瀛纪事》，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

林豪：《涌清堂诗集》，台北：龙文出版社，2006年5月。

林豪著，郭哲铭注释：《涌清堂诗集注释》（上）（下），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9月。

林豪著，顾敏耀校释：《东瀛纪事校注》，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10月。

林豪：《林豪手抄本》，澎湖县文化局收藏。

#### 二、专书

陈汉光等纂修：《金门县志》，金门：金门县政府，1968年。

刘北瓊著：《清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

林文龙：《台湾史迹丛论》，台中：国彰出版社，1987年9月。

杨云萍：《台湾历史上的人物》，台北：成文出版社，1981年。

金门县立社会教育馆编辑：《金门县志》，金门：金门县政府，1992年。

吴德功：《戴案纪略》，收入《吴德功先生全集》，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台湾文献丛刊第47种《戴施两案纪略》。

连横编：《台湾诗乘》，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台湾文献丛刊第64种。

王松：《台阳诗话》，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台湾文献丛刊第34种。

郑用锡等纂，林文龙点校：《淡水厅志稿》，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

王先正等合著：《金门诗文歌谣选析》，台北：设计家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11月。

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厦门市志（民国）》，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

何培夫主编：《金门马祖地区现存碑碣图志》，台北：“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9年。

周凯等纂修：《厦门志》（上）（下），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9年6月。

许达然：《清朝台湾民变探讨》，台湾历史学会编：《中学与国民意识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

洪受作，吴岛校释：《沧海纪遗校释》，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9月。

黄美娥：《古典台湾：文学社·诗社·作家论》，台北市：“国立”编译馆，2007年7月初版。

潘是辉：《林豪的史学思想及其实践》，金门：金门县文化局，2010年7月。

李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

季蒙、程汉：《清代思札史稿》，北京：季威信总出版社，2011年12月。

徐慧钰选注：《林占梅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2年12月。

#### 三、单篇论文

卢嘉兴：《清季流寓台湾编志专家林豪》，《古今谈》第23期，1967年1月。

- 陈汉光：《林豪先生传记及诗文》，《台湾文献》第18卷2期，1967年6月。
- 林文龙：《清末寓台诗人林豪事略》，《台湾文献》第30卷4期，1979年12月。
- 高志彬：《〈淡水厅志〉纂修考一兼论“陈培桂窜改林豪底稿、修改杨凌草稿”说》，收入台湾史迹研究中心编辑：《台湾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89年。
- 方豪：《修志专家与台湾方志的纂修》，收入方豪：《方豪教授台湾史论文选集》，台北：捷纺出版社，1999年。
- 黄美娥：《清代台湾竹塹地区传统文学研究》，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9年。
- 徐慧钰：《林豪之澎湖经历初探——三任文石书院山长》，《澎湖研究第一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澎湖：澎湖县文化局，2002年4月。
- 林濯湊：《在边缘的边缘实践——以清代台湾澎湖文石书院山长林豪为例的研究》，《成大中文学报》第13期，2005年12月。
- 陈国兴：《林氏家乘》手抄，未刊行。
- 高启进：《金门举人林豪与澎湖》，《金门日报》2006年9月25-27日。
- 吴培基：《澎湖文石书院历任山长及史迹考证》，《碇石古石》（澎湖县政府文化局季刊）第47期，2007年6月。

#### 四、学位论文

- 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1975年。
- 潘是辉：《林豪编纂地方志书的理念与实践》，“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6月。

（责任编辑：陈颖）

（上接第77页）

### 崇祯二年己巳（1629）

- 三月二十五日，大学士韩爌等具题上疏，为叶向高请谥，崇祯帝钦点“文忠”。
- 四月初九日，布政司左布政使吴国仕行谕祭四坛。
- 十一月二十九日，布政司右参政徐日久行谕祭五坛。

### 崇祯三年庚午（1630）

元月初十日，葬叶向高于闽县方岳里赐莹。中书科中书舍人吴甘来奉命至，开圻合葬，行谕祭一坛。

（责任编辑：陈颖）

# 曹学佺石仓诗话（上）

陈庆元 辑

（福建师范大学闽学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曹学佺，字能始，明侯官（今福州）人。生于万历二年（1574）闰十二月十五（公历已入1575年），卒于唐王朱聿键隆武二年（1674）。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唐王时官至尚书。曹学佺有《蜀中诗话》一种，唐文治主编《全明诗话》所辑《曹学佺诗话》已全录；周维德先生集校《全明诗话》亦已录之，本辑不再重复收录。本诗话所辑，限于文，诗不收；各则之题为辑者所拟；各则均标明出处。曹学佺《石仓全集》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关键词：**明代文学；曹学佺；石仓诗话

## 论辞达而已

夫文者，官天地而俯万物之具也，入于毫芒而出于八极之表者也。夫子一言以蔽之，曰“辞达而已矣”。子贡言语之科，曰：“赐也达。”沈约之言，亦欲使人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者焉。如是，则文之所重者，可想矣。直而烦者，达之之所趋也；郁而逆者，达之之所背也。然亦有说焉。使不壹郁之于衷，则何以宣而为言？不委蛇之于势，则何以衍而成章？故鲲化鹏，运必以六月息者，气为之也。长江、大河，不能不一曲者，势使然也。

（《苍霞集序》，《石仓文稿》卷一）

## 论明二百年文

我明崇重文教二百余年，作者彬彬称盛矣。要而论之，何以不古若也。其弊有四：夫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汉人上封事必借秦为喻，所从来矣。今谓非《左》《史》《两汉》不可用，至唐、宋、胜国，不一寓目焉，一也；且叙事与议论歧而为两，不能反复交互，二也；好以古人之事傅会今人，使读之难辨，三也；非溢美之言，则多隐讥之语，为谏为诋，四也。前乎二者之弊，北地、毗陵不能免也；后乎二者之弊，济南、弇州不能免也，而况其凡者乎？

（《苍霞集序》，《石仓文稿》卷一）

## 论温厚和平之指

夫诗之为物，非可以一人治也，又非可以一蹴至也。故有栖神寂寞，应变俄顷，心若枯木，动若脱丸，叩其思与机，则然耳。若夫扬推风雅、肆力不朽，则必有切焉、磋焉，而后谓之诗；讽焉、咏焉，而后谓之诗。此倡而彼和，厚积而徐发之，之谓诗也。是故诗之道非可兴、可观、可群者乎？苟无兴、观与群，则易入于怨矣，又非“迩可以事父，而远可以事君”者乎！若舍夫君臣、父子，则又草木之与居，而鸟兽之与群矣。夫圣人非教人怨也，亦非教人之屑屑于逐物也。盖悲乎人生之不齐，而遇之不可以必聊，使其情之有所寄焉尔。寄怨于诗，则怨而不怒也；寄情于物，则夭者、乔者、嚶者、鸣者而皆吾性，天之所发也。诗人之论曰：“诗穷而工。”又曰：“三百篇，皆发愤所为作

也。”而世之轻诗人者，不过曰花鸟之伶官也，烟云之过客也，而不切于事理。噫！是之为论，见标而忘本，偏而不得其正者也。唯夫修己而不怨天，自厚而薄责人，君子之事也；齐乎不齐，物物而不物于物，达者之事也。而后其温厚和平之指，冲夷闲旷之怀，乃于诗有合焉。诗之之道如此，岂其孑然孤立而沾沾自喜者之所能任哉？

（《六李集序》，《石仓文稿》卷一）

#### 论古今文体之变

夫君子之立言所以行于世者，其大要有二：曰诗也，文章也。诗宗三百篇，尚矣。予观古之说诗者，若端木氏、卜氏、毛氏，皆直指某人某事，根极详贍，非仅仅训海其字句而已。文之为《书》、为《易》、为《道德经》、为《太玄》之类，读之皆适于韵，则诗之与文章，实未始岐之为二也。由古之道无意于传，而其言传，其后则有意于必传，而始有专门之学。如为诗则不能为文，为文则不能诗。又其后，则思不能以胜前人，而不得不别为一蹊径，以务新人之耳目，而始有变体之学，如诗为《选》、为近体、为词曲；文有序、有记、有题名、有谀墓种种，不可殚述。至于今日，则体无所不备，必欲兼收之而成集。不如是，则目之为才短、为小家。噫！诗之与文章，其自无而有，自一而二，自成而变，前以开后，而后之必欲兼前，皆势也。即其人口代，亦不自得而知也。

（《王穉玉集序》，《石仓文稿》卷一）

#### 论诗才

夫诗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是故言者足志，而文者足言也。然要之在乎有才，人而无才，安得有情？其志乃卑卑不足数耳。苟志之如是，而言不足以达之；言之如是，而文不足以被之，则其才乏也。

（《刘民部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论《二南》之至情

《二南》，尚矣。夫士之慕女，亦犹女之悦于士也。是故有寤寐之求者，而必有“卷耳”之思也；有怀春之诱者，而必有“摽梅”之墜也，此之谓至情。匪情，则伪物矣，奚采焉？

（《潘穉恭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达乎色可与语情，情之所在而文生

达乎色者，可与语情；情之所在，而文生焉。予于是而序穉恭之诗矣。《诗品》曰：“潘浅而净。”人尚以为恨，予谓不然。夫其言浅者，其情深也；其心净者，其言净也。《西征》之赋，采风备之矣。使安仁不好游，徒文弱自爱，则无慷慨丈夫气，而穉恭何慕焉！

（《潘穉恭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僧诗不作禅语所以为佳

愚公诗古体有气力，五言律奇而险，颇多慷慨悲愤之句，不作禅语，所以为佳。僧家诗苦入禅语，是犹缙绅家有富贵气、秀才有举业气也。愚公遇山水则乐，友朋则乐，夜谈则乐，谈兴则起舞，盖得乎诗之趣矣。

（《石头庵集序》，《石仓文稿》卷一）

#### 诗之道主变

予谓诗之道主变，凡诗家有某集某集，不一而足，皆所以志变也。君宝走三千里，更几晦朔矣。则山川之所登览，风土之所经历，友朋之所应接，不可为不变矣。而其旧刻亡去，非偶也。君宝诗有奇句，新调不为旧套所束缚，盖足以语变者。

（《俞君宝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林光宇诗学能始体

子真意不可一世，始亦未尝私于不佞，既乃同调，甚相赞赏。社中讥其作诗拟能始体。噫！不佞何敢谓自我作法，亦妄意步趋前人耳。子真者，可与共学者也。

（《林子真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论有情与无情

予读子真诗既，复慨然曰：吾人之于世，其信有情耶？其信无情耶？夫情者，能升降乎？神明而死生人者也，人有情而生，则固当为情死耳。春，至艳也，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惟其情之所钟，故不觉为化之所系，如是，而生人、死人又曷既乎？夫惟有情之极，旋为无情，而始能拔于生死之途。

（《子真诗跋》，《石仓文稿》卷一）

### 诗以自然为宗

夫诗以自然为宗。自然者，气之所为也。气在人未有始以前，至足矣。行之于八极之表，而人不知者，风也。惟夫气有淳漓，故风有高下焉。风之散至，令人中心惨怛，生病造热，诃不危哉？达生之士，愤风气之日趋于浮薄，往往托之于酒，以补其所不足，故曰“五斗合自然”，又曰“醉者坠车，而不伤其神全也”。不闻大王之风乎，清清泠泠，愈病折醒。夫彼故终日醉而未尝醉也，第有所托，以陶养其气耳。唯浩然之气无害，乃得为大王之雄风也。

（《折醒草序》，《石仓文稿》卷一）

### 为诗惟日求异

夫人也，因其所同而同之，则莫不同矣；因其所异而异之，则莫不异矣。予与恒屈之为，有不期同而同者焉。而其为诗，惟日求异，以致其同者焉。今恒屈之诗何如哉？其在楚者，非乎在蜀者也；在金陵者，非乎在楚者也。盖馥馥日异而岁不同矣。古之人如是也，其可量乎哉！

（《尹恒屈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不通禅理学王孟失之浅弱

唐诗王摩诘禅理，“自深孟浩然，有莲花不染”之句，稍露其绪耳。今人不通禅理，而学王、孟，多失之浅弱，是未得其肤也。夫神气不存，则其容色立槁矣。刘须溪评，寥寥有趣，是于壁上淡影，而仿佛见之。严沧浪、高廷礼之所取，皆本此味。二公皆闽人，闽人之祖王、孟者十室而九也。海内言诗有闽派，不失正调，但有弱而不振之弊，非诗之罪也，亦非其地与人有限之也，苦未解禅理耳。

（《丘文举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性好作古诗

余性好作诗，蜀中殊有诗料，尤好作古诗，而蜀料尤古。乃以簿书之冗，兼摄之劳，无暇于诗也。间或作一二首，如欧阳公所称“三上得之”，往往就近体，取其易成而已；然则去古远矣。

（《蜀草小叙》，《石仓文稿》卷一）

### 论咏怀诗

夫咏怀固自难，其指物虽广，射意则专；积之者久，发之一时；繁简深浅，惟其所适耳。后来拟此体者不少，声咏且勿论，予不知其所怀为何物也。夫苟当乐而哀，则必有当哀而乐者矣。

（《章吉甫咏怀诗跋》，《石仓文稿》卷一）

### 论性情

夫诗之为道，本乎性情，而其用以之风世，乌可已也。何则？夫性至一也，情感诸物不一也，固出乎性，而阅乎世矣。世之隆也，于是有忧其治之之思焉；而其散也，于是有挽其重之之想焉。知其

势之所必至，而预为已至之言，则情见矣；知其情之难返，而要以不得不返之理，则性见矣。是故终风且霾，天之昧也；高崖为谷，地之亏也；绿衣黄里，服之奇也；赤狐白鸟，物之妖也。夫征以变之道，则诗尽之矣。而要之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有所补救，使夫性情不失其正者焉。是故为嗟叹之，咏歌之，从容而不迫。言之无罪，而立教足以法，此物此志也。

（《谷城山馆诗序代》，《石仓文稿》卷一）

#### 张民表谓能始诗酷似陈子昂

予与中牟张民表善，民表许予诗，以为酷似陈子昂者，予谢弗敢当。子昂诗风骨凛峻，文词弘丽，在唐第一人。

（《重刻陈子昂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李攀龙不知古诗

殷璠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殆为实录。李于鳞谓唐无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于鳞不知古诗，又不知律诗与古诗分之非，是不知六朝排偶已成近体文，不知唐人精邃全在古风。本肆讥弹，反征肤浅矣。

（《重刻陈子昂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诗不涉议论则细，禅不着知见则圆

然子美自言入夔之后，于律转细。子美平生虽不谈禅，然诗不穷不工，禅不穷不精。诗不涉议论，则细；禅不着知见，则圆。其关捩，殆有合焉。人之一身，志与气恒相胜，魂与魄若递换，而以达者论之，一身而有二物，无是理也。故人不深乎禅理者，未有知诗者也。

（《水明楼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谓七子非真诗友，不可也；己诗非学七子

今之谈艺者，必师古则，而诋乎七子。七子之于诗，未知孰造其极，而谓此七君子者，非真诗友不可也。彼以气类横行于一世，不知天之高而地之下也。诗固有浅深，七子之中又自为浅深，今乌暇辨之。乃今无七子之友矣，又何论诗也……窃有以窥夫毅夫之孜孜汲汲，不能忘情于予，非重予也，重予之诗也；非重予之诗也，实自重其诗也。以此取友，则有友矣；以此论诗，则有诗矣。是犹有七子之风也。予与毅夫，皆非学七子之诗者也。

（《俞毅夫水部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论诗法

法之体方，而其用圆；其理若易尽，而实难尽。体不必别，创意不必特起，自能运之于无穷而出之。若新人见之，以为平易，而不知其经几炉锤、费几曲折而后成此。此法家之作也。故在一篇有一篇之法，在数篇有数篇之法。《乐府》之词，不可以入于诗；《选》体之句，不可以入于律。立意欲高，恐涉乎议论；用事贵巧，当出之无心；浑成之句，不拘乎对偶；恰好之字，难得而移易；体一见而即辨意，屡索而难知。妙在于有意无意之间，意之微者，乃法之所为寓也。夫如是，何分乎述、作，何间乎古今，此诗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性情相表里，而不容已焉者也。

（《陈振狂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五古最难

振狂诗，篇篇有意，而字句不苟用，于五言《选》体少让，曰：“非其所习也。”……予于古人诗有泛爱之弊，不能如振狂专，间有稍近少陵处，振狂必击节曰：“少陵！少陵！”振狂以予五言古诗开口即是，予以为平生所最畏难，不敢易视之，而振狂不之信。此振狂之所以不甚谈此也。

（《陈振狂诗序》，《石仓文稿》卷一）

### 论作文求新反落套

今之作文者，如人相见，作揖曲躬之际，阔别致谢，寒温都尽；及其挾茶对坐，别无可说，不过再理前词，往往重复。又如俗人唱曲，以一句为数句，以一字为数字，不死不活，希图延场；及其当唱之处，则又草草读过而已。噫！此所谓时套也。今之作揖不如是，则人必怪之；唱曲不如是，则无人击节赏音。作文之趋于时尚，亦如是矣。其病在于无师友传授，而少浸润之于义理，徒逞其私臆，求作新奇，不知反落套矣。

（《钱伯庸文序》，《石仓文稿》卷一）

### 天下之士无不愿交于王稚登

吴门有王先生，交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无不愿交于先生也者。先生不藉于天下，而天下不能不藉乎先生。是故开阁公孙，必延虚左之席；好客临邛，往修都亭之敬；绅冕之士，以此缓其王程；求羊之侣，以此披其三径。于是乎，千里之外慕义而来赴者，一家之内累世而修好者，又有不分四民之业、愿望见颜色而退者，若曰：“过吴门而不谒王先生，则为阙典；得谒王先生，亦不虚此行云尔。先生则皆饮之以和，接之以礼，无亲疏、贵贱、智愚、贤不肖，而待之如一，使人人各当其意而去也。天下可以不藉于先生，而不能不藉先生之一言以为重，是故得季布诺，贵于千金之与；怜范叔寒，胜于绨袍之赠。好事家藏，以此增其声价；出门于役，以此壮其行色。于是乎，人子以之称觴，则亲喜者；士林以之羔雁，则人售者。又有以径寸之纸，易三尺之童，亦弃其所爱者。若曰：“当吾世而不得王先生言，何以自比于人；数得王先生言，可以无憾矣。”

（《赠王百谷序》，《石仓文稿》卷二）

### 论经术为根本词章为枝叶

我明累世右文教化，熙洽已二百四十年，其于儒道非不重也，载籍非不博也，而学者往往不竞之于经术，而竞之于进取。托言理学，而略英华；妄意禅观，而空文字。间有染指于词章、粉饰乎风雅者，则又为枝叶之末，其于本根无当也；沟浚之盈，其于江河无当也。岂天之欲丧斯文与，抑今之人性与古人殊与？

（《赠梅禹金序》，《石仓文稿》卷二）

### 论文字语言为流连光景妙乐之资

侂自墮地以来，浮湛于苦海，流浪于业途者几四十年矣。向者三十二岁时，眼观室人之暴殒，因念世间之无常，发心皈依，广作佛事，冀欲拔度幽冥，增长道业。奈机缘之未就，罔身体而力行，以文字语言，捏作性命之本，以留连光景，无非妙乐之资，虽博虚名，只滋我慢。

（《拜水忏疏》，《石仓文稿》卷四）

### 论同社僧秀公诗

秀公一宿一餐之外，空诸所有。初出家时，深心猛力，刺血书《华严尊经》一部，而间或作诗，则诸体悉备，即老于词家者不敢望焉。以此为王弇州诸公所称赞，亦大章赫矣。

（《秀公住山疏》，《石仓文稿》卷四）

### 作诗本之古风

愚意谓作诗如习书识字，一般作诗而不本之古风，犹乎书不由篆隶，字不由六书也。然古风之内，溪径最多流。而近体各有去向，如江河之委，人知其源；名门子弟，世辨其族。在高明者，一见了然；即寻常之辈，逐渐可寻。故钟嵘、殷璠评鹭，定云其源出于某某，非浪然也。吾侪少壮，制科、吏事夺去八九，赖此一点，识趣尚存。而山人逸客，必待功名，绝望方来染指。此路不通，安望彼路？既无超诣之见，又乏沉潜之功，安能进乎？某海内交游，名下几遍，日月一至，亦罕其人。孟德所云：“使君与操，雄心勃勃耳。”三复大篇，名理英致，博如平原，逸如青莲，渊渊金石之音，



非凡奏也。但诗之道，贵乎咏叹，反而后和，绰有余音。元微之云：“他人不足，甫乃厌余。”又唐人精蕴全在古诗。李于鳞曰：“唐无古诗。”噫！是何识见，是何说话！聊尔举出，丈必辄然笑之，相与勸勉云尔。

（《复邓远游侍御书》，《石仓文稿》卷五）

#### 今人谈诗之得失

今之谈诗，以视宋、元，迄于隆、万，互有得失。夫诗犹知有六朝、初、盛名目，是得也；而其一段认真气习，绵密工夫，个个少此，是失也。又以不作为高，不梓为贵，不但汉、魏、六朝贗，即陶、韦、王、孟亦贗，乃失之失者也。其最可厌者，以俚俗之语，溷清华之物，又或杂以道情禅唱，便云出世高怀。如此，则刘彦和《情采》之篇可废，而《水浒》《昙花》等戏可掩元时当家手矣，则又得罪于风雅者也。

（《复邓远游侍御书》，《石仓文稿》卷五）

#### 评诗之谏与规

使君谦抑不自满，必欲予鉴定，因属予序，必欲规，不欲谏。夫谏，称诗之所不敢出也。且与使君是何等交情，倘必欲规之，无已，使君诗声调尚其清，对待尚其巧，藻思翚翮，读之令人齟齬而释。间或有词掩体、才胜法处，予业为使君割爱，不复存矣。然必求合作，亦古人之所难。予与使君之所当共勉者与！

（《蒋国平使君阁草诗序》，《石仓文稿》卷之《浮山》）

#### 作诗“七有”“三尚”可避俗

作诗须先辨“雅俗”二字。此二者，虽得诸天较多，然要之，以熔炼胜。何则？谈艺家所举俗之病，不过以其有时套，乏心思，两端尽之矣。出乎俗，则雅矣。然予所谓雅者，宁斤斤免俗而已。诗有体裁，即章法也；有声调，即句法也；有采色，即字法也；有性情，才不支离；有根据，才不杜撰；有源流，才与古人不相悖；有变化，才不为古人所窘缚。之数法者，种种具备，而后谓之雅。是故体裁尚其正，不则俗；声调尚其和，不则俗；采色尚其清新，不则俗。俗多贗，有性情乎；俗多跳脱，有根据乎；俗多趋时，能古人即我乎，能我即古人乎？雅之与俗若径庭，然而常迭为胜。黄鲁直云：“子弟凡病皆可医，惟俗不可医。然惟读书可以治之。”噫！此即谈艺之法也。

（《胡白叔阁草诗序》，《石仓文稿》卷之《浮山》）

#### 论避俗之道

譬若有人焉，空腹不读书，出入无礼法，风气不道上，师表无老成，而但以手不握牙筹、口不称阿堵、身不亲琐屑者，而即谓之雅乎？诚恐其蹈于俗而不自知耳。予又与白叔论诗，譬若书者、弈者、讴者，其初未有传授，罕窥古法，而但本一己之聪明，则必趋于邪路，终其身不能精进，必不能成名。然稍就规矩，效法古人，其难乃若登天。世人往往畏难而乐其所易，势不可挽，只误一世耳。曹子建云：“文之佳恶，吾自知之。”夫有少年习之，白首而不自知者乎？自知之，自讳之耳。一经点破，无所遁逃。及乎他作，亦复如是。岂有佳理？此无他，其中距者坚也。

（《胡白叔阁草诗序》，《石仓文稿》卷之《浮山》）

#### 诗道性情不随景物为丰塞

友人孝廉吴仲声氏深得其指，故其所游函关不甚远，游亦不甚得意。既乏名山大川以倡之，又无骚客佳人以和之，而才思勃勃，不容遏抑。岂必有待而然者与？诗道性情，不随景物为丰塞也明矣。

（《吴仲声函关游草序》，《石仓文稿》卷之《浮山》）

#### 论多风少雅

拙诗超齐梁、三唐以上，则不敢当。谓其多风少雅，叶之宫商者阙焉，此针砭之至言也。

(《复张维诚论诗》，《石仓文稿》卷之《渺轩》)

### 论乐府至汉而尽

侏闻乐府，至汉而尽，曹魏父子质文不能相兼，则五音隳矣。六朝祇摘乐曲中一二语，如“乌生八九子”、“日出东南隅”之类，韵主咏物而已。初唐诸家尚因之，开元、大历似亦迺此不谈，至有被诸声歌者，不过绝句。小令入弦索间，如今所唱《鹧鸪天》《山坡羊》之类，以云古乐，又奚啻若河汉也。宋王安石、我朝李于鳞抄袭全体，略窜易一二字，即谓之拟古乐府，且自夸拟议以成其变化，亦奚取于变化哉！

(《复张维诚论诗》，《石仓文稿》卷之《渺轩》)

### 论诵读古之诗书论其世而后已

又尚论古之人，至于诵诗、读书，“论其世”而后已。予以为古今人亦不甚相远，而颇不相及者。何也？古之人游情于寥廓之表，而其翫精致志处，则凝一而不分；今之人无末节琐尾，而不分其心者，而其意见又苦局促于一隅，此其所以两相背驰而不相及也。夫友古之人而诵诗、读书矣，所难在世；友今之人或同朝而立，同里而居，其世不难也，人与我共之者也。

(《郑汝交文集序》，《石仓文稿》卷之《渺轩》)

### 三山同社开口喜作七言律

友人李玄同去岁游西湖，所杂着不具录，录其七言近体二十首，梓为行卷，求跋于予。予忆湖心亭初构时，徐茂吴有七言律十六首纪之，亦未甚满人意。盖茂吴多用《选》语入律，殊少光华、细润之致，此技亦非其所长也。予三山同社开口喜作七言律，予颇惮难，社中亦欲傲予以所不能，予笑谓：“七言律可多作，则盛唐诸君先为之矣。何但寥寥？”然予间亦有作，如《金陵怀古》《西湖纪游》之类，但不能如玄同廿首之多。予虽少，故不佳；玄同多，亦不必不佳。予于此处乃逊于玄同矣。近日钟伯敬作《诗归》，有评曰：“古人作诗，不肯用多。”是其最得力处。

(《李玄同西湖游草跋》，《石仓文稿》卷之《渺轩》)

### 感春悲秋

予观《诗说》曰：“春至艳也，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然非艳爽不能以相悦，岂二序凉燠时，顾颀自为政耶？秋之色，素里相喻者，谁也？秋之韵，长兴相属者，谁也？则非丈夫士不能，而非妇人女子之所能办也。

(《叶君节秋怀诗跋》，《石仓文稿》卷之《渺轩》)

### 山水入画图；图画肖乎山水

予复有说焉。咏美人者必以花草，咏花草者又必以美人。山水之佳者，固入画图；图画之佳者，又肖乎山水，是故《国风》好色而不淫。相如言工于形，似此皆诗家之正脉，韵士之极致也。

(《叶君节秋怀诗跋》，《石仓文稿》卷之《渺轩》)

### 论简：篇无剩句，句无剩字

汪父母君剡，名其集曰“简轩”，自一集以至五、六集，亦随其年与地而涂次之，不欲取盈焉。简轩之作，语必繇衷，功皆造极，篇无剩句，句无剩字。读其诗，如其人；见其人，如其诗，可谓简也已矣。昔吾夫子与仲弓以南面，曰：“可也简。”而汉、晋之间，品地高贵，始畀以清通简要之任。

(《简轩诗序》，《西峰集文》上)

### 古人之诗常得言外之趣；今人之诗惟恐其有所不尽

夫今人之诗，皆传注乎古诗者也。古人之诗，含蓄处多，而常得言外之趣；今人之诗，务欲言其胸中之所欲言，而惟恐其有所不尽矣。故古诗之所不能尽者，而今人务必于尽之也。则谓其传注乎古诗也，亦宜然。

(《吴汤日诗序》，《西峰集文》上)

#### 诗为时世使然

夫今之诗而能与古诗并行而不悖，虽有质文繁简之不同，而要亦时世使然。诗之不能违世也，犹夫注之不能违经也。性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其正也，将欲合之，必故离之者；其反也，而未尝不归于正也。是必我之才情见地已造于古人之域，而后能周旋曲折以合于变也。

(《吴汤日诗序》，《西峰集文》上)

#### 人心无穷，诗之变化无穷

李于鳞之《乐府》曰：“拟议以成其变化。”今观其《乐府》，点窜古人一二字而已，未见其所拟议谓何，而变化之状何居也？李于鳞又曰：“能不为献吉者，乃能为献吉者也。”其意以于献吉不为也，非不能也。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则后至者巧矣。“谢朝华之已披，振夕秀于未启”，则晚出者鲜矣。是故诗愈历年代，而愈不能尽也。人心无穷，而诗之道益无穷也。

(《吴汤日诗序》，《西峰集文》上)

#### 学诗如负重登山

予友桐城吴君汤日具有诗才，而其体周流，能极其意之所出，而不拘拘于古法。若曰：“我今人也，岂为古人诗者哉？”愚尝谓：“作诗如制器，苟欲合时，必须近古。”又：“学诗甚苦，如负重登山，既登绝顶，其苦自息。俯视一世，皆为微渺矣。”

(《吴汤日诗序》，《西峰集文》上)

#### 论明布衣之诗

至我明，则词赋不入彀矣。自科举而外，又别无以之官矣。然其为布衣称诗者，亦何寥寥也？国初重征辟，岩穴之下，罔遗贤焉。至宣、正、成、弘，征辟亦不行矣。予选布衣而仅得之钱塘刘士亨、吴郡之沈明、古启南、新安之谢一阳、关中之孙太初、予郡之傅丁戊，共数家而已。他若山阳之蒋子孝、金陵之谢子象，虽不仕矣，而皆以子显也。又如桑民怗、祝希哲、文氏父子，仕虽不达，又皆以科贡起家也。隆、万间，乃有谢茂秦、卢次樾、沈嘉则二三君之名大噪。然次樾拥巨赀使酒任侠，而灾逮夫身；茂秦与历下、中道参商，声价亦减。所称令德善交，身名俱完者，独嘉则无愧而已。

(《汪穆如诗序》，《西峰集文》上)

#### 诗无感慨无性情，一陈言耳

有皋大夫过予，道其性情亟欲向往乎风雅，但在都下苦于应酬，而在地方则又未免簿书之为累也。予曰：“诗可以观，志得失也，簿书政事，非得失乎？诗可以群，志离合也，应酬交错，非离合乎？且我观人，亦口自观，得失之中，感慨系焉。我之择人，人亦择我，应酬之中，性情寄焉。此诗之所为作也。诗无感慨、无性情，一陈言耳，固不如无作。然而，舍政事应酬而外，亦安所触发其感慨而抒其性情者哉？”

(《姚孟长秋旻集序》，《西峰集文》上)

#### 言垂训与否听于后世取舍

去岁董崇相赠余言，以予方之少谷先生：“其少年科第，栖处闲冗。以诗名号召海内者略同。”而未且引《左氏》之“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予谢何敢当先生万一，但考鲁穆叔之对范宣子曰：“鲁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此之谓不朽。”按：此即吾夫子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盖人于既歿之后，其言足以垂训与否，皆听于后世取舍之公心，而其人不得而与焉。故《传》又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凡言有者，谓其德，其功与言皆实有诸已，故后日虽久，而不废也。与夫好名之流，袭取于一时而实为速朽者，大径庭矣。

(《郑少谷先生集序》,《西峰集文》上)

### 作诗须有古意与有真境

予每谓:“作诗须有古意与有真境。”然真,则不求古而自古;古,则不期真而自真,亦相因之理也。

(《郭正夫诗序》,《西峰集文》上)

### 论曾巩诗学韦应物

夫欧得李之逸,此本诸眉山之序《六一先生集》也。王学杜而僻,此见诸弇州之序《余德甫集》也。独子固诗,世罕传之,且当时有子固不能诗之语。予谓曾不但学韦,而并得其幽深之致,因摘其《南轩》云:“久无胸中忧,颇识书上趣。”《写怀》云:“终非常情度,岂补当世治。”《七月初一假》云:“初秋尚苦热,休沐乃君恩。”《过介甫归》云:“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靖安幽谷序》云:“常疑此中吏,白首岂思还。”如此等语,即《苏州集》中,恐亦不能数数也。茅评南丰文出入经传,如在孔门听夫子与七十子之论说。董谓其好处有根柢,而类处在重复。余谓《左氏》之引《经》,固非泥其本文;孟子之说诗,亦不以辞害意。南丰之所诵说,以比丘明、子舆子何如哉?是故吴兴之所推尊者,南丰之文。余谓南丰之文,不能以胜诗也。崇相之所责备者,南丰重复之病。余谓古文专用倒法,即诗亦每一唱而三叹也。大抵诗主比兴,文工形似,要皆本诸性情之真,而触以时物之变。若不期于言而言,而言之又若有意若无意,故其妙处若化工之不可名状,若水月之不可摹捉。岂人力所能勉强而思议者乎?

(《李太虚集序》,《西峰集文》上)

### 性情无穷则诗与文之变亦无穷

余观太虚之诗若文,盖本诸性情者,故其厚寄慨而薄雕绩,体物而毕肖,撰境而不虚过。固不必问其所根柢者,某书所摹拟者,某氏亦无暇问其实力于诗者谓何,而专功于文者谓何。而性情无二,则诗与文亦无二也;性情无穷,则诗与文之变亦不可胜穷也。所谓同归而殊途,万虑而一致者,非是之谓歟?余愿与太虚持此道以不变,庶几拟议而日新焉,其可矣。

(《李太虚集序》,《西峰集文》上)

### 论不切之应酬

予又观子桓《典论》云:“富贵则流于逸乐,贫贱则惕于饥寒,日月逝于上,颜貌衰于下。”乃又学者之通弊也。然世间又有非饥寒、非逸乐、不富贵、不贫贱之为患,而日蔽其精神于不切之应酬,以周旋乎世。故此正作无益以害有益,亦即所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者。是故,小慧,大慧之减也;终日,终身之端也。故吾夫子叹其学之之难也。

(《李太虚集序》,《西峰集·文》上,《石仓三稿》)

### 语之为率意者非由匠心不能

予洪江故有社,有楚客来游闽,寓予石仓之听泉阁,因与洪江社中诸子日夕往还倡和,而诗因以成帙,欲刻为行卷,属余弃之。余观其诗,多匠心语,亦多率意语。然语之为率意者,非由匠心不能也……予故曰:“客之诗其率意处,乃其极匠心处。”

(《洪江诗草序》,《西峰集文》上)

### 韵之人籁天籁

诗非韵,士不能作。然而,韵之所寄不同,有寄之以幽者,人籁也;寄之以旷者,天籁也。有寄之以醒者,人籁也;寄之以醉者,天籁也。昔人谓,三杯合乎大道,五斗合乎自然。自然而鸣,有莫知所以然者,非天籁而何?故因醉而为韵,因韵而为诗,斯固籁之所发,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人而天者也。

(《韵醇诗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游宴歌咏暘其郁结之怀

夫修禊虽起自成周，而东晋之永和癸丑山阴为盛。然当是时，宾客凡四五十人，诗或四言、五言，或四句、八句，亦有不成篇者。有竟日无一字者，皆随其意兴所到，而略不增损。其高旷闲适之趣，即王右军《序》，亦以或“放浪形骸”，或“晤言一室”，其要足寄兴，以触目而感怀，一也。然往昔行乐，每于达生之内，而寓忧生之嗟，故曹子建之“西园”、石季伦之《金谷》，亦以人生寿命几何，求仙多误，而不若斗酒娱游之为乐也。兰亭末段归于死生，以齐寿夭等彭殇者为妄。夫既知死生之大，则必有所以疾图其不朽，而赫奕勋名、勒诸钟鼎、垂之竹帛者，始为不虚此生。及其时不我偶，势有所乖，无以暘其郁结之怀，乃相率而为游宴、歌咏，以写生平，以节牢骚。诗不云乎“匪我无酒，以遨以游”，此之谓也。

(《郑圣集诗文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四言古诗

夫古风盖有四言、五言、歌行，为三体。李太白云：“讽味深远，五言不如四言。”是犹以《三百篇》论也。汉、魏四言，具体而已，安问六朝哉！故韦孟《在邹》，赵壹《述志》，皆不录焉。太白四言，得阳幽愤，去古渐漓，惟《独漉》一篇有魏武之风，与“对酒当歌”同其激烈，而和平之旨乖矣。故予以太白所称讽味深远，乃《三百篇》之四言，非汉、魏之四言也。

(《古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五言古诗

至汉五言，乃直接乎风雅之绪，而启我后人。苏、李、班姬，是为鼻祖。中郎、子建，升堂入室，绰然有余。惟《十九首》，或称枚乘，或称相如，皆编之乐府。予以为，《十九首》作者非一人，按之如一律。政如《唐诗》之“正宗”，宋帖之《淳化》，非精金美玉，不以入选。见诸吟咏，则为古风；被诸管弦，则为乐府也。故余于汉、魏五言各分有内、外篇，内篇为古诗，外篇为乐府。有乐府而似古风者，则亦内之；有古风而似乐府者，则亦外之。昔人之编乐府也，以乐；余之选古诗也，以诗而已矣。晋、宋已来，有古诗而无乐府，何者？名下之士重，而房中之音寂也。齐、梁而降，有咏物而无古诗，何者？俳偶之伎繁，而兴象之风鲜也。虽或赠送、游览、闺情、宫体诸什，总谓之咏物而已矣。

(《古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歌行

歌行亦本诸乐府，后世独以其调别之。方整者谓之歌，繁曼者谓之行。故惟七言有歌行，而不知汉、魏五言固自有歌行也。

(《古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唐诗品汇》

夫唐诗之有初、盛、中、晚也，盖国初高廷礼目之也。高廷礼之选唐诗也，所重者初、盛，而不在中、晚。元周弼之选三体唐诗也，所重者中、晚，而不在初、盛。顷闻温陵黄大司马之选唐诗，则以盛唐而寄于初、中、晚之内，谓三唐各有其盛者焉。是之谓“盛”，以合作者言也，非世代之迁降也。然而，治世之音和以平，乱世之音嗷以杀，昔子夏尝言之矣。是故高廷礼之目唐诗而曰初，曰盛，曰中、晚也。实本于唐代之递降，而诗亦随之者也。故其所选诗，而前后无以易之者也。杨用修以廷礼为闽人而不习诗，故其所选亦无足观焉。胡元瑞《笔丛》则以后人之《诗选》《诗删》，俱未必能胜廷礼也。

(《唐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唐诗选本

近日之为《诗所》《诗类》，皆本于《唐诗类苑》，又重在类而不在选也。予友钟伯敬之《诗归》，予又病其学李卓吾。卓吾之评史则可，伯敬以之评诗，则不可。评史者，欲其尽；评诗者，不欲其尽也。唐人之选唐诗也，六家之外，有《才调集》焉。然要之，自矜其所尚者耳。故或首元结，或首白乐天，皆非正论也。宋人之选唐诗也，宋敏求有《百家唐诗》，王荆公又从而去取之，以为尽夫唐诗矣。然今之所行《百家诗》，果皆入选者乎？荆公自叙，以李、杜诗概不入选，故高廷礼亦以李、杜为大家而不入正宗之内。

（《唐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唐诗

予选唐诗，《李集》最多，而杜次之，然皆与法合也。选唐诗而不入李、杜者，不重古风故也。于鳞谓唐无古风，识者哂之。然非观李、杜之古风，则无以见唐古风之盛；非观宋及国初之不以李、杜入选，则无以见唐无古风非始于于鳞之言也。或又以青莲之飘逸而启中唐之门户，少陵之钻研而辟晚唐之溪径，于义何居？曰：“李之才情与古法合，杜之极思与格调合。”故但见其合而不见其离。若大历以下之诸公，纯用才华而蕴藉少矣；贞元以下之诸公，纯用工巧而风致乖矣。其病皆在不习古风也。如习古风，则发扬之气自不足以胜收敛，而工巧之词自不足以易风致，又何必为中、为晚之目乎？故予凡遇中、晚之古风，若获拱璧焉。即有微瑕，必加润色。知我、罪我，不以为懼。而中、晚入选之近体，亦无以甚异于初、盛之近体者，即概名之曰“唐诗”，可也。

（《唐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十二代诗选

余作《十二代诗选》，为期颇亟。或言于予，曰：“子未可以若是，其几也。”予应之曰：“然。顾亦自有说。”

夫诗自汉、魏而下，以至晋、宋、六朝、三唐。予在金陵时，阅选再四，缮写成帙，旋散佚去。予亦不之问，有暇乃更选。或前后并存者，则以今昔之去取，而验乎意见离合之何如也。《鲁论》云：“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夫诗，歌之属也。予不能歌，亦未能和，但日披阅而寻绎之。寻绎不已，若反之之而已矣。

（《宋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宋诗

虽然，宋之为宋，亦岂易言也！艺祖开国，五星聚奎，识者已觐其人文之盛。而当代名德，如寇莱公、韩忠献、范文正、司马温公、欧阳公、王荆公、苏文忠、李忠定、文文山；理学，如周元公、程明道、邵康节、吕东莱、朱文公，皆自成一家。上足以辅黻皇猷，而下足以陶写情性。乃若王元之、杨大年、梅圣俞、秦少游、陆务观、谢皋羽诸君子，则又是端门词人本色也。大抵宋之为诗，取材广而命意新，不欲剿袭前人一字，而诗家反以腐锢之。其与予之向未寓目者，殆亦同病也欤。然而，构思层迭，稍涉议论则有之。夫如是，则选当用何法？曰：“宋人之选宋诗也，而首寇莱公，盖以其合唐调也。王荆公《唐诗选》，李、杜诸大家概不入格，亦本此意。然则，予固以宋人之选宋诗者，选宋诗而已矣。”故于莱公《巴东集》之首而叙及之，以当凡例焉。

（《宋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元诗

元世祖虽以胡人主中国，然亦知尚节义。如文文山，不忍遽杀，辄困而诱之，俾为己用。及需以岁月之久，知其必不可回，而后辟之，以成其从容就义之志。故予读文山狱中《正气歌》，有足悲焉。若谢文节之被征用而不食，韩古遗之逍遥而不仕，要皆随其所欲为，而未尝迫强之。又若许鲁

斋、吴幼清二公，以理学宿儒聘其之官，欲以师世范俗，亡何，亦即放归，以就于其所安者，令后人不至重为二先生致遗憾焉。故其末，运城社迁毁而殉难，则有余廷心；死节，则有王用文；而顾阿瑛、杨铁崖、王叔明、王山农诸君，尚得为有元之遗叟、圣代之逸民也。

予观夫鲜于、袁、赵、虞、杨、范、揭诸名家，可谓盛矣。而萨都刺、雅正卿之出自雁门可都，又皆元上都地也。即若北朝之温子升、庾子山，何多让焉。然人病其纤丽，以多咏物诗，如《鹤骨笛》《走马灯》《芦花被》之类，极其工巧，以求速肖而风人，比兴之义鲜矣。

（《元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明诗

而我国初自洪武迄永、宣，仅六七十年间，而作者名数已轶过宋、元两代矣。乃所称齐名者，在元勋，则有刘、宋；在名佐，则有三杨；在死事，则有张以宁、王祎、孙炎；在殉难，则有方孝孺、练子宁、程本立，又何其与勋业节概相颉颃也。以地而论，其在吴中，则有高、杨、张、徐；在豫章，则有《江西诗选》；在两浙，则金华为尤盛，而四明、绍兴实羽翼之；在东粤，则有五先生；在闽中，则有十才子，而《三山诗选》《闽诗正声》又有出于十子之外者。岂若唐、宋之一二齐名为耨者欤？

（《明兴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明诗选体例

然此其初集也，引之而成、弘为次集，而嘉、隆为三集，而万历为四集。恭惟皇上为中兴右文之朝，其诸人士所以讴歌圣德、黜黜王猷者，又不知其何如盛也。昔吾夫子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然而，卜世卜年，实与文运相为表里。然则谓我国家之文，虽与天壤共敝可也。

（《明兴诗选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曾波臣画与诗超超玄著

波臣善写照，其技入神，人莫不欲求之。往往亦自珍重，不浪相应，而乃喜与贫交。方外之人，画画者，今人也；而观之者，又若以为古人也。或坐或跂，或正或侧，手之所持，意之所向，虽其人生平未必如是，而波臣创之，其人受之，固已超超玄著矣。虽然，波臣不但善写照也，而且工山水也；不但工于画也，而且工于诗也。波臣还闽之二三载，凡为人盘礴作画，俱散之于人，人而珍重之矣。其所为诗者，则可以收拾之奚囊，而授诸梨枣也。波臣将行，予送之诗，有曰：“漫游吴与越，山水娱一身。峭奇非所尚，澹远潜清真。”予但形容波臣画哉，以此而诵波臣之诗，思过半矣。

（《曾波臣诗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医者以意，画不必似

予观上古，创造舟车、弧矢之属，皆由仰观、俯察之圣，而竭其心思、耳目以成之者，未有悠悠忽忽、置其心于无用之地，而能开物成务者也。至若谈诗而另辟一格调，参禅而别置一公案，用兵而奇正之相生，对局而方圆之异势。医者以意，画不必似，皆能直抒性灵，不落窠臼。而成宗匠当家之名，要须宿根聪慧，亲诸知识，而下死工夫，方有人处，又非楮上陈言、口头经济所能了事已也。

（《陈法瞻续集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拙医俗之方

陈子幼负其才，不屑为进取，以任侠荡其产。故陈子读书之处，环堵萧然一秋室也。陈子以此，故肝胆良不俗。或问：“人何以不俗乎？”黄鲁直谓：“人俗最难医，惟读书可以医之。”陈子深知折节而读书也，其得医俗之方者乎！陈子一日与予论书，曰：“有一友工于书者，但未免俗。奈何？”予曰：“笔未拙耳，拙则不俗。”是拙又医俗之方者也。

然则，陈子之涉世巧乎？拙乎？世人固以太拙目陈子矣，予独喜其拙也。盛唐诸公之诗，妙处全

在用拙，拙则浑雄，大雅而无鬪巧、乘捷之病。予每以后人之极思，而不能易盛唐之一字者，工与拙之反也。予观应急之诗，一时不能即就，辄以巧思胜之。而用拙，则非从容暇豫不能。予与陈子论诗，多在暇时，诚有意于陈子之以暇而运其拙也。陈子之人，则太拙矣。世但见其语之工也，而孰知其以拙取效者乎。不知诗者，以诗之工、拙何预人事。知诗者固将曰：“秋室之诗如其人，如其人。”

（《陈叔度秋室编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不苟作无谏词

昔扬子云谓严君平不作苟见，蔡中郎以生平为人作碑，惟于《郭有道》无愧色。夫不苟作者，必其不苟见者也；无愧色者，必其无谏词者也。

（《王奉常集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诗画各有其理

游山诗似画，顾评画之家以为画不必似。夫似者，工笔也。然汉、晋、唐及北宋诸名画，未有不工者。至宋末元初，始开辟一法，似禅家宗门教外别传之指，而工笔不足尚矣。亦犹王辅嗣之谈《易》，端重名理，而扫象于不用也。

不佞窃谓，诗与画各有其理，诗之游山、咏物，犹画家之摹写山川与物像也。有似之而不似者，何于理乖也；有不似之而似者，何于理得也。诗之命题伙矣，属兴豪矣。当其吟咏在心、未出于口之际，能不为兴之所驱与题之所缚，宁逊而就之于理，则庶乎山川物象，皆我诗也，而何必问乎似不似也。我诗之工，即山川物态之工也。不然，则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奚取于物？”

（《张文弱诗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诗恒与记相错会

我友张文弱，盖深于诗者，而诗又多于游山。其游山之诗，恒与记相错会。如太史公之论赞，皆有以参伍传志之所不及，非如后人之屋上架屋也。顷者，司教霍童，名山胜区在其篱落，文弱之游，其为诗与记，又与支提、霍童相为错会，令人观者未游，则如已游已至，又若恍然其所未至也。谓不工者而能之乎？谓庸庸于工者而能之乎？余讽文弱之诗，兴虽豪而韵逾遒，题虽合而思层涌，必有得于意象之外者。然观者又勿作理解。如作理解，则坡公诗有曰：身在庐山境中行，不识庐山真面目。此之谓夫！

（《张文弱诗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 论三山社

余三山社中先亡者，如陈汝大、陈汝翔、陈伯孺、袁无竞、林子真，或耄而迁，或少而折，皆不离诸生也；又如徐惟和、陈幼孺，则既举孝廉矣，而不得一第；如赵仁甫，成进士第矣，而宦不达；又如邓汝高，则宦达矣，而年不满五十。是何世界缺陷，而骚人墨士不能取赢于造物也如此！

夫自汝大而下，其子若孙固多贤，亦不离经生，而罕有以五字为箕裘者。盖此道于我明非进取之资，在士子为不切之务。且习见其父兄之攻于词赋，非穷则夭，多所摧抑，不能畅其生平而垂裕于后昆。譬若人家之物，既不适于用，素又不祥，其不厌而吐弃之者几希。然而风雅之道本于人心，不可废也。朝家功令固在所遗，而海内人士之饶有天资具风格者，亦多习之。

（《邓道协诗序》，《石仓三稿文》卷二）

（责任编辑：陈颖）